

张国焘年谱及言论

盛仁学 编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张国焘年谱及言论

盛仁学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九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15印张·31万字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1185·29 定价：2.80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张国焘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很复杂、很重要的历史人物。随着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展和党史、军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张国焘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对他叛变革命前应怎样评价？对他叛变革命后和在《我的回忆》中攻击党中央、歪曲事实，为其错误辩解的谬论，应如何批判，以肃清其流毒？这都必须根据历史资料说话。

《张国焘年谱及言论》和读者见面了。这是继《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一书出版之后，又一本研究张国焘问题的历史资料。《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一书出版后，曾在史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反响。我带着广大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祝愿和期望，又进行了为时两年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新发掘了许多有关张国焘的文章报告资料，并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编写了《张国焘年谱》。现一并汇集成册，定名为《张国焘年谱及言论》。供研究中共党史、军史、现代革命史、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红军长征史以及研究张国焘问题的同志参考。

这本资料，对《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一书中，已经收录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的决定和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批判两部分内容，这次没有再加收录，但为了保持

《张国焘年谱及言论》一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对张国焘的部分文章报告进行了选录，其目的是为了为了使读者和史学工作者，对张国焘文章报告资料有一个梗概的了解。还要说明的是，对张国焘年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介绍和揭露张国焘从参加革命到叛变革命的情况。为了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在选编文章时未作任何删改。只是对个别标题和个别地方加了说明和注释，对原件字迹不清的地方，均用“□”表示。部分资料的错误内容，甚至反动的观点，务请读者持批判态度，注意鉴别。

这本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曾得到许多单位和个人支持。尤其得到了江抗美、王明渊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搜集资料工作做得不够全面和深入，加上水平有限，一定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盛仁学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日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目 录

张 国 焘 年 谱

张国焘年谱	(1)
-------------	-------

张国焘文章报告资料

大革命前后

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	(99)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102)
国庆日裁兵运动	(111)
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	(114)
中国人民是驯熟了的奴隶吗?	(127)
还是赞助新蒙古罢	(128)
庆祝海参崴工人	(131)
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	(133)
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	(137)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	(138)
我们对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	(144)
革命党的“否认”病	(148)
学生运动的我见	(153)
如何反对铁路共管	(159)

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	(161)
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	(172)
论中华民国底宪法·····	(183)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 的一些情况

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	(196)
“二七”前后工会运动史略·····	(208)
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	(231)
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	(235)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	(241)
民众心目中的广东·····	(245)
张国焘“致扩大会函”·····	(250)
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吗? ·····	(254)
党内必须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257)
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260)
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	(263)

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时期

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	(266)
张国焘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它情况给中央的 报告·····	(274)
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所作 的结论·····	(284)
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的原因 ——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 (节录) ·····	(288)

共产党·苏维埃·红军·····	(297)
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	(299)
贫农团的重要·····	(301)
毋忘广州暴动·····	(304)
战胜杨森的意义·····	(306)
还要百倍努力才能彻底消灭刘湘·····	(308)
坚决肃清反革命·····	(309)
张国焘在赤江、巴中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演讲·····	(311)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政工作大会上的 政治报告·····	(321)

长征路上和叛逃以后

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	(354)
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	(365)
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	(396)
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407)
怎样去正确运用党对少数民族的策略路线·····	(427)
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	(437)
从现在来看过去·····	(448)
关于我的错误·····	(454)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 问题·····	(456)

附：张国焘部分文章、译文、谈话、声明资料目录

索引·····	(465)
---------	---------

张 国 焘 年 谱

(1897年——1979年)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笔名和化名有：张特立、特立、凯音、特、天师、国焘、焘等。

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八年

一八九七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上栗市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一九〇六年前后，在上栗市私塾读书。

一九〇八年春，在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

一九一二年春，进萍乡县县立中学学习。

一九一四年春，进南昌心远中学读书，开始学习近代科学知识。

一九一六年夏，到上海投考大学，认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对其有影响。

一九一六年十月，考入北大理预科学习。

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主编的《新青年》广泛传播。张此时也受革命影响，思想日益激进，爱国之心萌生。

一九一八年，转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学习。

一九一八年五月，张参加北京各大学学生和少数天津学

生代表组织的向总统府请愿反日活动。

一九一九年

一 月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张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等组织“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杂志》月刊。张担任杂志社总务股干事，负责发行工作。张这时与任北图主任的李大钊开始来往，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也来往密切。与“新潮社”的傅斯年等也经常来往，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三 月

参加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市民教育讲演团”，主张从市民教育入手，进行社会改造。

五 月

四日，五四运动爆发，张国焘以极大的热情参加爱国学生队伍的活动，先后担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在五四运动中，他组织集会，发表演讲，显露了才干，是北大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六 月

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参加了大会。在会上没有表决权，但被选举担任总务方面的工作。张对此不满未到职。

七 月

月初，陈独秀与北京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先后被北京政府逮捕。张国焘从上海返回北京，参加营救陈独秀等人的活动。

十 月

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职务，重理学业，转读哲学。参加邓中夏等所组织的“曦园”。

十二月

为躲避警察的搜捕，秘密到上海。

一九二〇年

一 月

张国焘在上海与研究系的张东荪等以及国民党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常有接触。

同年春，与上海的“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开始接触，并于三月初被聘为该协会的总干事。

三 月

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联系，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五 月

张国焘辞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之职，返

回北大，参加李大钊、邓中夏等于三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花很多时间在北大图书馆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与李大钊交往更密切，热心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

同时，张国焘在北大图书馆多次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召集的座谈会，谈论了有关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的情况，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问题。

七 月

下旬，张国焘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议论了如何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有关问题。

八 月

陈独秀为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月底，张国焘返回北京，与李大钊讨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事宜。

十 月

张国焘在北大参加李大钊发起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成立会上报告了关于同陈独秀等会谈的情况，负责进行建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月底，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尚德（君宇）等在北大发起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高尚德被选为第一任书记。

十一月

与邓中夏等多次前往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与劳动补习学校。

同月，在北京小组创办的《劳动界》第十五期上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介绍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创办情况。

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决定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从事职工运动，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一九二一年

一月

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张国焘与邓中夏等人经常去讲演授课。

三月

月底，参加北大第二院召开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成立“事务所”和“筹借油印机”等事项，还选举了团的执行委员会，张国焘被选为执委会书记，并作了报告。

春

受北京小组委派，与邓中夏等多次前往唐山，找邓培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建立党的组织。

五 月

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身份，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加大会筹备工作。

下旬，由张太雷陪同，拜访已到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晤谈了北方工人运动和有关大会筹备问题。这次晤谈奠定了他与国际代表进一步联系的基础。从此，张被推为中共方面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常接触的代表。

七 月

二十三日——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到会代表十三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张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会上，张作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并被推为会议宣言与党纲的起草人之一。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成立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会后，张留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

八 月

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并出版《劳动周刊》，张任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并领衔发表成立宣言。

九 月

在上海参加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发动工人运动。

同月，陈独秀在沪被捕入狱。张国焘在外面散发传单，介绍陈的生平，说陈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这些传单在当时对关在狱中的陈独秀不利，因此遭到党内同志的反对。

十 月

中旬，受中共中央委派，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伊尔库茨克出席远东各国共产主义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张是中国代表团负责人之一。张国焘走后，劳动组合书记部由李启汉负责。

十一月

上旬，到达伊尔库茨克。

十二月

月底，会议改在莫斯科举行。

一九二二年

一 月

上旬，随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二十一日，大会正式在莫斯科开幕，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勉励中国工人阶级要团结其它革命阶级，领导他们共同前进。

三 月

三月间，由莫斯科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大会情况。

四 月

月底，与陈独秀前往广州，筹备组织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

五 月

一日，在广州出席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

中旬，回到上海。

六 月

十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宣言》。

中旬，受中央委派，张携带中共对时局主张的文件到北京会晤李大钊，并在北京支部总支会议上，报告中央发布对时局主张的意义。

七 月

中旬，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报告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会后，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并负责组织工作。从党的“一大”到“二大”期间，张在党内搞了一些小组织活动，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与批评。

八 月

上旬，参加杭州西湖中央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张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案。

九 月

继陈独秀，李大钊等加入国民党后，也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十 月

十日，在纪念中华民国国庆日时，许多城市发生了反军阀，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出现了两条标语口号：一是“打倒军阀”，二是“裁兵运动”；张于十月十日，在《向导》第一卷五期上发表《国庆裁兵运动》一文，对这两条标语口号，作了比较，号召全国人民在打倒军阀的口号下团结起来。

十八日，在《向导》第一卷六期上发表《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危险吗？》一文，批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一文中的谬论，揭露胡适是帝国主义的忠实代言人。

十一月

二日，在《向导》第一卷八期上发表《还是赞助新蒙古罢》

八日，在《向导》第一卷九期上，发表《庆祝海参崴工人》一文。

十五日，在《向导》第十期上发表《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

十六日，在《向导》第一卷十期上发表《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一文。

十二月

二日，在《向导》第十二期上发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不适当地夸大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贬低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地位与作用，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与前途作了错误的分析。暴露出理论上的幼稚。张认为：“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

六日，在《向导》第十二期上发表《不要忘记了山东问题》。

在《向导》第十三期上发表《劳工司与劳工局》一文。

十七日，在《工人周刊》第五十七号上以特立笔名发表《汉冶萍几万工友要失业了》。

二十三日，在《向导》十三期上发表《我们对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

二十四日，在《工人周刊》第五十八号上以特立笔名发表《铁路工人之大联合——全国铁路总工会》一文，文章向工人群众宣传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组织——总工会，号召工人阶级进一步团结起来。

二十七日，在《向导》第十五期上发表《革命党的“否

认”病》。

一九二三年

一 月

二十四日，在《向导》十七期上发表《学生运动的我见》，分析了学生运动陷入低潮的原因之一，就是脱离了民众的革命运动，号召广大学生积极投入到民众运动中去，做革命的宣传。

月底，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郑州出席并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二 月

一日，在郑州普乐园大戏院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大会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破坏。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为了反击军阀的疯狂迫害，决定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办公，二月四日开始举行京汉全路总同盟罢工。

二日，跟总工会的代表一起由郑州移往江岸办公。在江岸汉口车站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办事处。

四日，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张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

七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罢工工人实行血腥屠杀。指导罢工的张国焘在屠杀面前，惊慌失措，丢下广大罢工工人逃离江岸总工会办公室，躲入汉口法租界。次日夜里，又借口向党中央汇报，绕道回北京。

下旬，受中央委派，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二七”

罢工情况。

月底，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六 月

中旬，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代表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张站在“左”倾的立场上，反对国共合作，坚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的。由于他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党的“三大”上，没有当选中央委员。

八 月

二十二日，在《向导》一卷三十七期上发表《如何反抗铁路共管》。

九 月

月底，在北京会晤首次来华的鲍罗廷。

十二月

二十日，以张心诚笔名在《新民国》杂志第一卷二期上发表《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运动》。

月底，在《新青年》季刊二期翻译发表《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并写了“译者志”。在“译者志”中写道：“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不但是很钦佩的，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

这充分暴露了张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本月，与杨子烈女士结婚。

一九二四年

一 月

张国焘作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二 月

七日，二七罢工一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在北京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是该会的实际负责人。

五 月

中旬，到上海参加秘密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共合作、工人运动、农民问题、党团关系等问题。

二十日，回到北京。次日深夜，被直系军阀北京警备区司令王怀庆派出的军警逮捕。张被捕后，供出了中共组织和北京工人运动情况。王怀庆看了张的供词后，将原定死刑，改判监禁。

十 月

二十三日，冯玉祥联合奉系军阀发动北京政变，赶走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中共趁机从平津等地监狱中营救出

“二七”以来被捕的工人领袖。张亦结束了五个月的牢狱生活。出狱后，他向党隐瞒了在狱中的叛变行为。

一九二五年

一 月

一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张未出席这次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负责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二 月

七日，出席铁路总工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向大会致词，在会上当选为铁路总工会委员和铁路总工会名誉会长。

八日，离平赴沪。途中曾在郑州考察当地铁路工会情况。

十六日，抵上海，前往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办事处报到就任。

同月，曾到沪西纱厂考察职工运动情况。

二十八日，在《向导》第三卷一〇八期上发表《海员的新斗争》一文，纪念香港海员罢工胜利三周年，强调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重要性。

四 月

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职工运动复兴及应采取之方针》。

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始末》（报告）。

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海员的新斗争》（报告），强调工人斗争的重要性。

五 月

一日，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作为中共的代表向大会致词。大会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全总执委会决定在上海秘密设立一个办事处，张被选为上海办事处的处长（主任）。

在《中国工人》第五期上发表《庆祝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在《中国工人》第五期上发表《“五一”运动与中国工人》。

月底，返回上海。参加五卅运动的领导工作。

六 月

一日，以全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名义，与刘少奇，李立三等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任会长，参与领导上海的罢工运动。

一日，在《新青年》二期发表《“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

十一月

二十一日，在《向导》一三六期上发表《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一文，认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办法是武装民众，

进行武装革命，变军阀战争为反军阀的民众战争。他说：

“我们要制止战争就必须实行武装的革命”，“唯有武力可以打倒武力，唯有武装的革命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工具，唯有民众武装可以保障永久和平。”

下旬，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决议，张国焘成为被他们开除的九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之一。

十二月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在广州召开。上旬，张与陈独秀在上海与被逐出广东的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孙科等进行秘密谈判，订立退让协议，商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指导机关中不得占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并拍电广州要“二大”延期召开，送孙、戴等回广州参加“二大”。表示中共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与退让，这是张由“左”倾转向右倾的起点。

中旬，受陈独秀委派离沪赴粤，出席国民党“二大”，担任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党团书记。

二十日，在《向导》一三九期上发表《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该信名义上在批判西山会议派，实际上从思想上，政治上，抹煞了国共的根本区别，主动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信中甚至表示“不能如量为国民党服务”，“很觉惭愧”。这封信暴露出张已由最初的反对国共合作的“左”倾立场，滑到了追随陈独秀实行妥协退让的右倾立场。

下旬，在广州，竭力向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宣扬与右派的退让妥协是合理的必要的，反对开除西山会议派，认为“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真正的革命进攻”。指责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犯了“过左”的偏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压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向右派让步。

一九二六年

一 月

四日，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大会重申了孙中山的遗嘱，重申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的党籍。在大会选举中，张国焘执行陈独秀的退让政策，主动放弃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领导席位，使大会受到了不利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结果让国民党右派和中间派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占了优势，从而为以后资产阶级右翼篡夺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下旬，回到上海。

二 月

十日，在《向导》一四五期上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一文，对国民党“二大”作了歪曲性的报导，说“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承认全体代表都在孙总理遗嘱、遗像下，充满革命精神之中，进行这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大会，一切宣言和决议都在以至诚之意，接受总理遗嘱之下把握孙总理的主义和纲领，以最大数的投票决定

的”。“大会结束以前的一切纠纷，制定了许多实现孙总理主义和政纲的计划……”。这实际上起到了欺骗舆论，混淆视听的作用。

三 月

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向中共发动猖狂进攻。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坚决反击蒋介石，但陈独秀、张国焘等认为，“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

四 月

月初，受陈独秀指派，赴粤执行对蒋妥协政策；抵粤后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用所谓“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蛮横地压制党内坚决反击蒋进攻的意见，强令广东区委对蒋让步，一致遵行陈独秀的对蒋妥协政策。

上旬，前往黄埔蒋介石处作“亲善访问”，表示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张的行为，客观上帮助蒋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也更加助长了蒋的野心与反动气焰。

五 月

一日，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五月中旬，蒋介石操纵的伪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即将召开，五月十四日，张前往蒋的住所晤谈，与蒋达成秘密谅解。

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开幕，蒋介石在会上提出

了所谓“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中共，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动提案一公布，即遭到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张不顾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强行签字接受。结果，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蒋介石则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爬上了权力顶峰，为以后进行反革命政变，奠定了基础。

月底，离穗返沪，向陈独秀汇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情况。六月四日，陈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完全接受“整理党务案”，陈张的右倾退让政策客观上促成了蒋篡权阴谋的实现。

六 月

上旬，重返广州，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国民党中央商谈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举行的程序问题，后因即将北伐而搁置。

三十日，在《向导》第四卷一百六十期上发表文章《民众心目中的广东》。在文章中，他一方面表示急于主张北伐；另一方面，借口当时还“没有一个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广州内部不巩固等原因，认为此时北伐是为时过早。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当时是不同意北伐的。

七 月

上旬，北伐出师前，俄顾问加德曾要周恩来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周恩来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在北伐战争中对蒋介石应当采取怎样的方

针。陈独秀要张国焘出面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担任会议主席的张国焘并没有真正组织讨论，只讲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既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使与会同志无所适从，没有任何结果。

二十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张在会上作了“广州之行”的报告。

九 月

上旬，北伐军占领汉口，原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彭泽湘被党派到国民党革命军第八军任政治部主任。九月中旬，张受中央委派到达汉口担任中央驻鄂代表，指导中共湖北区委的工作，成为湖北区委“事实上的书记”。

十二月

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作出了关于《三省党务决议案》，张正式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

冬

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猛烈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基础，成为影响革命全局的突出问题。张国焘不仅不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反而站在右的立场上反对农民运动，指责湖南农民运动“左倾”，这样下去“要出乱子”，必须纠正偏差。

一九二七年

四 月

十二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处于危机之中。

中旬，陈独秀等中央领导由上海纷纷到武汉。

下旬，所任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由张太雷接任，与陈独秀等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决策工作。

二十七日——五月九日，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向大会作的《中央政治和组织的报告》中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会仍选举陈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张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五 月

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继续发展，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运，夏斗寅、许克祥等相继在湖南、湖北发动叛乱。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在汪精卫等控制下的武汉政府下令压制工农运动，共产国际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发动农民没收土地；武装工农，惩办反动军官，陈、张不仅不执行这个指示。并跟着武汉政府限制农民运动。

六 月

上旬，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所部会师郑州。汪精卫等武汉政府首脑拟于六月十日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张于会前赶赴郑州，向汪等游说。企图以继续退让来保持与武汉政府

的联系与合作。因汪精卫等已另有计谋，结果此行失败，六月十二日返回武汉。

十九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冯玉祥公开支持蒋介石，主张“宁汉合作”共同行动。武汉方面汪精卫等日益公开暴露反动面目。

三十日，陈独秀举行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拢汪精卫。张对汪精卫等仍抱幻想，追随陈独秀竭力推行右倾投降的让步方针，结果更加助长了汪精卫的“分共”决心。

七 月

一日，张在汉口向记者发表公开谈话，认为：“现在形势很险恶，这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应该负责任的；民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了我们主观力量与客观的要求，弄得不易驾驭，又引起了当局的反感。现在不能不采取退却的步骤；不退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还自欺欺人地说：“据我看来，武汉的局面，可以因为我们的退却而稳定下来。”他的这番讲话充分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客观上起到了掩盖事实真象，蒙蔽视听的作用，松懈了人们对汪精卫等叛变革命的警惕性与准备。

四日，在汉口参加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

八日，在《向导》第五期二〇〇页上发表《革命势力联合与时间》。

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张是五人临时中

央常委之一。

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象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大革命失败了。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昌起义。

二十三日，张与共产国际新派驻华代表罗明纳兹及瞿秋白在汉口晤谈。讨论以后行动方针等问题。

下旬，当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张受中央常委委派赴南昌指导暴动。二十七日，由武汉到达九江，即以临时中央代表的身份，召集在九江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恽代英，团中央委员贺昌，关向应讨论是否要发动南昌起义，遭到与会者的激烈反对，恽代英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谁要阻止南昌暴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二十九日，张又连发两封密电给在南昌的前委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张的意见被周恩来及前委其他同志所否定，起义仍按原计划准备进行。

三十日，张从九江乘火车赶到南昌，当时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张先发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动。在军队中的同志可以退出，到各地农民中去工作”。他还寄希望于张发奎，认为“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前委书记周恩来驳斥了张国焘的错误

主张，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退出部队，不能把枪交出来，相反，我们要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他坚定地说，“还是干！起义决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接着前委委员恽代英、彭湃、李立三相继发言，驳斥了张的意见，赞成周的主张，纷纷表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张陷入孤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可是原定于三十一日举行的起义，因张的阻挠推迟到八月一日清晨举行。

三十一日，张又以修改起义宣言为由，继续坚持推迟起义的意见。又一次遭到前委的一致反对。

八 月

一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北伐部队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后，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张是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并担任农工委员会主任。

三日——六日，起义军退出南昌，向广东进发。南进途中，张同谭平山制定一个“只”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条例。

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张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九日，前委在瑞金开会，否定了张国焘关于土地政纲的错误主张，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二十八日，起义部队到上杭，张又提出对小地主应有相

当保护，只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再次被前委否定。

二十五日，广东省委送来一份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地主土地的政纲，张遂召集农工委员会会议，按他的意见，通过了“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方案。

九 月

下旬，在起义军占领汕头后不久，张太雷从上海赶来汕头，召集领导同志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命令张国焘立即返回中央，一切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处理，其他同志也迅速转移。

十 月

上旬，起义部队在汤坑溃败后，张逃亡香港。

中旬，张从香港乘船抵沪。

十五日，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揭发批评了张国焘在南昌起义中的错误，要求党中央严肃处理。

十一月

六日，张在中央一个刊物上，看到了张太雷等揭发批评其错误的报告后，于十一月八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进行辩解，说张太雷“不是记忆错误，或传闻失真，便有点故入人罪”。又说“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还诡辩说：“至于我主张仍然用国民政府名义和主张没收五十亩以上土地等，那‘八七’以前的中央确有同样的原则的主张。只可惜我们在山中走了

两个月，与世间隔离。遂不自觉其为机会主义了。”

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张未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张太雷等具体揭发与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会议所作的《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指出：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之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动摇。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一九二八年

二 月

下旬，张在与瞿秋白的一次会晤中，提出要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二月（春），与由汉口迁居上海隐居的陈独秀频繁往来，多次晤谈，张向陈建议，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脱离共产国际的指导，受到陈的赞许。

五 月

中旬，邓中夏会晤张，通知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邀请他出席六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下旬，经东北辗转进入苏联。

六 月

上旬，到达莫斯科。

十八日——七月十日，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张在会上受到批评，被迫作了检查，承认错误，会议仍选他参加新组成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当选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六大以后，张被留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同时给他以学习和改正错误的机会。

一九二九年

张国焘在莫斯科期间，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又犯了许多错误，并且参加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少数学生的小组织派别活动。有一次，中山大学全体学生在大礼堂开会，有部分学生主张采取游行请愿方式，反对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张国焘表示支持他们，遭到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的当场反对，瞿秋白在主席台上向全体学员表示：“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张国焘的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采用这种方式是犯原则性错误的，我们不能这样做。”当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对张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一九三〇年

九 月

瞿秋白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左”

倾盲动主义。

同时，对其错误表示了调和妥协。

秋

王明宗派集团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积极争夺中央领导权。

十二月

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对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上，张国焘宣读了承认错误的声明书，并表示：“自然，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为了蒙混过关，他故意以“左”的语言批判李立三说，“立三执行反马克思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这不是‘左’的错误，这是‘右’的错误。”为了骗取共产国际的信任，他一再表白说：“我们党现在有危机，这是很严重的，要救党，要纠正错误，要服从国际路线。我们认为口头上承认是不够的，在实际工作上要改正。”“现在特别要国际帮助中国党”，“我认为国际要用组织上的办法帮助中国党解决危机”，“只有这样才能救中国党出这一危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决定要张国焘回国。

一九三一年

一 月

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会上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

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新的“左”倾错误对全党的统治。

上旬，张国焘偕夫人杨子烈离开苏联回国。

中旬，抵达上海。

二 月

七日，在党内刊物《实话》第九期上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文，竭力推崇四中全会，说“它彻底批评了立三路线，指斥了秋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外交手腕和对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反对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指导机关，指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作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又说“四中全会是完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又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表示“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示下努力工作”。

二十二日，在《实话》第十期上发表《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的战斗日》纪念文章。

三 月

五日，在《实话》第十三期上发表《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一文，吹捧王明说：“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这些观点是最易混淆两条路线上的斗争，而且右倾分子和立三主义的残余分子都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的反党反国际的行为，他

们或明或暗的反对所谓陈绍禹派，这就是籍反对所谓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他表示要同所谓借反对陈绍禹为名而反党反国际的人斗争到底。张的倾心剖腹的表白，受到了王明中央的赏识。

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决定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主持领导工作，改造当地党政军领导，贯彻四中全会的路线。张对此项任命很满意，认为“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他还说“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以去纠正当地错误的钦差自居。

四 月

一日，与陈昌浩一起乘船离沪赴汉。

四日，抵达汉口；

九日，进入鄂豫皖苏区。

十三日，到达中共鄂豫皖特区和鄂豫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区，与苏区负责人郭述申、王平章、郑位三、周纯金等会面。

中旬，与从前线返回的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会晤，听取军事情况汇报。

四月底，由七里坪出发，到达苏区中心六安金家寨，与先期到达那里的沈泽民、张琴秋夫妇会面。

五 月

上旬，到河南新集，筹备成立鄂豫皖新的领导机构。

十二日，张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决定，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张任分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取得了鄂豫皖的党政军领导地位。并开始在鄂豫皖苏区全面贯彻四中全会的“左”倾错误政策。

不久，张对红四军领导干部进行调整，军长仍为邝继勋，曾中生调任军政委，陈定侯为政治部主任，十师师长刘英，政委康荣生，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委余笃山。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委陈奇。

十六日，中央分局发布第一号通告，宣称：“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

月底，由于苏区粮食发生困难，中央分局发出通知，要求党和苏维埃人员节约粮食，每日吃两餐稀饭。后又开展粮食运动周，号召群众起来生产自救。

三十一日，中央写信给中央分局，指示“要集中火力去对付主要的右倾危险。”

六 月

月初，鄂豫皖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在红军的军事行动方针上，红四军领导同志同张国焘发生了严重分歧。曾中生、徐向前等根据蒋介石正在积极准备对中央根据地行第三次“围剿”，敌军对鄂豫皖苏区暂时采取守势的形势，建议我军留一部分向外发展，恢复蕲、黄、广根据地，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同时，解决经济和粮食困难，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这个

主张是正确的，张却指责，这一主张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提出“巩固根据地和根据地土地一寸也不让敌人蹂躏”的口号，命令红四军主力集中苏区剿匪。红四军执行这一任务时，由于张主张单纯的军事打击，效果不大。六月下旬，红四军领导又向分局申诉，希望采纳原来的建议，但张仍不接受，反进一步指责这是“揭开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并认为，四军干部主张急于向外，将招致敌人再来进攻苏区的危险。这是张与红四军领导冲突的开始。

十一日，中央分局发出第三号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加紧扩大红军、支援红军，加紧反围剿的工作。通知还号召要坚决地丝毫不动摇地反对右倾主要危险，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

下旬，为了迎接全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分局决定从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为选举运动周。

二十八日，张在新集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凭着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全盘否定鄂豫皖苏区过去的工作成绩，吹嘘在分局成立后“当地工作才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会议的政治决议案不仅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而且全面贯彻四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的各项政策。如在土地政策上，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在劳动上机械限制工时等。

在组织上，张国焘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进行了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立三路线残余”的斗争，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曾中生受到严厉的批评，徐朋人被诬为“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开除党籍，陈

定侯被指责为破坏工农联盟。张并任意歪曲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干部政策，在会上宣称党委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应以书记意见为准，知识分子犯错误要“罪加三分”。

在当前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红四军领导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的方针，经过激烈争论，由于许多同志的支持和援助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张国焘勉强同意了红四军领导的意见。但是，这次会议从总的说来，使“左”倾错误的统治在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机关进一步加强。

七 月

一日，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分局决议。通过了苏维埃政府的临时组织大纲及土地、粮食、劳动、军事、外交、肃反等决议案和“红军战士伤亡抚恤条例”。

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在讨论红四军南下行动的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时，张与红四军领导又发生严重分歧。张国焘提出限期一个月攻下英山后，由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红四军领导则主张打下英山后，出击蕲、黄、广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相机出击武穴，威胁长江。虽经过激烈争论，张仍按个人意见作了决定。

十四日，中央分局发出关于反对富农问题的通告，规定富农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政机关已有的富农分子须立即清除出去，富农的土地以及多余的牛和农具房屋应予没收。

八 月

三日，红四军南下攻克英山城。英山攻克后，曾中生、徐向前（这时任四军军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分析研究了潜山、太湖、安庆地区的情况，认为南下蕲、黄、广胜利的把握比较大。因而决定改变张国焘决定的行动方向，南下蕲、黄、广地区，并同时报告中央分局。八日，红四军攻占了浠水，接着又攻克罗田县城。十七日，部队奔袭蕲春北部漕家河驻敌第八旅，全歼该敌。

十七日，张国焘以分局和军委名义写信给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改变军事行动方向是“违抗分局命令”，重复“立三路线”，并严令红四军立即北返。

二十日，红四军领导曾中生、徐向前接到张的信后，即向中央报告，申明反对张国焘东进的错误方针，以及红四军南下的理由，同时，继续坚持南下行动，乘胜攻占了济城，形成威逼蕲春、武穴、黄梅之势，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遥相呼应。

二十七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与军委会又强令红四军“火速回来，不得有丝毫停留”。红四军被迫放弃南下大量歼敌的机会，遵令北返。

九 月

四日，红四军南下部队集中在英山县鸡鸣河，军部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指导员、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工作，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会上，大多数人认为：红四军南下以来已取得了很大胜利，应继续开展英山、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工作，而北返是不对的。会后，

曾中生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向分局与军委会写了申诉信，表示“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的必要”。信中逐条驳斥了张国焘的无理指责，再次批评了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说明了南下的正确性及其胜利的重大意义。

上旬，张收到曾中生之申诉信认为这是“一个哀的美敦书的报告”，遂在新集召开了分局与军委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认为：“现在曾竟然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它办法。”于是派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赴红四军接替曾中生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

十三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接替，随后，强令红四军北返。在北返途中，陈昌浩按照张国焘的意旨，逮捕了一大批红四军领导干部，并开始“肃反”。

下旬，红四军集中到光山县白崔园。张国焘也同时由新集赶赴白崔园。亲自主持“全力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的工作”，在红四军中进行了“大肃反”。在“肃反”中，张从个人宗派主义出发，借肃反为名，残酷地打击与他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又逮捕了大批红四军领导干部，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杀害。同时把肃反向下层发展。

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在红四军先后被无辜杀害和逮捕的干部和战士共达二千五百余人，包括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副师长肖方，政委庞永俊，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以及陈定侯、姜镜堂、魏孟贤等师团级以上

干部四十余人。

十 月

一日，鄂豫皖中央苏区通过关于召集鄂豫皖第一次党代会决议。

九日，张国焘写了《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十一日，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提纲？”提出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等“左”的错误土地政策。

本月，张国焘在光山县浍皮河主持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进行斗争，说在曾中生领导下，红四军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并给曾中生戴上“反抗中央分局”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帽子。中央分局随之按张国焘的调子作出了“关于红四军的决议”，确定了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

十一月

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张国焘与项英当选为副主席。同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原红四军军部改为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

十五日，中央分局发出紧急通知，动员苏区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本月，张在黄安县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中，无中生有地夸大革命队伍内部的敌情，颠倒敌我关系，说：“现在红四军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别活动，就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红军中就是有一万二万改组派也是不奇怪的。”他一方面号召要加紧对红军的改造，一方面又号召还“要改造青年团，发动团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并改造苏维埃，改造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为在全苏区继续肃反大造舆论。

本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为肃反致各县一封指导信”，要求各地加强肃反，继白崔园红军大肃反后，苏区各级党团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地方武装与群众团体都卷入了大肃反的浪潮之中，肃反又采用逼供方式，制造许多冤假错案，成批的干部与群众被关进政治保卫局，许多忠于党，忠于革命，为鄂豫皖苏区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优秀干部惨遭杀害，苏区各级地富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被清洗。

十一月二十五日，张国焘向中央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全盘否定鄂豫皖过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说“鄂豫皖苏区整个来说，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诽谤鄂东北黄麻地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土匪行为”，商城的党是“打着共产党招牌”，“脚踏两只船的国民党”，皖西地区的党“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苏区“党、苏维埃和红军中隐藏着许多危机”等等。并报告说：“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党、苏维埃

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取得决定胜利。以前路线转变不能深入，就是有这些反革命的暗中破坏。”“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个经验“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

十二月

四日，中共中央为粉碎敌人对鄂豫皖的“围剿”，发出了关于敌人加紧围剿鄂豫皖苏区事致鄂豫皖中央分局信和告鄂豫皖工农群众书。在指示信中提出“一寸土地也不让敌人蹂躏”的口号。

十日，为了支援红四方面军围歼黄安之敌，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紧急通知，动员群众拥护红军，解决粮食问题。

二十三日，红四方面军攻下黄安城，全歼黄安守敌。

一九三二年

一 月

十日，在中央分局指导下，鄂豫皖省委在新集召开全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省委书记沈泽民，张国焘当选为省委委员。他在会上宣称：

“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

十九日至二月二日，红四方面军继黄安战役胜利后，又发起了商潢战役，经过十余天的战斗，商潢战役胜利结束。解放了商城及商潢公路广大地区。苏区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本月，分局派政治保卫局到黄安仙居区捕人，引起该区干部与群众的反抗，将其撵走，并呼喊“打倒刽子手张国焘！”“不许保卫局乱抓乱杀！”等口号，爆发了所谓“仙居区事件”，这一事件遂被诬为“反革命爆乱”而遭镇压，因之前后被捕六百余人，被杀三百余人。

二 月

十七日，在张国焘“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鄂豫皖省委作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认为现在“全国革命形势已进到了成熟的前夜”，进攻苏区和红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负”，国民党军队现在只是担任“偏师”的任务，因此目前鄂豫皖苏区党的严重任务是：“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三 月

六日，中央在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在分析了敌人进攻鄂豫皖苏区的形势后，指出鄂豫皖分局对国民党的估计是“过分”的，“偏师”说是“不顾事实的胡说”还具体指示分局，国民党正在调动部队围攻鄂豫皖苏区，兵力在十五师以上，因此，那种“偏师”说是“绝对错误的”。

二十一日，张国焘与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写信给中央，报告红四方面军攻下黄安、商城的消息及今后行动计划。

三十一日，张国焘与陈昌浩又致信中央政治局，报告了“红军胜利情况及请示中央给予指示”。信中指出：“不但

以打破敌人‘包围’，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口号”，而且要以“准备以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并要求中央训令各苏区红军配合行动。

五 月

八日，鄂豫皖苏区红军取得苏家埠大捷，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

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担任鄂豫皖围剿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积极筹备新的“围剿”。

六 月

上旬，中央在给鄂豫皖分局的军事训令中，将敌积极部署新的“围剿”，蒋介石亲自上任，准备向鄂豫皖大举进攻的情况作了通知。

十二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的整个战略部署：首先集中兵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企图以此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

中旬，红四方面军取得潢光战役的胜利。这时，鄂豫皖苏区达到极盛时期，主力红军发展到两个军六个师共四万五千人，地方武装约二十万人，拥有二十余县革命政权，总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

十八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报告潢光战役情况，他在电报中不但夸大潢光战役战果，将歼敌两个旅报告为三个师，而且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并提出沿京汉路南下，威

逼武汉的计划。此外张还指责中央红军“无积极行动，”并自以为是为周围各苏区红军规定战役方向，以配合他提出的战略计划。

十九日，中央分局根据张对形势的分析及战略计划，召开驻新集的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分子报告会。会议不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动员和准备，反而强调继续向敌人进攻。会议报告把蒋介石亲自组织的第四次“围剿”，说成是“敌人崩溃”的表现，只是“集中所有残余力量”来挣扎，提出现在“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占了优势”，战争已转变到与敌“决胜负”的时候，说红军最近即将出击京汉线的行动，“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或对敌围剿一个打击的问题，而是根本消灭围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二十五日，红四方面军向京汉出击不久，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加紧“围剿”部署，向分局提出停止京汉路行动的建议。

二十九日，蒋介石到武汉坐镇策划，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除右路军对付湘鄂西苏区外，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四师另五个旅，对鄂豫皖苏区形成包围形势。在战术上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追，企图逐步逼迫聚歼我军于长江北岸。

七 月

月初，中央分局在夏店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会上，以张国焘为首的分局，否定了徐向前提出的暂时停止进攻作战，集结红军主力于适当地区休整待机，准备对付敌人新的“围剿”的正确建议，坚持红军要实行“不停顿的进攻”，并决定红军主力南下围攻麻城。以实现其威逼武汉的

计划。

七日，皖西之敌徐庭瑤部进攻霍丘县城，张国焘命令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率一个团固守县城。终因众寡悬殊，县城为敌所破，旷继勋只身脱险。战后，张将失败责任全归于旷，撤掉旷的红二十五军军长之职。

上旬，方面军根据夏店会议张国焘的决定，南下围攻麻城，因城为敌凭坚固守，我军不能迅即攻克。乃撤围麻城，向西南出击。

中旬，敌各路纵队陆续发动对鄂豫皖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剿”。

中旬至下旬：方面军在转战出击中，获得一些战果，但并未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张国焘这时仍无视敌“围剿”的严重情况，反而夸大围攻麻城作战以来，所获战绩的意义，进一步提出“打下麻城、宋埠、歧亭、黄陂……打到武汉去，实现数省政权的首先胜利，完成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先决条件”等左的口号。

八 月

月初，张又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二次围攻麻城。

七日，蒋介石下令“总攻”。要各路国民党军队以疾速秘密之手段，深入苏区中心，逼近红军于一隅而歼灭之。

十日，因北线、东线和西线的敌人均逼迫根据地中心区域，敌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进逼七里坪、红安城。在此严重情况下，张被迫决定撤围麻城，命令方面军向西在红安地区迎击进犯之敌主力，企图以此一举粉碎“围剿”。

中旬，红安城与七里坪相继陷落，方面军给西进之敌以

重创后向新集转移。

下旬，蒋介石积极调整‘围剿’军队部署，严令各路敌军会攻苏区政治中心新集。”

二十九日，张对敌人调整部署的行动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在当天致中央的电报中，竟认为敌军的调动结集是溃退，说敌军“已无斗志，军阀内部又起冲突，敌经济恐慌急剧，全国群众革命情绪更为高涨”，提出“全国红军应趁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九 月

上旬，四方面军主力在新集地区与敌军激战五天，歼敌三千，但敌人从西、北，南三面继续向新集逼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为摆脱被敌围歼的严重局面。张国焘一面令四方面军向皖西转移，一面仓促成立鄂东北道委，留当地领导地方武装坚持斗争，自己则率分局、省委及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撤出新集地区，东进皖西。

五日，敌占独山，九日陷新集，十一日占麻埠，十三日陷英山，十四日占商城。

中旬，在敌大军压境，深入苏区中心，前堵后追的严重局面下。张国焘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有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气力”；并于十三，十四日速电中央告急，要求“紧急动员各地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江西中央苏区在接到党中央十四日转来的十三日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电告鄂豫皖分局，指出红四方面军应根据敌我形势，采取“诱敌深入”、“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份”、“各个击

破”的作战方针。张此时已失去打破“围剿”的信心，没有贯彻这一指示来挽救危局。他在燕子河召开会议，提出“出潜山，太湖打游击”的计划。这一行动方向，正适合敌包围逼近红军于英山以南长江北岸加以歼灭的战略目的。张的计划遭多数同志的反对而未果。

十月上旬，四方面军由皖西重返红安地区。西返途中张国焘致信郭述申，要他与东路游击队司令刘士奇和红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组成鄂豫皖工委，留皖西坚持斗争。

十 月

中旬，在敌人四处进逼包围，迫我决战，部队大兵团已失去在苏区内部以运动战歼敌可能的情况下。张国焘在红安县河口镇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部队战略行动方针。张国焘在会上认为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失败。苏区主要地点全被敌军占领，红军主力只有脱离苏区向外线转移才有希望。徐向前等认为敌人重兵云集根据地，红军在内线作战回旋余地很小，亦同意转移外线作战，希图以此调动歼灭敌人，待机打回苏区。最后，会议决定四方面军主力过平汉路以西地区活动，同时决定沈泽民仍为鄂豫皖省委书记，留苏区坚持斗争。会后，中央分局与四方面军总部率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四个师和少共国际团，共计十三个团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往西转移。第四次反“围剿”至此失败。

十三日，部队越过平汉路后，到达洛阳店。张即派人侦察到潼关的路线，企图向西北方向转移，由于徐向前的反对而未果。

十六日，部队进到鲍家店，召集师以上干部讨论行动方针。会上多数同志建议南下与不久前在附近经过的红三军会合，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待机打回苏区。张国焘以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加以拒绝，决定继续西进。不久，他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军事委员会”。这样，张就改变了分局黄柴畈会议的决定，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便由外线反“围剿”一变而为长途作战转移。

十一月

中旬，四方面军进至鄂陕边漫川关一带山地，被前堵后追之敌围逼，形势险恶。张国焘惊慌失措，准备让部队分散突围。如果这样，必将为敌各个击破，甚至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对此进行了抵制，并决定择北面敌之薄弱环节，实行突围。十三日傍晚，全军奋勇从北面突出重围。

十二月

九日，部队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时，原曾任鄂豫皖特委书记的曾中生、曾任红四军军长的邝继勋和曾任红四军政委的余笃山，以及总部的一些同志，对张国焘的盲目西撤不满，便商议派人到党中央揭发张的错误，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后经讨论，改为推举曾中生以书面向张国焘陈述大家对过去领导上存在的问题和当前行动方针的意见，基本要求是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争取迅速在川陕鄂一带创造新的根据地。希望他能采取大家意见改正错误，并将这一意见转报中央。

十日，张国焘得知大家意见后，为了应付这些同志的要

求并缓和部队的不满情绪，即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同志们又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与批评，并且要求把方面军今后行动方针报告中央。张见自己处境孤立，便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欢迎大家提意见，并在会上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又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另一方面则对大家的意见不置可否，更不把曾中生提出的意见书以及部队的行动方针向中央报告。

小河口会议对改善部队领导的团结状况，克服盲目西退，迅速创建川陕苏区，起了积极作用。

十二日，率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渡过汉水，进入陕南西乡县钟家沟。在这里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到川北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讨论和传达进军川北的战略方针。

十四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党中央，报告未能粉碎敌人“围剿”的原因和准备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十七日，率领红四方面军离开钟家沟，开始向川北进军。

中旬，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

廿一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通江以北的两河口，进占泥溪场，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这里召开会议，提出“红军停止转征，在川北创造根据地”的口号，随即建立赤北县（即通江县）苏维埃政府，张国焘参加和主持了这次会议。

二十五日，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先头部队解放了通江县

城。

廿六日，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通江县天主教堂。

二十九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于通江成立，旷继勋任主席。同时，张国焘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布布告：反对军阀地主豪绅的剥削掠夺，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府。

一九三三年

一 月

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进占通江城，并继续向西发展。原四川军阀杨森部旅长任炜章率部二千余人发动武装起义，参加红军。

下旬，张与徐向前、陈昌浩等在通江举行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在通南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号召广大青年男女参军参战。并决定红四方面军组成大批工作队，各部队分区负责。

二 月

七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于通江县城召开，到会代表五百余人，张出席了会议。大会选举了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三十七人，组成中共川陕省委员会。袁克服任书记，余洪远任组织部长，刘瑞龙任宣传部长，姚明善任妇女部长，吴永康为秘书长。

中旬，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到会代表一百五十余人，正式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选举熊国炳为主席。

下旬，敌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頌尧以三十八个团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对红军发起三路围攻。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研究制定了“收紧阵地”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三 月

二十日，在反三路围攻期间，为了加强后方警卫，组成妇女独立营，下辖三个连，共三百余人，营长陶万荣，政委曾广澜。

五 月

十七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空山坝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由徐向前主持。张国焘、陈昌浩及各师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决定集中主力歼灭冒进到空山坝以南敌左纵队十三个团，从而开始大举反攻。五月二十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取得空山坝大捷，歼敌五千余人。六月十五日，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总计歼敌一万四千余人，俘敌万余人，田頌尧军队损失近半。根据地面积扩大到近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余万。

六 月

二十五日，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于通江新场坝召开，到会代表二百四十八人，曾中生代表省委作政治报告，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共川陕省党的任务》的

决议，规定了扩大红军、分配土地、健全政权、开办党校、发行《干部必读》理论刊物等任务。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

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于旺苍木门镇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徐向前就作战和建军问题作了报告，并提出了部队要扩编的意见，张国焘、陈昌浩、傅钟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原有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进一步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恢复“彭杨学校”，培养干部等。

二十八日，张国焘在后方认为，红军“已经站稳脚跟”，于是，大搞所谓“肃反”运动。以“土匪习气”和“通敌”为名，杀害了红军高级将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卞继勋。同时杀害的干部，还有总参谋主任舒玉章，十师参谋长吴展，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韩继祖等。独立师师长刘杞被开除党籍。

七 月

上旬，根据木门会议的决定，部队进行扩编。扩编后，张国焘继续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曾中生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下为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曾传六、张琴秋。部队由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即：四军、五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四个军共十一个师，二十五个团，四万余人。

八 月

一日，张国焘于巴中出席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月初，张国焘、陈昌浩在后方党团活动分子代表大会上，大肆攻击曾中生，指出：“在中生指使下，在小河口公开开会。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并提出其政纲，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去活动，企图加入其反革命组织”。给曾中生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其非法逮捕。强迫曾中生写声明书，交待小河口会议的问题，曾中生据理驳斥。

接着，张国焘为其错误作法大造舆论，妄图掩盖其罪行。三十一日在《干部必读》第三十六和四十四期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和《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一文，给曾中生罗织种种罪名，诡称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攻击：“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形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 B团、第三党”。“立三这种半托洛茨基的观点，无怪乎得到了惯于军事投机的曾中生的极端拥护”，“象曾中生这样的分子就拒绝写声明书”，“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踏，必须执行纪律”，并宣布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并严刑拷打，长期关押。此时，曾中生同志正在为方面军撰写《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当时还非法逮捕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央代表廖承志。撤换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领导干部。

八 月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告诫红四方面军，不要重犯撤离鄂豫皖苏区的错误，并要求在渠江与嘉陵江之间创造巩固的根据地，并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围攻”，扩大苏区，在半年内扩大五万名红军，虽然交通，通讯困难，但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和中央保持交通联系。

九 月

月初，曾中生在关押期间，受尽了种种折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抱着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为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学习和掌握军事技能，彻底粉碎四川军阀新的围攻，巩固和壮大根据地。他回顾和总结了鄂豫皖苏区红军反围剿和红军入川以来历次作战经验，在短短的时间里，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写完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军事著作。

十五日，张国焘在巴中读完该书，不得不承认此书的价值和作用，并在书的扉页上签署了：“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再三探讨，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论——国焘附注。”

十月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刷出版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

十 月

八月至十月，红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央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指示，向敌人主动发起历时两个月的仪(陇)南(部)、

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共歼灭敌人两万余人，缴获长短枪一万二千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质。与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汇合后，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川陕根据地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据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八座县城，建立了二十三个县（市）的苏维埃政权。

一日，张国焘出席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于巴中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

二十二日，张国焘在川陕省苏维埃机关报《苏维埃》第十一期上发表《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一文，颠倒阶级关系和实行过左的平分土地政策，同时夸大各级苏维埃政权混进了大批坏人，因此，进行了所谓“改造”苏维埃政权的过左做法。

十一月

月初，敌四川军阀“剿匪”总司令刘湘纠集一百一十个团（后增到一百四十个团）、共三十万人，兵分六路，以东、西两线，向根据地和红军大规模军事进攻。

下旬，张国焘与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研究制定反“六路围攻”的作战方针，决定采取“收紧阵地，重点突破”，分东、西两线配署兵力，抗击刘湘的六路围攻，徐向前分工担任主要作战方面的东线总指挥，王树声任西线总指挥。

十二月

一日，张国焘在中共川陕省委会机关报《共产党》第二

十二期头版，发表《坚决肃清反革命》一文，再次混淆敌我矛盾，大肆叫嚷要在革命队伍中“肃清反革命”，在红军队伍中进行“查成份、查阶级，决不让一个坏人混进革命队伍”，戒备森严，又一次打击和迫害了许多优秀干部。

十一日，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于巴中县城召开，二十多个县的一千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的中心是动员和组织根据地党、政、军、民全力与刘湘“六路围攻”作斗争，张国焘参加和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大会结束时，张作了《为保卫赤区，消灭刘湘而战》的演说词。这个演说曾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干部必读》第六十二期上。

一九三四年

二 月

七日，张国焘致信四川省委，要求四川省委对红军反围攻斗争给予有力配合，加紧领导川东北赤区周围一带农民反军款，反剿赤经费的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后方，迅速加强重庆、万县、顺庆等几个中心城市的工人罢工斗争。同时，开展白区的兵运工作，使川陕苏区反围攻斗争，以顺利进行。

三 月

根据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指示，在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的基础上组成妇女独立团，下辖三个营，曾广澜任团长。

四 月

一月至四月，红军在东线，西线连续粉碎敌人发动的“三期总攻”。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被刘湘撤职软禁。

五 月

十五日，张国焘在赤江，巴中活动分子大会上作演讲，要求广大党团员和人民群众，不论男女老少都要紧急行动起来消灭刘湘。

八 月

从六月下旬，敌发起“第四期总攻”，七月一日，方面军在万源前线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坚决抗击敌人的疯狂进攻和伺机反攻的问题。随后，部队展开了著名的“万源保卫战”。九日夜，徐向前亲自指挥部队发起反攻，突破青龙观后，率军向敌纵深猛进，敌第五、第六路全线崩溃。此时，张国焘极力反对徐向前同志的大胆迂回穿插的反攻方针，要部队立即收兵向西发展，丧失了东线反攻彻底胜利的大好时机，敌人乘机经宣汉、达县跑掉。二十四日部队迫近宣汉、达县，东线反攻遂告结束。

九 月

上旬，西线反攻，克服了张国焘的阻挠，大胆向敌纵深迂回。取得了重大胜利。十一日克巴中后，主力向黄木垭地区前进，将敌十多个团的道路切断，并包围全歼。十六日收复仪陇，十七日收复南江，二十二日收复阆中、苍溪等地。

下旬，历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胜利结束。方面军东西两线部队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共歼敌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和大量火炮及军用物品。

二十日，张国焘口述《胜利了！做什么》，何柳华（即：廖承志）记录。曾刊登于川陕省委机关报《共产党》第二十五期。分析了一年来反六路围攻我们是怎样胜利的，胜利的经过和以后应该做些什么。

十 月

张国焘与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组织全军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整训。并决定将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改称为红军大学。

七日，蒋介石飞赴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

下旬，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第五次“围剿”，主力向西南转移，开始长征。

同月，张于巴中出席中共川陕第四次党代表大会。

二十六日，张国焘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为彻底消灭刘湘，冲破“川陕会剿”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书》，号召部队深入政治动员，加紧军事训练，迅速充实战斗实力，进一步发动群众，为粉碎敌人新的“会剿”做好一切准备。

十一月

一日，红四方面军于毛浴镇召开全军党政工作会议，总结党政工作经验。提出粉碎“川陕会剿”的行动口号，表彰反围攻作战中的先进单位，并制定“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训词。张在大会上作党政工作的政治

报告。这个报告共分有：我们伟大胜利的意义；世界上的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形势；国民党统治的实质；中国革命的一般形势；川陕苏区的斗争前途六部分。会议于九日移往清江渡继续进行，重点转入军事工作。徐向前同志作了军事工作报告，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基本经验，阐明了红军对付敌人的基本战略战术原则。并指出了会后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方针，要求各部队集中时间，严格整训。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并将这一战略计划在方面军领导人和各军师级领导干部中进行了讨论。

十四日，张国焘在党政工作大会上作总结报告。他对整个政治形势的分析是错误的，看不到随着中日矛盾的加深在国内阶级关系上所引起的重大变化，片断强调各派军阀是要一致地进攻革命，夸大敌人的力量，丧失斗争的信心。

十二月

十一日，张参加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在巴中召开的第三届工农兵代表大会。

一九三五年

一月

四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夸大敌人力量，提出：敌正急调部队入川。上官云相两个师已开安康，敌正赶筑碉堡。山大，贫困人口少，西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来决战防御亦非良策”，为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制造舆论。

十二日，蒋介石派贺国光率参谋团抵重庆，以监督川军“进剿”，并乘机篡取川省军政大权。

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继续西进，准备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十八日，蒋介石布置“川陕会剿”，调其嫡系胡宗南部，丁德隆旅入川，接替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务。

二十日，中央红军制定渡江的作战计划。

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为红军入川电示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威逼重庆，牵制川军主力，配合中央红军渡江。

下旬，为了贯彻清江渡会议决定的，向西进攻，在川陕甘边界扩大根据地的方针，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以歼灭胡宗南、丁德隆旅为目的，夺取广、昭、尔后向甘南发展。

二 月

三日，红四方面军在广昭战役之后，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发起陕南战役。同时，布置三十一军负责造船，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

十六日，中共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因敌以重兵在泸州附近长江沿岸防堵，不易通过，中央红军已停止了原在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主力转向川黔边活动。

下旬，制定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继续贯

彻原定向川甘边境发展的战略方针，同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和黔北的活动，决定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三 月

上旬至中旬，徐向前同志率领部队沿嘉陵江东岸勘察地形，选择渡江点，指挥部队进行强渡嘉陵江战役。以消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敌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岷江之间广大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为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二十八日，渡江战役开始，二十九日，强渡成功。在突破敌沿江防线后连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新明、北川等九座县城，至四月二十一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十二个多团，一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打破了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震撼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

但是，张国焘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及其重大的战略意义，他认为由于中央红军的西进，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会很快压到四川来，竟为敌人即将到来的围攻所吓倒，得出了“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的结论。正当广大指战员在嘉陵江浴血奋战时，他在后方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将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西调，后方机关撤到嘉陵江以西，仅留三百余人枪，交由原绥定道委书记刘子才等领导，坚持当地斗争。在撤退途中，张国焘实行所谓“坚壁清野”，强令红军焚烧和破坏沿途的房屋资财，给人民造成巨大损失，给党和红军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川陕根据地的放弃，破坏了原定向川甘边发展的计划，断送了两年来艰苦

奋斗的成果，使红四方面军再次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五月初，各路敌军从南北两面向我逼进，这时川陕根据地已成白区，新占领的地区还很不巩固，而中央红军已胜利渡过金沙江，并继续北上。

四 月

为争取主动，并策应中央红军北进，红四方面军在渡嘉陵江以后，继续向岷江地区发展，沿途击溃敌人的堵击，控制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五 月

十八日，张国焘不请示中央擅自在茂县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下设政治局，严如党中央组织。同时，还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自任主席。

三十日，张国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主席名义发表《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自称“这是宣布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要取得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同日，又发出《西北联邦政府第一号布告》。并以此名义发出了致全国、全世界、红军游击队等通电，妄图造成既成事实，威逼共产国际和党中央承认。

六 月

十二日，徐向前于茂县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起草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诸同志的电文报告川西北敌我情况，请示作战方针，表示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正以“十二万分的

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十三日，李先念同志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十六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的总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

十七日，张国焘不同意川陕甘方针电致党中央，故意夸大向东北发展的困难，强调北川一带“不易通过”，由岷江东打“条件不具备”，“北打松潘粮食绝无”；主张红军经阿坝草地西进北上，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如果遇到很大困难，“则暂时向南进攻”。

十八日，党中央，毛泽东电示张国焘指出：“目前的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两广方面军“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地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南向川康边之雅安、名山、邛崃、大邑等地发展“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速下决心”。

二十日，党中央又电示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二十六日，为了统一作战方针，克服张国焘的阻挠，进一步讨论和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

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等。

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周恩来着重讲了中央的战略方针及其行动等问题，强调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指出两支红军应由中央统一领导和指挥，但是张国焘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竭力反对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向荒僻的川康边境退却，同时，他自恃人多枪多，狂妄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取得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毛泽东、周恩来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指出：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扭转革命所遭到的挫折；脱离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必将置红军于困境。同时，严正驳斥了张国焘伸手要权的错误，强调红军应由中央统一指挥。

二十八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利用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线尚未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

二十九日，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今理县），（两河口会议通过决议的第二天）立即致电中央，主张红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打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说：“目

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

七 月

上旬，由于张国焘对中央决定阳奉阴违，借口组织问题和统一指挥问题未得到解决，拒绝执行中央计划，故意延迟四方面军行动，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行，遭到破坏。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红军向懋功一带北上，翻越大雪山，到达了松潘附近的毛尔盖地区。

五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会议，蒙蔽事实真相，肆意歪曲中央路线，破坏中央威信，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制造分缓，阻挠红军北上。

九日，张国焘指使他所控制的“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增设军委常委，并提出了具体名单。

十八日，张国焘又指使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就统一指挥致电党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要挟党中央，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党中央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同时，本着大敌当前，以革命大局为重，为教育和争取张国焘，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让红军总政委给张国焘，以争取他北上。十八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芦花（今黑水县城）会议，解决由张国焘提出的所谓“组织问题”，会议对张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尔盖地区集中，但红军的北上时间已耽误一月之久。

八 月

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

四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等。

五日，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了两个方面军会合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决定一、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指出张国焘夸大敌人力量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鉴于张国焘破坏红军团结的行为，决议强调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号召全体红军必须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切有意的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张国焘在大会上玩弄两面派手法，同意北上，但右倾分裂主义思想并没有打消。

十五日，党中央电示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

“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进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并指出：“目前应专力向北，万不能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

二十日，张国焘仍坚持其退却方针。为了坚持北上，党中央于二十日在毛尔盖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作

了关于夏（河）洮（河）战役计划的报告，同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占领甘南夏河和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

中旬，沙窝会议以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决定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右路军以毛尔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九军团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并决定左路军北上到达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

二十一日，张国焘率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借口葛曲河水涨不能通过，按兵不动。党中央电令张国焘按预定计划行动，张拒不服从。

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就《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致电张国焘，指出：如果违反这一方针，主力向洮河以西，敌则沿洮河封锁，我将被迫到黄河以西，然后敌又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我将处于大为不利的地位。再次阐明中央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命张国焘率其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此时，右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及陈昌浩也先后于二十四日和三十日致电张国焘，力劝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指

出：“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九 月

月初、左路先头部队第五军团已抵墨洼附近，但张国焘竟限令部队返回阿坝，停止北上。

三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并决定左路军三天之内全部返回阿坝，拒绝东进与右路军会合。同时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要挟中央立即南返与左路靠拢，党中央见张国焘别有用心，长期等待敌情严重，势必陷入险境，当即决定在巴西召开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张国焘执迷不悟，势必使党和红军遭受损失。决定党中央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共八千余人，从巴西出发经包坐，到俄界继续北上。

上旬，党中央北上后，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作出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污蔑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是“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而把自己的向南逃跑美化为“进攻路线”。

九日，党中央率领部队从巴西出发，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即北上，并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北上方针决不应改变。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并声言南下“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张国焘毫无转意，仍继续反对党中央北上方针。

十日，党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

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不可能打到四川去，只能向康定退却，白白挨冻受饿，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并大声疾呼：“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

十二日，张国焘回电中央：指责一、三军团“单独东进”是“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莫及”。“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要冻死”。

十二日，党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点名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揭发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抗日方针，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大量错误事实。

十四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时，再次电示张国焘，恳切说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只是为着实现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再次摧促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

十五日，张国焘不顾中央命令，一意孤行擅自率领四方面军和原红一方面军建制的五军团南下，于十五日和十七日先后发布了《大军南下命令》和《大军南下政治保障计划》，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

十九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甘南哈达铺，等待张国焘三天之久。后得知张国焘已拉着红四方面军南下，才继续北上。途中，党中央获悉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具体情况，遂决定到陕北去，同陕北红军会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于十月十五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及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从此，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开

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下旬，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五军团、三十二军、四军、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集结于马塘、松岗、党坝、绰斯甲以北地区。一路上，雪山草地秋风凛冽，天寒地冻，战士衣单鞋缺，粮食不足，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过草地，许多红军指战员牺牲，部队减员甚大。

十 月

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东南）非法成立伪“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上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丑剧。他还以伪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了《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傅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和叶剑英免职查办。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七日，张国焘为贯彻其南下方针，发出《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以五军团、九军二十五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和丹巴；以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在大金川以东进攻，夺取崇化和懋功；三十三军及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掩护后方。

八日，各部队按计划行动，至二十日战役结束。总计击溃杨森、刘文辉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占领懋功、丹巴两县城及绥靖、崇化等重镇。

十二日，攻克绥靖，十五日攻占崇化，十六日攻克丹

巴和抚边，二十日攻克懋功。

二十日，张国焘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规定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攻取天全，以一部向汉源、荣经活动；以三十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先占宝兴、芦山，再向名山、雅安进攻；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一部分巩固懋功等地，主力向东伸延，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三十三军团五军因为左右支队巩固后方，威胁两侧之敌。二十四日战役开始，到十一月十二日，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虽歼敌五千余人，但红军伤亡很大。

十一月

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指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进行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另一个团，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

十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只有一个中央。

十六日，敌刘湘急调主力王缙绪，唐式遵、范绍增，李家钰等八十余团兵力进攻百丈关，张国焘命令部队冒险进攻。敌拼命反扑，方面军与敌激战七昼夜，虽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但红军伤亡近万，严重失利，遂于下旬撤出百丈关，转入守势。拟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过冬。这是张国焘率兵南下从进攻转入防御退却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的严重碰壁。

十二月

五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狂妄地宣称：（甲）此间已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十四日，张国焘发表《抗日反蒋与土地革命》一文，错误地分析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以此，对抗中央的抗日路线和抗日政策。

二十日，张国焘《为抗日反蒋运动中策略问题给何畏、伯承两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歪曲了党的抗日宣言，竭力宣扬他的《抗日反蒋与土地革命》一文的重要性，说什么“关于《抗日反蒋与土地革命》一文，全文都着重无产阶级领导，整个意思是争取无产阶级在反帝中领导，这自然与轻视反帝领导，轻视民族改良主义危险，在无产阶级已经获得领导的胡说下掩盖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这种观点是相冲突的”。

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回国到达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会议听取了林育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二十七日，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

当中央把这一会议精神立即电告张国焘时，他竟攻击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显然是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放弃自己的主张”，“如韩文公之祭鳄鱼”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九三六年

一 月

六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共产国际承认他所谓非法的伪中央组织。

十六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第一次全苏大会准备会上报告《苏维埃运动》。

二十二日，党中央鉴于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已达到公开另立中央的罪恶行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全党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以教育党员和红军干部。

二十四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同时，指示张国焘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

二十七日，张国焘致共产国际代表团林育英电，指责：党中央“不将党的策略路线改变预先电告我们，不将国际决

定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道的告诉我们，不但表示服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表示“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路线，“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

“对兄处中央委员会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然用毛主席名义”。建议在目前紧急的情况下：“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二十八日，张国焘在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用他自己的话讲解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宣称：“我们这一策略路线的改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的深刻的讨论而确定的。”

“共产国际指示的这一策略路线，现在二、六军团和陕北的同志大家都是同意的。”“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和陕北的同志们采取各干各的，互不相管的态度，现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过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会上来解决，是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组织上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正在提议，解决办法目前应在适当地区内建立中央，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们成立西南局。”虽然。张原则上同意中央的路线，但他的反党分裂活动并没有停止。（这个报告曾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出版的《干部必读》第六期上）。

二 月

八日，共产国际代表团林育英为保全廖承志、曾中生（一九三五年六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西部卓克基）的生命安全致电张国焘，指出：“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组织全部垮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化，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

十一日，因天全、芦山敌情严重，张国焘发出《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开始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张国焘在其伪中央政治局决定中被迫承认，停留川康不利，抵达道孚、炉霍。

下旬，由于张国焘顽固坚持其退却逃跑主张，致使红四方面军遭到了严重损失，部队由南下时的六十五个团、一个骑兵师的十万人，迅速削减至二十八个团四万余人。至此，张国焘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彻底失败。

三 月

二日，张国焘致电邵式平，关于夺取康定为向西北发展作准备，提出：“我军在天全、芦山已成持久战，因决以主力首先灭李抱冰取康定，为将来向西北发展的准备。”

四日，张国焘，陈昌浩关于袭取炉霍，甘孜及组织粮秣致电徐向前，提出：“我军以夺取道、炉、甘、瞻之目的。”

“先制各部衣物，并替后方及他部准备每人十斤干粮，两斤干肉，供十五天吃。”

七日，张、徐、陈关于大金川地区部署致倪志亮、邵式平、黄超电。

十五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张国焘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继续坚持南下逃跑的错误方针。他认为“第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中间”。否认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高潮。继续攻击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是“退却逃跑”，无耻地吹嘘南下“正确”。诡称：“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团能顺利地达到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能顺利的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同时还叫嚷：“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

四 月

一日，张国焘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张国焘又提出所谓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宣称：“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藏、西康的几个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这与中国革命是有着极其

重大意义的。”张在这个报告中竭力掩盖其南下以来遭到的严重损失，鼓吹南下“胜利了”。继续攻击中央北上“逃跑”、“分裂”、“右倾机会主义”、“脱离险境”等，散布其企图偏安西北边陲之谬论。

一日，张国焘发出《目前我军行动任务的指示》，提出：“我们的行动计划与当前的任务，为实现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我们最近的行动计划：①首先消灭李抱冰，配合二、六军团。②首先赤化西康道、芦、甘、瞻等县，完成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向西北开展。”

一日，张又发出了《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提出什么“为要坚决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各级干部必须细心的耐烦的有系统的研究西康及整个西北的地形道路，社会情况，并将所得的材料报告我们”。

十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陈昌浩，“二、六军团北上已成事实，四十日内可接通。应努力筹集资粮，完成四、五两个月战斗准备工作，必能争取会合二、六军团和实现北上的胜利。”

十五日，张国焘和朱德关于策应二、六军团过金沙江致徐向前电：“提议三十二军进到江边接应。”

二十日，张国焘、朱德关于迎接四、六军团的部署致徐向前、王树声电：“会合二、六军团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阻止敌人的截断，相机消灭雅江李敌，并伸到稻城以致金沙江边去迎接二、六军团。”

二十一日，徐向前关于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致张、朱电：“与二、六军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大军往返减员必大，且天候亦不允许，我们迟迟而行。一面我

们配合，一面仍须他们巧于运动，因敌无法用大兵”。月底，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渡过了金沙江、进入西康地区。四方面军一面派出部队接应，一面发动红军做好迎接会师的准备工作。

二十五日，张国焘在伪中央局会议上，作《怎样去正确运用党对少数民族的策略路线》的报告，提出：“党的策略是领导广大番人下层群众的独立解放运动，甚至成立完全独立的波巴依得瓦共和国”、“波巴依得瓦政府”（即：藏族人民政府）。

五 月

五日，张国焘在甘孜组织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并决定从阳历一九三六年起改元为波巴人民共和国元年，发表《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声称：

“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后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现在“我们的旗帜是‘波巴独立’，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兴番灭蒋’！”“并宣告一切赞助和同情波巴人民独立的国家或民族，政府或军队都是波巴人民的朋友，必须与之建立友谊的联盟，订立各种平等互惠的条约”。“更希望于最短期内，得到各方面亲密联合，并派代表来参加，共举波巴独立的伟大事业。”张国焘其用意和目的是妄图取而代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他的所谓康、川、青边抗日根据地为本营，进而统管天下。

中旬，徐向前率领红三十二军由雅江、西俄向西发展，

攻占理化（今理塘）。

十六日，《干部必读》第十六期上发表张国焘在五五纪念节上的报告，（五五纪念节，是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一十八周年，马克思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出生）张在这个报告中，用他自己的话讲解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运动，指出：“现在和二、六军团会合迫近了，这将要更大的增强我们的力量，汇合各方面的斗争经验，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张在这个报告中继续攻击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机会主义者所利用”。“我们和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在党的路线上团结起来，在卧薪尝胆的时期更加团结起来，坚决与敌人奋斗到底”。现在，“公开宣布了波巴成立，组织了波巴的中央政府，并宣告了参加联邦政府，成为西北联邦政府的一部分。这也实际的证明了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有若何大的关系，倘若我们有一部分番民骑兵和我们一块去西北活动，这对我们有莫大的帮助。一切忽视少数民族，说番民是中国革命的障碍的机会主义都更一次证明了他们政治上的破产。”

二十一日，张国焘发出《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不得不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粮食的缺乏”使当地的“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因此，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张国焘所说的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不是要到陕北去同党中央会合。他说：“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增加了更多有利条件。”“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

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电讯红四方面军“今后具体行动方针”。

六 月

三日，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军在理化（今理塘县）的甲洼寺与六军团先头部队十六师会合。

六日，张国焘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被迫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张提出：“我们双方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十日，张国焘电复中央，同意六月底共同北上，准备向夏河、洮州西北部行动，仍不愿与中央会合。

二十三日，红四方面军作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向松潘、包座一线作前进的部署。

二十四日，张国焘在二、四方面军活动分子会议上报告《关于新策略路线的具体运用》，张被迫传达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所谓：“我们进入西北地区时——以前是工农

红军，工农革命委员会，工农苏维埃——现在我们的名义在政权上还是人民苏维埃军队，是人民抗日红军，革委则用人民革命委员会。”“北方局方面主张用抗日国防政府的名义。”

“在西北也当然有可能组成西北抗日国防政府。”张仍然不愿同党中央会合，而是要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

二十九日，红四方面军发布二次北上的政治命令。

七 月

一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在甘孜以西的绒坝岔与二军团会师。二月，党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者，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二日，红二方面军的二、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等对张国焘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并坚定地表示：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只有北上抗日，才有出路，任何分裂活动，都是损坏革命的。

二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召开干部会议。二、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上由于朱德、刘伯承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由于徐向前同志代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张国焘企图分裂二方面军的阴谋又告失败，终于明确决定了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二日，红二、六军团奉党中央命令，正式改称为“红军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

三日，红二、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北上。

二十二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北上，并指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并指出：“国际电台联络之日起已畅通，张国焘兄将四方面军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

二十七日，甘孜会议后，经党中央批准，二、四方面军组成西北局，书记张国焘，副书记任弼时。

二十八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二、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情况，“八月中旬可否出甘南”。

“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

二十九日，红二、四方面军各纵队通过草地，从二十七日至八月一日间先后抵班佑、包座地区。此时，中央来电祝贺并指示迅速北进，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

八 月

一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进发生困难”。“包座到哈达铺五百里有险隘五、六处”，“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腊子口以北即脱离番区，地势宽敞，人烟稠密，便于部队之休息整理”。

同时，中央军委致电指出：敌朱绍良“凭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线取攻势防御，封锁二、四方面军于川、康、青、甘边区内，阻我会合，并由川、康抽兵分头追击”。

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党中央关于迅速出甘南的指示，决定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

五日，红二、四方面军各纵队先后向甘南挺进。九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抢占天险腊子口。十日，八十五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并包围岷州。二十六日，八十九师克渭源。九月七日，九十三师克通渭，至此，四方面军先后攻占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县城及岷州、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打破了敌人堵截计划。

九 月

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反蒋不能并提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指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底开始改变此口号。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

十一日，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占领洮州、通渭等地之后，张国焘违反甘孜会议决定，要部队停下来，建立“甘南根据地”。并将二、四方面军之实力及活动地区致电中央。同时，提出：“现成立两个省委；一以岷县为中心，名甘肃省委；一以成、徽为中心，名陕甘边省委。政权组织为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

十四日，毛泽东电令“四方面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红一方面军在固

原西部硝石河地区之部相机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

十七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我一师已到界石铺、现在静、会北端之单家集一带”，准备配合，“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十八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岷县三十里铺召开西北局会议。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党中央的电令，否定了张国焘西绕青海，进出甘北的错误主张，坚持既定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并根据党中央指示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中旬，二、四方面军发布“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迫击胡部为目的”致电党中央。

二十一日，党中央关于组织军委主席团致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电。指出“（A）四方面军北进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B）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C）主席团地点暂时以在同心城附近为适宜”。

二十二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漳州再次召开西北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拟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先机占领甘北，而后实现与一方面军会合，全力夺取宁夏的战略目的。

二十五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方面军总部的决定，改变原计划，方面军总指挥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

十 月

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抵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第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

九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一方面军的热烈欢迎。

十日，会宁城内万众欢腾，举行了盛大的会师联欢会。二十日，二方面军进抵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二、四方面军结束了伟大而艰苦的长征，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了大会师。

十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联名发出贺电，热烈庆祝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向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祝贺。贺电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线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

十一日，党中央根据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形势，向全军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和准备之后，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公路以北，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来犯之敌，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样，就可以使东临华北抗日前线的陕甘宁根据地，从西北方靠近外蒙古，便于打通苏联国际路线，造成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因此，此时，党中央发布了《宁夏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

二十五日至三十日，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奉命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仍站在

右倾分裂主义的立场上来对待党中央的这一指示。他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是去宁夏，而是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继续追求他的所谓“大西北计划”。

二十五日，党中央致电指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去破南敌”，“第二步重点、集中注意力于向北”。张国焘对党中央的上述指示，阳奉阴违。他不顾大局，对在河东向南作战根本不予重视，一心想着如何根据军委命令，尽快渡河西进，实现他的所谓“大西北计划”。

二十六日，党中央发现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二十八日，党中央电示张国焘等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其余以坚决击破胡敌为目的”。“除九军、二十军已过河”，“其余以坚决击破胡敌为目的”。

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党中央连电张国焘，立即停止西进，返回河东准备夹攻战。

二十九日，张国焘命令已过河部队向西疾进。

十一月

五日，张国焘电令河西部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

十日，党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命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陈昌浩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二十二日，西路军向党中央和军委报告敌我态势及面临的实际困难，请示作战和行动方针。

二十一日，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在党中央的指挥下，胜利地进行了山城堡战役，全歼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团，击溃敌王均部和毛炳文部两个师，共歼敌二万余人。

十二月

一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回到陕北保安，同党中央会合。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同志的归来。

七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四方面军一部分同志进了保安的红军大学学习，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严肃地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指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

一九三七年

二 月

六日，张国焘在延安向党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十分简单地承认了他与党中央闹分裂，闹独立，达到政治上组织上的根本对立的严重错误。他在检讨中掩盖了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事实，说：“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会合时，我与当时的党中央有过分歧；但在十二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在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在政治上一致的基础上，又在西康地区自动的取消自称中央的错误行为，成立西南局，从政治上的一致走到军事策略上的一致，组织对立的撤销，一直到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的统一。”“错误观点在那里呢？”张国焘说：“第一，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第二，抹煞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第三，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意见；第四，对中央的批评和指示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对组织原则不够布尔什维克的了解，军阀主义倾向得到发展，这些就是错误的根源。因此在过去一个时期中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和组织上的对立，这在

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三 月

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以及候补中央委员和红军军以上干部共五十六人。会上，张国焘首先作检查，他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错误事实上，却又进行狡辩，拒不认错。会上，有三十几人先后发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会上，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在三十日的会议上，洛甫代表党中央提议，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因为在估计到张国焘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也还应考虑到他在党内的历史，是个老同志，曾参加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已开始承认错误。为了挽救他，还应给他时间，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同意党中央的这一提议。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深挖了其根源，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四 月

六日，张国焘写了《关于我的错误》的声明书，表示：“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

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入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的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五月——六月

在镇原、平凉地区活动的红四军和三十一军，在援西军党委的领导下，也参加了反对张国焘的错误的斗争。任弼时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和解释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全面展开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后，也先后展开了这一斗争。

八 月

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时，张国焘表示愿意工作，同意党当前的政治路线。党中央虽然停止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为了给他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是，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他表示不赞成党中央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

三 月

张国焘趁国民党决定四月四日派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去祭黄帝陵之机，和国民党的特务秘密勾搭，精心策划了一个

叛逃阴谋。

四 月

一日，张国焘在延安城南同一个国民党“记者”密谋后，带着警卫员张海、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座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到达黄帝陵。

四日，祭陵完毕，张让其余的人乘卡车回延安，他带着警卫员同国民党行营主任蒋鼎文到了西安。张国焘到西安后立即住进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所住的西京招待所。由于张的行动诡密，引起了警卫员的怀疑。

七日，当张国焘正准备乘胡宗南的专列去武汉时，警卫员张海立即打电话报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告诉他张国焘搞不好要走，让他到车站来一下。林伯渠同志闻讯后及时赶到车站，对张国焘反复进行了劝说，要他不要走，但他执意不肯，一定要去武汉。林伯渠同志回到办事处后，立即向党中央报告了张国焘脱离西安赴武汉的情况。党中央为了再一次挽救张国焘，便密电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武汉工作的周恩来、博古等同志，让他们在武汉寻找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十一日，张国焘到武汉大智门车站。周恩来派人到车站来接他，要他留驻八路军办事处，他执意不肯，竟在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下，扬长而去，住进大华饭店。张住进大华饭店后却电告党中央说：“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为了争取张国焘回心转意，回党工作。周恩来当晚亲赴大华饭店找张国焘，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周恩来指出：对抗党中央的指示，擅自离开延安是十分错误的。张

国焘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公开表示：他对革命已经动摇，对党的组织和党的总路线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绝望，不愿再干革命。张国焘再三表示：“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到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我家有饭吃，我以后再不问政治了。”他还诬蔑党中央在延安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结论是错误的。对此，周恩来一一进行了驳斥，同时，责令他等待党中央的指示，不得擅自行动。

十二日，应张国焘的要求，周恩来陪他游览武汉市容，办事处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张国焘的行李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张回到大华饭店后，见没了行李，只好移住办事处。

十四日，他又要求周恩来陪同他晋谒蒋介石“汇报边区工作”。周恩来陪他到了蒋介石那里，张国焘开口便无耻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向蒋介石摇尾乞怜，露出一副叛徒的丑态。在返回办事处途中，张国焘乘周恩来与另一同行同志谈话之际抽身急驰而逃，又从汉口渡江逃回武昌，住进一家戴笠事先为他安排好的旅馆。办事处的同志见张国焘深夜未归，派人四处寻找，在得知他所住旅馆后，即又于深夜劝其返汉，当他不得已返汉时，坚决不愿再回办事处，于是遂寓于一个“朋友”家中。

十七日，党为了最后挽救张国焘，周恩来、博古等同志再次找他谈话，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鉴于“张国焘的政治观点既如此悲观，而个人行动又如此反常，我们知对他已无从迁就可能，遂正式向他提出三点办法：（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

一时期；（3）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当时他的回答认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并允许其两日内闭门考虑后答复。不料谈话后不及一小时，当晚，张国焘竟乘坐有三人的保护汽车，跑到了太平洋饭店。临行时用书面写交给周恩来、博古等三同志的信说：

“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从此，张国焘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十八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大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十九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向全党详细说明了张国焘叛党的经过，深刻地揭露了张国焘叛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根源，表明了党对张国焘脱党的态度。

二十二日，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一文，在武汉《新华日报》上正式公布之后，张国焘派人将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写好的两封信送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二十二日的信中写到：“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

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突阅有开除弟党籍之公布，便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同日，张在国民党的《扫荡报》上发表《张国焘声明》。为他的叛党行为辩护。

二十八日，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揭露了叛徒张国焘所犯错误及其逃跑脱党经过。

五 月

六日，张国焘又抛出所谓（《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这实际上是他叛党的投降的自首书，在这篇所谓《敬告国人书》中，掩盖他逃离陕北，投降国民党的事实真相，反诬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是什么“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在这个自首书中：张国焘极力鼓吹国民党炮制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无耻宣称：“三民主义是中国救国建国的唯一主义”，“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他愿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下，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六 月

二十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发表《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一文，对张国焘的造谣、诡辩和反共谬论。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九 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会议上，发表声明，郑重宣布：“党巩固自己的队伍，驱逐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分子，党开除了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因为他是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事业的叛徒与逃兵。”在听取了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的决定。此时，张国焘正在桂林观光。广西建设厅长黄公度，在他办的《建设杂志》上，全文公布了共产国际批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看后，“大感丧气，认为是戏弄讥嘲他，因此，扫兴离桂去渝，住在重庆张家花园。张国焘叛党后，加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主办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十月——十一月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张国焘出党的决定。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政治局代表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是绝对正确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意见，即是：张国焘的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七九年

一九三九年前后，张国焘经同乡朱家骅的亲信机要秘书甘家馨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朱推荐他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张是无功受封，特务们甚不服气，更不信任，因此，张说：“这里无计可设，无公可办。”不久辞职。

一九四〇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张分别出任了国民党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结果无政可参，是样子货，活动不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召见张国焘，叫他草拟了一个如何管理全国粮食和物价问题的方案。尽管他一窍不通，却不负主命，熬了几夜，写了几万言书复命。但如石沉大海，永无回音。

一九四六年，又几经周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救济分署署长。当时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曾和红四方面军交战川北，田颂尧、王陵基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刘湘撤职，拘禁数月，张国焘是王陵基终身之恨。张任署长，王旧恨未消，因此多方刁难，张到职不满两月，就被排挤去沪。

一九四八年六月，张国焘在上海筹集了约一百二十两黄金，办起了《创进》周刊。主要从事思想上的反共宣传。但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重视，不按价供应白纸，唯张国焘办的《创进》周刊不受优待，后经国民党中宣部长黄少谷说情，才配给官价纸。年终，淮海、平津战役国民党百万部队被歼，中国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使张国焘惊恐不安，蒋家王

朝大势已去，便举家大小于十一月中旬逃往台湾。在台北市新北段租住了一栋房子栖身。反动周刊《创进》停刊。

一九四九年冬，张国焘举家到了香港，化名“凯音”。不久，参加了顾孟余等人的第三势力运动，创立“民主战斗同盟”成为“战盟”领导人之一。同时，创刊了《中国之声杂志》，张国焘任社长，不久，因与“战盟”宣传部长李微尘发生分歧，相处不洽，张辞去社长职务。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黄金市价逐渐上涨，张便以五千元美金作押，到香港金融市场上干买卖黄金生意。最后连老本都丢光，一贫如洗，仅靠大儿子教书维持生活，其妻因生活奔波，摔断臀盘骨，成为跛子。

一九六一年前后，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约稿，开始写回忆录，“肯大”每月付给二千元港币作为生活费。张国焘《我的回忆》成书后，得了一笔稿酬，靠稿酬维生。此时，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也写了《往事如烟》，后改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一九六六年，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国焘移居美国。

中美建交后，张国焘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市和长子张海威住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张国焘患中风，右手脚瘫痪，卧床不起。家里无多余房子，为了让三儿子张渝川结婚，张国焘便住进了加拿大官办老人免费病院。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日，加拿大多伦多市下大雪。医院条件差，病员多，护士少，冬天有时无暖气供应，夜里无护士值班。夜间，张国焘翻身时，被子、毛毯掉在床下，叫

人无人，自己又动不了，至三日晨冻死。五日埋葬在多伦多公墓。

盛仁学 江杭美编写

张国焘文章报告资料

大革命前后

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张 国 焘

长辛店离北京有三十里路程，是京汉路唯一的重要铁路工场所在地，有工人三四千人。地方虽然是很小很不开通，但是工人们是很热心很有见解的。这地方从前所组织的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会，都是工人做中心，救国十人团有工人的团员五百余人。他们屡次赞助学生运动，每次为公益的事情捐款，总在百元以上，从此也可以见他们的魄力之一斑了。而且现在还正在进行劳动团体的组织，预备和上海及各埠的劳动者——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联络一致，并进于与全世界的劳动者握手，现在他们觉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由十几个最热心的工人自动的发起一个劳动补习学校，不久就可开学。他们的募捐启事和简章等，我现在把他录在下面。各处的劳动者，你们看看他们的精神，是怎样的好呢！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募捐启事：

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呢？看下面简章第一条就可以知道，此处不再辞废了。有人要问长辛店不是已有“劳动高

等小学”“工界国民学校”“女子国民学校”……几个学校吗？何必添此一个。我们答：“高小”、“国民”、“女学”仅限于儿童一方面；可是已成年之平民尚那么多，长辛店为铁路工场所在地，劳动者亦复不少。请问这一大部分人，到何处所，觅何机会，可以领受一点教育呢？现在的潮流，“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头子、小孩儿，都应该领受的”，差不多已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意义。何独于长辛店地方两样呢？同人等根据这个理由，所以发起这个学校。不过我们的力量很小，不能不仰求各界加以经济上的援助。热心的先生们啊！务望你们“解囊捐输”，使此校得以成立，那么，不仅同人等之幸，而长辛店的劳动社会，“获益”尤为不浅啊！

附录简章及预算案于下：

（甲）简章

（一）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

（二）凡身体强健，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

（三）本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每班暂定八十人，分组上课。

（四）本校课程：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

（五）凡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

（六）由本校创办人和热心赞助人，组织校务会议，主

持本校一切进行事宜。

(七) 本校设驻校办事员一人，由校务会议选任之执行本校事务。

(八) 本校教员，由校务会议聘请热心劳动教育者担任之。

(九) 本简章如有不适不尽之处，得由校务会议随时增修之。

(乙) 预算案

(一) 开办费

1. 制桌凳三十张洋五十元。
2. 修理校舍洋二十元。
3. 杂费洋十元。

共洋八十元正。

(二) 经常费

1. 校舍房租每月约十三元全年约一百五十六元。
2. 驻校办事员（兼教员）和专任教员每月共支洋三十元，全年三百六十元。
3. 校役一人月支七元，全年八十四元。
4. 书籍文具等费全年四十元。
5. 杂费每月支五元五角全年共支六十六元。

共七百〇六元

发起人 陶善琮 段其伟 史文彬 施五常 郭长泰
张 珍 李茂银 武明科 邓长荣 陈励懋

（原载《劳动界》15期，1920年11月21日）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①

张 国 焘

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的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了不少困难，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

在报告之前，我尽量简略地向你们叙述一下北京社会生活的情况。

一、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继续保持着杂乱无章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二十万这样的居民，由于他们的忠顺，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可再加上高级和低级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有约三万个干着各种可疑职业的人物。北京的人口不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

^①这是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正如我们所说的，北京是公认的政治中心，因此，似乎这地方的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军官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追求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

怎样解释北京的居民抱有这种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牢牢地记住了古老的哲学家们的说法，他们说：“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天命的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第二，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第三，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关于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

在“文学”革命后（推行白话文等等），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志向。与此同时，在瓜分战利品的会议上，中日之间因山东问题发生了冲突，这就引起了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五四运动”。这时，学生已作了很大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逐渐削弱。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

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

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可以大体上分为三派：1.民主主义运动；2.基尔特社会主义；3.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的混乱不堪的思想，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与这帮家伙相差无几。拿起任何一张、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自然，这种运动所使用的手段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说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大概已意识到他们向群众发出呼吁是怎样重要，但是他们除了散发他们的小册子和坐牢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例如，在去年五四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已集合了三十人，可他们也没能在工人中亲自发起组织游行示威，只限于印刷一些周报，可是又不能象样地组织散发，因此，散发得很不均匀。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一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则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

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并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最后，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总的说来，军阀和官僚的政权很不稳定；他们的眼界局限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线。只要无产阶级努力，这种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

二、北京的经济状况很简单。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城市，因此，实际上只有百万富翁才在银行里有存款，而企业家一般地说很少，大商业家也不多。某些比较大的工厂和企业，如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机关。因此，这里的厂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有了加强上述企业和机关职员的爱国的精神，为了使他们不停歇地工作，政府向他们说，“为了国家富强，应当这样做”。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很困难，无论如何要比同资本家厂主打交道困难得多。同志们，请你们注意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有五万到六万人。他们虽没有给资本家做工，可是他们来自下层，就其工作来说，又与广大居民阶层有接触，必须寻求向他们积极进行宣传工作的实际措施。

三、骑在别人头上是北京常见的事。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军官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赶人力车夫，以及其他等等暴行。我看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抓住时机，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政府官吏、军人、官僚和警察等，他们在压迫平民百姓方面争相竞赛：“重要人物”的汽车压死行人，他们可以随意控制交通，他们在社会上布满警察，任意镇压平民。某位“重要人物”一出门，摆在首位的就是维护其尊严。所有这些事例表明，有多少向群众宣传的好时机啊！

现在，再回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过去的活动和纲领上来，我们应该看到，在去年十月产生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才使他们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付精力宣传和组织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

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

北京的工业还不发达，没有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可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加强与他们的内部联系。为此，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

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各种阶级要求，象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要求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已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三百四十至三百五十人的铁路工人工会。

同志们，不应当限于只是组织工会，工会组织以后，首先应当引导它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时，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工人群众没有知识，不认识字，十人当中只有一人能看报，因此，印刷宣传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见，我们必须与这些困难做斗争，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克服。

总之，我们在最初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经验是：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自然，开办劳动学校时，我们不能幻想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力差、经费少，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建立学校，力求达到的不过是上述的两个目的。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工人，并使其习惯于亲自从工人当中选出有觉悟而又积极的工人来管理学校和工会的事情。学生会议能够给你们提供许多合适的宣传机会，而特别重要的是培植召开公开群众大会的习惯，而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

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受资本家厂主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

初，他们觉得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优秀的鼓动员。可是，找到导师即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的任务，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办各种行业的工人学校，起初，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所必需的准备阶段。

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努力工作，为的是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还特别注意各地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

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工人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政府禁止出版。在这个禁令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散发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时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

我想举个例子来证实工人组织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们说过的，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最初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

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不到一个星期，工厂车间里发生了数十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还是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帮助他们的最好的方法，据我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坚决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

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有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的和创作的文章。当罗素教授在上海作讲学，并进行有利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传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文字论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最近几年，公开的普通教育学校在北京显著地增加了。

首先，他们教育学生要有爱国主义精神，可是我们也在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

我的报告完了，可是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现时，我们虽然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一系列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

(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原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

1981年第6、7期合刊)

国庆日裁兵运动

国 素

在今年的国庆日，全国各大城市会有一种群众运动，这次群众运动是由压恶内乱反对军阀的心理激成的，同时有两个标语：一个是打倒军阀，一个是裁兵运动。这两个标语的意义大不相同，“裁兵运动”的标语和他包含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呼冤的声音，是软弱心理的表现，大家须要把他弄个明白。

主张裁兵运动的人，替军阀们拟定一些所谓裁兵计划，什么核实浮额，淘汰老弱，缺额不补……等等清理和限制军额的办法，实际并不是裁兵计划；还用慈悲的心理，顾虑兵士们被裁后的生活问题，发明化兵为工的计划，自以为这样一来，既可以免匪患又可以发展实业。而且以为这件事是北京政府办得到的，只是北京政府责备人民对于这件事没有民意的表示，（摧残人民的事情，北京政府倒不管民意）所以有些主张裁兵论者，也一同来发起这个群众运动，为的要向北京政府做个普通的表示。他们以为既有了这些计划，又有了民意，再向军阀哀求几次，疏通一番，那就可以由政府实行裁兵了。

朋友们！你们错了！这条路是不能通行的。你们听见张作霖在奉天购械陈兵吗？徐树铮在福建招兵买马嘛？吴佩孚

在洛阳图谋南征北伐嘛？刘镇华在潼关大收土匪嘛？哪一个不是耀武扬威，准备厮杀！这样的局面，你们到底希望谁来裁掉他的兵。你们退到最后一步，希望消极的清理和限制军额，以为至少可以减轻军费，但是军阀们侵吞浮额的军饷是必然要做的，不但侵吞浮额军饷，那一个不是腰缠千百万，欠饷五、六月，即兵变亦不顾惜的。你们想轻轻把他们刻扣浮额军饷的财源闭塞，这不是晴天白日里做梦么？就算由你们的努力做到了清理和限制军额的初步，而且更进于做到了化兵为工，那些军阀们现在既然刻扣军饷，他不会刻扣“工兵”的军饷么？兵士的生活，匪患，兵变能解决么？每个军阀不仍旧会拥有几万“工兵”，无事的时候，就藉兵工制的美名，驱策兵士们种鸦片烟；一有战争，那些“兵士”还是一样的会要去挡炮子替曹家打总院，替秀才打巡阅使。还有一层，现在北京还有政府吗！这莫非是你们的错觉罢。老实说，北京并没有政府，现在只有一个曹吴的账房和一个监印官，同时也是英美日三国的驻华代理人，你们现在向他们表示民意，就是表示一百回也没有用的。要是内阁稍微和人民敷衍一下，曹巡阅胡子一扭，王博士马上就得抱头滚蛋。在明天国庆日，恐怕军阀们还会不许你们游街表示呢！所以我要恳挚的奉告希望裁兵的人们，赶快改更方针。并且我要说：我们并不是不主张取更和平的办法，并不是不走便宜的道路，也不是不采即刻能实现的最低办法，只是许许多多的事实告诉我们请求北京政府和军阀裁兵的办法是不通的道路。

我们主张打倒军阀当然不是替军阀拟计划，向“政府”表示的办法，是要大声疾呼的唤起被军阀残杀的全国人民，

连兵士在内，赶快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毫不歧路徘徊的，百折不挠向军阀下攻击。只有这样，是唯一使国内和平与统一的办法，这是比较最底而可能的一个切实办法，决不是画饼充饥的。只要饱受军阀推残的国人，去掉软弱的倚靠的心理，自信这大量人的团结力可以打倒极少数的军阀呀！

末了，我们要声明，我们对那些热心裁兵运动的人们，是钦佩的！也许有些人明白请求军阀解除武装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他们的游街能够举行，所以用“裁兵”二字做标题。但是这他是错了的。因为我们既只能是和全国人民说话，请求军阀和政府既无效，所以只能用一个极明显的标语，只有“打倒军阀”是唯一的标语。全国人民的愤怒都要集中这四个字之下，全国人民都要为打倒军阀而团结，结果才能实际打倒军阀呀！

（原载《向导》第1卷，第5期，1922年10月11日）

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

——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

国 焘

美国哲学博士胡适先生，素来与美国驻华政治家舆论家学者来往亲密，于美国“文明”多所介绍；最近在二十二期的“努力”周刊上发表一篇“国际的中国”。那篇文章竟完全替英美帝国主义辩护，并武断中国现在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末尾一段还劝本报同人此时不必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像这样为英美帝国主义辩护的文章，似乎比美国每年花上三千万银子雇派许多牧师、记者、侦探、顾问、学者等向我们所做的亲美宣传，还更明显而且有力，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他那篇文章的大意是：

1. 当直奉战争时，英国没有援助吴佩孚；英公使曾劝天津某英报持中立态度，事实上的援助更是没有的。美国愿意中国废督裁兵，而且美国学者实际上代中国拟定裁兵废督的计划；若说美国与日本携手，企图共同利用曹银张作霖和安福系交通系等，更是关话。

2. 巴黎和会因为是美国的大失败，所以中国的权利也随着断送了；美国舆论在华盛顿会议时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彼时许多美国学者舆论家确系热心援助中国代表

团，并不替资本帝国主义者做走狗。

3. 新银行团确有消极阻止某一国单独借款给中国政府的大效果，三年不借一文给中国政府的新银行团确是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此贪图高利，借无数款子给中国政府的国内资产阶级得多。

4. 投资者是希望投资所在国安宁和统一，外国投资者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不下中国人民。民国初年，外人捧袁世凯，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并非恶意；而且国际投资没有危险，英国投资美国铁路便是例证。他们既已不能征服统治中国，英美日都不能不让中国人民做到和平与统一。

5. 远东局面因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欧战结局有了三次大变迁了，日本的侵略反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自觉，在巴黎华盛顿两次都能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是自觉了，中国现在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

他又告诉我们说：（一）人民有时只觉得租界和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所以国际帝国主义还不是人民埋怨的对象；（二）进行国内政治的改造，是不必顾虑到国际帝国主义，国内政治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因此更进而劝我们不要管“共同管理”的论调，不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只要专心整理国事，使政治上轨道。我们呢，老早就想说明中国人民为什么要反抗任何国的帝国主义，为什么非打倒英美日等国的对华侵略主义，不是以改造国内政治，现在胡适先生既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乐得把胡适先生的谬论略加驳覆，以当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

胡适先生说：“国际帝国主义，不是人民埋怨的对象。”仿佛是说中国人民没有受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痛苦似的。其实中国人民明明白白受了几十年国际侵略的极大痛苦和耻辱，只因同时也受军阀的推残，官吏的讹诈，鑿金制的剥削，痛恨的对象不专是国际帝国主义罢了。胡适先生那好藉此隐蔽国际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减轻国人对于外人侵略的注意，促成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顺利情势。老实说罢，租界和东交民巷只有官僚政客安福系交通系帝制派觉得是福地，外币只有少数富翁觉得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只有少数银行家觉得是神人，胡适先生或者也这样觉得，我们小老百姓倒不觉得是这样。我们只知道我们每年所缴纳的租税，一半是外国政府和银行家强夺去了，一半是军阀朋分了；北京政府就是经管了这两笔帐，从未替人民做过一点事体，因而我们的子弟受不到教育，我们当兵的兄弟拿不到军饷。我们百余万劳苦弟兄在外国资本家的鞭策下做工，洋货深入穷乡僻巷，弄得做手艺的没有生意了，种田的无数弟兄制不起一件粗布衣服了。外国牧师替土匪流氓保镖，欺侮乡下佬。香港六十五万同胞和上海一百五十万同胞，被一二万外国人统治着，平均每个外国人统治一百五十个中国人；东三省的住民时常遭日本人和日本人豢养的胡匪杀戮。上海市等处的公园，是“禁止华人与犬入内”，日前上海市民欢迎孙大总统的会是被外国巡捕禁止了。这些痛苦和耻辱已使我们够受了，何况痛苦和耻辱并不止这些呢！我们虽然同时要打倒军阀官僚，铲除鑿金制；但是也决不因此忘掉这些痛苦和耻辱呀！即使中国现在确实不会再增加国际侵略的危险了，目前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也非打倒不可。况且他还会侵略无

已，摧残我们民众的自强运动，站在和我们势不两立的地位么？

胡适先生说，远东问题只是英美日三国的的问题，这句话是不错的。若说中国现在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即本报同人便不敢盲从了。但是我们要明瞭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那就首先要明瞭最近经济帝国主义的厉害和英美日都必须侵略中国，以及怎样侵略中国的情势。

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当然没有现在这样雄厚，所以那时的侵略手段，是用武力做主要的力量，如瓜分或占领弱小民族的土地，打翻他们的政府，征服那些人民。这样武力侵略的行为，便叫武力的帝国主义。现在资本主义算是发达到极点了，他侵略的目的便纯粹是奴隶经济落后国的人民，吸取原料，销售制造品，以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便不须把弱小民族的政府推倒了，也不须花许多气力派许多军队去占领他们的土地了；只须用经济的势力做主要力量，使弱小民族的土地和富源，变成资本家的私产，使那些人民做纳税和为他们开发富源的奴隶罢了。这种方法既省钱，又省力，还不易引起重大的反感，更能深刻的普遍的榨取弱小民族的精液，一滴不漏。但同时因为要防止被侵略人民的反抗和别个帝国主义者的暗袭并准备和别个帝国互相争夺；所以还是要用武力帝国主义一样的武力来镇压被侵略人民和用兵力把守那侵略的土地。这种侵略方式便是最近的帝国主义，也叫做经济的帝国主义，又叫做侵略的资本主义。我们拿这两种帝国主义比较一下，便知道后者更是残暴厉害。国际帝国主义既由武力的变到经济的，因此列强侵略中

国也正由武力侵略进到经济侵略的过渡时期；况列强在华利益素来错综复杂，就是要瓜分中国也难得分脏平均，如是更不得不采取经济侵略政策。瓜分土地的事实在现在或许不会发生了，但是中国人民已是压在外国资本家的铁踵底下，经济的侵略还要更加严重，那能说没有危险？

英美日实行经济的侵略于中国，除了与资本主义和侵略政策的历史有关以外，与什么别的历史和国情，什么道德和感情都是没有关系的；只因为维持和发展他们的资本主义的要求，迫着他们必然做那侵略的勾当。英国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老前辈，海上的霸王。自俄罗斯革命成功后，他失掉了由俄罗斯——占全世界土地六分之一——采取原料的市场。战后德国和中欧各国经济破坏无遗，购买力薄弱，纸币异常跌落，物品价格因纸币汇兑关系比各国的物品价格低廉得多，英国的高价货物自然不能流入，而德国极廉价的出品反能销行国外，英国不但失掉三个大销售场，德国反能与英维持商业竞争的地位。美国在欧战中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把金融中心由伦敦移到纽约，由原料输出国变成制造品输出国，他不但把英国的南北美市场完全夺去，还已插足到欧洲市场，就是英国百余年称霸的世界煤市，也被美国抢去一次，这便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新兴的大敌。法国战后夺得广大的煤铁矿区，渐由银行资本主义国家进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势将与英国大起竞争。日本崛起于东，动摇英国在中国和南洋群岛的市场。因此英国工商业萧条，工厂歇业，航务停滞，失业工人增至二百万，减低工资又引起国内劳资纠纷，军费无法维持，有失却世界盟主资格的危惧。中国人虽然难以梦想这种可怕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知道

英国来往远东的商船，现在是要贴水脚费的。但是他要恢复他的工商业，渡过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必须恢复那些大市场和掠夺场。所以他一面为对俄对德两问题不惜与法国冲突，极力图谋与俄国通商和培养德国购买力；一面用保护商业政策抵挡美德的商品；一面不惜用兵力镇压土耳其的复兴，为的要保全他到印度和小亚细亚的孔道；一面极力与日美竞争中国市场的发展。英国必然要在远东发展，是他维持资本主义命脉的一条道路。最近英国政治家舆论家资本家看见北京政府是亲美派人物，中国新兴资本家都可以任用美国机器，以及一班学者教员政治家政论家都赞美国吹嘘（因为他们多由留美学生出身）大起醋意，认英国没有注意中国留英学生问题，实属危及商业利益。他们最近注意到留英学生问题，是不是因为他现在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缺乏各种侵略的介绍人和中间人物呢？是不是亟之准备经济侵略中国的表示呢？美国在欧战中是唯一的胜利者，战争的结果，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王，他已拥有世界金子的一半、制造业发达到极点。战争时，他的输出品中三分之一是军用品，战后不但须将那三分之一的生产力变为制造消耗品以求售，而且英法等国复起与他周旋，不但不让他的商品销到欧洲去，也不让他在他们的殖民地自由畅销，因此美国生产过剩，发生经济恐慌，失业工人竟增至六百万。美国要维持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得寻找商品销售所和资本经营地；但是世界上的土地差不多早已画成了英美日法等国独占殖民地，只剩下中国是可以供他们自由发展和自由争夺的地盘，所以美国就非出全力争得中国市场不可。历来日美战争的呼声，并不是为耶普岛统治问题，也不是为加利福尼亚的

移民问题，更不是替中国打抱不平，只因侵略中国这肥沃地皮，和掠夺四万万中国人民，引起不解的争端。他必须夺得中国，乃是维持美国资本主义的生命的一个重要方法，所以不惜与日本竞争军备和召集华盛顿会议来达到目的。拉门德史提芬欧白脱芮恩施辛博森那些忙碌的大资本家和外交家，不惜奔走京津沪之间，为的不是这侵略政策的实现么？日本侵略中国更是显明，而且他非继续侵略不可！因为中国是日本货物的唯一销场，煤铁的来源地，战时的后路粮台；日本如果停止侵略中国，便是宣告日本资本主义的死刑。况他和美国竞争激烈、军费浩繁，自然更要加劲掠夺中国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英美日三国都急须用伟大经济势力侵略中国，而且是相互竞争的侵略，为的是救济资本主义的崩壤。只是侵略的方式正由武力的变到经济的，不是武力侵略没有了，便连侵略的危险也没有了。为什么那自命“政论家”的胡适先生竟眼小如豆，只知道武力的侵略是危险的，竟不知道经济的侵略更是危险呢！这或者经济的侵略只能使四万万中国劳苦群众受痛苦、不会使美国学者的胡适先生受痛苦，所以他不能感觉到那些危险罢。胡适先生也是中国人，也是和我们一样受了几十年外国的压迫和侮辱，那继续不断的外国压迫想也忍受不了，更厉害的经济侵略的危惧又在目前，胡适先生还应多替中国苦同胞设想一些才好。

英美日的侵略进行又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美国协同侵略的政策，一种是日本企图维持特殊地位的阴谋。美国因为他的经济力量最雄厚，同时在中国又没有得到势力范围，所以他用协同侵略政策，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利益，削减他人的势力，而且可以一跃而居远东侵略的领袖地位。日本经济侵略

力不充足，有时须用武力补助；同时在中国得的利权最多，所以暗中破坏共同侵略政策，希望维持固有特殊地位。他们的政策既然不一致，因此各个扶持一派势力，进行他们的暗斗，为的实行各自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好：“日本帝国主义者先后扶助安福部。张作霖、新旧交通系等当权的北京政府，为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为实现日本侵略计划的工具。英国便站在吴佩孚派的督军后面，为的要藉此巩固他在长江一带的权利和势力范围的推广。美国欲勾结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分子，想用掩眼法来实现他国际把辣斯的经济侵略政策。”他们如今还正在那里拿中国人民做牺牲品，拿军阀做工具，玩暗斗的把戏；凡是稍微明瞭中国政局的人没有不明瞭那些事实的，胡适先生何能代他们否认呢！

胡适先生说：英国没有援助吴佩孚，这未免太为之遮掩罢了。彼时观战的英国人以战场虚实探报直军，驻扎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不断的用无线电把奉军消息传达保定，吴佩孚的飞机由英国人驾驶，联军车替直军察勘京奉路并作先锋，以及逼迫奉军退出涿州，并不阻止直军开往涿州的种种事实，难道胡适先生竟一无所闻吗？我国人虽然健忘，这些事实也不是一句“更是没有的”的话所能勾消的。英国不但帮吴佩孚打张作霖，并曾助吴佩孚在湖北打走川湘联军，助陈炯明在广东打走国民党。英国所以帮助吴佩孚打张作霖的缘故，这是不让亲日派的势力侵入到他特殊利益的长江流域去。英国所以助吴佩孚打川湘联军和助陈炯明打国民党的缘故，都是不愿意那代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民党势力发展，因为他知道如果民党握得了政权，是会便中国渐渐自强起来，与他在

长江流域和广东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英国帮助吴佩孚，是必然的政策，无论谁也不能代为辩护，英国使馆虽曾劝告天津某报保守中立态度并撤回飞机师，谁不知这正是掩人耳目的奸诈行为，那能据为辩护的理由呢？

美国只是想把他的过剩资本在中国发展，他在中国既无势力范围的根据，想实行他的对华政策，须得英日赞成才能实际上做得到。他宣言要中国和平和统一实现了，他才能借款，这并不是他对中国的好意。不过美国先前因不能借款给亲日派的北京政府，至巩固亲日派的政治地位，造成亲日派的统一；即现今北京政府转到亲美派手里，他如果冒然放债，日本如果勾结亲日派在中国的日本势力范围圈内捣起乱来，日本人便会占了便宜去，美国政策反会受打击。所以他乐得说要等中国统一了，他才借债给中国发展实业。他既然是企图输出他的过剩资本，维持和发展他自己的资本主义，自然希望中国能够永远销纳他的过剩资本。倘若中国做到了真正的和平统一，以至独立自强，便会不让他继续输入过剩资本，那他不是自己堵塞了他排泄过剩资本的路么？所以美国尽管说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尽管代拟废督裁兵的计划，他只是要造成能够放债的局面，乃是极浅显的道理。若说中国独立自强的和平统一，他是会为了他自己的资本主义自然而然的反对呢。要是能够达到共同侵略的计划，就是和日本携手共同利用张作霖曹锟安福交通等的勾当美国也是会干的。（这种企图，本在六七月间是传说过的；后来因为他和日本妥协不了，所以这个政策没有实现罢了。）看呀！北京政府现在不是在亲美派手里吗？中国现在统一了没有？但是美国外交家银行家正和北京政府商议垫款的办法，这到

底是希望中国真正和平统一呢？还是借款扶助亲美派政府增进他自己在政治上的势力呢？但是日本便不愿政权永久在亲美派手里，尤不愿意造成吴佩孚的统一，更不愿意因统一面实现美国政策，所以又帮助着徐树铮在福建厮杀起来了。

巴黎和会的确是美国的失败，因为不能把中国利权重新分配一下，日本夺得太多，美国不但不能分润，反把日本夺得中国的权利加一层正式的保障，难以再夺回。这真是美国的失败呀！美国召集华盛顿会议，是要解决了远东问题，才商议减轻军备的；这就不说英日须要把中国利权和我分配平均，并且让我占个侵略中国的领袖地位，我们才能暂时不接火。所谓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决定采取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所谓门户开放，那就是说英日不要把中国的门户把住了，让大家有均等的机会去抢掠罢。国人不要听了外交系‘象煞有介事’的自吹，以为华盛顿会议使日本有名无实的交还青岛和可以赎回胶济路的结果，便以为华盛顿帮助中国解决了一部分中日问题，这也是帮助美国开放中国的门户呀！中国虽然挽回一点微小的利权，但是多引进一个富有经济力的抢掠者。这点微小的利权，是用四万万人民卖给美国银行家的预约券换来的。美国资本家银行家是不知道怜惜受痛苦的中国人民的，即使真有几个舆论家学者援助中国，与美国资本家侵略中国的勾当也是不相干的，我们难道因为美国有几个学者舆论家和我们买弄假风情，就连美国资本主义吞噬四万万中国人的雄图都忘记了呢？

新银行团三年不借款给北京政府，是被日本反对和中国内乱阻难住了，事实上不能借款；并不是为中国的和平与统

一而不借款。他记词说是友谊的赞助中国发展实业，我国人何尝不希望中国发达实业，但是我们希望要为中国民众的利益发展实业，要是为美国少数银行家的利益来发展实业，那是我们不得不反对的。这哪里是发展实业，不过把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命脉断送给美国银行家，也不过是美国银行家要挖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变成他们的黄金的代名词罢了。

胡适先生说：外国投资者也希望中国的安宁与统一。不错，他们也这样希望。但是他们希望的安宁与统一，是中国人民俯首贴耳让他们挖取精液不加反抗的意义，也正是胡适先生所谓“能保障投资者利益和安全”的意义。我们人民所希望的安宁与统一，是由我们人民自己造成的而能改善我们生活状况的安宁与统一。而且美国资本家现在是希望由吴佩孚和外交系造成和平与统一，日本是希望由张作霖造成和平与统一，英国是希望陈炯明和吴佩孚能够握住广东和长江流域的政权的和平与统一、英美日的愿望既互相冲突，吴佩孚张作霖的愿望也互相冲突，怎样能和平统一呢？而且英美日吴佩孚张作霖所希望的和平统一，正是我们所反对的，也是做不到的。只有没有他们了，才能真正达到和平与统一呢！民国初年，外人捧袁世凯，便是侵略中国和压迫民众势力的发展一个最好的例子；那时外人捧袁，是不是因为袁世凯能把西藏送给英国，蒙古送给俄国，满蒙五省送给日本呢？那时孙中山和东南各省是不是代表民众势力，但是外人怎样帮袁世凯反对孙中山，怎样帮袁削平东南各省的反抗，大家总还记得罢？这还能说他们希望中国和平与治安，简直是压倒民众势力的发展！

远东局面的确变迁了，倒了德俄两个强盗，来了一个野

心勃勃实力雄厚的美国强盗了，现在是已变到英美日三国侵略的远东局面了。侵略的形式是由武力侵略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变成开放门户共同经济侵略的形式了。侵略局面虽然变迁了，是变得更趋严重了。中国人民受了几十年侵略痛苦的结果确是渐渐自觉了；但是仅仅自觉怎能改变侵略的局面，阻挡资本家的贪婪行为呢！只有我们民众的实力才能阻挡那侵略的进行！要是没有一种力，不但已有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势力无由除去，中国无由独立，还会受更大的经济协同侵略的痛苦呀！

胡适先生还说：国际投资，只要投资所在国能维持和平与治安，更不会发生问题，并举美国接受英国铁路投资为例。其实并不是以证明国际投资不会有危险，反证明中国要赶快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为美国曾经过七年的血战，脱离了英国的羁轨而独立，所以后来他接受英国的投资，便没有危险。以半殖民地和列强角逐场的中国和那时的美国比较，这不是笑话么？

总之，我们从上面得不来的结论是：

（一）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几十年了，给了我们许多痛苦和侮辱了，现在还继续加给我们那些痛苦和耻辱。

（二）英美日屡次助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徐树铮等延长中国内乱。

（三）英美日直接间接压迫中国民众势力的发展。

（四）经济的侵略比武力的侵略更危险，他们正图谋加给中国以更广大的经济侵略的危险。因此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

看呀！他们正在那里图谋“共同管理”，日本还在那里图谋建立满蒙为一大缓冲国，这不是他们向中国民众的进攻么？中国人民决不能信胡适先生那坐以待毙的办法，只有集中和准备民众势力来抵敌呀！这并不因为我们是马克思派，所以这样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我们正为中国人民的利害关系，所以要提醒和引导中国人民一致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

末了，我们要说，中国人民就是为国内政治的改造，也得要取这个方针。因为我们所谓国内政治改造便是用民众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主主义共和国。要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依然存在，他会让民众势力发展和中国民族独立么？他们帮助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是不是巩固了我们要打倒的军阀的地位呢？所以我们的政治改造初步就是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就是改造中国政治的先决问题。

胡适先生既然赞成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我们自然是很欢迎的。所以我们还借用中国共产党宣言上一句话，恳挚的奉劝胡适先生：“中国的知识阶级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

（原载《向导》第1卷、第6期，1922年10月18日）

中国人民是驯熟了的奴隶吗？

国 煮

唐山矿工被英国资本家迫着罢工，中国军队枪杀他们，英领事居然也要派兵去，一班爱国团体和革命党一声不响。陈炯明大借外债，驻在广州市的中国人民，只当“亡省”借款来反对，住在他省的中国人民充耳无闻。浦东纺织工会忽然被封，卢斌为接收民权运动信件被钢，主张民权主义的国民党和争取民权的同盟毫无表示。金华竟未经法庭审判，湖北督军私自把他在军法处枪毙，人民毫无顾问。李启汉为中国苦同胞已座了五个月监狱，社会上竟把他忘记了。武昌女子师范开除加入革命新团体的八个学生，汉口英美公司的女工被迫罢工，英国资本家还出布告侮辱中国女工说：“停工一天心里慌，停工两天就典当，停工三天就当娼”；中国女权运动者不管那些事情。……中国人民对这些事实，都莫不关心，好象驯熟了的奴隶！

（原载《向导周报》第8期，1922年11月2日）

还是赞助新蒙古罢

国 煮

蒙古国民革命党领袖登德布曾有一篇演说，题为“蒙古及其解放运动”在本报第五期和第七期上发表过，算是极有价值和真切的叙述，很足以沟通中华民族和蒙古民族的亲密感情。

依他的叙述，我们明瞭历来清政府怎样利用蒙古王公，佛教徒和扶助中国奸商鱼肉蒙古人，俄帝国怎样侵略蒙古，后来徐树铮又怎样杀戮蒙古人。我们不要说远了，中国兵在内地十八省和胡匪在东三省奸淫掳掠，是最著名的；徐树铮统率大队边防军到蒙古去了，那还了得，肆行抢掠，任意杀戮，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中国奸商欺侮和愚弄蠢笨的蒙古人，更是北边人谁也知道。蒙古民族处在和朝鲜人一样的命运，当然应该图独立自强。我们中国人也处在被列强宰制的地位，也正在要自图解脱；当然不能主张自己去鱼肉人家，还要赞助人家的独立运动才是。况且中国自己并没有力量按住蒙古，曾让俄帝国夺去一次，后来又让日本侵略家和他的爪牙恩琴在那里大肆屠杀，我们与蒙古人并没有永世不解之仇，为什么一定要使他不遭中国军阀的宰制，便遭日本人和白党的屠杀而不赞助他独立呢？

现在中国一班所谓“爱国家”，他们很仇视日本，又痛恨

军阀，到天天唱撤退外蒙红军，交还蒙古，我到底不明白他们还是要把蒙古人民送到日本和白党口里去，还是要给中国军阀抓住。这样，是鼓吹和我们同病相怜的蒙古人民供豺狼虎豹的牺牲，还为日本军阀扩张侵略势力，为我们急欲打倒的军阀谋地盘。你们不怕蒙古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误会这是中国人的卑污行为吗？不怕日本帝国主义者，俄国白党，中国军阀笑你们为他们帮忙吗？

总之，日本和他的助手张作霖及俄国白党围绕蒙古的东南面，中国军阀包住他的西南面，蒙古只有三条路好走：第一条是给日本和俄国白党作殖民地，第二条是给中国军阀作屠杀场，第三条是让蒙古人民独立。蒙古是一块“不毛”的高原，经济是最原始的状况，三面环绕着强盗，要真正能独立，便非和新俄罗斯结最密切的关系不可。在蒙古这一方面，最须要与苏俄联盟；在俄罗斯那一方面，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大本营，在俄罗斯本国内已解放十几种被大俄罗斯民族压迫的小民族，他又赞助土耳其等国的独立运动，已足够证明他对于弱小民族的忠诚。他与蒙古结军事同盟，驻兵库伦，保卫蒙古的独立，与蒙古结经济同盟，借款给蒙古，促进蒙古民众的经济生活；前者便是抱世界革命的过激派政府忠实保卫弱小民族，进行解放全世界的应尽义务，后者便是促进经济落后国的经济生活，造成全世界经济平衡的革命计划。这是什么大惊小怪的狂叫：说什么“占领库伦”，“经济侵略蒙古”；还受外交系和军阀的愚弄，居然把红军驻扎库伦与日军驻扎库页岛相比拟，指经济合作为侵略勾当。同时却把驻扎北京城内的外国兵，和北京政府天天进行卖国借款，促成经济侵略等

事实抛在脑后。还有一层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外交和军阀，蒙古王公和中国奸商所宣传的蒙古消息都是信不得的，我们用不着替皇帝式的活佛悲哀，也用不着替蒙古王公和中国奸商抱不平。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是应该即刻决定的：还是让蒙古为日本，俄国白党或中国军阀的殖民地呢，还是赞美和羡慕簇新的独立蒙古共和国，称许新俄罗斯的义勇行为，而实际与蒙古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呢？

（原载《向导》第8期，1922年11月4日）

庆 祝 海 参 崴 工 人

国 煮

我们——苏维埃俄罗斯的挚友们，在今天庆祝俄罗斯革命五周年纪念的时候，使我们对于海参崴的工人们发生特别的感想！因为海参崴是新近由日人和白党手里夺回来的，海参崴的工人们是新近才得到自由的。所以我们特别庆祝海参崴的工人们。

从种种消息看来，我们知道你们现在是再高兴没有的了，知道你们天天在那里开种种很愉快的会，怎样庆祝红军——你们的兄弟，为社会革命的忠勇行为，怎样要求莫斯科给你们以苏维埃。这些消息给我们一个很深印象。

你们和我们都是住在同一个远东地方，在两星期以前，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遭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派的蹂躏；也和我们一样自由。可是现在的情形大改变了，你们用你们自己的努力得着完全的自由了；你们的弟兄，住在同一远东的弟兄——中国的劳苦群众，受压迫反更日甚一日。我们知道我们也须和受你们一样的困难，和你们一样的努力，才能获得自由。当我们正在准备争斗的时候，看见你们的模样，你想我们当如可的羡慕你们，庆祝你们。

现在你们当要进行组织你们自己的工人政府了，公开的组织你们的工会和俱乐部了，进行组织你们的新社会了。我

们中国工人准备学习这些新课程。从这里到欧洲太远了，我们不容易从欧洲的弟兄们学到见识，但是到你们那里更近，容易从你们那里学来。

你们从事建设的新海参崴将要变成远东的明星了，我们希望远东明星的光芒会布满全远东呀！

（原载《向导》第9期，1922年11月8日）

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

国 焘

和森同志在本报第八期上发表一篇“福建人民当助革命军复建革命政府”，他主张重新建立一个革命政府，担负中国的民主革命；他的主张虽然是为革命，虽然出自一种很好的观念；但是在革命策略上看来，不免是一种错误的主张。他曾拿南方革命政府化为土耳其安戈拉政府，但是他忘记了这两个革命政府中间的重要分别。土耳其国民党的安戈拉政府是与君士坦丁堡政府对峙的，君士坦丁堡政府是在外国强盗们挟持之下，而供他们的利用，安戈拉政府是为土耳其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的。安戈拉政府成立只两年光景，现在居然得着了胜利，把土耳其人民从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凶爪底下解放出来。我们看见土耳其革命政府的胜利，自然非常欣悦，非常羡慕；因此也希望中国国民党的南方革命政府能做到安戈拉政府一样的伟绩。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安戈拉政府能够成功，因为安戈拉是靠近俄罗斯的领土，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在安戈拉那里，基玛尔派可以自由宣传国家主义的理想，聚集各种反帝国主义的势力，组织他们的人民和革命军。不但不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威压，反能得到苏维埃俄罗斯友谊诚实的帮助。这便是基玛尔派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广东和福建的形势就不同。广州最靠

近香港，英国侵略者握住广东的咽喉，把持广东的经济命脉，英国海军几个小时内便可占据广州；福建被日本的势力包围着，和广东的形势毫无两样。在这样英日势力威压之下，如何能够组织一个自由活动的革命政府，完成他为自由和独立而革命的任务呢？

我们再拿历史上的事实来说罢，国民党曾在广州组织过两次政府，第一次被陆荣廷派的军阀赶走了，第二次被叛徒陈炯明打散了，这两次不但没有完成为自由和独立的革命，反遭显著的失败。是什么缘故呢？一、遭那些与国民党合作的军阀之破坏，二、国民党旗下的有力军官之背叛，三、外国势力屡次的压迫。国民党革命政府虽成立两次，但同时不能得到有组织的民众努力做后援，所以一方与一派军阀或有力军官妥协，联络他们的感情，谋同床异梦的合作，一方极怕咄咄逼人的外国势力，总想对他们做相当的让步，消除他们的阻碍力，得到他们的赞助。这样的革命，何能维持一个革命政府！结果事实告诉我们，这革命政府的命根先后都被他们扑灭了。这种与有力军官和外国势力妥协的政策，或则完全放弃革命主张，与他们完全妥协，为他们做奴仆，从前既因这样推翻革命政府，将来他们又会让它安然存在么？现在形势并没有改变，如果又复建革命政府，不是再走上这条循环的旧道路去了么？

现在我们设想许崇智等的军队能完全占领福建，打回广东，恢复革命政府，这个革命政府又怎样做法呢？第一个简单的问题，便是那个能够担保所谓革命军里面，不会发生第二个陈炯明呢？国民党已经遭遇着有力武人的几次卖弄，现在还去用全力和他做形式的合作么？外国帝国主义者屡次陷

害革命的事业，现在还向他们乞怜么？即使和有力的军官合作，向外力乞怜，组织一个政府，不会再被他们推翻么？我们不愿意光荣的国民党永远与有力军官玩把戏，我们不愿意他再受狡猾的外国侵略者的愚弄，因为这是徒伤革命精神而毫无益处的。

因为历来国民党仅仅做军事行动，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所谓革命政府，第一个结果，便是使人民与国民党隔离，第二个结果，便把全中国的革命变成南方局部的革命，第三个结果，造成只是消极的否认对方势力的政策。孙中山和跟着他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的确于中国的改造上面尽了许多力量，由他们几十年努力的结果，才有今天的中华民国，但是民众完全把他们忘记了，在双十节那一天，全国各处的庆祝大会中间，简直没有一个人提及孙中山的功绩。这便证明国民党与群众早隔离了。因为国民党没有在群众中间宣传，所以群众才不记得他们呢！因为国民党只在南方“革命”，群众——特别是北方的群众——便认为是南北之争，完全不觉得是为全国人民利益之战争，还使地域的观念侵入革命领域之内。假使国民党的领袖也把为自由和独立的革命，认为反抗北方驻防军的革命，这真是革命的损失呀！国民党因为曾在广州组织过合法政府，当然认北京政府为非法政府；但是因为北京政府是非法政府，所以他的一切动作，国民党都不去理会。这样做法，等于停止了一部分最重要的政治工作，我们不可仅仅不承认非法政府的动作，并须起来做严厉的反抗。这种消极否认的政策，便多半是由于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合法政府的观念造成的。

所以我以为国民党再不必在广东或福建组织不稳固的革

命政府，而且一定要改更他们的方针，才能完成他们的革命任务。虽然现在国民党还没有重新组织革命政府的表示，但是把全副精力注射福建，也是失策的。他们——因为他们是为全体国民奋斗——必定分一部分力量帮助正在争集会结社自由而罢工的一万三千个浦东纺织和烟草工人，和正在反抗英国资本家，而被压迫的唐山工人，这些工人们正在与军阀与洋主人争斗，出来保卫他们，正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给国民党的责任。国民革命的领袖真不宜长久坐在租界内做亡命客，把这些任务抛在脑后呀！这样一件保卫受摧残的人民的事业，比去组织一个有名无实不久即倒的革命政府，实在还更重要。因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要真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同情，如是他们的革命才有基础。倘若国民革命没有人民的同情做基础，是绝不会成功的。我们不是说，军事行动可以不要进行，打倒叛贼陈炯明的行动可以放弃，但是我们在群众中间做工作，是第一个重要。如果要组织革命政府，便要是真正革命政府，便要是—一个不受军官特殊势力和外国势力威吓的革命政府。这样一个政府现在既然不能组织成功，只有由一个全国国民党大会促着全体党员向群众中去，是唯一的完成革命的新道路。

（原载《向导》第7期，1922年11月20日）

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

国 焘

大家都知道向导周报是中国一派革命的社会党人创办的，是争自由，独立，和平的武器，是打倒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这周报难免国贼陈炯明的蹂躏，早就在我们预料之中，现在他果然实行收没和查禁向导了。但是同时广州有几个所谓社会主义者所办的珠江评论（在广州出版）居然还能存在，这不是证明珠江评论的态度出了社会主义的范围么？这个评论独能继续存在不是广州社会主义者的羞耻么？就只这事实即足以证明向导是真正社会党人的机关报。广东的工人，青年，社会主义者应该从速觉悟，要即刻向陈炯明下攻击，跟着向导所指示的道路前进。

（原载《向导周报》第10期，1922年11月15日）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

张 国 焘

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份，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为什么很重要呢？这是极容易解释的。稍微明了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五六十年前中国完全是个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因此造成一种士大夫阶级，这阶级几千年来都是以做官为专利的职业。近代工业虽然逐渐发展，但是欧美式的资本家简直只能在上海香港等处数几个，所以资产阶级的势力还是很小。新式工人自然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的斗争；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的势力会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那一班旧官僚——士大夫——现在还盘据中国政治舞台，他们简直不知道政治是什么，只是以做官发财为目的；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做政治活动，不如说他们是做政治买卖。虽然那一个政治买卖都离不了他们，但是他们也不是政治上的真正有力成份。所以别一种力量，便很

容易把中国的政治夺在手里；这种力量便是军队。一个拥有万数并无战斗力的军官便能在政治舞台上横行。要是有一种更大的势力，当然更能操纵一切，这更大势力便是外力，所以外国人的势力在中国是无上的权威。在另一方面，当然会发生一种反对官僚军阀外力的势力，同时又因为农人资本家劳动者都还没有势力，所以这极少数的知识阶级在过去十几年间便为革新势力的先锋，而且他们仍然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说：知识阶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造成的。

要明了知识阶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便要略微叙述他们过去的活动。辛亥革命之成功，以一班留东学生实际参加革命投身新军的力量为最重要。后来到民国四年，因为日本以最后通牒，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条约，引起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也是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尤其是著名的五四运动最足为知识阶级势力的写真。那次运动差不多完全为知识阶级所倡导，结果能够使日本商业受重大打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竟至不敢签约，亲日派亦被罢免；而且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真不亚于辛亥革命。自此以后他们渐能左右舆论；近来之非基督教运动，裁兵运动，民权运动等，均足表现他们的势力。

但是现在他们的运动和从前五四运动时比较，似乎是消沉得多。不错，他们现在没有一九一九年那样活动了，这是因为他们走上错的道路了。他们的误谬观念，是不注意现实政治；而且相信社会改造只需要书本上的学识和教育能够成功的。我们很知道“知识便是权力”，我们并不看轻知识，

（马克思派还特别看重知识）我们也知道教育是最要紧；但

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是错误了。当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全国各处学生革命气焰极盛，学生们到处都做爱国宣传，并且用十人团等方法，想组织那更广大的民众于爱国旗帜之下。现在他们的革命气焰日见消沉，虽然是因为他们的战斗方法有许多错误，但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为文化运动的声浪所迷惑了。文化运动发生什么结果呢？他不过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赶回课堂，使那些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学着做新诗，做白话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学，到研究室去研究哲学文学科学去了，整理国故去了。现在我们一定要问问此时研究学问的爱国学生们：你们现在研究三年工夫了，现在你们得着什么了？再问问那些投身教育事业的爱国学生们：你们现在的成绩怎么样？我们并不说：那些爱国的学生们现在是变了心了；不过他们现在所研究的学问除了做他们自己的装饰品以外，与中国民众是无切身利益的；他们献身学校教育，简直连个人的肚子都不能弄饱。我们并不反对知识和教育，但是他们如果要得知识，便要是得到一种与民众有利的知识；要得到与民众有利的知识，只有在民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得到这部分最重要的知识；在书本子上是得不到什么的；如果要讲教育，便不能专讲学校教育，组织群众，率领群众运动，向群众宣传，便是一种最重要的群众教育。虽然他们知道民众的觉醒是重要，虽然他们也以改造中国为己任，虽然他们不了解中国的状况，但是仍然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用“预备改造中国的工具”的语调欺瞒自己，完全把现实政治和中国问题置之不问。这是何等的错误呢？作者亦曾与这些知识阶级一同参加五四运动，与这些爱国分子都是好友，所以敢于恳切警告他们说：你们现在是走错了道路

呀！而且要说：我们现在正当的道路是要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

还有那以政治为万恶的观念，和只做社会运动，不做政治活动的观念，一定要从根本上铲除。因为中国政治素来是一种官吏买卖勾当，所以使一班纯洁的知识阶级认为是万恶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不是政治活动，我们的政治活动是要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外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倘若我们的政治活动都能照着这个方针，这有什么万恶呢？只做办学校教育办出版物的社会运动是断然达不到这些目的的；况且社会运动如何能和政治运动分开呢？

我们的敌人都已渐渐知道我们的势力了，他们是用种种谬说阻止我们做政治活动的。一班旧官僚军阀如徐世昌等等曾经屡次声告学生不应干预政治活动。一班旧式政客也时常宣传青年脑筋简单，不宜做政治活动。但是我们很容易明了他们的用意，自然我们也很能明了自己的政治知识很缺乏；我们却相信现在青年至少比那些旧官僚政客的政治见解要高明些。我们虽然不懂得政治买卖，但是我们却懂得中国民众的真正要求，这种“青年脑筋简单”的宣传，不过是要减少我们的自信力。若说“学生不应干预政治”，这只是我们的敌人才是这样说的。他们的用意是很简单的，不过是把我们将排出政治范围之外，以遂其仓办政治买卖的欲望。但是我们就不能受他们的愚弄；这或者还是我们要取他们而代之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些不努力的知识阶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中国，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件新衣，想拿一些新布屑来把一件旧衣补成一件新衣，结果补来补去还是一件破烂不堪的旧

衣。这种主张仅仅证明他们缺乏政治知识和不懂得中国状况。我们也不要被这种谬说所欺骗，以至阻碍我们真正政治活动的发展呀！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知识阶级既然在中国的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现在他应该负什么责任呢？要是擦清眼睛仔细看看，我们个个都能发现曹锟怎样争总统又种下国内战争的种子；那些总统国会议员阁员军阀最近捣的什么鬼；英国如何霸据威海卫、片马；河南的土匪怎样蹂躏那些无组织的人民；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军阀怎样压迫上海唐山汉口等处的工人；就是我们费了几年工夫，流了血去争的青岛和胶济路问题，现在明义虽说交还其实还完全以日人管理之下。再看了那些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怎样互相冲突，不是鹬蚌相持的时机么？青年土耳其党怎样恢复土耳其的独立，俄国劳苦人民怎样从日人和帝制派手里夺回海参崴，这两件事不能使我们奋发么？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或者是知识阶级为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奋斗的最好时机；或者这些事实会促着知识阶级再不能忍受了，再不能过纯粹研究室的生活了，或者至少会使他们记起他们曾出全力而争的青岛；现在是功亏一篑而仍落于敌人之手。在另一方面，那时常被土匪杀戮，军阀蹂躏的农民，正等着知识阶级去率领他们出火坑；那些压迫在外国人之下的上海唐山等处的工人们，现在是不断的向他们呼救的；他们自己也天天在压迫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又造成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切实参加解放被压迫的民众的运动，是他们——中国人民的重要成分——不可摆脱的责任。倘若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真正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者，一定要和中国之革命的社会主义派联络，以打倒军阀官

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呀！倘若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责任，更能百折不回的努力，中国的革命是会得到和土耳其一样的胜利呀！

（原载《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

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

国 焘

在小资产阶级和平派中间，胡适先生或可为一派的代表，他发刊努力周报，活动甚力。这个资产阶级的学者曾发表那有名的政治主张，标榜好政府主义。他还梦想他自己是个漂亮的外交家，主张由各省政府，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派代表组织一个会议，要求一班军阀官僚把袖子里的把戏拿出来，做到“杯酒释兵柄”的故事，并大倡联省自治、梦想用这种制度削减军阀实权。这位先生也曾多少站在一个政府党（王宠惠内阁）后面，企图把他的主张慢慢实现，结果经过这几月的试验，不但竟是一场春梦，反被王怀庆等加上他一个过激派的头衔，要把他捉将官里去。现在呢，或者是使他细嚼过去经验的时机到了，或者是使他重审过去的政治主张和决定目前的方针的时机也到了。我们要问他，目前你怎么办呢？还是三十六计，跑为上计呢？还是坚持原来的主张呢？还是从此更有新的觉悟呢？

第二个可注意的小资产阶级和平派，是蒲伯英派，就是研究系的左派。蒲伯英先生原来是研究系中间一个重要分子，他现在似乎发现了一些研究系历来的错误了，他现在至少了解研究系藉以结合的基础——共同的政治观念——已经动摇了，所以他宣告研究系早已不存在了，不过还剩着一个

友谊的组织。因为研究系是和平的民主派，又可说是投机派，他虽然是中间的左派，但是还完全不能说他有急进的色彩。他那稍微有价值的事业，便是在晨报上宣传些资产阶级的新观念和新理论。他主张国会先制宪，和联省自治。在一个月以前，主张先制宪和制定联省自治制度，不能不说稍有意义；但是现在便没有意义了。国会议员现在是公然向曹大帅磕头去了，公开的买卖又开市了；曹锟快要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了；更反动的张绍会立刻要上台了。我们要问问：你或者还是闭着眼睛制宪呢？还是这些事实会迫着你更走左一点呢？

现在我们要求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仅仅要求你们来抵御更反动的势力。由吴佩孚指挥北京政府的稍微进步时期已是过去，政府现已落在曹锟手里。曹锟虽然素来是个懦弱无能的东西，但是现在是受一班帝制派和反动官僚的包围，变成更反动军阀领袖了。倘若他把北京政权握得稳固了，北京便会出现恐怖的色彩呢。我们还可以说，凡属带着一点所谓新的色彩的分子，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非革命的，将来都要遭受同一的危惧。我们决不要求你们和我们一样的向军阀进攻，但是我们要求你们来共同抵御这种危惧。你们敢接受我们的要求么？

或者因为更反动势力都已联合拢来了的缘故，足为我们共同抵御的第二个理由。现在更反动的中心当然在保定，著名帝制派杨度等早已变成保定王的宠臣；不但专以压迫新势力为职务的齐变元是保定的外藩，就是皖系督军卢永祥等和徐世昌派的王怀庆等也与保定有明显的结合了。这个保定王现在一面和亲日胡匪张作霖联络，一面又要藉吴景濂之力，与

英国奴隶陈炯明发生关系了。国会中最反动之吴景濂等现在也变成保定王的走狗了。所以保定现在是制造政治罪恶的中心点，那些凶恶军阀，亲日派，民国罪犯，国会叛贼，流氓强盗之流，都是光园的上宾了。他们聚集在那里，商量怎样得到奴隶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地位，怎样把民国的政治机关变作他们的私人账房，怎样拍卖中国以饱私囊，怎样压倒各种进步的势力等勾当。倘若你们细心考察这种政治情况，倘若你们想到反动的势力都已结合一气的事实，或者能提醒你们感觉与革命势力携手的必要罢。

我们宣告过好些次说：所谓“恢复法院”是无意识的举动；所有温和的改良运动，立宪运动，是会毫无结果的；目前解决政治的唯一方法，是革命的民主派和各派社会主义团体联合的革命运动。我们的主张，拿历史上的事实，屡次证明毫无错误；目前的现状又给我们的主张从新证实一次呢。无论那个诚实希望改造中国的人，现在是没有法子否认我们的革命方略了；而且他们现在是没有旁的道路走了，除非跟着我们一块儿去走。

这个多年躺在文化运动底下的胡适先生，因为奉直战争的时局变更，促着他献身政治宣传，这个蒙上社会运动面具的蒲伯英先生，也因为那次政变，促起他注意国会制宪事业。现在一个有捉将官里去的危险；一个目击多数议员卖身给军阀去了，或能感觉制宪的无价值了。先生们，现在在你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你们如何干法呢？请你们快快答复这个问题，用事实答复这个问题。而且这里有许多知识阶级分子在后面看着你们：他们会看着你们现在怎样干法，藉此审定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还要说明白些：我

们所希望于你们的，是在不与任何外国侵略家发生关系之下，在不帮助叛贼陈炯明辈之下，和在不宣传不可能的和平主义而阻碍中国的改进之下，与我们共同抵御更反动的军阀势力。再说明显些：胡适派或者目前应该放弃替王正廷辩护的态度，放弃替顾维钧、罗文干伸冤的态度，也不要一溜烟跑了，而且在上项条件之下，努力做暴露反动军阀祸国卖国的宣传；蒲伯英派或者目前应该为政治上共同利害的缘故，抛弃对于民党多年来的恶感，进于与民党联络，在议会的讲台上，指着国会内外那班国贼的面孔，很勇敢的指摘他们的卑污行为。用这样的方法干去，就是说你们在唤醒大家痛恨军阀的事业上做了一些功夫，这就是说你们在改造中国的事业上尽了一点力量。倘若你们能照这样做去，虽然我们在政治上是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相互中间，目前是没有大冲突的。倘若你们不能照这样去做，我想那些知识阶级分子再不会让你们在政治上说话了罢。还有一层，当着政局这样反动的时候，你们如果把头缩起来，这就是说，让反动军阀横行，让反动军阀横行无忌，其罪等于帮助反动军阀呢！

（原载《向导》第13期，1922年12月23日）

革命党的“否认”病

国 焘

中国革命主义者的观念上，自然有许多错误。消极的“否认”观念或者是最大错误之一。下面这些事实，足够证明“否认”观念仍然支配一般的革命心理：

本月二十七日上海总商会所发起之裁兵制宪理财委员会招待新闻记者，欢迎他们赐教。席间民国日报记者邵仲辉发表意见，说道：“北京政府及所任命之军阀，如总统，巡阅使，督军，督理，以至总司令，国民概不承认。如有接洽，概以先生称之。一则可以表示平等，一则表示其官职在法律上不生效力，所谓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就是仲辉同志贡献商界三项办法中之最重要的一项。接着还有叶楚伦同志演说，又把仲辉的大意重述一遍道：“至言办法，则须以北京政府地位之承认与否为前提。如不否认北京政府，则任何办法，断难有效。”这两位代表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演说的用意，无非想引起商家反抗北京政府，不幸只是传授他们一些孔子的名分论和消极的否认论。这种消极的否认观念，一半出自只图建立革命政府反抗非法政府的片面革命策略，一半出自缺乏革命精神的旧观念。虽然这个“否认”观念使各种民众运动受许多磨折，使革命事业受重大打击，但是革命党人现在还没有脱离“否认”观念的病态。

最近几年之内，“否认”观念留下的坏影响，实在数不胜数。五四运动的过程中，上海学生和北京为否认北京政府案之争执，引起不断冲突，全国学生联合会毕竟因而破裂，因而消灭。全国各界联合会及其他由国民党领率的团体，一俟否认北京政府的议案通过后，便放弃一切实际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甚至失去活动机能。最近之劳动立法运动，又因国民党分子否认民六国会之成见，引起劳工界之纠纷。如果国民党分子仍然向商人宣传“否认”政策，恐怕又是一次失策罢。

我们并不是说民众不应该否认北京政府和民六国会以及各省军阀，但是仅仅否认他们，于革命上为无意义。如果一旦民众获得了政权，我们是会立刻否认一切卖国借款和卖国条约，丝毫没有顾虑的。但是革命未成功以前，我们便须承认军阀官僚的存在，并拿他们当做我们瞄准的目标，不断的向他们下攻击。并且拿他们的种种卖国勾当和暴虐行为做攻击他们引线。倘若我们现在只是否认他们，事实上有什么效果呢？我们敢断言：丝毫没有效果。这样是说，如果军阀官僚继续掌握政权，即使全国人民都否认他们，他们仍然可以一样的进行卖国借款，一样的横征暴敛，一样的掳掠屠杀。进一步说，只是消极的否认他们，等于闭着眼睛让他们作恶。这个理由，极其简单，极易明了。因为只有民众的实力才能打倒一种暴力，所谓“否认”的心理和“否认”的表示，简直不能危及暴力的毫米。所以革命党的重要工作，是如何增厚民众实际反抗的势力，并不单是在口头上造成否认军阀卖国政府的空气就算完了。

许多反对否认北京政府的分子，确是缺乏革命精神。他

们只知向军阀官僚告哀苦，希望军阀官僚改善他们的境遇，丝毫不觉得革命之可能与必要。同时民众赞成革命的，的确还是极少数。要是革命党为用一种适当的政策，这些今天还反对革命的民众，明天或许就会赞成革命，而且总有一天，他们会变成革命的信从者，因为他们那种和平改良的希望，始终达不到目的。现今民众既然只有要求改良的动机，还没有真正觉悟革命之必要；如果国民党总是要求民众否认政府，民众便一方害怕，一方觉得否认政府并没有益处；结果民众便不会与国民党接近呢。倘若民众还承认北京政府，倘若他们还没有觉悟，倘若他们还向政府要求这个那个，革命党便要让他们去要求，而且还要不断的引导他们去要求。倘若民众愿意枝枝节节去攻击政府一下，革命党便应该率领他们去攻击。因为民众向政府要求一次，便增加一次失望，向政府攻击一次，便增加一次愤激。这样做去，才能得到三种重要的结果：（一）由这许多次的失望和愤激，促醒他们相信革命是唯一的方法；（二）这种零细的要求和攻击，便是一种民众的训练，如同兵士练习打靶一样；（三）革命党借此得到时常与民众接触的机会，得到向民众宣传革命的机会，结果便能使民众信任革命党，也能使民众的革命气焰变成由一个或数个革命党指挥的革命运动，而且是有组织的革命行动。所以否认北京政府的观念，不啻造成纵容军阀官僚作恶的形势，也是停止一部分最重要的革命工作，不但无益，反有极大的损害。

一个革命党一定要有两个计划，一个是最高度的计划，一个是最低度的计划。最高度的计划便是由革命而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原则，最低度的计划便是目前奋斗的方略。倘若

没有高度的计划，固然不能成为革命党；要是没有最低度的计划，何能使民众相信革命党是真正为民众利益奋斗呢？现在国民党的最低计划，除了军事行动不计外，只是今天联张作霖，明天联段祺瑞。简单说来，国民党除了与军阀周旋以外，简直没有别的目前奋斗的方略，怪不得民众难以发现国民党是代表民众利益奋斗的政党。同时我们看见：民众渐渐觉醒，各处都发生争民权、争自由、裁兵、承认苏俄，废除治安警察法，反对山东协定等运动；但是个个运动都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助力。如果国民党永远躲在否认北京政府的观念之下，丝毫不去实际的参加这些运动，这是国民党何等的损失呢！我们以国民党与其只图由军事革命而建立一个局部的革命政府，同时否认北京政府一切行动，不如在全部革命不能成功之前，采取反对北京政府的态度。而且国民党只有立在北京政府反对党地位，不断的代表人民向北京政府下攻击；如是所有反对北京政府的势力，才能聚集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即使民众仍然愿意向北京政府去要求什么，国民党也要引导他们去要求，不过应该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罢了。他们不能说军事行动不是攻击北京政府的方法，但是单是军事行动，未免不是片面的。象这次商人要求政府裁兵制宪理财的运动，实在含有反对政府的色彩，国民党最好把否认北京的老调子收起来，即刻用实力帮助商人的要求才是，而且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很可以给我们一种教训：俄国共产党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曾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加入议会，代表俄国无产阶级要求改良生活；而且不断的引导群众做争自由与解放的运动。我们知道中国只有幼稚的革命历史，自然革命党免不掉许多幼稚的病态；但是我们希望国民党能够跳出这个

“否认”病态的范围，一方指挥已属革命旗下的群众实际利用个个反抗政府的机会，一方促起没有觉悟的群众向革命的路上前进。我们知道这种反抗政府的群众直接行动，是革命进程中一步艰难的工作。但是要完成革命，这步工作，是没法子避免的，而且只有这样有系统的努力，才能使群众觉醒，才能使革命党日见发展，结果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呢。

（原载《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

学生运动的我见

国 焘

自“五四”到现在，全国学生大有变化，这是我们敢断言的。从前日本侵略我国太厉害了，全国无人不愤恨，所以北京学生一发动，便得着全国的同情和响应，那次的学生运动，不但是全国一致的学生运动，也是全国人民都表同情的运动。现在外国侵略中国的情势依然一样的厉害，内政更是腐败不堪，而学生运动居然消沉了，这是何等的可惜！学生运动消沉的原因，当然很多，大概有四项原因是最重要的：一、地方观念太甚，没有“全国学生一体”的热烈观念；二、各省各地政治情形不同，造成各地学生对于政治的不同观念；三、他们与民众接触太少，没有由学生运动形成民众运动；四、他们对于自己的地位和责任，没有彻底了解。既然有这些原因，结果便使各地学生分离，使学生运动不能有永久的影响；而且造成现今学生界的复杂情况。但是现在许多政治现状促着各地学生都兴奋起来了，或者象“五四”运动一样的学生运动，能够复活于今日罢。如果各地学生能够采取一种适当的方针，我想全国学生是能重新团结起来的，而且能够得到人民的同情，达到一种一定的结果呢。

五四运动以后，接着便有安徽学生驱逐李兆珍的运动、湖南学生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天津学生反抗杨以德的运动

……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得到全国学生充分的援助，仅仅有些地方，曾有某省学生之同乡会援助某省学生之举。全国学生既不能充分的援助某个地方的学生，便使全国学生不觉得严密结合之必要和功效。这种现象，是地方观念造成的；地方观念深入人心，所以难得发生一种彼此休戚相关的强固观念。各地学生既无亲切关系，便使各地学生团体散体，无法抵抗的恶势力。地方观念或者是中国民众最大敌人之一，而且地方观念现已侵入各种民众运动。鲁案协定，只有山东人出头反对，他省人民丝毫无表示；片马问题，只有川滇人民力争，全国人民漠不关心；这是两个显明的例。如果全国学生能够不受地方观念的影响，将北京学生被政府国会协同蹂躏的耻辱，认为是全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耻辱；将英人毆伤重庆学生的耻辱，认为是全国学生和全国人民耻辱；大家协力同心，一致对付，才是增长民众势力消灭敌人暴力的希望罢。所以全国学生的目前任务，尤其是北京学生的任务：便是如何重新组织一个全国学生联合会。从此大家结合得异常严密，彼此互相担保：以后无论那一个地方学生发生事情，都要认为是全国学生的事情，一致行动。有这种观念和行动做基础，全国学生联合会才能实际成立，才是学生界有益的工作。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全国学生结合于什么目标之下。学生不过是求学的青年，并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没有政治上的共同利害关系；所以要找出全体学生的共同目标，真是煞费斟酌。从前全国学生联合会以抗日成立，以抗日为唯一目的，虽然反抗日本的事业仍须进行，但是这个单纯的目的，现在是不能维持全国学生会的存在了。如果重新组织

全国学生会，便有重新审定该会目标之必要。全国学生会的目标，不外两种：一种是政治的，一种是学生界的自身利益。现在我们先说学生界应取的政治目标。全国学生界的观念比以前确有变化和进步；虽然因各地政治情形不同，造成各地学生不同的政治观念，但是也有归于一致的趋势。最近学生界的活动足可证明这种趋势。进步最速的学生要算湖南学生，他们不但组织得很好，最近还发表宣言，表示他们要推翻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汉口学生为英商和英国捕房杀伤拘禁花厂工人事件，竟予以实际援助；重庆学生为片马问题，且举行抵制英货的示威；广东学生且能明瞭英国借款给陈炯明的用意，和他们必须赞助民主革命的使命，因而举行反抗借款的国民大会；上海学生是素来否认北京政府，否认北京政府一切卖国条约和卖国借款的。北京学生在政治的见解上，的确比南方学生较为落后；虽然他们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虽然五四运动明明是政治运动，但是他们屡次表明他们不干预政治，他们历来便取不理政治的态度，以为专心求学和造就个人是能“定吾国文明的百年大计”的。现在蔡校长之走和象坊桥之被毁，是使他们觉得非干预政治不可了，而且承认他们现在的行动是干预政治的行动呢。去年双十节的裁兵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的运动，民权运动和高师学生预选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事件及最近北京学生暴露国会罪恶的运动，均是表示北京学生厌恶军阀官僚和反对北京政府国会赞成民主革命的意向。其余各地学生，如果三省等处学生，思想虽较落后，但是没有不痛恨军阀官僚和外国侵略勾当的。照上面这些事实看来，如果全国学生的结合以反抗外国侵略为共同目标，当然是没有人反对的；再加上以打

倒军阀官僚建立真正的独立的中华民国为共同目标，也是没有人不赞成的。或者还有许多学生不觉得有取革命方法之必要，但是非有政治上的共同目标，全国学生不能结合拢来，这一点或者大家能够明确。而且各地学生的活动，已经证明现在学生界是有采取一个共同政治目标的可能性了。要是说到学生界的自身利益，那就比较简单。因为学生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利益也就是一部分青年的利益。中国社会有许多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如婚姻制等）。束缚青年的发展的，非根本铲除不可；官僚政客时常宣传青年脑筋简单，受人利用的谬说；而且禁止青年干政，用意都是妨碍青年的进步，青年须一致反抗，比如实际要求扩大青年的选举权。改良学校制度，普及教育，谋学生求学之安全等事，当然更是他们的紧要利益。所有这些共同要求和共同利益，都可做为全国学生结合的共同目标。而且非有全国学生一致的努力，决不能达到这些改善青年境遇的目的。现在北京学生既然要挽救蔡驱彭求得求学之安全，又不能忍受象坊桥之耻辱，那么，便非联络全国学生一致行动不可。我希望北京学生能够认清这次运动的性质，急速联络全国学生。而且他们要引起全国学生的热烈同情，便不可专以挽救蔡驱彭为目的，首先要明白全国学生的要求和意向，再进于采取全国学生所需要的共同目标，这次北京学生运动或可变为全国学生运动。

学生在中国社会上的重要地位，这是谁也承认的，但是学生离了民众，便会一事无成。最显明的事实，便是无论商人群众、工人群众、农人群众或军警群众，只要一有组织和觉悟，都比学生群众的力量大得多。学生引导各种民众运动

是可以的，但是离开一般民众而成为独立的学生群众，是决不可以的。现在各处的学生运动，都有离开民众的形势，这真是学生运动的危机！江苏省议会减少教育经费的议案，这是省议会把纳税人民所纳的教育费移作别用的行为；江苏学生便应该和纳税人一同起来干涉。但是我们只看见江苏学生包围议会和召开全省学生代表大会等举动，没有看他们为纳税做适当的宣传。要是他们能够有适当的宣传，纳税人谁不愿意他所纳的税用在教育自己子弟的事业上呢？蔡校长愤目前政治万恶而辞职抗议，北京学生并没有本着蔡校长的意思向民众宣传；怪不得象坊桥学生流血的时候，满街市民都说，“又是学生捣乱”。学生请愿被打，这是政府国会蹂躏人民的一桩大罪恶。学生如果能够到民众中去宣传这事实，民众的同情和愤激是会发动的呢。所以我们可以说：各地学生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团结全国学生；但是这样是还不够的，如果时时把学生运动形成单独的运动，还是很大的失策呢。我希望全国学生不要忘记了与民众密切结合的重要，渐渐在实际上不离开民众；我尤希望愤恨政府国会军阀并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诸君，能急速到民众中去，做革命的宣传。

我还要说的，便是他们不彻底了解自身责任的事件。许多学生认为他应该专心求学，将来以所学贡献国家社会，现在蔡校长指示给我们说：“从前的留学生和学者不过给恶政府做装饰品；所以现在学生要将来不做恶政府的装饰品，便只有先行引导民众改造现政治的唯一方法。还有许多学生抱和平改革政治的观念，但是有许多事实早已证明这种观念的误谬。国家财政已属破产，军费反日增无已，教育经费不是拖欠便是裁减，安徽的教育经费，简直被军阀勒扣了去。废

督裁兵无望，理财制宪亦无望；连学生请愿的和平行动，都已屡遭政府的殴辱。人民生命依军阀官僚的喜怒为转移；一切法律均归无效。外力横行国中，土匪无处不有，现政府何能解决呢？这些事实，我们只要思想一番，便知道民众革命是唯一的道路。又有一些人，以为民主大革命是办不到的，虽然民众势力一天一天的增长，但是他们还不感觉革命之可能。现在我敢断定如果全国学生能够在革命目标之下团结得紧密，再在全国民众中，下宣传的工夫，那么，革命也许在很短的时期之内便会大成功的。我希望全国学生——中国社会最活动分子——能够抛弃一切和平苟安的观念，认清自己的责任，毅然把为自由独立的革命搁在自己的两肩上才是。

末了，我要说的是：现在团结全国学生的机会到了；全国学生聚集一处，大家诉说他们受军阀官僚和外力蹂躏的痛苦的机会；现在他们决定共同反抗军阀和外力的时机也成熟了，或者从此还可动员全国学生向军阀和外力进攻。我们现在问问全国学生们：你们还是抛弃你们的时机呢？还是歧路徘徊，莫名其妙的瞎干呢？还是奋起革命呢？

（原载《向导》第17期，1923年1月24日）

如何反对铁路共管

国 煮

临城事件发生的结果，列强势必趁火打劫，由中国人民身上敲诈一笔横财，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了的。果然，最严酷的铁路共管案，已于目前由外交团护路委员会预备好了，不日就要向北京政府提出。该案不但指明列强要共同掌握已成未成之全中国铁路警察权，并须连带管理全部铁路财政权和运输权。我国人处此全国铁路将亡未亡之际势非护路救国不可。

但是我们处在北京卖国伪政府之下，怎样护路救国，怎样才能达到护路救国的目的，这是我们目前最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京卖国伪政府，不但为我们所否认，而且日夜处心积虑，势非将他推翻不可的。如果我们现在去督促北京政府力争外交，简直是承认和巩固北京政府的地位。我全国人民决不可因争外交的缘故，便认贼作父。而且北京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是不待列强压迫便自动卖国的传统外交政策，这次不待外人要求，首先任命曼德组织铁路警备队，开门揖盗，便是铁证。北京政府若存在一日，便卖国一日，因为他专靠卖国以生存。国民如为外交问题与北京政府合作，岂只认贼作父，抑且延长北京政府之卖国生命，促成他多多与卖国家利权呢！

列强这样协以谋我，北京政府又不可靠，那就只有靠民众势力以救危亡。但是如果我们和前几年的活动一样，由全国各团体各自单独打几个代电，开几次会议，效果势必又等于零。就是举行几次无组织的国民大会或示威运动，效力一定也不大。我们并不能说民众团体没有势力，只是民众团体的组织还未强大，而且没有全国民众势力集中的有力团体，起来号召全国民众为系统的救国运动。

因此为护路救国起见，唯一的方法，只有赶快由全国各职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工会等，起来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这个国民会议组织成了，才能在全国各城市举行有组织的国民大会和示威运动，表示民众的公共意志，和爱国热忱，并因而吸引更多广大的民众加入运动。国民会议如果变成了全国民众的中心团体，那么，国民会议才能做全国民众的武器。而全国民众才能应用这个武器，内则攻打北京卖国伪政府和一切祸国乱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外则反抗铁路共管，制止列强一切侵略阴谋。倘若没有这样一个国民会议，我们虽然有十二分的爱国热忱，如何能够反抗目前最紧迫的铁路共管呢？

（原载《向导》第37期，1923年8月22日）

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

张国焘译

世界各国无政府党的理想和行动，异常分歧，此宣言中已略为指明，毋容再赘。我国与政府党虽只做文字宣传工夫，不如各国无政府共产党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实际参加革命运动，然大部分确系纯洁高尚的青年。但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党人中间不免有些隔阂，无政府党对于共产党，更是时常加以无味的攻击。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兹特将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译出，我亲爱之无政府党同志，如能加以注意和慎重的考虑，这是我们所最希望的。

译者

我们——俄罗斯的无政府共产党和无政府工团派——曾实际参加俄罗斯革命，无论在十月革命将成未成之准备革命时期，或在革命中为劳农政治之剧烈战斗时期，我们总是和波尔扎维克党人在一块儿合作。我们和波尔扎维克党人共同担负一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奋斗，并共同对付那些资产阶级帝制派与伪社会党人的反革命运动。许多无政府党人，在这次俄国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战争中，丧失了生命，而这篇

宣言的作者们仅仅代表曾参加为劳农政府而战的无政府党同志中的一小部分。

虽然我们和波尔扎维克党人一致奋进，我们的目的，直到现在，却还没有相当的达到，这是表现很明白的。我们从来相信无政府党的世界拚命，一时是办不到的；而且要在国家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完成以后，才能谈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无政府事业。我们等待和希望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局面，因为我们承认要达到不用强力维持之社会组织，劳农政府简直是历史进程中必经之道路。

但是在此六年之内，俄国劳动阶级须顽强而勇猛的与全世界资本主义相搏战，而且是单独担负这战争呢。俄国须单独抵御全欧帝国主义的进攻，并须在此世界革命一时尚无希望的情况下，设法使国基日见巩固。俄国无产阶级要能维持他的革命地位，便只有劳农专政之一法了。

因此苏俄不能将已得的政权，从自己手中失去；更不能将此政权奉还资产阶级；同时也不能从事进行不用强力维持之社会组织；除外各国工人们把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都推翻了，那时才能谈到罢。

大战以后，欧洲资产阶级更是凶恶，西欧各国无产阶级也正在那里拼命反抗他们，这是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也很有注意的；他们的最后胜利，还是差得很远呢。在最近几年之内，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局面更加稳固了；阶级斗争之进程中，资产阶级居然占了上风，由抵御时期进到向劳动阶级进攻时期；并且他们为制服国际革命运动起见，创设一种新式而险毒的武器——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无产

阶级是被打到十八层地狱下去了。黑暗的反动势力，不但扫荡了巴华利亚和匈牙利的劳农共和国，而且在这两国内，建立着地主和资本家专政的局面。德国波兰奥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们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次血了，现在呢，压迫工人的形势并没减轻，黑暗的反动势力又进于攻打农人的共和政治了。保加利亚的暴动，便是法西斯蹂躏农民之表徵；保加利亚农人，要算是第一次独立执掌政权的农人。

这种反动潮流还正推进不已，在许多国家里一种特殊恐怖状态，已在发展之中。工人们的机关正在被损毁着，各个罢工运动都遭受残暴的压迫；还有万数被开除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在饥寒的惨状中，坐以待毙。资产阶级立意要以根基上摧残工人的组织，图谋完全拆散劳动运动，使这独立的工人势力，毫无存在的余地；并削去工人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使他们降于奴隶的境地。

在这种种情势之下，还谈无政府革命，那就太非其时了。第一步，无产阶级必定要奋起抵御，共同努力击退资本家的攻势，达到可以抵御的地位；然后才能进攻，与劳动农民携手，以夺到政权，正如俄国表现过的进程一样。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资本压制之下，解脱我们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打碎军阀主义，将生产和分配事业，重新组织起来。只有达到最后胜利以后，并将资产阶级恢复地位之反动革命种种阴谋压到了以后，那时我们才能谈到废除国家和强力等问题。那些认这个进程为不当的，却不能指出其他更妙的进程，实际反处在直接行动和胜利的结合以外，把自己的活动限于很小的范围，很勉强的忍痛和不合实际的幻想之中，这都是不免为革命的名词所蒙蔽着的缘故了。国际无政府主

义既这么软弱和复杂，那就须要一个新势力才能摇撼资产阶级的组织罢。

现在资产阶级竟是全副武装，用他所有的力量攻打我们，那些攻打我们的陆军，舰队，潜水艇，含毒气体，警察，教堂，黄色报纸和黄色工会（译者按：所谓黄色报纸和黄色工会是指改良派和妥协派的）早就预备好了。处在这样的时期中，我们也应该赶造新式武器，所有那些无用的旧武器，不能让他再存留于我们的革命武库中了。

在这个时候，无政府党宣传自由联合主义，势必使劳动阶级势力分散了去；指摘红军，硬说是一个抱野心的帝国主义势力；或是为俄国伪社会党的反革命辩护，而不顾及他们图谋恢复资本家秩序的丑行；都是无政府党绝对不应该采用的政策。要是用个人主义的遗留观念，反封在这历史上过渡时期必须应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甚至以为在这剧烈争斗时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的态度，在后面的建议案中，更表示得明明白白，而且我们是对于世界状况，对于无政府主义在世界革命中历史的任务，和对于由十月革命所得到的种种经验中，加以客观的研究后，才采取这种态度的。

无政府党必须完全脱离一切空想派的偏癖性；我们一定不要自陷于应何陈腐的形式观念，我们必须承认十月革命是收容了第一国际一些最好的传统理论，而且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老早就与社会民主党分离了。

共产党虽然立足于革命的马克思派理论上，却溶化了许多其他的理论，虽无国家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超出他溶化的范围。共产党对于国家问题，怀抱着很明白的态度；他在一个

落后的农业国内，树起社会革命的旗帜，毫不犹豫；他对于德谟克拉西和议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念，扫除得非常干净；而且他领导偌大国家之革命，至五年之久，——这就足以证明历史上少数无政府党的最初观念是很正确的。

无政府工团主义对于国际劳动运动，曾有很大的功绩，和他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完全承认的；但是我们以为无政府工团派此时应该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了。无政府工团派如能承认这个必要，便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一个大转机；从此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中间的一些隔阂，都可以渐次消除了。我们请求无政府党的同志们不要把各资本国家里的革命势力分散了，并与共产党人联合，大家团结于直接群众行动的纯粹革命机关——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之下，更树立一个抵御资本进攻的巩固基础；同时，对于俄罗斯革命，加以赞助。俄国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派和封建派图谋再夺回政权的新阴谋和新攻击是还没有终止的，因此俄国究竟还不能说是完全脱离危险的境界呢。我们同志必须明瞭俄罗斯的各派伪社会党确确实实是为反革命党的利益而活动，假若他们的活动居然成了功，那么，这种由东方杀入欧洲劳动阶级的可怕的反动势力，若以意大利法西斯党与之相较，那又渺乎其小了。

我们确信劳动打倒资本的最后胜利，要是没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如许被压迫民族中的劳动群众的赞助，也是难得成功的。

十月革命促成东方的觉醒，因而发生民族解放之殖民地革命，已证明是确实的事实。我们请求所有诚实的革命主义者，永远而且决绝的与多数社会党和与他们合作的黄色工会

所奉行之秘密帝国主义政策脱离关系。倘若那些革命主义者能努力的赞助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俄罗斯革命，如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才能迅速的脱离殖民地奴隶的地位，如是一切全世界自由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日子，就近在目前了。我们请求无政府党同志对于我们的建议，加以慎重的考虑，因为这包括我们的观念很简明的总和，而这些观念的总和是我们在这最大革命焰火之下六年奋斗所成的。我们在世界反动痛苦下为无产阶级奋斗，完全觉悟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写成这篇宣言和建议，发表出来。

适于此时，党纲和政策的修正和他们的价值的审定，是这么样对于个个革命主义者都有急切的需要，只有很懦弱的或怀成见的狭隘性，才会阻挠无政府党同志们进行这些更改。

我们请求我们的同志们注意目前无论何处资本进攻的开始，估量这种危险至若何程度；研究俄罗斯革命所得来之经验，总括起来，再将攻打资本社会的方法加以修正，那么，革命势力的分离，才可以终止了。我们十分相信：除非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为密切之联合，是再没有其他的道路了。

建议案

1. 无政府党的理论和行动之审定

我们觉得无政府思想，是将许多不能兼容并包的思想，陆续的凑合拢来的。戈得温与托尔斯泰的全人道德论，司狄策（Stirner）的贵族式的个人主义，和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阶级战争观，如何能够范围在一个科学律之内呢。正因为理论的无政府主义是这么样的情景，所以无政府党半世纪以来

的奋斗，竟没有达到在世界上若何重要的地位。

无政府党思想之不一致，实弄成共同意向之缺乏，并妨碍一切共同行动，而且打碎了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不能在世界上发动任何有重要意义之革命行动的原因。直到我们的时代，当此初步社会革命怒潮激荡的时候，当此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政府主义不能担负革命中的最要任务之真象，更显露无余了。

因为这些理由（就是无负担革命中最要任务的能力和思想与行动之不一致），世界各处的无政府党运动，都一天一天的崩溃下去。社会革命主动的地位，是早已丧失了；这个主动地位，是落到主张群众直接行动和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的那些党的手里去了。

2. 无政府党在革命中的任务之审定

在社会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中有组织的少数（就是革命的社会党）总是挺身出力的指导着，并且是在革命中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奋斗。这样一个任务即是自始至终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无政府党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如是把自己逐出革命的历史进程之外，并且于劳动与资本争斗的时候便毫无所行动了。

工人革命的计划 and 演进，需要无产阶级——就是有组织的少数——支配人们社会生活的全部事业，特别是管理生产分配事业和国防事业。无政府既鄙视权力，甚至反对暂时的专政，便将自己处于反对革命工作的地位。

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无政府党总是努力去加厚革命的要素“破坏的精神便是建设的精神”，这个抽象的公式便是无政府党所努力的了。因此半世纪以来，各部分的无政府党总

是致身于初步煽动和宣传的工作，至于革命后如何办法，就没有清晰的观念了。

但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破坏是绝对不能得到胜利的。要得到胜利，便需要一种有组织的权力，这种权力要能运用革命要素，并将革命要素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倘若革命自身不能建立稳固基础，那就鲜有不为反革命的牺牲者了。

革命爆发之际，群众往往尽量毁坏旧有的国家社会机关，在那个时候，有组织的少数革命分子便要引导这种势力向相反的方向进行，并且要将这种单纯的破坏势力，变成建设和组织新社会的势力。

若以无政府党的破坏行动而论，正与一般群众相同，总是立足于所以发生革命之动因上面。那些群众也与无政府党一样，是一种单纯的革命势力，他们总想把促成革命之目的物去掉，并且他们的努力仅仅限于毁灭旧社会。但是革命除掉要把目的物去掉以外，还有其他的计划。有组织的少数自然要回头看到革命的目的物，但是对于最终目的，也须前向为同等之注意。对于这个时期，必须对症下药。第一件要紧的事便是一个有力的组织，这种组织要能依照坚定的意向，支配革命要素，从纷乱中间，找出进行的道路，并领导革命的要求；他固然要能够抵抗从右边来的攻击，也要不屈服于从左边来的感情作用的强奸政策。

3. 我们的时代之审定

我们的时代是在两大势力互相冲突的时代：一方是私人资本，一方是集合劳动。大资本是在有限数的一部人手里，无论在那一种生产事业中间，都想扩大规模以利用劳动力，

或是减少生产，或是大规模的扩大生产。私人资本现在却遇着一个生死仇敌，这个仇敌便是社会集合劳动，既能管理生产，又能发展生产，到空前的大规模地位。

这个经济基础也引起政治上的特殊状态，这是个私人资本和集合劳动的极剧烈的争斗所形成的。近代国家已再不能保持资本和劳动间的平衡了。国家机关的全部权力不是被逼着保护这方，便被逼着保护那方。在最近的将来，全世界的帝制派和德谟克拉西制度之地位，一定要消灭，而成为片面的阶级专政：不是劳动专政，便是资本专政——这是不可避免的进程。在法西斯和共产国际二者之间，我们必定要选择其一的。而且日下再没有第三个进程。反共产党的各党派，无论他们怎么说法，是会或先或后的很合适的归到法西斯队伍里去。俄罗斯的各派反革命党，很明瞭这种情势，虽然他们并没有将他们的希望公开表示出来，却在等着资本豢养的军队打进俄国来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是有组织的阶级军队正在开始最终决斗时代。所有中立的势力，不是加入这边，便须加那边；否则，便被赶出战场之外，而成为社会上无用的废物了。

4. 共产国际

我们深以为第三国际下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向着自由社会主义的最高方式和社会主义生活的最高方式努力进行。我们亲眼看见第三国际所信仰的观念，与社会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好的传统理论，是相吻合的。

同时我们看见无政府党早让社会革命的主动地位，逃出自己的手掌了。我们内部组织原则的欠缺，和包括群众的革

命行动的组织之初步基础的有无，另一方面，集合互相冲突的思想的乌托邦梦想，仍在我们的党派中盛行着；所有这些，实从无政府运动陷于死境。因为这个缘故，目前社会革命主动地位，实早已过渡到共产国际手里去了。

我们已看见俄国共产党所成就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在他们的能自由而不受掣肘的时候；有时也许为这个或那个理由，被欧洲反动势力压迫得太甚的时候，不得不让俄国革命换过一口气来。虽然俄国共产党有因不得已而让步之处，而我们却没有半点理由，疑及他们的急进派革命社会主义。至于共产党完全没有沾染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和改良派社会主义的臭味，这也是丝毫不容疑感的。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算是完整的一件新现象。我们从实际经验上觉得，俄国革命之进步和成功，实有赖于世界革命之成功。我们也相信世界反动势力正在阻碍俄国革命的进步。克烈慕林（译者按：克烈慕林昔为俄国皇宫，今为苏俄政府）的状况虽已改更，在各反共产党领袖下之欧洲无产阶级却依然站在一边而毫无活动的。

俄国革命中，除掉有些错误，偶然的抵触，和想不到的事态发生以外，俄国革命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之确定重要意义，却不容我们有丝毫的怀疑。无产阶级必定要认识俄国革命是一件新的事实，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世界新权力。

因为在革命的新变动中间，俄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权。在这个不可比拟的社会革命中间，组织者的重任落在俄国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劳动阶级之先锋，不能够也不至于放弃这个重任。我们赞许他们合于科学的经验之全部，我们认为

他们的全部事业，是必要的有机阶段，而且是无产阶级奋斗的历史的总和。

签名者：黑资孟、贺甫莱、梅格洛夫司基、温戈古拉多华女士、西麻洛非子、列萍、华西尔察、特洛西士客耶、伯尔确夫士基、罗田保。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于莫斯科

（原载《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

张 特 立

“二七”京汉罢工失败，全国职工运动受此重大打击，大有一落千丈之概。“二七”以前，一时职工运动风起云涌，在我国可谓第一次高潮，不幸此短时期的高潮，即随京汉职工失败而降落，以至未能建立职工运动的稳固基础。职工运动降落了两年，最近始有复兴之兆。北方铁路，如京汉、正大、陇海、胶济、津浦等路工会，均在次第恢复中；“二七”京汉失业工友，已多数恢复工作，胶济路工友亦由罢工而得到胜利；本年“二七”，全国各铁路代表，且在郑州举行盛大之会议。长江一带，如上海则发生四万余纱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虐待的罢工运动，汉口则发生英捕殴杀徐典的罢工，最近英美烟厂工人又发生要求改良待遇的罢工运动。即远在香港之海员工友，亦因船东和香港政府破坏前次罢工争得的条约，正谋积极反抗，为逼迫船东和香港政府切实履行条约的运动。这些事实，不是充分表现职工运动正在复兴吗？

在此职工运动复兴之初，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便是如何可使复兴的职工运动，依正道发展，以进于第二次高潮；而且如何在此复兴的进程中，建立职工运动的稳固基础。我们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须注意三个要点：一、最近职工运动

为什么有复兴的征兆呢？二、在现在职工运动中，有什么新的问题呢？三、从我国职工运动状况上，我们得有一些什么印象呢？

职工运动复兴由何而来？岂真如一班列强外交家、资本家、军阀官僚、反革命派、洋奴，工贼所谓：“由过激派煽惑而成”。不是，决不是的。所谓“由过激派煽惑而成”，是敌人图谋压服职工运动的一种口实。敌人这种妖言，好像是说中国工人并未受何等痛苦，他们并不是为切身痛苦而奋斗，只不过受了过激派的煽惑。如是以取缔过激派为名，实际摧残全体工人。所有为工人阶级切身利益而奋斗的最勇敢分子，以及为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军阀和外国侵略的革命分子，甚至于为合法的，争自由运动的自由派分子，均被他们指为过激派。照外国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的意见，所有反对他们的分子，都是过激派。那么，我们工人阶级就以为这种过激派分子还太少了，因为这些分子愈多，愈能反抗敌人，争取自身的利益。但是从客观上的事实看来，职工运动之复兴，自然有其真实的原因，这种真实原因，决非敌人所能掩盖的。

从民国十一年直至“二七”京汉罢工，各地工人均曾猛烈的进行工会组织。工会之由来，多半因为工友们受了不可忍耐的痛苦，群起而罢工，在罢工中工友们更学了组织之必要；如是罢工而发展工会。由事实证明，工会确能为工人谋得利益，工会组织愈扩大，团结愈坚固，愈能为工人谋得利益；如是工友们又深切了解了工会的作用。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弟所处的悲惨境遇，现在只有靠工会来改善。因此大家了解：团结起来奋斗，是出死入生的唯一道路。工会是工

友们的救星，工会也是工友们的第二生命。这是工友们实际上得来的第一课教训。

彼时工友们于组织工会和要求改良生活之中，遇着外国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的百般压迫；解散工会呀！破坏罢工呀！逮捕领袖呀！枪杀工人呀！因此工友们又认清了这些敌人是不可调和的对头。他们知道了幸福不是安然无事可以得到的，第二生命的工会必须靠大众工友的团结力来维护的，敌人是只能屈服于他们奋斗的实力之下的。因此“二七”罢工不但是京汉工人保卫京汉工会的罢工，而且是全国工人保卫京汉工会反抗敌人压迫的壮举。“二七”罢工虽然失败了，这却是工友们由第二课教训而形成的争斗。

自“二七”京汉工人被屠杀，全国工会被封禁后，前此各地工友拚命争得的权利，尽被敌人取消了。不但如此，工厂中还制定许多苛例，虐待工人，甚至粗语者亦轻则罚金，重则殴打开除。所以“二七”后，工友们所受的痛苦，竟甚于“二七”以前。工友们从此知道比较一番，有工会的时候是怎样，没有工会的时候又是怎样。这就是工友们“二七”后所得到的第三课教训。

工友们得了这许多历史上的教训，所以现在的工友，大非三年前的工友可比；而且他们还受了不可忍耐的痛苦，因此时机一到，工友们便能一致奋起而恢复工会。这就是最近职工运动复兴的主要原因。我们既然知道了职工运动复兴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还要进于解答的问题；更是所谓复活职工运动的时机，到底是什么时机呢？

所谓职工运动复兴的时机，便是政局的变动。曹吴倒后，算是去掉了工友们历年深仇的敌人；但继曹吴而执掌北

方政权者，为另一派军阀，此派军阀之残暴并不减于曹吴。然当此直系军阀刚倒，反直系军阀政权未固之时期；即是职工运动复兴之时机。这个时期有几个特殊之点：一、胜利的各派军阀，彼此冲突剧烈；强暴如奉张者，在山海关以内的政权，尚未稳固；安福卖国军阀如段祺瑞者，正在买空卖空为夺取地盘之计；国民军系之军阀，一面尚未为帝国主义所勾结，一面为反对段张起见，不得不对于国民革命运动为相当之让步；因此不敢公然摧残工会；即直系军阀，亦因曹吴之倒，势力失堕，对于工人，不能如前此之强暴。二、国民革命运动势力随着曹吴失败而澎湃起来了，因此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均有所畏惧，暂时不敢用强暴手段，摧残民众集会结社的自由。这几个特殊之点，便与了北方工人复活工会的机会。北方铁路工会之恢复，和武汉罢工运动之发生，即是事实的表现。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之发生，实系日本资本家年末将花贵纱贱种种种损失，企图加倍榨取劳动力并增加虐待工人的分量，以图补偿，如是发生罢工的运动。罢工所以没有完全失败者，虽因工人能坚持十八日之久为其主因，然日本资本家畏惧民族性的反抗和上海警厅不敢用最强暴手段与民众为敌，亦须为其次要原因。香港海员反抗船东和香港政府破坏条约之举，因然是发动于为切身经济利益，然在他们的运动中，充分表现他们是受了新兴的正确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洗礼和刺激。

所以职工运动复兴的原因；一、工友们得着许多历史上教训，和不可忍耐的痛苦，知道非复兴工会不可。这就是复兴职工运动之根本的伟大要求；也就是职工运动复兴的主要原因。二、直系势力倾覆，各派军阀冲突剧烈，外国帝国主

义在华势力发生变化，国民革命运动勃兴，给与职工运动复兴的种种机会和影响。这是职工运动复兴的次要原因。因为没有根本要求做主要原因，无论什么时机，工友们都是不能利用的；民国十一年以前没有受着历史教训的工人，就是遇到目前的政治变动，也是不能发展一个职工运动的；只有“二七”及现在的工友，才能看清时机，为复兴职工运动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定振兴工会的根本要求是主要原因，促进或影响职工运动的政治变动是次要原因。现在我们知道职工运动复兴的真实原因。我们更证明敌人所谓“由过激派煽惑而成”，确是妖言惑众的阴谋。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二七”失败以后，秘密工会的组织，的确很涣散，工友们对于复活工会的运动并无充分的准备，职工运动至今尚未建立稳固基础，工人阶级的势力，尚不能抵御敌人强暴的压迫。倘若我们在职工运动复兴的进程中，是以造成第二次高潮、建立职工运动稳固的基础为目的；那么，我们格外要看清环境。因此我们要严密审查职工运动复兴中，有什么新的问题？

在“二七”以前的职工运动第一次高潮中，彼时敌人还不知如何应付职工运动，手忙脚乱，无一定方针，因此进行尚比较顺利。自“二七”起，工友们遇着强暴的压迫，丝毫不能挣扎，但只是一个简单的强暴政策而已。工友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却是一个复杂状态，也是一个难于应付的状态。

一个什么复杂的环境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段张专政的北方局面、与曹吴时代没有两样，他们对于工人必仍旧采取强暴手段，这是毫无疑义的。张作霖曾经

屡次严禁哈尔滨工人组织工会，而且东三省境内的人民团体，非秉承他旨意行事，简直没有存在的余地；所以东三省至今尚无公开的工会。段祺瑞是一个顽固专制的军阀，安福时代的横暴，国人如不健忘，当能记起。现在他们的政权暂时渐趋稳固，他们能不秉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命令，摧残职工运动吗！所以职工运动现在须立即预防必来之段张压迫。昨日报载正大工会又被封，其领袖孙云鹏君等又被捕；此消息如确，这就证明段张的压迫已开始了！

北方职工运动不但将受段张的强暴压迫，还处在交通系险毒阴谋破坏之下。交通系一面与段张共同压迫工人，又不准工人组织工会；一面收买工贼，在工人内部中反对工人自己的真正工会；一面又办什么职工教育馆，什么工报；在一种欺骗工人的阴谋下，用软的硬的方法，麻醉工人的心理，破坏工人的组织，使工人永远不得翻身。因此交通系不但是谋害工人的强盗，而且是蹂躏工人的扒手，其为毒甚于段张，这是工人阶级不可不谨防的。

从前北方各省政权，完全在直系军阀统治之下，各地都是一样的压迫工人，因此工人能够认识所有军阀都是属于压迫阶级的，都是工人之敌。现在北方各省政权，是由好几派军阀割据的。有些地位动摇的军阀官僚，不敢与民众为敌，因此不得不暂时优待工人组织工会；有些势力稍弱的军阀官僚，不得不暂时买好工人，为反抗另一派军阀官僚之计。但是在这种政治不统一的状态中的工人都不要受政治不统一的影响，认清工人的斗争始终是为本阶级的，工人的利益要靠自己奋斗得来。我们只能利用军阀官僚彼此间的冲突，发展自己的势力；决不可发生什么幻想。这些自私自利残民祸国

的军阀，无论他现时的态度若何，必然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处在现时政治不统一的状态中的工人，易于发生错误的政治见解，这也是一个新的现状。

最普遍而又最坏的新现象，便是工贼的发生。职工运动发展的进程中，必然发生一班工贼，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现在北京发生一班被交通系和段政府利用的工贼，他们组织什么各省区工团联合总办事处，为欺骗工人之工具，并籍此达到私人升官发财之目的。上海则发生一班租界捕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利用的工贼，私造一些冒牌工会，从各方面破坏职工运动，籍此维持他们敲竹杆领津贴之流氓生涯。香港则发生一班船东和香港政府豢养之包工头，组织什么航海工会，专门破坏海员工会，夺取海员位置。这些同样的工贼，汉口长沙等处都有，助桀为虐，摧残工人，种种事实、不胜枚举。工贼中的多数，当然自始便是工友们公认的工贼；但是也有少数工贼，曾经当过工会职员，博得少数工人的信仰。这些当过工会职员的工贼，现在却见钱眼红，卖了工友，降了敌人，做了最坏的汉奸了。他们或许会用许多花言巧语、蛊惑工人，造谣中伤，欺骗工人；他们的方法，便是想把工人中最勇敢的领袖与工人群众分开。所有为工人阶级勇敢奋斗的领袖，都被他们指为过激派。这不过是明明白白告诉敌人们，某个某个是要当作过激派来捕捉的。但是工友们要了解：这些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津贴的工贼说话的用意，不过是想破坏工会好去向敌人请赏的。工友们应该毫不顾惜的认定这班工贼是工人阶级最坏的敌人，所谓外盗易拒，家贼难防，非用死力打倒他们不可。这些工贼，是职工运动初发生时所没有，却在职工运动发展

之中，由敌人卵翼而成；直到现在，便为职工运动复兴的障碍物了。

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二七”以前，并没有普遍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现在新兴的正确的国民革命运动却正在普遍发展之中。国民革命运动虽尚无广大组织和雄厚势力；但国民革命运动的空气，已布满全国。所谓正确的国民革命运动，便是准对着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下攻击。最近全国人民的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呼声，确能使外国帝国主义和军民革阀畏惧不安。因此国民革命运动和劳动运动所攻击的对象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国民运动所奋斗的目标——自由和独立，就是劳动运动所要求的初步解放。在此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新现象中，职工运动如何去加厚国民革命运动势力，如何使国民革命运动助工人阶级争取目前利益和自由，这也是职工运动中一个新的问题。

劳动运动发展和国民革命运动猛进的结果，段政府虽一面不准工人组织工会，但段政府御用机关善后会议专门委员会所审定之国民会议条例草案，不得不规定一条各省区工团得选举一人参加国民会议的条文。但是接着却说各省区无工团总机关之组织者缺乏，把工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轻轻取消了。他一面不准工人组织工会，一面又规定无工团组织者不得选举代表加入国民会议，这不是明明白白取消工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么！所以工友们应该急起要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获得工人的自由为目的。此种合法的选举权运动如何进行，也是现在职工运动所应注意的问题。

现在职工运动既然有这许多新问题，我们要应付这些新问题，还得先说说，我们在职工运动状况上，有些什么印象

呢？从事实上看来，中国的职工运动虽然还是争初步的经济利益，却是处处都遇着武力的压迫。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和同盟罢工的自由，是被军阀私造的法律剥夺了。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却有无上的威权，可以任意压迫和枪杀工人的。“二七”罢工便是争自由的运动，现在自由尚未获得，那么，争自由的奋斗当然是没有止境的。中国工人的历史命运是这样的：虽然为的是不可忍耐的经济痛苦，却是不得不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来争斗，但是马上便要遇着武力压迫，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争自由的运动。争自由的运动是中国职工运动的第一重难关，要越过这重难关，须经过长时期的奋斗。“二七”罢工不过是争自由的起始，将来须经过二次三次……“二七”样的奋斗和牺牲，才能打过这重难关。

“二七”罢工失败后，凡属参加过职工运动的工友们，都有一种思想。工人领袖多以为“二七”之所以失败，因为他们的组织还没有严密，所以不能当敌人之一击。这种组织尚未严密的觉悟，即极有价值的觉悟；但是当工人阶级之最觉悟分子尚无其阶级的政党组织时，自然一经打击，难免不成粉碎。由这种觉悟而知注重严密组织，这是极对的；但是这只是问题之一面。问题之另一面，便是要注重政治宣传。工人领袖应明明白白告诉全体工友们，工会是只能在奋斗中生存的，每一个初步的经济争斗，都必须变成争自由的政治争斗。须知注重严密组织，是争斗的重要准备，使工人群众明了要改良经济条件，须长期的继续不断的进行争自由的奋斗工作，也是一样的重要的。

有些工友们因为“二七”的失败，发生一些失望和恐惧的心理，这也是失败后必然的现状，但是我们要解释“二

七”失败不过是职工运动史上的难关，不可避免的难关，要解除工人阶级的痛苦，必须由继续奋斗而打破难关。这种错误观念之打破，只有由宣传工作，团结势力和奋斗经验，使工友们了解工人阶级必能打破难关而获得胜利，才能成功的。“二七”以后有些工会依然能存在者；因为他们在“二七”后的退守时期中，能用种种外交的方法或别种取巧的方法，对抗敌人，争得一些经济利益并保持工会的安全。他们所应用的方法，他们自己叫做“软的方法”。这种所谓“软的方法”是对的，是应该采用的方法；因为敌人是奸滑险毒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对付工人，当然工人也要用种种有效的方法对付他们。但是不可忘了阶级争斗，是不可调和的争斗，真实的胜利，只有“硬的方法”——不妥协的争斗——才能得到的。在南方的海员工友，虽然未受“二七”的影响，但是他们第一次罢工胜利后，组织也有渐趋松懈之势；因此授人以隙，结果船东和香港政府便敢于破坏条约；现在只有从速增进团结力和战斗力，并与全国工人的争斗结成密切的关系，才是维持既得权利的不二法门。

我们既然解释了职工运动复兴的原因，目前的新问题，和目前的几点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于讨论方针了。我想目前职工运动的主要方针，应该是争自由的运动。我们要提醒全国的工人群众说：“我们要的是切身经济利益，但是先要有团体的发展；那么，首先就要获得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言论的自由，同盟罢工的自由。”换句话说，就是：

“先有组织，才有争斗，首先尤要有第二生命般的自由！”这个争自由的运动，要不是零零碎碎应付这个那个压迫的运动，要是一个普遍全国的有力运动。而且这个运动有两个目

的：一、由这个运动发展职工运动的势力因而统一职工运动，以至于由运动而能实际保卫职工运动不受摧残。二、获得法律上的合法自由，并取消剥夺工人自由的罚工刑律和治安警察法。进行这个运动还有几个应注意之点：一、应该扩大每一部分的经济要求或争斗，发展争自由的观念和运动；二、这是全国工人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广东工人亦应争全国工人的自由权；三、争自由的运动在香港和上海汉口天津等租界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在内地是反抗帝国主义走狗的军阀官僚的；四、不但要求取消剥夺工人自由的恶法律和争得法律上的自由；并不准军阀的中央政府或省政府制定什么工会条例来限制工人的自由；五、在公开的要求工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要求一个有工人参加的真正全国人民国民会议，藉以获得自由权。只有立即发展一个争自由的运动，才能满足工友们的根本要求，而且使复活工会的时机延长下去。只有立即发展一个争自由的运动，才能抵御帝国主义和段张的压迫。只有立即发展一个全国统一的争自由的运动，才能揭破一班工贼和交通系等的假面具，显露他们破坏和分裂工人阶级的罪恶，并证实一切军阀官僚都是反对工人自由的压迫阶级。只有发展一个争自由的运动，职工运动才实际负担国民革命运动的责任，因为自由是全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反之，也能够证明现在国民革命运动是否能为劳苦群众而奋斗。这样一个运动已是目前职工在此运动中发生职工运动的第二次高潮，才能进于建立职工运动的稳固基础。

（原载《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

论中华民国底宪法

张 国 焘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经过国民政府立法院三年以上的时日，终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一日修正通过、同年五月五日由国民党政府公布。这一宪法草案将成为半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大会讨论底根据。对于这一宪法草案、国人虽多论列，即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中也提出了不少意见，认为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中须详加讨论和修改，但是还未引起国人广泛和充分的注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已逾十年，还不曾有一个宪法，当然是一个憾事。这个已经公布的宪法草案，也不曾发动国人热烈讨论，而是由一党训政壁垒森严的状况下颁布下来的。因为有了这种原因，所以国人对于宪法草案就采取着缄默和冷淡的态度、这当然不是好现状。如果认为与其纵容国人对国事发言盈庭，倒不如使之缄默寡言，一切听候（万能政府）底颁布；那么，立宪与不立宪，反正一样，又何别多此一举！但由渴望抗日和民权的国人看来，就不能始终安于缄默。如果国人对宪法保持冷淡，宪法就会是一纸空文；如果重视，宪法就会发生应有的作用。因此发动一个广泛而有力的立宪运动，那么，这一运动本身就能吸引广大民众来参政和救国，而且立法本身能否民主化，能否用立宪来开辟一个

民主政治的新局面，能否动员广大民众抗日救国，就看国人对于立宪是否热烈参与。宪法制定以后，不至成为具文，也全恃国人对于宪法的态度如何而定。

应当认识抗日救国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离的，民主宪法正是民主政治底法律根据。由一党训政，转变为立宪政治，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行国民大会职权转变为由民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和行使最高政权，总算是中国政治一个进步。因此国人应当急起直追，积极注意立宪问题，发动广大民众来讨论这一宪法草案，形成强烈的立宪运动。广大民众热烈参加立宪，发表意见，要求修改，宪法才能形成全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宪法。就是如果民主宪法一旦到手，也还不应当以此为满足，而且应当再进一步运用这一民主宪法来抗日，□□□中国成为独立自由、领土主权完整的民主共和国。这便是国人对于立宪应当采取的态度。

究竟中国现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宪法呢？在南京立法当局方面，存在着不少的偏见。或则拘泥于孙中山先生底遗教；或别用单纯的法律观点去观察宪法，注意于各国宪法底比较；或则认为宪法系万古不变的根本大法。因此制成的宪法草案，不能适合中国现时代底需要。国人对于宪法草案底批评，也多少不能逸出上述的。

其实中国现时代底宪法，应当具有他自己的特征。

第一、孙中山先生底三民主义，对于中华民国底创造，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自有其历史作用。曾在孙中山先生底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展开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也曾因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为招致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山先生在世时的中国环境与

现在中国所处的环境显然不同。现在是日本侵占了中国很大一部分领土，正企图灭亡华北和全中国，亡国灭种底危险降临在每个中国人民底面前。救亡图存乃是我国家民族、政府和人民最中心和最急迫的。因此国家要善于运用中山先生的遗教，使之适合于中国现在的危亡环境，不应当将中山先生的遗教视为教条，而应当将中山先生底革命主义看作挽救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

第二、中国与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同，因此中国宪法不能机械地仿效世界各国的宪法。中国现在是丧失了领土主权的半殖民地，是正被日本帝国主义宰割的国家，因此不能用单纯的法律观点或与各国宪法底比较研究，来究成中国底立宪。中国底宪法最主要的根据，是将中国目前的危亡环境和中山先生底遗教很好地联系起来，完成一个适合于中国现状的救亡图存的民主的宪法。

第三、宪法不是永久不变的。现时代的宪法应当是能够最广泛的唤起民众来救亡图存底一个武器。在中华民族的领土主权恢复以后，中国获得独立自由以后，那时宪法当可为必要的修改。

总括说来，宪法是一个规定国家性质、政府机构和保障人民权利底根本大法。中国需要救亡图存，因此需要一个民族解放的宪法。中国人民需要改善生活，因此需要一个保障人民民生幸福底宪法。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是互相联系而不可分解的，更不可互相对置的。目前中国人民的中心目的，是民族解放，这又非有广大的民权自由，认真的改善人民生活，来发动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不可。民族解放需要全国人民底抗敌战争；民生幸福需要

民众有组织的努力，都非宪法所能直接赋与，宪法只可给予为民族解放民主幸福而斗争底一些保障和条件；至于民权自由、宪法应当给与彻底而直接的保障的。因此保障民权自由、是立宪运动底中心任务。中国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不但尚未成功，而且亡国大祸逼在目前，因此中国需要一个为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斗争底政府，这个政府需要一个民族统一纲领，为政府和人民底奋斗指南，同时需要一个民主宪法，为政府和人民共同奋斗底依据。

立法院当局没有了解中国的需要，因而对宪法缺乏应有的认识。须知日本侵略中国，不仅出自日本军阀一时的侵略政策，而是有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本质做这侵略政策底基础。因此中国的得救，决不能由外交政策、和平应付和生产建设得来，必须进行猛烈的抗敌战争，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换句话说，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就非给日本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或者是致命的打击不可。吾人并不对抗日的外交政策和生产建设，相反的，而且赞成，如果这些政策，是以抗日为目的，不过仅仅指出只有这些是不够的罢了。问题的中心，是应当认识中国今日的最主要的历史任务，是一□不放□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来实现抗敌的战争。

为什么南京当局的一部分人士总是眷眷不忘训政时期底一党专政，不肯大胆开放政权，不敢形成民主宪法底新阶段呢？这原因是没有了解中国非常时期底需要，因此不能了解以一党来救国，即使是真诚的，也是万分不够。如果能了解目前中国需要最广泛的发动全国人民来救国□就不□泰然放弃训政时期的政治，积极主张民主宪法，与国人共救危

亡。

中华民族对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既是不可避免，战争没有爆发以前，固然需要最广泛的从精神和从物质上来准备，发动和组织全国人民去进入抗战。战争爆发以后尤其需要全国底优秀力量来领导抗战，需要全国军队和千千万万的农村和城市人民为国牺牲，需要全国人民踊跃地供给战争需要，巨额的纸币需要维持，军需工业，交通，□□，粮食需要保护，纵令遇到困难，全国人民战斗精神需要始终不懈，内部需要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并且还要战胜敌人和汉奸从内部来破坏中国的抗战等等。试问即使有“万能的党国”，民众老是在静待，老是安民众安于阿斗底地位，老是对民众存在着门户之见，这如何能成功！万一因为不能团集国力，不幸抗战不利，则中国必遭灭亡。那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都亡了，还有什么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至多只好效法阿皇到英伦作富公罢了！

如果能够从中华民族底最高利益出发来讨论宪法问题，那么，宪法中许多具体问题就不难解决了。现在让我们对于宪法中几个主要问题来加以探讨。

一、三民主义共和国的问题

宪法草案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此条曾招致国内许多人士之非议，即如大公报记者王芸先生曾认为：“在一个尊严的国家之上，还是少加些形容词为好。”吾人并以为在宪法所不加冠词为妥，正如王芸先生所说：“我誓愿尽忠国家，永不做违反国家利益的事；但是叫我举手宣誓信仰三民主义，却踌躇了，我不反对三民主义并且在原则上是赞成的，但是一定叫我举手宣誓，承认不折不

扣的信仰，最低限度，还得给我一个充分的时间，再把三民主义仔细地读几遍。”我们想，这种意见，是值得注意的。除此以外，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种规定可以用以作为限制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的曲解之根据，如萨孟武氏就有这种观点。他说：“宪法草案既把中华民国的国体规定为三民主义共和国，那末，凡积极的主张别个主义或消极的反对三民主义的政党，当然，都可以视为违宪的政党而不容许其存在了。”依照这样说法，不就是仍然是一党政治了么？不是极大的限制与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了么？因此，我们主张，第一条照普通一些好：“中华民国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自然这不是说：我们主张不以三民主义冠国体就等于反对三民主义，我们是赞成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因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为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奋斗的革命的救国主义。依照中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民族主义一则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二，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履行直接民权……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第三，民生主义……一日平均地权，二日节制资本……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我们赞成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并力求其能迅速实现，但并不是在国体上冠着三民主义四个字就可以了事的，而是在日常的政治上议会上，整个宪法的精神上来

贯彻它。

二、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问题

宪法草案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非经国民大会议决，不得变更”。这些规定，固然不错，表示了民族主义底精神；可是这些规定，还只是消极的，还应当进一步的为积极的规定。因此宪法总纲中应专设一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业已丧失之领土主权，应力图恢复，务须达成领土主权完整之中华民国”。这样的条文规定，其意义是宪法给予国民全体和政府一种神圣的任务，凡属国民都应为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而奋斗，以求得最后胜利。

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法应有的特点。因为事实上中华民国主权，大部分已被侵犯，如果宪法上只是掩耳盗铃的记载着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有名无实的条文，实在太过于消极。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政府或国内某种势力固不得侵犯国民的主权；第二，政府和国民尤应恢复被外力侵犯了的主权。第一种意义，由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条文，业已自明；第二种意义就需专设一条，使其意义更加显明。

“中华民国领土非经国民大会议决，不得变更”的记载，其意义一方面表示不承认“满洲国”和冀东察北的被侵占，另一方面表示限制政府不经国民大会议决，不得为丧权辱国的领土处分或与外国订立丧失领土底条约。这意义固然很好，但是也还不够。宪法必须表明中华民国国民和政府不但不容许领土之被侵犯，而且决心恢复失地。

上述条文的增加，不但万分需要，而且表示中华民族底

志愿和宪法的特殊精神。这样宪法就不会成为死板的条文，而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工具。

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问题

宪法草案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这一条文，没有规定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有自决权，而只是空泛的说到一律平等。应当根据中山先生遗教，“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因此宪法应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有自决权，均为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

特别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蒙古王公，进行反动的民族运动，来破坏中华民国底统一，以遂其宰割中国的阴谋的今日，如果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没有民族自决权，就不能发动各民族来共同抗敌，反而使各少数民族感觉在汉族占优势的情况下，各民族的底自由是被漠视的，这更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中国的机会。因此宪法上承认民族自决权，确定各民族组织自己的政府，而自由联合于统一的中华民国之下，这正是夺去日本侵略者利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矛盾来宰割中国的武器，并且是发动各民族来一致抗日救国底必要前提。

四、人民主权利问题

如果中华民国的宪法应当是一个民主宪法，那么，对于人民主权利的保障，至为重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人民是不是享有民权自由，可以说丝毫没有。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各种新闻纸均受严格的检查；人民没有出版自由，各种出版物可以随时被没收和查禁；人民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

更没有组织政党底自由，随时可以用“扰乱治安危害民国”底罪名，横遭摧残。人民底身体，可以任意逮捕，拘禁，审问，甚至处死，人民底居住处所可以任意搜索或封锢。工人罢工，甚至反对日本资本家的罢工都被弹压。人民不但不能宣传比三民主义更进步之主义，而且不能有信仰之自由。弄得偶语弃市，腹谤当诛。甚至以“睦邻”的理由，不准各种刊物登载“抗日”等字样；爱国志士沈钧儒、章乃器等被认为是危害民国底罪犯；真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另一方面外国报纸，刊物，真正“危害民国”的日本报纸和刊物，在中国境内享有无限制的自由，不受检查，不敢封禁。日本侦探，汉奸卖国贼，到处横行无忌。甚至殷汝耕辈可以自由来往于天津一带。这些事实，同样举不胜举。

如果政府当局真正主张立宪，与国人相见以诚，就应当首先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开放党禁，立即停止干涉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信仰、居住、身体等等基本自由权利，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新闻检查条例和一切限制人民自由底法令。国人更应急起力争上述民主权利底实现，而且人民还应当力争有选举国民大会代表之自由，对国民大会提出议案和宣传讨论之自由。

人民底民主权利，不但不应当制定法律来限制、干涉或剥夺，而且应当由宪法予以直接保障。

立法院中一部分人士主张限制人民民主权利，不外下列几种理由：

（一）中国人民是一盘散沙，没有团结力和组织力，其原因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殊不知人民缺少团结力

和组织力，正是人民没有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结果。只有赋予人民的广大的民主权利，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吸引人民参加政治活动，才能提高人民的团结力和组织力。（二）在目前非常时期的中国，人民为了救国，应当牺牲民主权利。其实反面倒是真理；正因为中国处在非常时期，人民若没有民主权利，就不能使广大人民奋起救亡图存。（三）根据世界大势，战后各国都趋向限制人民自由，因此中国也要限制人民自由。其实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危机，所以有些国家形成法西斯专政，来镇压革命，维持资本帝国主义底垂死统治。中国都需要唤起民众来共救危亡，因此不应当效法法西斯主义。（四）“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也是不可不注意的。一切不敢开放政权，畏惧民众，顾虑到“利害是非繁然难阵”、都是当局未能置身于领导国人救亡图存的地位，因而感觉到一旦给人民的民主权利，殊为危险。

根据上述各种事实和理由，国人应当力争宪法直接保障人民权利。人民的信仰、言论、著作、出版、通信、集会、结社应有完全之自由，不得制定法律限制之。人民的身体和居住自由，除刑事上犯罪外，不得侵犯。这种自由应当最广泛的给与中国人民，不应当用保障国家安全，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等等宪法的理由来限制人民自由或权利。只有外国侵略者，日本特务机关及其人员，汉奸卖国贼亲日派等团体或个人，不但不应当享有此种自由，而且应当严厉的剥夺他们的一切自由。因此宪法应当载明“凡勾结外敌，危害国家领土主权及安全者，不得享有人民之自由及权利。”

五、国民大会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应由宪法规定，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权力应当扩大，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国民大会底代表之选举应以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之方式行之。中华民国公民年满十六岁者，即应有选举权，年满二十岁者即应有被选举权。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应当有财产、文化、性别、民族、信仰等等限制，也不要经过什么公民宣誓，更不得以背叛国民政府等罪名，剥夺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有汉奸卖国贼，刑事上犯罪者，和有神经病者，才应剥夺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民大会应当每年召集一次，会期应当延长，不应当有什么当然代表，也不应当有什么指定的代表。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限制不应当太严紧。总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民选的，和有最高权力的国民大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读者可参看本报第二期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和第四期凯丰同志的文章）

一部分当权人士对于国民大会底概念，大要如下：

（一）国民大会的权限愈小愈好，因此将原定这次“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及行使宪法所赋予之职权”底规定改为“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底规定，而且加上“本届国民大会如期完毕，任务終了”底条文。（二）训政时期越长越好，认为现在还只是宪法开始，而不是宪政告成，因此准备还继续来一个训政时期，将施行宪法日期，推延到很远的将来。

（三）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限制愈多愈好，国民大会开会时间愈少愈好。这些都表示不愿有一个民选的和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只想将国民大会变成空议一场的，毫无实权的，装饰品式的，群众大会式的玩具。

实际上，在今天不应当认为如果国民大会权力过大，就

会发生各国议会政治同样的流弊，须知中国今日正是缺少一个民选的国会，而中国正需要一个民主的国会。没有民主的国会，就没有民主共和国。中国今日并不是政党太多，并不须畏惧各党派将会操纵国会，制造政潮，而是人民缺乏参政的机会，人民没有政治结社的自由，应当开放党禁和政权。因此国人应当要求一个民主的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就是一个民主的国会——也是救国会议和立宪会议。

六、政府机构问题

吾人不反对中山先生五院制的政府机构论，可是总统、五院院长副院长、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都应由国民大会选举，对国民大会负责。总统和行政院长不过是行使中央政权的行政首长，立法院应是缩小的国民大会，行使立法权，监察院等于国民大会的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考试院只能对公务人员，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行使考试权，不对公职候选人资格也来实施考试权。行政、司法，考试三院院长副院长，都不应由总统任命，而应由国民大会选举。总之，不应形成总统独裁，而是一方面应当不侵犯国民大会职权，另一方面增加五院职权，使之能独立负责。论者每谓这样足以形成立法与行政的互相牵制，减少行政效率；殊不知基本问题是需要一个民族统一的纲领，提高民权来团结政府和人民一致奋斗，这样就无所谓互相牵制了。

七、地方制度问题

在地方制度问题中，应当增加一节，规定中国境内各民族得组织各民族的人民自治政府，一面这些民族自治政府对于自己区域内得享有充分行使政权的权利，另一方面自由联合于中华民国之下。对于各省省长还是应当遵照中山先生遗

教，由各该省省民代表会选举，而不应由中央政府任命。

八、国民经济

关于国民经济，宪法上，还应明确记载下列二点：第一，“耕者有其田”和“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第二，八小时工作制。吾人不但主张宪法应当明文保护工农利益，并且主张迅速制成保护工农利益的土地法和劳动法，因为这是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来一致救国底前提条件。

本文不过对于宪法草案中各个主要问题，略加论列，其他问题，均不论及。关于宪法问题，值得国人详加研究，本文不过当作国人研究的一个材料罢了。国民政府所公布的宪法草案，需要彻底修改。希望国人能够发动一个热烈的立宪运动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运动，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主政治所应当采取的步骤。

（原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6期）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 大会后的一些情况^①

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亲爱的威金斯基、穆辛同志：

你们二位给我的亲笔信，我已先后收到。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应该如何在党内进行工作的忠告。同时，也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经常地、全面地把中国的情况写信告诉你们。因此，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很可能会对我产生误解。

当然，要我用自己的观点来全面地回答你们二位信中提出的一切问题，这对我恐怕太困难了。因为我的英语很差。不过，我将尽力简单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当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到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我们许多同志没有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清楚。为了阐明我和我的对立面之间的意见分歧，可以把我和马林的观点，作一个比较。

^①题目为编者所加。

马林的观点如下：

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不错，中国的劳动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都还太年轻，太软弱，目前在中国只能开展国民运动，国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这些我们都同意。但是，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吗？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存在吗？中国的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吗？这些就是我们所怀疑之点。

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对立面的同志就叫嚷说：“要忠于国民运动。”“不要怕国民党，劳动运动不会在国民党内迷失方向的。”他们不以客观分析，而是用许多这类主观的辞句表达他们的意见，以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甚至有些领导同志也说出这样明显的错话，如：“中国没有劳动运动。所谓劳动运动实际上就是国民运动。”“谈论阶级斗争就是破坏国民运动的统一”等。由此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被曲解到何种地步。

我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要论点是：

(一) 中国的民族运动受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同其它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埃及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还谈不上已经有了一个纯粹的民族运动。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而这个运动却多少被美国帝国主义所利用。现在的民族运动不但不反对美国和大英帝国，反而出现了一种保护他们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则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

(二) 中国资产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及商人)，在各方面仍然十分依赖外国资本家，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即使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除了反对日本的压迫之外，还远不是一支反对外来压迫的自觉力量。

(三) 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

(四) 我们不能指望，一场意味着反对世界上所有列强的民族运动，会轻而易举地到来，这是需要几年时间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不可能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产生。再说，工人已经有了相当力量，它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运动的一个强大因素。

(五) 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

的可能。

(六) 因此，当前我们共产党人首先要对国民革命的思想继续进行一般的宣传，特别要做大量的工作，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然后下一步，我们再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组国民党，或采用其它任何形式使我们参加到联合的国民运动中去。

(七) 与此同时，我们将留在国民党内，为国民党组织支部，并设法改组国民党。这就是说，我们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或者一般地讲，是为国民运动寻找新的动力。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但它和上述的第六条同样重要。有人提出：马上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如果失败了，就离开国民党，哪怕是短时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再呆几年，因为我们要使国民党做些事情。

(八) 由于国民党还没有进行改组，它仍然集中力量于军事行动和组织政府，我们共产党一方面要作为一个独立地对我们关于中国目前时局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的组织而存在，另一方面，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的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

(九) 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同时，我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还不明确，也许从一开始，工人队伍就是联合的国民运动的左翼。所以，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只有

在广州和汉口，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不得不在国民党进行。

这里我还要向你们指出几点：

（一）前一阶段，我们的同志过多地期待国民运动的统一。可是国民党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因此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现在只能说为国民革命创立某种基础，从而为其打开新的局面，然后再把各种不同因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的国民运动。

（二）事实告诉我们，组织一个真正的中国国民党还需要几年时间。首先要做许多初步的宣传工作。中国人民，甚至革命者，至今还没有感到组织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把革命工作看得非常狭窄，认为只有军事行动才是革命工作。孙中山先生本人一直坚持他的陈旧观点，认为革命进程首先是军政，然后才是训政阶段。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认为，首先他们必须掌权，然后再建党。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有作为的党，它的领袖们首先必须完全放弃组织政府和搞军事行动的主张，诚恳接受首先建党的思想。在国民党的领袖们还没有放弃其陈旧观点和老一套的行动方式的时候，苏维埃俄国却去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是决不会成功的。一旦国民党在反对北方军阀和陈炯明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孙中山就会马上被他自己的将领们所抛弃，广州政府也就会马上彻底垮台。所以，对广州政府的支持不仅毫无价值，反而会延误国民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当国民党遭到失败，放弃旧的主张并接受新的做法后，方可给予支持。

(三) 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改组国民党，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这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就认为：“自上而下的改组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组。”在我们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会目前正热心于组织一个国民革命青年团。最近我收到陈独秀同志本人的来信，说他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而且，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而是现实状况造成的。

(四) 当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传到上海时，我正在那里。上海市党员大会开会讨论了这个宣言。我在会上发表了以下几点看法：“宣言中计划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可能立即组织好。我们一方面必须宣传关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并且坚持不懈地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要赶快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并深入到地方的国民运动的组织中去，以便完成宣言中所提出的计划。”虽然一些同志认为全国代表大会应立即召开，并认为我的意见是“破坏”（“破坏”这个词在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出现），但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大会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清楚地表明。当我们着手进行某种政治运动时，每个中国同志就会懂得，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是何等重要。这同组织或改组“国民党”一样重要。我们不能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党产生之后，再去着手组织工人和农民。

(五) 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幼弱，如何不能把工农组织起来。是的，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仍然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促使幼弱的共产党来承担这双重的任务，即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党和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

不过，现在形势起了一些变化，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在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的概况。上周以来，得到这样的消息：国民党将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上封信中提到，想给你们写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现在我想把这篇文章推迟一下，改为同你们讨论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据悉，要求各省派六名代表参加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于广州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六名代表中，三名要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名由各省的支部选举产生。

在上星期一举行的北京市党员大会上，我就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我把报告的要点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些要点可以表明我对大会的看法。我报告的要点如下：

一年前，我们所要求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两个月以后举行。虽然我们还未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这件事的通知和指示，但是我们必须抓紧进行讨论并作好准备。

代表大会是否能如期召开，这取决于广州的战局。可是，关于广州战局的现状如何，前途如何，现在北京没有人能说清楚。

这次大会能否成功，确实难说。不过，据说每省只派六名代表，那么这些代表可能多数是国民党的将官，能代表普

通国民党员思想的代表极少，故而会议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求增加代表名额，尤其象广东这样的省份，名额应增加得更多些。我们应该提议：国民党的知名党员，那些虽不是国民党员，但却是国民党的朋友的革命者，以及各种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团体的代表，都应被邀请出席这次大会。这样的结果，就会增强群众对大会的影响。

其次，我们必须要求国民党在各地的党员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国民党所有的报刊都应该动员起来讨论和宣传这次大会。尤其是我们党的报刊，应该立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邀请一些进步的国民党员非国民党员的革命者，一起为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草拟一个纲领，并把它提交大会讨论。这次大会将表明我们同国民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假如我们这个纲领被大会采纳则很好，如果不被采纳，那些和我们一起起草纲领的革命者，就会作为国民党的左翼，同我们站在一起。

此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至少要把首先用武力攻占一省，继而攻占多省，然后再发展国民党的主张，改变成首先组织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然后再进行革命。这就是我们对这次大会的主要要求。

北京市党员大会已采纳了我的报告，并决定报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推选我草拟前面提到过的纲领草案，作为下次地方党员大会讨论的基础，然后再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最后决定。

关于这个问题，这里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从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但是由于近来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无法告诉你们确实的情况。

二、我们党的目前状况

在这次广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马林在祝贺大会成功时一方面说，大会排除了在解决党的组织问题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他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障碍”不仅没有“不合作”，没有搞“破坏”，相反，他们仍然同过去一样积极工作。如果马林真的把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些“障碍”排除了，我不知道他将会如何地向那次大会的成功表示祝贺呢！

代表大会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象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那时，我们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反对上届代表大会和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由于我们的帮助，使这种情绪平息下来了。因为我们深深懂得，我们幼弱的党根本经受不住这种打击。

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热烈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有些同志根本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且他们在那次激烈的讨论中，不去避免产生困难，甚

至还在会内外利用我们党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纠纷，对我进行攻击。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样谈论我的。我要公开地答辩：“的确，由于我们年轻，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甚至于犯过些很愚蠢的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将来也决不会犯。”

你们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穆辛同志甚至还表示相信我不会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确实，我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维护我们幼弱的党的团结的。我决不会亲手损害我视为自己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从一开始我就参加的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的说来，党的三次代表大会并未给我们党带来任何困难。至于某些支部出现的一些小纠纷也只是因为我们党的组织还不够完善、党员太年轻又有些个人主义的东西所致。最近我们党的工作没有多大进展，因为遇到了诸如缺乏办法等实际困难。有些决定，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没有贯彻执行，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受到了同志们的阻拦。现在，根据我自己的看法，简单地向你们谈一谈关于我党的工作情况。

自从我们代表大会决定了同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以来，我感到我们党的机关现在并没有加紧宣传工作，也没有对国民党问题提出什么要求。甚至对于我们党公布的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也没有作什么宣传，我们党的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譬如长沙支部，这是我党最好的支部之一，也由于战局的影响，和长沙工会一样，都处于几乎无法开展活动的境地。

长沙支部领导机关遭到了军阀赵恒惕的镇压。汉口外交后援会过去是反日的民族主义组织，近来已把矛头转向英帝国主义。我们在汉口开展国民运动多少还得依靠它为基础，可是最近它也遭到湖北督军的镇压。

有些地方的工会运动有了进展，但由于我没有得到全面的消息，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确实情况。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危机。上海一些或多或少反对我们的工人领袖，打算举行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当然，有些政客是支持这些工人领袖的计划的。我们也打算召开这些代表大会。但我们是否能同他们顺利合作，目前还很难预料。交通系的政客和张作霖大帅以及其它一些人，正企图利用工人为其反对直系的斗争效劳。有些工人领袖也想从某个政客身上寻求支持。倘若这些工人领袖一方面同某些政客或张作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末这在今后很可能成为分裂中国中部和北部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些领袖尚未和任何政客有任何联系之前，我们要委派两名同志去奉天揭他们的企图。过去我们因为派同志去奉天而犯过错误，因此，现在在我们也许还会受损失。

最后，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我们看到出席党的三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对政治问题都能切实地积极讨论，这表明了我们党在成长。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在大会上多次提到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年轻的、赤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革命者组织起来的，是唯一具有远大前途的党。我希望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给我们以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对工会运动的支持，以使

中国革命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现在再说几句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我现在在北京工作，我的任务是编辑北京《劳动周刊》，每周的发行量为二千五百份。同时我还担负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并在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个委员会里工作。我还经常为我们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报刊写些文章。可是我现在不是党的专职工作者，所以还得抽些时间搞自己的事务。我个人动用了一部份共产国际东方部为购买中国刊物寄来的款子。当然，我将尽快于短期内归还，并且要给你们多寄一些刊物。我每两周给你们寄一次刊物，寄去的刊物想均已收到。

希望你们能给我寄些书刊物来，并告诉我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希望你们能马上给我回信，对我上面所写的问题，请多多提出批评。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张国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

“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

张 特 立

一、“二七”前工会运动之发展

我国北方和中部的真正工会运动，发生于民国十年，尤以铁路工人得风气之先。由是工会运动风起云涌，彼响此应，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推其原因，系由于工人身受种种痛苦，因而要求改善，更因而组织工会。在工人所受种种痛苦中，最先感受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外员目之虐待：如克扣工薪、贿赂公行、包卖米粮、包赁住宅、放印子钱、私行役使等等，种种黑暗，罄竹难书；二是经济的压迫：车务工务两部分铁路工人，大概月薪都是九元左右；机器匠的月薪以十五元上下为最普遍。生活日高，而工人工资如此低微，数口之家，何以度日？

但是工友们怎样知道组织工会，就能改善他们所受的痛苦呢？换句话说，便是有什么事实，发动工友们起来组织工会观念呢？这里也有三种事实：一、五四运动虽然是排日的爱国运动，而又完全是由学生发起的，但是五四运动完全表现一种群众势力。工人们看见学生一有组织，便能殴打公使、罢免总长，于是也就起来组织职工会或十人团，赞助学生的爱国运动；后来这种爱国组织便一变其色彩，而为工人的

经济组织了。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劳动运动，澎湃已极，报纸连篇累牍，日有登载，中国工人不免受其影响。尤以俄国工人之胜利，最能惊醒中国工人。三、一班信仰共产主义献身工人阶级的志士，最先组织工人补习学校，劳动组合部书记等机关，宣传工会的作用，开发工人的知识，至实际赞助工人组织的工会。

在这里有一点，须特别注意的，便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铁路工人曾经也受过很大的刺激，开始发生的对于政治的兴趣。那时也有少数志士提倡工人组织团体，结果都失败了。其失败原因是：那时的工人团体，并不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人团体的宗旨只图选举，而未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要求，所以失败后，就烟消云散，并未在工人群众中留下丝毫影响。五四运动后，一班提倡工人团体的志士却不然，一面助长工人的爱国运动，并与□□便的输入正确意识，一方面宣传真正工会组织的意义，并进而引导工会为工人切身利益而奋斗。所以“二七”失败后，工会虽然被封禁了，但是真正的工会的观念、依然□留在全体工友脑海中，还有不少觉悟分子在“二七惨变”后，仍为工会努力；足见“二七”虽遭重大打击、工会运动却依然进行不已。

工会运动既然有了工人的经济痛苦和种种虐待做基本原因，同时又因五四运动的发生，使工人知道群众的组织势力，世界各国的劳动运动又做了工人人们的实际例证，又有一班志士的正确指导，所以真正的工会运动，就发生于民国十年而莫□抵挡了。

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发生于两个地方：一是唐山，一是长辛店。五四运动的时候，京奉路唐山南厂工人即开始组织

职工同人会，于民国“五七”国耻日举行示威运动，曾有三千余工人参加；该会并加入唐山各联合会，做种种爱国运动。后来爱国运动渐渐消沉下去，职工同人会的色彩也渐渐改变；直至民国十年，遂变为纯粹的工会组织了。五四运动的时候，长辛店工人即有十人团的组织，加入者二百余人，开始与北京一班热心工人运动的志士接触。民国十年一月一日，才成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该校在发起之初，为长辛店一班有力工头、工人中觉悟分子及热心工人运动的志士所主持，至同年五月一日，该校遂发起千余工人之示威运动，并产生工会的初步组织，后来经过许多困难和分化，淘汰了一些不良的工头，才成立了纯粹工人的工人俱乐部。铁路工人既然有了这两个组织，同时还有一个《工人周刊》替工人们鼓吹工会组织的消息，传达工人们的意思，因此各地各站的工友们都一致奋起发动他们的组织了。

工人们初有组织的时候，同时也就发生经济的奋斗。这就证明工人们受了不可忍耐的痛苦，简直不能等待他们有坚固的团体，即勉强举行罢工运动。这种事实也证明工人运动并非凭空由少数鼓吹而成，实是有不可忍耐的痛苦为基本原因。十年八月间有长辛店工务处工人的加薪运动，十一月间有粤汉铁路工人的加薪罢工运动，陇海路工人驱逐洋总管苦里的罢工运动，十二月又有汉口人力车夫及香烟厂工人的罢工运动，还有许多的零碎的加薪和改良待遇的运动。

当工人们进行工会组织的中间，当他们举行罢工运动的中间，他们得着了许多的教训。第一点，他们知道和平的哀求是没有效果的。如粤汉工人上稟要求加薪，结果不但不能加薪，还被开除八十一位小工。而且他们从此觉悟幸福与利

益，是要靠工人自己的力量奋斗得来。第二点，惟有工人才能帮助工人。在他们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中间，路局员司军阀官僚交通系等等都是或明或暗的破坏他们或压迫他们，只有同一阶级的工人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热心志士是忠实的帮助他们。如陇海工人罢工中，路局千方百计破坏罢工，竟想利用京汉工人往陇海开车，以制陇海工人之死命，但是京汉工人不但不受利用，反而帮助陇海工人。第三点，他们渐渐了解组织愈大、力量亦愈大。这是他们开始组织的时候，以及每一个组织问题中或运动中，都能直接感觉，无须特别举例证明。这些教训因此又变成促进工会的要素了。

接着就有十一年春间的香港海员罢工，那次罢工参加的海员至三万人，支持至五十七日之久，算是我国工人运动有史以来的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那次罢工不断得到香港和广州全体工人同情罢工和经济援助，而北方工人，亦极为兴奋。京汉、京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曾举行许多次大会，并发出许多通电和文告，一面向铁路工人宣传阶级休戚相关之义，一面充分援助香港海员罢工。正当海员罢工的紧急关头，“援助香港海员”的旗帜从北京一直飘颻到汉口；陇海、京汉、京奉、正太、京绥等路工人汇寄海员工会之捐款，至二千元。这就可表现北方工人运动怎样受海员罢工的影响。海员罢工之大胜利，又使全国工人更确信工人阶级的组织势力，而工会组织因之也更易发展了。

自海员罢工胜利以后，全国各地的工会运动和罢工运动有如雨后春笋。而工会组织得最完善的，有京汉铁路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等，罢工运动最重要的有五月间的上

海纱厂工人罢工，七月间的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八月间的京汉工人罢工和九月间的安源矿工罢工等等。而且这些罢工都得到相当的胜利。不消说得，罢工胜利的结果，自然使工人得到许多的新教训，工人的团结力亦因之而增厚，工会的组织更易扩大到各地各种工人了。

工会发展的进程中，遇着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便是集会结社自由问题。工会发生之初和罢工运动中，没有一处地方未曾遭过强权压迫或武力恫吓。如上海纺织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之被封禁，京汉及各地罢工中及安源矿工罢工中，都遇着严重的武力恫吓。因此十一年八月曾发生全国工人的劳动立法运动，要求国会通过劳动立法案。第二条要求承认工人同盟罢工自由，第三条要求承认工人团体的契约缔结权；同时又要求取消束缚工人的治安警察法和罢工刑律。工人们从痛苦中了解到自由之可宝贵，要求自由之迫切，于那次布满全国的劳动立法运动中完全表现出来。自然直系军阀豢养之国会，丝毫不能给工人以自由权，不过那次运动，是工人群众争夺自由之必须的初步办法，也是工人群众进行政治运动的发端。十一月间唐山五矿三万余矿工发生反抗洋资本家的虐待和要求加薪的罢工运动，罢工支持至二十余日，竟横遭洋奴杨以德的武力压迫。唐山矿工会、京奉路唐山工会、洋炭工会都被封禁，矿工伤五十余人，京奉路唐山工会书记彭礼和君被捕入狱。那次矿工罢工之受摧残和工会之被封禁，北方铁路异常愤激，愈觉得非夺到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不可。

正当唐山矿工罢工失败之际，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聚集北京，议决各铁路一致罢工，要求恢复唐山铁路工会矿工会

和洋炭工会，并承认矿工条件，虽然因为时机已过，各路罢工运动没有实际举行，足见那时工人所感受的切肤之痛，便是压迫工会的事件。那次会议最终决议有两点：一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次第统一各路组织；二如某路遇到压迫时，各路工会一致行动，以图全体互相保障工会之存在。从这两个议决案看来，那么，我们便知道，十二年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被禁止，因而引起大罢工，诚非偶然。

综起来说，北方及中部工会运动到“二七”时，发展到什么程度呢？铁路工人有组织者如京汉、京奉、津浦、正太、京绥、陇海、道清、粤汉、株萍等九路，共计会员约四万人，武汉有二十个工团组织的工团联合会，人数约三万人，湖南有十四个工团组织的工团联合会，人数亦在三万人以上。北京天津济南等处，亦均有各业工人之工会发生，那时工人方面的计划是：先成立京汉总工会，再次第成立各路总工会，再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城市成立各业工会，再由联合而成立各城市工团联合会，准备于同年五月一日在武汉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全国工人运动之统一。工人们这种一日千里的进步和种种伟大的计划，军阀岂有不岂刻之理，怪不得吴佩孚揭穿假面具，而实行其大屠杀工人的阴谋了。

二、“二七”大罢工之始末

我们知道工会运动正在猛烈发展之中，而因团体尚未集中，基础尚未稳固，正是工会运动最危急的关头，十二年春间就是我国工会运动的一个最危急的时期。我在前面已叙述

了北方及中部工人运动发展的大略，现在我再特别说说京汉工会蒸蒸日上之形势，证明“二七”罢工是不可避免的事变。

民国十年以来，京汉工人陆续组织“工人俱乐部”，至十一年春，全路皆组织就绪，得十六个单位。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筹备组织总工会，整饬和划一全路的组织。八月十日复召集全路代表于郑州开第二次会议，制定总工会章程，举定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定总工会地点设在郑州。紧接着第二次会议以后，即同月二十四日，复由北段工人发起全路总同盟罢工，作第一次经济的奋斗，全路一致响应，支持二日，结果工人胜利，路局不得已承认工人九条要求，每人每月加薪三元。足见京汉工人稍有全路统一的雏形，便不能忍耐，奋起而为改良生活之决斗。胜利自然又给与新的兴奋，京汉总工会就无形中得到一种权威了。总工会筹备了四个多月，十二年一月五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复在郑州开会，尔时全路纪律确已一致。即该路少数工人组织之传习所，亦自行宣告取消，该所之百余工友，亦悉数加入总工会。至时全路总工会统一之局完全告成，遂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既已定期举行，于是由筹备委员会登报宣告成立总工会的宗旨，并邀请各工团各界到郑州参与盛典。

不料一月二十五日京汉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法忽致电吴佩孚，要求其禁止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靳云鹏严禁开会，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黄殿辰执行一切，至一月二十八日，黄殿辰即到工会声明禁止开会，工会与之相持三日，终无结果。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

遂派代表杨德甫、史文彬、李震羸、李焕章、凌楚潘等五人即日赴洛与吴交涉。三十一日见吴，吴一味敷衍恐吓，仍声明禁止开会，交涉遂无结果，代表即于当日晚回郑。是时京汉十六个分会、到郑代表已有六十五人；应召而到郑之各工团亦有三十余，计代表一百三十余人；各地方男女学生及新闻界到者亦有三十余人，不但成立大会已准备完善，并已由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命令各分会全体工友，于是日举行庆祝大会。在此情势之下，成立大会岂能因吴之禁止，而遂中止？

代表由洛回郑后，即召集全体代表会议，报告与吴交涉情形，当时全体代表一致愤激，咸谓集会结社乃人民应享之自由，吴佩孚何得而干涉！然犹再三计议，委曲求全，共同议决成立大会或可延迟一二日举行，但各工团所送之牌匾，则须于二月一日迎送总工会会所。当以此详告黄殿辰，亦是见工人让步求全之苦心。不料二月一日清晨，郑州全部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当各代表及郑州全体工友整队护送牌匾向工会进发时，中途竟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于是全体大愤，群以人民自由既遭武力干涉，誓非开会以雪此耻不可。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代表与军警长官再三理论，终无结果。乃奋勇拚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先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之可恨，并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亦遂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军警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强迫解散，但群众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是日下午，代表所驻各旅馆，即有重兵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酒饭，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饭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弃道旁，不许馈送。总工会及郑州分会会所均为军队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杂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兵士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郑州会所即被封闭。

我们现在试静心思想：当初这种情形，工会应当如何办理才好？吴佩孚始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禁止开会；继则由黄殿辰秉吴意旨，用强蛮手段，干涉开会，交涉数日无效；最后并不准许各团体代表送牌匾，包围工人行列，监视行动，不准走路，不准谈话，不准吃饭，并蹂躏会所。军阀之凶横至于此极！而我工人数年来奋斗得来之工会亦遭封禁！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到底是吴佩孚的用心残暴，手段险毒呢？还是工会代表的主张激烈呢？京汉工友在此严重压迫之下，极端侮辱之下，还是束手待毙呢？还是急起以图最后的奋斗呢？想无论何人，凡有血气者，无不愿舍死拥护此神圣之总工会，奋力争夺此获而复失之自由，虽死亦无余恨？

各处代表目击此种情势，知毫无挽救之余地和退缩之可能。即郑重致函京汉总工会，其大要云：“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铁路总工会必能为争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各团体全体代表当日晚率及次日早车分别离郑，各回原地准备实力奋斗，临行时，无不慷慨激昂，大有破釜沉舟之慨。京汉全路各分会代表于十分忍无可忍之中，当即秘密会议，本着拥护总工会之天职，真实代表全体工友的愤

恨心理，为紧急之决议，其大意是：“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决议于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决无退后的。”这个决议案，便于我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有价值的议决案。如火如荼的“二七”大罢工，便根据这个议决案而发生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说：吴佩孚为什么摧残工会呢？吴佩孚这个人是阴险成性，口是心非的大奸雄。当他看见工人们毫无势力的时候，他便宣言“保护劳工”以为沽名钓誉之计；及至工会势力日见膨胀，他使用种种阴谋破坏工人。一面设法买得工人领袖的欢心，如工人代表于十一年八月间去见他时、他亲自接见，殷勤招待，并赠送代表川资及纪念品，殊不知诚实工人并不如官僚政客之易牢笼，吴佩孚的手段遂毫无效果；一面又命他的兵工队学习开车，为破坏罢工准备。等到他觉得工人势力已不可侮，他又唆使他的使党京汉南段段长冯沅组织同人会，藉以破坏京汉工人的组织，但是他的破坏手段都着着失败。所以十二年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开成立大会时，他便毫不客气的揭穿假面具，明目张胆的摧残工会了。但是他究竟为什么摧残工会呢？这个道理，是最易明了的。京汉全路早已是直系军阀的私产，换言之，就是吴佩孚的私产。京汉路是他的重要财源，供他挥霍奢侈，供他养兵乱国，并供他镇压人民之用。京汉第一次罢工时，他迫于时势，不得不允许工人每月增加工薪三元。但是后来他详细计算一下，京汉路二万多工人，那么，每年便增加支出约八十万元，便是他每年减少收入八十万元。他如何舍得这笔

巨款？因为这八十万元，他就认定了工人们与他个人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将来工会扩大，得陇望蜀，再接再厉，这还了得！恶贯满盈的吴佩孚，又知道他自己是为人民所痛恨的，工人有了组织，终久是他的隐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吴佩孚下定决心，非摧残工会不可。当初就是工人方面能够格外容忍，也不免遭他的毒手。工会与其无声无息而被封禁，不如轰轰烈烈的不屈而死！工人回顾吴佩孚压迫工人的事实，应该明了军阀与工人的利益是永远冲突的。工人还可正告全国人民，中国铁路名虽国有，实则无异军阀及交通界官僚的私产，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军阀官僚和洋资本家是冲突的，与全国人民是共同一致的。

到了四日上午十二时，果然全路一律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止。京汉工人罢工后，第一件事情便是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人民自由的摧残，不得已而罢工。一般旅客与工人们同是被军阀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无不表同情于工人的壮举。他们痛恨军阀垄断国有铁路，摧残人民自由，因而妨碍一般人民的交通。工人们内部的组织是十分完整严密的，因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无不是工会会员。各会员均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均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全路，各分会素有训练之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各分会临时组织的调查队。但是在这个组织严密的中间，也有一二缺点，为工人所必须注意的。第一，罢工后，车辆一概停止行动。总工会与各分会的信息来往，亦遂断绝；曹錕、吴佩孚、肖耀南、赵继贤等到能往返窜高，调动军队，屠杀工人；我工会反不能彼此互通消息，及至敌人杀来，犹在梦中。这种缺点：一则因为铁路上的电报局生未

加入工会，二则因为电报局工人无组织，并与铁路工人没有联络。故铁路工会将来必须劝导铁路电报生加入工会，为初步办法。第二，北段各站员司及站长等，居然私自开车，运输军队，屠杀工人。铁路下级职员这种助桀为虐的丑行，工人们此后亦必须尽其能力之所及，开导感化之才好。

四号罢工时，京汉总工会即发表宣言，提出五条件，其原文如下：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云、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阳历放年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工人方面，既有总工会负责，又发表宣言，提出条件，当然是静待吴佩孚和路局方面派代表与他们接洽，俾得早日恢复自由。谁知奸险之吴佩孚，不但毫无与工会和平协商之意，且纵使其爪牙，多方压迫，百计破坏。吾人不妨叙述一二事实，证明当日吴佩孚之狠毒手段。在总工会所在地之江岸，如则由肖耀南之参谋，张厚生要挟工会交出林祥谦、罗海臣、杨德甫等五人，不遂继则派大批军队占领铁路工厂，于深夜在工人家中拘去司机二人，强迫开车，江岸二千余工友闻讯，即全体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张之阴谋遂完全失败。于是一变其阴谋破坏之手段，而为威吓强横之

暴行。先首捕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并连工会派往要求释放被捕三工友之代表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亦一并拘禁，百方威吓，谓须枪毙斩首，他们毫不为动，而二千余工友又与军警对垒相持，张氏无法，只得将项罗等七人释放。直至七日下午二时才有警官来工会，谓奉肖督军命令，当派全权代表于下午五时来工会与工人代表开会谈判，谁知五时二十分即有大批军队突然包围工会，向工人群众开枪袭击，事前并无丝毫警告。此种一网打尽之毒计，始则诱骗工人以开会谈判，继则乘黄昏之时突然袭击，不下警告，成所谓绝无仅有之惨酷事件。郑州方面，由黄殿辰等，逮捕工会领袖刘文松、高彬、姜海士等五人，非刑拷打，游街示众，逼其下上工命令，刘等始终不为之屈。长辛店方面，一面由赵继贤限工人于十二小时内上工，一面调动大批军队，形同围猪，结果捕去工会领袖史文彬、陈励茂、吴雨铭、武把等十一人，及至工人群众要求释放被捕领袖时，此等手无寸铁之工人，亦遭江岸工友同一之命运。是役也，计江岸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郑州被捕者有八人；长辛店死者四人，重伤者三十余人，被捕者十一人；沿路各站，亦均有捕拿工会领袖，严刑拷打，或杀伤工人之同样事件。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不屈，于回答三声“不下上工命令”之后，当工友群众之前，即遭斩首。京汉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以热情赞助工人之故，亦于二月十五日被害。

统观当日情形，国人细想，这是工人行动激烈，要求过伤呢？还是吴佩孚等居心险毒，立意谋害工人呢？假若吴佩孚等稍有息事宁人之意，“二七”罢工，极易和平解决。当日工人要求方面之主要目的，即为撤退占据郑州工会之军警，

恢复京路总工会；所提条件，工人方面未始不可由协商而让步。并且工会方面，曾将撤革赵继贤、冯沅、黄殿辰之条件可以让步之意，由代表委婉达知张厚生及其他曹吴爪牙，此种事实，为参加此次罢工之工友所共见共闻。无如吴佩孚狼子野心，毫不顾及工人方面之意思，而以屠杀无辜之工人为称心快意之事；事后复捏造谣言，谓工人身藏手枪，与军队互斗，以淆乱国人之听闻，掩饰其屠杀之罪恶。其爪牙黄殿辰复勾结郑州少数流氓，假借国民大会名义，为反对工人之虚声。其实国人中稍有血气者，未尝不赞叹工人此次为人民争自由之壮举，而自惭不能附工人之骥尾也。

当日工人之奋斗情形，实笔不胜书，但是工人为反抗军阀为人民争自由之最勇敢的先锋，诚毫无疑问。工人中如林祥谦者，竟能于白刃加颈之际，连呼三声，“不下上工命令”，虽古之英雄豪杰亦何以过此！江岸工友，处枪林弹雨之下，倒毙者已三十余人，犹死守工会，无一逃避者；相持至数十分钟，得工会退后之令，始渐次退散。

郑州姜海士等被黄殿辰强迫执旗工人劝告上工，姜等不畏强暴，反劝工人万勿上工。正定分会委员长康景星被军阀捕拿之后，于下令枪毙之时，彼乃要求稍延数分钟，俾得略申数语，时围观者数千人，彼乃从容叙述工人争自由之意见，滔滔不绝，言词慷慨，历时一小时半，听者泪下如雨，狂号震天地，卒使某军官慑服，不敢加害。此种义烈行为，诚可歌可泣！因此吴佩孚无论如何横蛮残暴，无论如何严厉压迫，工人有如上述之奋斗精神，虽局外人亦知其绝无一蹙不振之理。“二七”大屠杀后，京汉工人之所以陆续上工者，虽由于军队之捆绑、强迫、监视，并绳之以严刑，其势不

得上工，实亦根据总工会二月九日之命令，该项命令，为劝告全路工人暂时忍痛上工，以图将来之再起。因总工会认定全路工友能要恢复工作，将来才有报复之可能。故屠杀后二年以来，京汉路的秘密组织，是从没有中断的。无怪乎曹吴一倒，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旗帜，又复高扬于郑州矣。

上述种种，均系“二七”京汉工友的奋斗之实际情形，现在不妨再说说各路和各地工友的奋斗经过，证明工人阶级一致，及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读者于这些事中，更能看出“二七”京汉罢工之扩大，及其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之重要意义。

各路的罢工援助，当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共同约定如京汉罢工之日仍无切实解决办法，即实行陆续罢工援助。代表回至本路即实行照此公约准备，现在不妨分别简单叙述一番，以明当日情形。

一、正太路二月四日京汉路罢工后，是日下午一时，正太工会即行召集一个紧急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援助京汉方法，结果决定：（一）立时发出通电，以作声援；（二）准备实力援助，七号实行罢工；（三）派纠察队往京汉正定分会石家庄部分，夜间协同守望；（四）下午六时，召集全体大会。是晚召集全体大会，工友异常愤激，委员会议案一律全体通过。七日上午，该路即一致罢工，直到九号晚得到京汉工会通知，谓京汉工会渐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开工，免遭意外。此通知证实后，正太方面才于十号一律忍痛开工。他们上工后，虽武力恫吓，但工人团结坚固，故未受害；虽被封禁，突然路局开除工会委员时，工人复一致反抗，路局口不得不允许他们复职。

二、道清路该路工人人数不过千人，然于“二七”奋斗时最为勇猛，该路工会与京汉同日同时举行罢工，坚持九日之久，始陆续开工。工会领袖王惟桢等四人被捕入狱；黄业兴、李培学、谷云岭、秦梦虎等均因此被开除，工会亦遭封禁。该会此种奋斗精神，正所谓“虽败犹荣”也。

三、津浦路该路工会秘密约定于十三日上午五时，全路一致罢工，但南段浦锁方面已先行发动，于十日上午实行罢工，嗣因京汉工友已遭武力强迫上工之消息传到，该路南段工人遂不能不即时恢复工作，而全路罢工之计划亦只好中止了。

四、粤汉路该路工会自八日起举行罢工，随后该路工人即被军队用麻索捆绑上工，徐家棚工会亦被封禁。

其余如京奉路工会京绥路工会均一致议决于八九号实行罢工，一切罢工手续，均已准备完善，不幸京汉大惨剧发生，罢工风潮亦渐平息，他们同情的举动也只好相机停止了。即彼时尚无组织之胶济路工人，亦准备于津浦路罢工之后，立刻参加此次光荣之奋斗。“二七”罢工蔓延如是之广阔，工人团结力如是之伟大，军阀武力压迫，表面上虽暂告成功，然亦足以使军阀胆战心惊了。

至于各地各工团之实力援助京汉罢工，以武汉各工团出力为最多。当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去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武汉工友，大受感动，各工团全体议决于八日实行罢工，与京汉工友取一致奋斗。于大罢工之第三日（即二月六号），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持旗至江岸总工会慰问，即于江岸举行露天大会，合江岸及各工团工友到者，有万余人，并举行大规模之游行示威，声

容之壮，为从来所未有。不幸二月七日江岸工友即遭大惨杀，同时武汉特别戒严，湖北工团联合会及各重要工团均被封禁，然八日起执行工团联合会之决议案而实际举行罢工者尚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丹水池工人、杨子机器工人等等，结果均遭悲惨的厄运，甚至工人子弟学校亦被蹂躏开除工人，至二百余人之多。其余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工人，事先即被重兵看守，故未能实行践约。其他各处，亦有同样之准备和行动，如上海总同盟罢工之酝酿，北京电业工人之暗中准备，香港海员工人之大愤激，种种事业，不可胜记。

至于那次罢工所得到的同情声，更是难以尽述，如湖南、广东、香港、上海、北京等处的工人团体之电报，如雪片飞来，举行示威者有之。真是“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意义，于奋斗中特别能够表示出来。那次罢工不但得到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同情，而且震动全世界的耳目，第三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特因此发表宣言，海参崴工团总会日鲜无产者同盟以及其他各国工会工人政党，均有最恳挚之电报，遥寄其阶级的同情。即我国民众团体，亦能认识工人争自由之真正意义，为充分之同情表示，如北京市民曾举行四千余人之群众示威运动；通电者、发表宣言者有：北京全体教职员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及各地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及各地各界联合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南洋华侨协会等团体。甚至直系御用之国会中亦有不少有良心之议员屡次为此大屠杀之事件提出查办、质问及弹劾案者。工人要求之正当自由为全国人民所急切需要，于此广大之同情声中，已足见其一斑。我工人更毫不客气地昭示国人：“二七”之役，实为我

工人争自由之起始，自由一日未获，我工人誓必与各业民众为共同需要之自由而奋斗，我工人当继“二七”未竟之功，以争自由之先锋自任。

三、“二七”后的工会运动

“二七惨变”后，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既然受了偌大的损失，自然工人运动转到了一个新的局面。表面上看来，简直没有工会的活动，其实工人运动何尝一日停止，不过在严重压迫之下，进行迟缓吧了。就是在先进各国的工人运动，每当一次大压迫之后，亦必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何况初登舞台之中国工人。我们要知道“二七”后的工会运动情形，最好先检查“二七惨变”所留下之残破局面。

“二七”失败后，统计死者四十余人，残伤者三百余人，京汉及各地失业者在千人以上，被捕者四十余人，工会领袖，多在通缉严拿之列，故多逃亡在外。新兴的工会运动，蒙此巨大损失，何能负担！故彼时工会第一义务，即为抚恤死伤、救济被捕工友及其家属。因工会运动者一时均奔走呼号，设法募集捐款，以图稍舒被难者之困苦。此种救济事业，有及重大之意义，不但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工会运动者既多逃亡在外，同时又为救济事业所苦，秘密工会运动进行自然更迟缓了。

直至十三年二月七日，才有全国铁路工会代表之集会。彼时检阅工会势力，计京汉工会各重要车站，均有数人至数十人之秘密组织，领袖人物为姚佐唐、刘文松等；京奉工会尚秘密存在，暗中应有实力，工会基金亦尚有千余元；京绥

车务工会亦颇为进步，有会员约一千五百人；正太工人尚能团结一致，委员会亦依然存在，惜工会基金分散；粤汉工会亦秘密存在，但会员亦略有减少；津浦工会只有浦镇方面有五千余人秘密组织；株萍路组织如旧，且极有进步；“二七”后异军特起者为胶济路之工会该工会竟能于工人运动大受打击之后，突然发展会员至一千五百余人，算是“二七”后第一件难得的事。北京工人周刊，于极端艰难困苦之中，依旧出版，为指导工界之明星，这也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武汉等各处工团，至此亦只剩下秘密组织。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在此情形之下开会，到者计九路代表，共二十余人，卒能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其成绩不可谓不佳，兹录其宣言如后：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

前年十月间开滦五矿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曾于北京集会，除计议援助开滦矿工外，并产生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正式成立。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进行极为顺利。本拟去年三月间召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不幸“二七”事变发生，京汉工友大遭屠杀，京汉路各路工会多被捣毁封禁，筹备委员会委员及各路工会主要分子，死伤的也有，监禁的也有，逃亡失业的也有。那么一来，进行就极为困难，因此一年之内，除救济死伤失业被害者外，简直没有余力去精密的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幸赖筹备委员和各路工会领袖都具有热忱毅力，所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事宜，没有停顿，这不能不说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经过了这一年多的艰难筹备，直至如今，我全国各

路工会代表才于本年二月间集会，正式宣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制定好了，机关也设立了，负责人员也推选出来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简直是我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之中，得着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

全国铁路总工会怎么是我全体铁路工友的救星呢？我们只要看看总工会的宗旨，便能知道了。总工会的宗旨是什么呢？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争端；三、提高知识，促成工人阶级的觉悟；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会建立密切关系。这四条宗旨，写得多么明白，那一句一字，不是为我全体铁路工人谋福利呢？

总工会既然有了宗旨，办法又怎么样呢？我们要谋得幸福，首先便要有团体，所以这次成立大会已经制定了一个全国铁路组织计划，务使组织好了的各路工会，团结更加严密，各路工会被封禁了的，设法恢复，还没有组织的，从速成立团体。死伤被捕失业工友，总工会当力图救济，各路工会互相联系，总工会当力谋密切。从前各路罢工已要求到之条件，总工会当力争实行；并决定加入万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实现全世界联合之目的。我总工会既系全体铁路工友的总机关，当然以谋全铁路工友之利益，为第一要义，但工人亦国民一分子，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入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亦当视能力所及，参加而促进之，我工友若参加此种国民运动，必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如果能够一一做到，不但总工会的宗旨实现了，我全体铁路工人的幸福也就不小了。

总工会既然有了很好的宗旨和办法，最可注意的，还有各路工会代表的精神，各路工会代表都抱定坚强的志愿，牺牲的魄力，大家约定非实行互助不可，非组织坚固的总工会不可，非奋斗以解除痛苦谋到幸福不可。这种全体代表一致的精神，便是铁路工人万众一心的表示，也就是总工会团结坚固之表证。如果我全体铁路工友能以代表之精神为精神，那我们前途的希望，就很远大了。

全国铁路工友们！全国铁路总工会是我们全体铁路工友的，我全体铁路工友务必拥护我们的总工会，务必依照总工会的宗旨和办法做去，并须在总工会指挥下，一致团结起来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除痛苦，获得幸福哩。全国铁路工友们！我们的总工会已经成立了，从此一致团结，一致奋斗，并一致庆祝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工会运动为之一振，各路组织，均有显著进步，如胶济路会员之大增加，京绥路车务工会会费之能确实收齐，正太工会组织之大加整饬，皆其明证。不料又遭国贼曹吴之所忌，于五月间捕去汉口工人领袖杨德甫、许白昊、罗海臣、周天元、黄子章及律师刘芳等六人，牵连所及，全国铁路总工会北京会所亦被抄封，干事张特立、彭礼和、李斌等同时被捕，未几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亦在石家庄被捕。四月间胶济路工会因举行大会被封禁，工会领袖郭恒祥等四人被开除，至此又有郭君等七人被通缉。一时各工会领袖有被开除者，被通缉者，亦有逃亡者，共计不下四十人，于是工会运动又受一大打击，为“二七”后工会运动的第一厄运。虽然工会运动之进行，亦未尝因此打击而停顿，此则足见工人再接再厉的精神。

此次曹吴倒后，民众势力随之增进，工会运动亦遂毅然有生气。京奉路开除二千余失业工友，因工会之艰苦奋斗，居然达到完满恢复工作之目的；京奉路唐山四千余工友，虽无公开会所，然团结精神，极为浓厚，最近唐山工友捐助京汉被难工友恤金约二百元，即足证明京奉唐山工会之真正存而具实力。胶济路工会亦已恢复，有会员千余人。京汉总工会恢复未及一月，郑州分会已有七百余人，彰德分会已有会员二百余人，将来向南北发展，不难恢复“二七”以前的局面。这些事实，表现什么意义呢？这就是说，工人运动又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的局面，足使工人运动发生极大的进步。

前前后后工人运动的略史，都约略叙述完了，最后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工人运动虽然遭受了“二七”那次的大摧残，但是二年以后，仍进行不断，前仆后继，那么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压迫，工人运动决不会消灭的了；二、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的局面，工人们应一致奋起，恢复“二七”以前之原状；三、我们不但要恢复“二七”以前之原状，还要知道“二七”失败后之一败涂地，究竟是我们工人的组织还有未完善的地方，我们应该谋更完善的组织；四、我们有许多先烈既然为工会牺牲了，我们决不能退缩，决不能畏惧，无论如何，要继承“二七”未竟之功，争得工人集会结社之自由；五、“二七”失败既然因为工会组织力量之薄弱，以后要谋处工会运动之统一，进而谋全世界工人之联络；六、我们既然得着“二七”的教训，我们知道军阀与工人的利益是冲突的，我们以后要处处小心提防是。

“二七惨变”是我国工人运动不可幸免的难关，“二七惨变”给了我工人许多痛苦的教训，许多工友们已经为工会死了，为工会入狱了，为工会失业了，我全国工友只有继续这种光荣伟大的奋斗，只有不怕死的奋斗到底，才能改善我们工人的地位，造成更光荣的工人运动史。

（原载《新青年》第2号 1926年6月）

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

国 焘

五卅运动还没有完结，国内战争又开始了。在每次战争中间，人们总要受极大的损失和痛苦；多一次战争，就须多受一次的损失和痛苦。战争是人类的恶魔，是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百数万的紊乱，没有法子生存，如是不不得不把身子卖给军阀去挡枪弹。军阀们只要拿出七、八元大洋，就可以雇佣一个兵士，为他们自己的私利而战争。可是这些兵士也一样是好好的老百姓，诋因为太穷苦了，所以被军阀们大批地送到前线去丧失了生命，兵士们的父母妻子从此也就变成最可怜悯的为军阀的牺牲者。在战争中间，不但商业停滞，商人们不遭强捐勒索，就被焚杀掳掠。学校不但因战事停顿，学校还要被军队占领，学生也要被驱逐了。农民工人一面要受战时生活昂贵的痛苦，一面还要促去前线送命。每一次战争中，不知要丧失多少生命，孤儿寡妇，遍地皆是，繁华都市和农民区域，都夷作战场，因此人们对于战争恐怖极了。人们没有不厌恶战争而祈祷和平的。所以每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总见一片哀求和平的声音。

可是和平是哀求不来的，民国九年的直皖战争和十一年十三年的两次奉直战争，人们何尝不哀求和平，可是战争依然继续下去。假使人们抵知哀求军阀间的和平，那么，和

平永无实现的一日。人们对于战争十分厌恶，对于和平屡次哀求不得或者觉悟得时机已经到了。人们会慢慢地想到怎样制止一切战争和获得永久和平的方法。

人们既然要避免军阀战争的蹂躏，就得追求战争的原因。这次战争是五卅运动所促进的。为什么这次反奉战争是五卅运动所促进的呢？要明瞭这个因果关系，就不得不追述已往的事实。当五卅运动初起的时候，民众何等热烈，声气何等浩大，迫得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和北京政府开始谈判，准备让步。可是奉系军阀自告奋勇的向英日帝国主义者投效了。遣派大军驻扎上海，从事压迫民众运动。因为奉军开到上海的结果，就引起奉系军阀和孙传芳之间的剧烈冲突了。帝国主义者看见中国民众的觉醒和勃兴，如是恐惧极了，因此一面就想把大宗款项和枪械供给他们的刽子手张作霖，遂引起直系不可忍耐的危惧；一面帝国主义者又记起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关税会议，想藉此缓和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并在经济上略示援助他们的工具段张，而以段张压服民众运动为交换条件，可是这又使直系眼红起来。关税会议不啻是帝国主义列强抛下的一块骨头，这块骨头既引诱着段张尽量压迫民众，复使奉直两系军阀为这块骨头而打起来。这真是帝国主义残害中华民族的妙计呀！有了五卅运动，便有帝国主义利用段张的阴谋毒计，有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毒计，就有这次的战争。所以我们可以说五卅运动促进了这次的反奉战争，换句话说，这次战争就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毒计对付中国民众所酿成的结果。

帝国主义这样阴谋毒计的酿成中国内乱，压迫民众运动，内乱虽然被他们酿成了，可是民众运动到底被他们压服

了没有？没有，五卅运动并没有被他们压服，不过由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进到国内战争的时期了。只要看看全国民众的反奉运动和北京学界反对关税会议以及上海市民反对沪案重查力争自由种种运动，就知道五卅运动还没有完了。

但是这次战争的发动，是由于□□□直系战争的目的：一、是抢夺帝国主义抛下的骨头；二、是报复去年战败的旧仇。假使这次战争一面是奉系，一面是直系，再没有其它分子参加，那就简直是军阀间循环式的报复战争。可是反奉方面，并不止直系，还有国民军国民党和民众势力也站在反奉的一方面。而且在实力上，直系不过共有十多万军队，国民军有四十万，就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也有十多万精兵，再加上全国一致反奉的民众势力，所以在客观上看来，反奉战争中国民军国民党和民众势力是毫无疑义的主力军，直系不过是这次战争的导火线罢了。国民军不但表同情于民众反帝反帝国主义立场，且能给予民众以相当的自由，国民党的军队，更是唯一拥护人民利益的国民革命军，民众也愿为国民军和国民党的后盾。这次战争，既然一面有民众做后盾的国民军和国民党做主力军，一面又是帝国主义刽子手的段张，这一点是与历来战争所不同的。

在民众方面，虽然有反奉的浓厚情绪，可是一班小商人和一部分的教职员与自由职业者，看见五卅运动的表面消沉，不免悲观失望，表示对内对外的妥协心理，甚至哀求和平；就是素称热烈的学生，也多有回到学校里埋头读书去了。但是只有反奉的心理是不够的。就是热烈的徒手示威运动也是不够的。五卅运动以来，无论谁都有一种热烈的反帝国主义

精神，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想打倒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刽子手的奉系军阀。可是帝国主义是全副武装的，又有奉系军阀做他武装刽子手，要打倒他们，就得实行武装的革命。惟有武力可以打倒武力，惟有武装的革命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工具，惟有民众武装可以保障永久的和平。再说民众对于这次反奉战争，若取袖手旁观的态度，那么，你怎样痛恨奉系军阀，奉系军阀还是打不倒的。若没有民众的武装势力参加，这次战争便又是军阀的相互战争。打倒奉系之后，代而起者又是军阀，军阀一日存在，战争就永无已时。所以民众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可使军阀的相互战争成为民众反奉战争，就是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民众积极参加战争的结果，革命民众才能渐次武装起来，民众武装起来的结果，才能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才能肃清军阀，成为保障人民利益的民众武装。

读者诸君，五卅运动还没有完；我们要利用这次战争的机会，成为武装民众的机会，使示威游行的五卅运动成为武装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使向军阀要求自由的运动成为民众武装保障本身自由的运动。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唯一出路，这也是革命民众的必经坦途！

（原载《向导》第136期 1925年11月21日）

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

张 国 焘

林森等召集的所谓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等四位中央委员和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五位候补中央委员。他们被开除的理由，因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还有一篇开除凡属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宣言，也在号称党报的国民日报发表出来，连日民国日报又做了好几篇关于开除共产党员的文章。这个问题，因此值得国民党全体同志的注意了。

无论民国日报如何掩饰，但是这次北京会议和开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决议，其本身终有许多不合法的地方：一、这次北京会议不是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召集的，乃是由林森等以中央委员的个人资格召集；二、退一步说，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至少要有十三个正式委员出席，现在林森等的会议，除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候补委员沈定一第祖权傅汝霖等五人和并未参加会议的吴稚晖先生外，实际只有九个正式委员出席，根本不得谓之中央全体会议，更不得有所决议。三、再退一步说，就算他们的决议有效，古今中外，也没有中央委员开除中央委员的道理。

一个党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除了他是叛徒的现行犯以外，中央全体会议，只能加以处罚，或停止他的职务；

但是他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资格和开除党籍的处分，是要留待全体代表大会解决的，中央全体会议断乎不可越俎代庖。杨希闵熊克武刘震寰等都是反叛的现行犯，但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都只予以不得已和必要的处分，不但还没有正式开除他们，就是他们的中央委员和监察候补委员的资格，也未正式取消。可是未按法定手续而召集的和不足法定人数的所谓中央全体会议，居然开除九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并开除汪精卫先生党籍六个月，这是何等反常的举动。

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根据：在国民党方面，由总理孙中山先生允许于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于后，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在中山先生指导之下，又重新制定“凡属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如何，本党均应集中而包括之”的决议；在共产党方面，也由屡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共产党为集中和扩大国民革命势力起见，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山先生认定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国民革命的共同倾向，所以坚决主张国民党须包括为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属性的真正革命分子。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他负着为工农阶级斗争的特别使命，可是中国此时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计，为无产阶级的初步利益计，也就毅然决然的自愿在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一致进行国民革命的工作。如此看来，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肯容纳共产党员和共产党自愿加入国民党，都是赤胆忠心为着革命，也是磊落光明的行为。如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于革命前途真有不利，在国民党内又是引起纠纷而阻碍革命工作，亦应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加以善

意的讨论而决定之，方为合法。在共产党方面，为两党前途计，当然也要重新考虑。林森等这种不合法和急剧的举动，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是否能得到全体国民党员的信用，都失了居在一个政党领袖地位的常态，不但违反中山先生的遗旨，于党于国亦是有损无益的。

林森等的宣言和民国日报的论文虽然都声明仍认共产党为友党，可是不断的说：“共产党是营寄生生活的”“共产党是没有党德的”“一个跨党党员要忠于国民党，便背叛了共产党，要忠于共产党，便背叛了国民党”“团体是有排拒性的”……等等挑动感情的议论。但是共产党员并不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用不着促进这些反对共产党的感情。这种宣言和论文出现以后，徒使一些党员，在这南北革命潮流都在激进中间，放弃积极的革命事业，专门进行挑动感情的工作。就是一些反国民党报纸，也用冷嘲热笑的口吻，幸灾乐祸的心理，大肆其破坏的阴谋。这不但妨碍国民革命的发展，就是孙中山先生之灵，也是很痛心的。

一个共产党员，假使他没有阶级的觉悟，只顾参加国民革命，不愿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很高兴的让他做一个不跨党的国民党员，丝毫没有吝惜的。一个国民党员，假使他进行国民革命，同时又愿意负担为工农阶级争斗的特别使命，不但是国民党所不能阻止的，而且是国民党所不应阻止的。阶级争斗不但不破坏各阶级共同需要的国民革命，反而只有促进阶级争斗才能使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阶级实际参加国民革命。工农阶级的分子须是一个阶级觉悟者，才是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者，他才是一个真正国民党党徒。老实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没有根

本上的差别的，目前两党的革命工作，更是完全一致的。三民主义之中，再加上一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是一个真正国民革命者。可是于信仰三民主义之外，加上一点老腐不革命的习气，或是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的心理，或是违反中山先生革命方略的行动，或是具有争权夺利的欲望，或是悲观叹息的无勇气，可就不是一个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了。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诸领袖明知共产党确有共产主义的坚决信仰，为集中和扩大国民革命势力起见，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最高党德的表现。共产党员为同一目的起见，不惜加入国民党，自愿受国民党纪律的约束，也是最高党德的表现，都是稍怀私见和热心革命的人所不能做到的。

如果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就要开除，未免太不顾中山先生意旨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革命的前途了，这是我前面已经说明过的，若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不守纪律，也须事实证明。在这两年中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来，不但到处为国民党扩大党势，努力国民革命工作，而且还有不少同志，已经为国民革命而死难了。我们是为革命而加入国民党的，既没有变国民党为共产党的野心，也没有垄断国民党党务的阴谋。到因为革命潮流太紧张了，我们有时力量不及，不能如量为国民党服务，到是很觉得惭愧。这不是信口瞎说，都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我个人就是一个例。虽然挂了一个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的空衔，国民革命的工作到是做了一些，可是国民党机关内的工作，却是没有做过，倒是十分抱歉。就是其他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没有钻营饭碗的，总算都是为革命而来，也可告无罪。我们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才加入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同志手握着手来革

命，那有仅去包办革命工作的道理？不但欢迎国民党老同志和我们一块合作，尤其欢迎国民党的青年同志来和我们一块儿革命。我也承认，有些共产党员，因为幼稚的缘故，在国民党内工作有些错误，或是态度不好，但是在许多错误中间，他们有一样好处，就是不避艰难困苦的干革命。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的组织，不错，是有的。可是这个党团作用，是特别督促和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同志们在国民党内特别努力革命工作。所有国民党的革命主张，只有积极赞成，从没有掣肘过，所以这个党团作用，不但与国民党无损，而且是与国民党有益的。

我希望忠实的国民党同志们不要自视为圣明天子，以归化的夷狄视共产党，我们兄弟般的于中山先生和我们共同所需要的国民革命工作好了。我更希望林森先生不要面对大众说：“无论北政府南政府都是一样靠不住……”，邹鲁先生不要终日坐迫鹿钟麟压迫北京民众的示威运动和发表挟嫌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论。汪精卫同志是代表国民党执掌国民政府政权的人物，开除他的党籍和停止他的职务，不啻摇动国民政府的基础。广州这块革命根据地是孙总理历年来和最近汪精卫蒋介石和许多英勇奋斗的同志屡经血战得来的，绝不要去勾结外敌和反动者去破坏了。上海这些好好的党部，不要打得粉碎呀！尤不要指挥热心革命的同志说：这件国民革命工作，是共产党发起的，我们真正三民主义信徒不要参加呀！张静江同志的劝告，全体国民党同志都必须平心静气去接受呀！假使有人不顾一切，走这条相反的道路，他不但是自杀，而且糟踏了总理孙先生，那么，凡是忠实的国民党员为国民党和革命的前途计，就要毫不客气的和他奋斗。

最后，我要慎重声明的是：国民党内纠纷的继续，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密切合作，是革命成功的唯一保障。我们是愿意和一切忠实的国民党革命分子，长久合作的。林森等的决议是对于我们没有影响的。一切困难问题，须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的。

（原载《向导》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出版）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

国 焘

中国国民党中，一小部分为谣言所惑的党员，时常叹息的说道：“自从共产党加入本党以后，引起党内重大纠纷。”不错，二年以来，党内纠纷是继续不断的。可是这并非孙总理容纳共产分子集中革命势力的遗旨有谬误，也非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妨碍了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的发展；这乃是最少数落伍党员不明瞭革命趋势和不愿积极革命因而排斥新进革命分子之所致。虽然这一小部分党员不明瞭纠纷的原因及党的真象，为敌人多方的离间挑拨诋毁所蒙蔽；但是这两年来中国国民党惊人的进步，已是不可磨灭的事实。自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党的方面，中国国民党吸收了全国先进革命分子十万以上，国民革命的种子已散布在全国进步的民众的心中，国民革命的旗帜已为千百万民众不惜牺牲生命以奋斗的目标；在政治方面，广东反革命势力完全肃清，而且建立了一个革命的国民政府和一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可谓全国民众的革命基础。

国民革命进行如此顺利，当然为敌人所深恶痛绝，百般破坏，而不肯一刻放松的。而且敌人的破坏是很巧妙的。他们知道中国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根本，他们就从破坏国民党下手。这种破坏方法，比用武力攻打革命势力还要厉害十

倍。自从孙总理去世之后，他们就梦想中国国民党将从此瓦解，不但梦想而已，而且在行动上给了中国国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许多绝大的打击。迨至第二次代表大会召集之前，他们还梦想第二次代表大会不能举行；当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之中，他们又梦想第二次代表大会必定破裂。可是他们的梦想成了梦想。但敌人如何梦想，我们不去管他。所可叹者，即在中国国民党内，也有一小部分的党员，虽然他们没有蓄意破坏中国国民党的心思，或许还是以为爱护中国国民党的，可是在反动分子领导之下，谣言迷惑之中，他们在那里希望第二次代表大会不能开成，或最好发生裂痕；甚至敌人或反动分子所捏造的关于广东政局的谣言也有意或无意的为之传播。这是何等重大的过失！但是现在事实证明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不如反动分子所预料。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到海内外代表二百五十八人，全国和海外各地所有中国国民党部都有代表到会，代表都是由全体党员所选举的。所以这次大会确系全国的代表大会，大会开会十九日，全场气象异常严肃，代表精神异常统一。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承认全体代表都在孙总理遗嘱遗像之下，充满革命精神之中，进行这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大会。一切宣言和决议，都在以至诚之意接受总理遗嘱之下，根据孙总理的主义和政纲，以最大多数的投票而决定的。宣言和一切决议的要点，读者自能领会，用不着多说，但是这次大会在革命史上的重要，不减于第一次大会，这是大家应一致承认的。

大会结束了以前的一切纠纷，制定许多实现孙总理主义和政纲的计划，而且大会代表全党立誓要于第三次大会前，实

现全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国国民党员诸君，和自命中山先生真正信徒诸君，对于第二次大会，采取若何态度？还是在第二次大会决议之下，一致进行孙总理所指示的国民革命呢？还是消极的怠工呢？还是在反动分子迷惑之下，继续反对正确的继承孙总理遗教的第二次大会决议呢？这是请大家平心静气思索的问题。

也许有人认为大会处罚西山会议几个最反动分子，还应宽大一些。但是就事实上说，已经是宽大的无以复加，最大多数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根据全党的意志都以为不能再加优容。处罚反动分子或许宜宽大，但是党的威信亦是重要的。我们还是牺牲几个反动分子呢，还是牺牲孙总理艰难缔造的党的纪律呢？这几个反动分子虽然是老同志，但是为了全党的生存，也就不能不割爱了。

还有一些党员对于广东政局尚欠明瞭。他们不知道广东这个活泼泼的革命根据地，确系党中诸领袖和广东全体同志历经艰苦奋斗，才有今日，广州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依照总理的遗志遗教为指南的。广东的革命局面，一方面固然可以为北出中原的根据，一方面也还没有脱离危险之境。英帝国主义窥伺于南，反动军阀环绕于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潜伏于内。稍微明瞭一点大义的人们，都应极力爱护孙总理数十年经营的广东，并为这许多艰难困苦的广东同志分扰，尤其香港政府无时无刻不在图谋倾覆国民政府，武力攻打广州，只有全国党员一致动员抵抗，并急速促成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功，才能保证广东的安全。即使对于广东现状真有怀疑的地方，亲去考察一番，亦无不可。若取消极反对的态度，终有些说不过去。

大会对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依照孙总理容纳共产党分子集中革命势力的遗旨，以诚恳和蔼的精神，加以讨论。在理论上，一致拥护孙总理遗旨；在事实上，证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确能增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亦在大会上声明共产党员的党团组织，不过督促共产党员努力国民革命，而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纯粹以扩大中国国民党和集中革命势力为目的。经此一番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又重新得着一层稳固的保障。

大会既然获得绝大的成功，当然为真实的革命者所欢欣鼓舞的。国民党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鉴于国民党的势力日增，基础日固，或者格外嫉视，因而加紧破坏，亦未可知。只要所有国民党左派——中山先生的忠实继承者，都准备在第二次大会决议之下，牺牲一切，矢志奋斗的自能化险为夷。我们不知道为反动分子所欺骗的一小部分党员，将何以自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那些在革命战线上的战士们，正伸出他们的双手，希望迷途未远的同志，抛弃已往的成见，重新在中国国民党统一的旗帜之下，互相提携着为同一目的而奋斗！

（原载《向导》第145期，1926年2月10日）

民众心目中的广东

国 焘

我会到许多广东以外的革命民众，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国民政府什么时候能够北伐，北伐能否成功？”为什么他们这样问呢？因为他们听说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广东，人民似乎已经获得自由与幸福，而且相信国民政府是为全民族而反抗帝国主义的。他们自己却无日不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反动势力的摧残和剥削痛苦万状，因此希望国民政府做他们的救星。许多并不同情革命的民众，稍微明白一点的，现有也不被反革命谣言所惑去相信广东会实行共产；他们所要问的，就是广东是否平静，政局是否稳定。因为广东以外的各省都扰乱不堪，民不聊生；到是广东统一以来，平安无事，因此他们对于广东也就渐渐同情起来。倘若广东的状况，还良好一些，那么，对于全国民众的影响还更大得多。全国工商界的资本都可以输入广东去开发实业，来往广东的商船，必能满载货物到上海等处，决不至空船漂海而回。广东良好的消息传到全国，全国民众的革命勇气，至少增高十倍。全国民众希望北伐，必然若大旱之望云霓。真到北伐的时候，我们即不说全国民众会“单食台浆，以迎王师”，然此种民众的同情，其影响北伐的效能，至少亦当过几师劲旅。但是怎样才能使广东的现状更为良好，这是一个很复杂

而很重要的问题。

广东是革命势力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受帝国主义者及反动军阀蹂躏最甚的地方，社会现状极为纷乱。自国民党的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广东无日不在敌人四面围攻之中，香港窥伺于南，卖国军阀环绕于北，反动分子蠢动于内；革命势力除了艰苦奋斗之外，并无和平建设的充分机会。现在吴佩孚势力伸张的结果，不但湖南的唐生智已经被他的武力所攻打，即广东亦已从各方面感到吴佩孚势力的压迫；广东若不准备应战，简直是坐待而亡。目前高唱入云的北伐问题，目的固然在于完成国民革命和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同时却也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无论是完成北伐事业，或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都必须先巩固广东内部。但是如何巩固广东内部，又是一个很复杂而又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若说到巩固广东内部，大家的目光似乎注重在北伐时广东要留多少兵力，才能镇压一切的问题。国民政府既然要一支大军实行北伐，同时又要有雄厚的兵力巩固广东，人民的负担未免就要加重起来。而且在准备北伐的紧急关头，解除人民疾苦的工作，政府似乎亦不能十分注意。因此大家有意无意之间，以为要广东现状日渐良好，必然要减轻人民负担，注重解除人民疾苦的工作，要实行北伐，必然要加重人民负担，而且不能以全力注重解除人民疾苦的工作，认为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工作，其实不然，并不是负担加重；即使为完成国民革命，保卫广东的安全起见，人民负担如需加重一点，受多年革命潮流熏陶的广东人民，亦不至发生不安的现状。同时政府若不能整理广东政治，加重人民负担的结果，政府所得亦属无几，很难达到巩固广东内部的目的。

要晓得如何巩固广东内部及如何改良广东现状，就要首先知道广东人民的痛苦是什么。广东人民现在最感受痛苦的，第一就是土匪的骚扰，因为广东土匪是最多不过的。为什么广东的土匪这样多呢？广东的南边有三个海口——香港、澳门、广州湾，这三处本来是中国的地方，现在都归了外国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盘据这些海口，当然是以掠夺中国人民——首先是广东人民——为目的。他们只有掠夺中国人民，才能培植他们的海口。而培植他们海口的方法有三样，枪械、鸦片和赌博；那么，土匪就变成他们的重要主顾了。土匪在这些海口买得枪械，回到广东，大抢一番，又回到这些海口去将抢掠所得的金钱用之于烟赌，并带些枪械回来重新抢劫。如此循环不已，土匪的本钱固然用在这些海口，抢掠所得也就消费于这些海口了。加之香港历年利用陈炯明魏邦平林虎等反革命派扰乱广东，又留下不少的残兵散卒，流为土匪。广东既有三个制造土匪的外国海口，又加上残兵散卒之流为土匪者，那么，广东就变成土匪最多的地方了。土匪之在广东，简直是垄断河道，公然抽捐派税，弄得农民不能耕种，商买无法贸易，交通阻塞，民不聊生。而且这些土匪许多与反革命派勾结的，随时都想乘机倾灭国民政府。第二就是贪官污吏。这些贪官污吏，多半是躲在革命旗帜之下的腐败士大夫。他们对于除盗安良和整理乡村政治的事业，当然不热心执行，反而勾结土豪劣绅，鱼肉乡民，巧立名目，多方抽税。人民血汗多半流入他们的私囊。政府所得之捐税还不如贪官污吏之所得。这班贪官污吏简直是政府与人民中间的最大障碍物，有了这班东西，不但要加重人民的痛苦，即盗匪亦无法肃清。不多说别的，国民政府只要能够

做到肃清土匪和贪官污吏这两件事，人民的痛苦至少能减轻十倍，政府的收入至少也要比现时增加一倍。不但人民的痛苦减轻了，广东内部也就巩固了。广东无土匪并无贪官污吏的消息传到全国，全国民众真会“单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欢迎北伐军，国民政府又事实上增加了一倍的收入，那么北伐也就易于成功了。

如何才能肃清土匪和贪官污吏呢？首先要有一批忠实而廉洁的革命分子，能有切实负起肃清土匪与铲除积弊的决心才行。广东有九十四县，三千万人民；统治这么一个地方，至少有一万个真正革命分子，分布各县各机关，办理各项事业。但是这一万个忠实而且廉洁的革命分子如何养成呢？就要有一个革命的民党。国民党并不是没有，国民党也并不是不革命，而一班党员还没有充分的政治训练和彻底的革命化。要使多数党员获得充分的政治训练和彻底的革命化，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能够在最短期内所能办到的。但是我们仅仅指明这是最重要的事实问题。不然，革命党打到了广东，并不能把广东弄好，这又有什么益处？如果北伐军打到湖南，仍是不能肃清湖南的土匪和贪官污吏，打到湖北，也是一样，那更为危险；而且广东有这班土匪和贪官污吏，广东内部又何能稳固呢？

我说这么一大篇话，不是不赞成北伐，而且我主张急于要北伐。但是这些问题，说明党是如何的重要。要是有一个有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北伐成功，其意义便是解放全国民众，革命政权必然异常稳固，否则，至少亦有些美中不足。但是如何才能养成一个有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第一，革命党人必须认定党是比什么都

重要的，没有党什么事情都办不到；第二，革命党人要认定什么都可牺牲，但是民众利益决不可牺牲；第三，一个党员要负担真正解放全国民众的责任，必须日趋革命化，一切不革命的分子决不能混进党中；第四，一切革命分子必须有合作到底的决心；第五，革命势力的真实联合比什么还重要。假使一个革命党没有上列的五项决心，必不能造成一个真正负担革命的群众党。没有这样一个党，革命不是不能成功，即是革命失其意义。二者都是革命党人所不愿意有的现状。

一般民众是从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看广东，他们是否同情革命和北伐，也是从这样地方着眼，而我们要满足人民的要求，又须从长期的选党下手。望革命的同志们加以注意！

（原载《向导》160期，1926年6月30日）

张国焘“致扩大会函”（摘要）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

（一）当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中央常委得悉在浔（九江）同志主张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的时候，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后来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去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其任务是去指导前敌方面工作，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由赣东入粤，与广东东江农民结合。

（二）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中央常委开会，出席者为（瞿）秋白、罗迈（李维汉）、（张）太雷、国际代表、少年国际代表、加伦（BlueCher）、范克同志（当时被称为斯大林之特别代表——马注），翻译若克、家辰，两同志及国焘。当由加伦报告，加伦说，今日会到张发奎，和他讨论军事，他已赞成……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暂次（逐步之意——马注）往南昌移动回粤。加（伦）同志说，据他（加伦）的意思，张发奎如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此两条件下（其他条件如汪精卫、李济琛等态度可暂时不管）可与张发奎共同回粤。但回粤后，我们与张发奎之间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我记得加伦将这句话重说了两遍）。接着又说：因我推测，假如我们在南昌与张分化，做得好可得八千兵，不好只有五千兵，军事上在江西即要遇着朱培德、钱大钧的部队及张发奎剩余部队种种阻

碍，恐难于到达东江。若张（发奎）共同回粤有二利：一、共有三万兵，易于打破朱培德、钱大钧种种阻碍。二、我们既然推延我们与张（发奎）之间分化，将来可更加分化张（发奎）一部分势力。若张（发奎）不能同意上述二条件，那我们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来。加伦报告后，大家并未发言，当时情形大家是默许他的意见。接着国际代表报告说：现在经费一时无着，又国际电：不许俄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这次暴动，现在较之我们以前所讨论者，又有两件不同的新事实。接着说：国际来电内容：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现在此二件新事实及国际来电，既不能写信告知前方同志，须派一得力同志当面将这些情形告知他们。说罢乃目视国焘，并说可否派国焘去。

（三）曾经向（周）恩来同志说过两次……我接着又说，这新国际代表愿意如此主张（争取与张发奎军队共同回粤，延迟与张发奎军队分化——马注），你看其他俄同志意见如何？（周）恩来同志说：新国际代表来，范克等都不敢表示意见，看加伦意似不主张在南昌发动。我接着说：所以呀！（周）恩来说：到那里再看情形罢。

（四）七月十三日我党发表宣言，……我记得当时曾问国际代表：我们现在对国民党态度如何？他说：国民党的旗帜还是要用的。当时中央实际赞助所谓国民党左派联盟在得结合的运动。

（五）新国际代表来时，中央常委已拟好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没收大地主土地，秋季进行抗租减租的运动，他看了表示赞成，只说农民运动应以没收土地为重心，此议案

只是太把减租看重了。他是对于小地主始终说准其享有土地所有权。七月十八日我党发表的目前行动纲领，还是说没收大地主土地，至于说没收一切土地决议，那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事，为前敌同志所不知道者。

（六）当武汉唐生智、汪精卫政府日见反动时，彼时我党与张发奎关系尚好，事实上我们曾将农民的枪支送给他，并答应他种种帮助。

（七）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谭）平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一面坚决进行，一面派人与张（发奎）办外交。（谭）平山说，贺龙想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这一点以拉拢贺，所以我们不好主张与张（发奎）办外交。我记得有一次和（恽）代英说：我们若不与张（发奎）办点外交，表示拉拢，七十七团及教导团中几百同志不是都牺牲了么？

（恽）代英说：现在哪里管得许多。又关于暴动日期问题，我主张推迟一二日，但须在张（发奎）未到南昌之前。理由是，因我们这里干起来，汉口中央及其余未到南昌在张（发奎）部队中的同志尚不知道，恐防备不及遭他们毒手，须留一二日时间，等他们得到通知，好作准备。后来算是将暴动日期由三十晚改至三十一晚。至于推张发奎为主席团之一，并将黄琪翔、朱晖日亦参加革委，这也是我主张的，理由如上述。

（八）当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土地时，我也是赞成者之一，当然是一大错误。后来在瑞金及上抗时，我提出必须修改，减至五十亩以上土地应没收。

（九）对于没收和征发的经济政策，工农化的军队，严惩反动派三主张，我为坚决赞成者之一，县市区村政府须实

施工农政权，我为坚决提议者。

(1927年11月30日《中央通信》第13期)

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吗？

特

立三同志自从六月一直到三中全会领导了中央的政策，他在这个时期中一贯的反对共产国际，他责备共产国际不懂得中国形势，企图以革命者所绝不应采用的外交辞语责备国际右倾，而领导中国反对国际。自然他达不到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万分的密切。

什么是立三的理论呢？什么是他以类似激烈的辞句所遮盖的反共产国际的理论呢？很明显的，立三理论是：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理论。这位“大革命家”——立三同志只是一位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沮丧的小资产阶级者。

立三在他的文章中总是说到，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范围中方能胜利，它或者说，“没有世界革命底胜利则中国革命不能保障它的持续”。

立三这种对于中国革命很自负的特殊意见并不是他首创的。德国奥奥国及匈牙利的社会法西斯党人在一九一八年，亦曾采用这种口号反对革命运动。考茨基、诺斯克、谢德曼及包活尔等狂吼着说：“啊，是的，我们赞成革命，但是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范围内才能成功，我们单独干只有失败，所以要打倒不懂这个大道理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欧洲社会法西斯蒂党人利用这种口号，居然得着暂时的效果，麻痹

了工人群众。

这种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主义也就是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的实质，托洛斯基主义独有的与这件左倾的冒险主义的外套。托洛斯基派反对苏联的斗争实质是什么呢？是：苏联不能存在，更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失败，如果不赶快爆发世界革命，苏联一定要死亡。于是，托洛斯基派根据着这种苏联一定要死亡的预言，努力去促成这种早已算定了的死亡。自然他不会如愿以偿。苏联工人阶级在联邦共产党领导下飞快的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时托洛斯基在土耳其著书，反对德国革命，拼命的证明苏联的死亡是必然来到的，自然我们希望立三同志根本铲除他的错误理论。但是这种不相信革命的悲观主义也就是立三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基础。

各国的一般形势，与革命主客观力量之发展速度是不同的。革命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毫无怀疑，各国统治制度的危机，都在大大的向前发展。但是只有与列帝主义绝不相容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家，才会想到全世界能同时爆发暴动。

中国革命者应当怎么办？在等待着这种事件的到来吗？这实际上是抛弃组织中国革命，是放弃组织中国革命的任务，是麻痹与解散群众的理论。简言之，这是认为中国革命没有办法的理论。如果立三毫无掩饰的在党内宣传这种理论，那他早就不能在党内了。所以他就用托洛斯基的方式遮盖这种理论，用冒险主义的词句，责备共产国际。

立三提出开始世界暴动的号召，他以为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它简直要求要使一切共产破产，现在党应当组织中国革命，争取城市与农村广大群众，创造真正胜利的

暴动条件，而立三对于这一任务的完成表示怀疑，而提出冒险主义的把戏。

他看到帝国主义国民党与白色恐怖的力量，但他不相信，中国工农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拥护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能够推翻反动统治与保持革命胜利。因为他是在绝望中去组织中国革命，所以将中国党引向冒险主义去，同时逼迫着共产国际要它也要走上这个冒险主义的道路。

立三路线是与列宁主义绝不相容的。必须铲除立三路线，才能使党有力量去执行组织革命的历史任务，创立胜利的暴动的前提。立三根本认为这种任务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是在对绝对的消极与冒险主义中间动摇着。

我们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应该而且可以解决的任务。革命形势正在飞快的发展。党需要百倍努力的争取与组织广大群众，以准备胜利的暴动。

（原载《实话》第4期，1930年12月21日）

党内必须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特

常常咒骂党的同志是怠工不动和动机主义，这是李立三的方法底一种特色。李立三所采用的那种手段，不仅是卑劣的，而且是极危险的。

我们很难看到，在世界任何一国内，有象中国党这样动员大多数干部与全体同志所干的勇敢的拼生死的残酷斗争。如果党内已经显然发生了一种停顿与混乱，我们就必须分析他的来源。特别是在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斗争情绪，在许多斗争中表现不但不是低落而正是高涨的现在，这种分析更是需要。

我们必须明白地，毫不含糊地指示出来，现在一般党员之所以徬徨无据，和党与广大群众关系之所以削弱，根本原因是中央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以前在李立三领导下所定下来的致党的死命的路线。当着党的领导——象李立三的领导那样——在一切问题中采用着错误的政策，当着这种领导给予党以有系统的错误的指示和命令，当着这种路线取消了工会与青年团的组织的时候，那么，除了一般党员丧失那执行真正革命路线的有效方法以外，还有什么别样的结果？如果我绑起一个人的脚来，他怎么能够跳跃呢？

这种情形的改变，只有在理论上与行动上彻底的来肃清

李立三主义，才有可能。三中全会完成了这种任务吗？我们应该说，没有。毫无疑问的，三中全会是曾经尝试，想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国的实际的情形来定下一个路线，以代替李立三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不错，三中全会取消了那种条件尚未成熟就去暴动的办法，也取消了李立三独创的群众的和组织的路线。并且也已经把苏维埃根据地的问题，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

但是，三中全会这种建立一个正确路线的企图，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他对李立三主义取消了一个错误的调和态度。三中全会想取消李立三主义，但是一点也没有损坏它。三中全会企图根据国际的指示来定下的一个路线，但是并没有领导全党走到正确路线的途径，没有同直接反对共产国际的李立三主义作坚决斗争。这种错误的对李立三主义的调和态度的结果，使得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在党的工作上开始反立三主义的第一步。这是一种惯常的经验：只开半步的人，他决不跑路。

他还会怎样呢？李立三，他断定了“中国与全世界的暴动”。他用他的冒险的计划来“组织”（就是说，他不组织）党，他说，参加与领导一切罢工，一半是不可能的，一半是机会主义的。他把他的天然论代替了组织革命的真正的革命的路线。他说，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向前发展。李立三给了党一大捆钞票，但是都不能兑现，因为都是假的，在党内的结果就是党的崩坏。不去对党员群众解释这些是原则上的错误，不去解释李立三发行的假钞票，而且他的路线是反对共产国际的，三中全会不但不做这些事，反而说这条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

李立三对党说：“哟，现在全中国与全世界的暴动的时机到了”。三中全会说，不对。但是同时也不说，李立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一致的路线。在这种含混状态之中，一般党员与党的干部怎能找出他的出路来？所以，三中全会在有些实际问题上的正确的决定也毫无结果，这有什么可怪的呢？

从这里看来，很明显地，我们必须在党内对李立三主义施行一番彻底清算，推动党来担负起伟大的革命任务。一切调和的企图想掩护李立三主义的任何部分，都是想把党拖住泥坑里的企图。因此，现在主要任务，是要很彻底的确定在理论上行动上反李立三主义的斗争的基础，击碎那些在三中全会尚占着统治地位的对李立三主义的调和态度，因此好毁灭那阻挡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障碍。

这就是党的目前任务。我们必须完成这一任务，使党能够团结起来，队伍整齐的前进！

（原载《实话》第4期，1930年12月21日）

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国 焘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发生了与共产国际指示给我们党的路线背道而驰的立三路线，这一立三路线，统治着全党达三个月之久，发展成为反共产国际的斗争。因此要使全党转变到共产国际所指示的路线上来，须首先最清楚的最彻底的揭穿立三路线的本质。

三中全会在秋白同志领导之下，对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立场，这不但没有能够反对立三路线，同时也没有反对右倾。相反的，倒是给了立三路线一层保证，并使右倾发展滋长起来。这样，当然不能转变到共产国际路线方面来。虽然在共产国际批评立三路线错误的信到达后，当时中央政治局即企图接受国际指示，开始这一真正转变，但是还不彻底，还包括由于调和立场所发生的错误观点。

只有四中全会才开始了这一真正转变。它彻底批评了立三路线，指斥了秋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外交手腕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反对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指导机关，指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作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在这四中全会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就明显的暴露了他们自己的面孔，而受到四中全会的打击。

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

以罗文虎为首的右派小组织，并不敢提出明显的右派纲领，可是利用一般党员反对立三路线的愤激，和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派别成见来欺骗一部分同志，用意只在于分裂党和破坏党，来便利敌人对于我们党的破获。

虽然罗文虎企图掩盖他的右倾纲领。但是他的右倾观点还是暴露出来了。第一，在罗文虎所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和他所发行的反革命的小册子中，对于党反对右倾的任务始终一字不提，或空空洞洞地说他一句，共产国际和党的路线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而他却是片面的。“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这是右派罗文虎不能不具有的立场。第二，他口口声声说立三路线破坏了党和中国革命，这是暴露他对革命的失望，目的就是要得出取消派的结论，可是中国革命是在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之上发展的，我们党虽然发生了立三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然于党始终尽了它革命的作用，而且有不可抹杀的成绩；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党一天天的健全起来，并不如立三主义者说什么党的危机，也不如右派首领所说立三路线破坏了党和革命。可是右派叛徒罗文虎企图提出右派纲领，却不能以夸大立三路线的恶果下手。第三，他说中共第六次大会的路线不正确，在六次大会以后，在六月十一号决议立三路线形成之前，党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因此他主张推翻整过领导，这正如陈独秀的取消派一样，是以破坏我们的党为目的的，右派要提出他的纲领，又不能不从破

坏党下手。

丝毫没有奇怪，因为共产国际和党员群众反对右倾的坚决和激烈，右倾机会主义者不能用提出明显的右倾纲领的办法来反党。因此右派就利用反立三主义的机会，企图把党拿往退却的路线上去，一开始就用发行反革命的小册子和组织第二省委等办法来分裂党，公开向敌人告密。

立三主义者，在党坚决的反立三路线的争斗中，也知道公开反对国际，对立三路线公开调和是不可能了，便也采取企图联合右派小组织或者用对反右倾的消极态度的方法，来继续他们反国际反党拥护立三路线的新花样。

凡是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和革命的工人，应该了解右派小组织首领罗文虎等十人说什么他们是坚决反对立三路线者，他们主张提拔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他们不满意四中全会，因为它没有解决实际任务，他们反对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因为他执行国际路线没有保证，力争紧急会议等等欺骗的话，实际他们是反党反国际反四中全会分裂党向敌人告密，来便利敌人对我们的摧残。

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不受叛徒罗文虎的小组织的欺骗，而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不放松反立三主义，因为反立三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开展出来，尤其要反对“左”右联合反对党和国际的一切企图。这样，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

（原载《实话》第10期，1931年2月7日）

执行党的路线 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

特 立

四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后的过程，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重要关键。我们的党开展着反立三路线和对它的调和主义的争斗，谴责了瞿秋白同志对于共产国际两面派的行为，将右派叛徒罗文虎等驱逐出党，打碎了右派小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党和群众工作的全部转变，这个转变将要使党的工作在最近的将来有重要的进步。

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辞句掩盖着对于执行革命任务的消极，它不但曾经把党从国际路线变成了半托洛斯基主义和盲动主义的路线，而且它也使右倾发育滋长起来。阶级斗争的剧烈发展，需要党的坚强领导，使党内不能不发生在剧烈斗争中落伍的公开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代替坚决领导的“左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就尽了它助长一切反国际路线的倾向的发展作用。在党转变到国际方面来的关键时期，严重打击这些倾向，甚至开除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是万分必要的。这不是什么使党的力量减弱的现象，而是强固党的必要前提。要使党的转变更能彻底，工作更能进步，还须加强两条战线上的争斗。

一部分右派小组织的参加者和拥护者，曾经口头上承认他们分裂党的小组织行动的错误，可是他们真正承认了错误么？完全没有。

右派组织的参加者和拥护中，虽然有些的确想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党内来，可是他们还没有能够脱离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同时却有很多的分子，知道公开提出右倾政纲与党的路线对抗，是予他们不利的，就是公开继续他们小组织的活动，也必然在党员群众前面暴露自己的罪恶。如是他们就采取了新的策略是：①承认分裂党的小组织行动是错误的，可是反对四中全会的右倾政治意见，仍然保留。②声明停止小组织活动，可是互相保持小组织的道德把小组织的活动经过对党秘密起来。③有组织的回到党内来，等待适当机会来反党反国际。这完全是不承认错误、简直是右派小组织有组织的对党的策略，在这新策略下维持小组织的存在和活动。

党员群众应该认识清楚，不但公开的右派小组织分子不能存留在党内，就是在这种新的掩盖之下，继续小组织活动的分子，也是不能存留在党内的。他们或者彻底承认错误，事实上与右派小组织和右倾作争斗，或者堕落到罗文虎的地位，再没有别的道路。对于右派小组织采取调和立场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最明显的表现。但反右的争斗，却要深入到各种实际工作方面去，反对一切理论上的和实际工作中的右倾，如对敌人“围剿”苏维埃区域的恐惧与悲观，富农路线，工会中的合法主义和黄色倾向，不积极领导群众争斗，对执行党的路线的怠工等。只有加紧反对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右倾，才能根本打碎右派小组织和它的调和情绪。

立三路线虽然揭发了，但是立三路线的残余仍然存在各种工作部门中，正需要深入的肃清。假若有同志认为反立三路线已经结束了，这是绝对错误的。公开拥护立三路线，已是不容许的了，就是对于反立三路线实际怠工，或者不去坚决揭发立三路线在各种工作中的残余，反而去保留起来，也要遇到严重打击。只有加紧反对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左倾”，才能彻底肃清立三路线。

表面拥护党的路线，实际继续右派小组织活动或立三路线的两面派行为，是最值得党注意的。因此党不仅要求每个犯错误的同志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且要求他们从实际上改正错误，在党的领导下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上的争斗。

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这些派别观点最容易混淆两条战线上的争斗，而且右倾分子和立三主义的残余分子都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他们或明或暗的反对所谓陈绍禹派，这就是借反对所谓陈绍禹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因为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的分子利用党内曾经有过的派别成见或由派别观点出发的武断宣传来反党反国际，继续其右倾或“左”倾路线或者是“左”右倾联合的新花样。

进行实际工作与两条战线上的争斗是不可分离的。决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加紧实际工作，因此就应该放松两条战线上的争斗。相反的，只有更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才能更加有力的加紧实际工作，也只有加紧实际工作，才能更加有效的执行两条战线上的争斗。

（原载《实话》第13期，1931年5月3日）

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时期

张国焘在分局

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①

同志们！这次会议主要的议事日程就是中央分局、共青团中央分局及皖西北特委的报告，只因时间所限，不能使每个同志尽量发言，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在三十八个同志发言中，都富有自我批评精神，不尚空谈，能与实际工作相联系，这是很好的现象。可是还有一些缺点，就是对自我批评有些没有正确的了解，还不能首先批评自己的工作，然后批评其他工作，上级批评下级，下级批评上级。惟红军中工作同志更能彻底把过去的一切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揭露出来，这是很好的自我批评。要用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我们要反对躲在自我批评的旗帜下进行破坏党纪及组织的企图。例如县委到区委检阅工作时，区委不能把自己的错误全推到县委身上，区委要批评自己，但如县委路线指示错了，县委不能推到区委身上，县委就要负责。这需要上下级都要正确的运用自我批评。

^①一九三一年四月张国焘离开上海到达鄂豫皖苏区，五月十一日张国焘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主席。这是张国焘六月二十八日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什么叫做正确路线呢？就是依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分析的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路线。比如立三路线，是不根据主客观的事实规定出来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科学的不正确的路线。右倾是机会主义，“左”倾也是机会主义，没有比国际路线再左的再革命的，立三路线处处用左的名词，如缴农民的械，取消农民武装等等，自以为是很左是革命的，其实在事实上还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许多同志常这样批评；某人工作没有抓住中心或者说工作方式不好，什么叫做工作方式呢？工作方式是保证正确路线的执行的，是最有效去执行正确路线的工具，如普遍笼统说工作没有抓住中心是不对的，是不科学的，究竟是你没有抓住中心还是别人没有抓住中心？只有告诉他的中心工作才保证工作能抓住中心，一切非科学的类似批评的词句是不该有的。

现在要正式讲了。

第一点，说目前敌人对我们已经是取防守形势了是不对的，许多地方还组织民团时时要向我们进攻，同时还听说敌人集中大的力量去打击中央苏区再来进攻我们，我们正要趁敌人没有积极向我们进攻，我们要向敌人作大的进攻，不能放松一点“包围会剿”的工作。

第二点，中央局在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的确在实际中开始转变。如军事上近来确是日益巩固了现在的苏区，在皖西北独山敌人消灭了，麻城敌人吓跑了，在黄、麻方面消灭了桃花，黄安敌人一团，把将要占领新集的浍皮河的敌人赶跑了，并发展了许多苏区。在红军内，党的组织关系，军队组织关系和红军与地方组织关系都建立了他的基础，特别调了许多得力干部到红军中负责，在扩大红军方面，中央分局

是抓紧了这一工作。

中央分局曾号召同命令强迫群众和苏维埃的官僚腐化作斗争，并建立工农监查委员会，对粮食问题曾有很多的详细的指示和方法来解决，中央分局号召坚决同苏区农民到非苏区拿穷人的东西的坏现象作斗争。现在是开始转变，如对工会问题特别指出忽视工人利益的倾向和与农民的关系不好；对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有了加强，并坚决同徐朋人、曹大骏、陈定候等倾向作斗争；如对非苏区工作的加紧，如对京汉、潢川、鄂中特委工作的布置和巡视；整理了陂孝北、陂安南县委组织和办二次训练班与整理加强党的领导。这些等等都是过去工作中的成绩。

但他的缺点还是非常多的，主要原因：1、是中央分局机关人员少和各部门工作没有建立起来，故不能经常巡视工作，使各县与中央分局的关系不密切。2、过去分局常委内没有工农同志，今天要选出几个工农同志来参加常委会，但不是虚名的而是要担任实际工作的。3、这里还要说到几个问题，党的领导机关实现他的领导，大概有下列的几种方式：指示信、党报、巡视工作、个别谈话。同志们不要认为党报是不领导的（苏联党员一日不看党报就要开除党籍的），这样说是不对的，倘文件和党报有不对的地方，应该向上级建议，党报对的，下级要当做通告实行的。4、过去各处报告很少，纵偶有报告，其方式不是不确实的空洞的简单的报告，即是没有中心问题的冗长的八股式的文章。在各种会议上也是一样的，不是没有报告和讨论，即是从盘古以来报告起，或讨论第三时期（？）等等非切实需要的问题。5、关于各种组织关系，过去都没有弄清楚，今后中央分局要极力

改善这些关系。6、郑位三同志演说，说中央分局对特苏政府的领导是零碎的，是只向某个人谈话的，而没有系统的有计划的领导。其实特苏政府虽然经常只有一、二人在家，难得用会议形式对特苏工作同志作整个指示，而特苏各种中心工作曾加紧领导并未放松，如粮食、经济、培养干部、特苏与中央分局的关系，特苏报纸，特苏政工会。中央分局曾向特苏工作同志说过，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自此话说出以后，听说有些知识分子同志害怕工作，怕犯了错误，这是不应该的，这种倾向是不应该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志应该越发加紧自己的工作……。

第三点，现在我要把党的目前主要任务说在下面：

1. 反“包围会剿”的任务（军事行动）。现在我们主要任务：（1）肃清亲区，打通商、光路线，解决粮食，经济问题，以巩固并扩大苏区。（2）援助中央苏区。因为敌人目前集中大的力量要向中央苏区进攻。庞永俊同志说巩固苏区是保守的观点，这是不对的，国际有个同志说“如果立三同志说我们巩固苏区是保守，那末我们宁愿做一个保守党”，解决经济问题是不能和政治任务分开的。

2. 苏维埃代表大会：（1）代表大会要成立党团干事会，按出席同志编为若干小组、并指定周纯全同志担任书记，直接在中央分局指导之下。（2）这次大会第一要好好成立苏维埃，政府机关过去没有红军代表，妇女青年代表，这次应该有些代表；有红军代表就不能忘记了红军的家属及伤员问题，有妇女代表就不会形成了对妇女的不正确和限制

她的发展，有青年代表就不会有压迫青年的现象，特苏要加紧这一路线的执行。（3）要检查过去工作的错误和充分发展自我批评，并且要决定今后转变改造实际的方针，如不仅简单产生一个工农监查委员会，而且要使群众知道运用。

（4）大会不要很多的文件，只要大会宣言、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政策，婚姻问题、青年问题、苏维埃组织问题、红军问题等等……这些文件每个党员应当做党的文件一样看，不然就是认为是违反党的纪律。（5）大会闭幕后，各代表要到下级去召集群众大会的路线，来改造下级苏维埃机关。扩大会议要领导大会的同志说明大会的一切提议要经党批准，这就是中央分局对苏代大会的领导的方针，要求扩大会议批准通过的。

3. 对红军问题：（1）已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用扩大会议的名义发表，这也是要求扩大会议批准的。（2）对红军扩大问题应经常不断的动员群众到红军中去，要不是富农、改组派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人，而是工人、雇农、贫农和可靠的中农，在自愿的原则上来动员他们，要反对自动拉人（不经过苏维埃）和不将好的青年动员参加红军的现象，仅对将富农和改组派嫌疑分子拉到红军中去，已经有的，应坚决从红军中肃清出来，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要受纪律严重制裁。这是第一点。（3）就是要尽量帮助红军一切物质的解决，改善红军中的生活。（4）反对红军不遵守纪律，提高士兵教育，自动遵守纪律，更要建立红军与群众关系，反对不正确的两性关系，对妇女乱行动，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首先改正去影响士兵。（5）要加紧政治教育工作，改造红军中的成分，要使最近期间在训练上得着很

好的成绩。（6）要加紧红军中党对团的领导，反对轻视团的工作的取消观点。（7）要政治委员坚决执行党的这些路线，要训练红军中负责同志坚决的执行上面的对红军几个问题。（8）红军中的党组织与地方党的组织不同，只有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不能在军队中发展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这样才能不致减弱红军的纪律，才能加强红军。

4. 粮食问题；要继续粮食问题的路线，每个同志要好好的种瓜、红芋、荞麦、豆子及各种杂粮，并且领导群众好好给红军家属种田，这一点不松懈，时常来检查这一工作的执行。

5. 土地、农民问题；（1）雇农是乡村的无产阶级，贫农是半无产阶级，中农不剥削人家也不被人家剥削是小资产阶级，富农是剥削劳动、出佃、放高利贷的，是乡村的剥削分子。（2）对反动家属可以罚他做苦工，否则驱逐出境，不得分土地权。（3）我们要将土地法令告诉好的农民，使他下乡巡视和改正乡村中土地问题的一切错误。（4）我们要吸收多的好农民到土地委员会来工作，要专于训练专门土地问题的人员到各乡彻底解决，特别是皖西方面更急需解决。

6. 肃反工作：（1）富农路线是主要危险，要坚决反对富农不是杀尽富农。（2）要好好建立保卫局的工作。

（3）要加紧肃清改组派的工作，对改组派的谣言与反动宣传要在政治上作大的斗争，肃清改组派的影响。（4）没有收富农家的武器。

7. 贫农团应该把地主、富农分子驱逐出去，贫农团要在一定期间内（如半年或一年）检查一次。

8. 工会问题：赶快提拔干部，使成为党领导的工会，坚决执行劳动法。

9. 经济政策：对非工农群众必需品，马上实行纸烟税等。

非苏区工作：到非苏区的交通网要建立得很好，在可能条件下，苏区党应直接领导非苏区党的工作，将非苏区的同志和群众吸引到苏区来受训练，可办专门训练班。要加紧士兵运动。

10. 各种组织关系问题：（1）一切组织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不互相发生龃龉冲突。最高领导机关是党，一县中只有县委会是最高领导机关，与县委书记意见不同时，还是要依照县委书记之意见执行，再报告上级党委。红军中军事指挥员与政治委员，红军中最高领导是政治委员，他是党与苏维埃的代表。（2）各县起码要做到：①县区一切政治重要文件，必须经过县委批准。②报纸稿子要先送县委阅。③派人出外巡视工作或参加群众大会要得县委许可。④经济支配及干部支配要经过县委会。（3）苏维埃政府对政治保卫局只能问他的政策，不能管理一切。（4）苏维埃不能命令工会和贫农团，只能用党团去起领导作用。（5）绝对要避免秘书专政，尤其是非党同志的秘书。（6）要打破一切困难，训练各种人才，积极培养干部，办各种训练班，采用见习制度，利用会议去训练人才。（7）以后各机关团体都要有简单的工作计划，切实执行之。（8）党内斗争问题要积极发展自我批评，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各级党部都要建立监查委员会，严厉实行党的纪律。党内斗争与政权机关的斗争是两样的，党的思想斗争要做的好，是要靠党的群

众力量，我们主要的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尤其是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此外如怎样健全支部及区委问题、经济会问题等等，现因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详细说下去。

同志们！我们现在所处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我们一面要向外面的敌人作斗争，同时还要向内面的敌人作斗争，这就是我们进攻的路线。

各同志自扩大会闭幕后，须加紧执行这些决议，不要等待中央分局的决议和通告，我们要用考查制度去考查同志的工作的成绩。

1931年6月30日

（选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选编》）

张国焘关于第二次反“围剿” 及其它情况给中央的报告^①

中央政治局：

我和昌浩同志于四月七号到达黄安赤区南边，直到现在已四十七日，此期间事情经过很多，现在只能先作一简单报告：

一、当我于四月十一号到达打虎山特委和特苏政府所在地，即得到当地同志报告，红四军已决定到长江下游去行动。当时鄂豫皖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于两天前完结了，CY扩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正在新集举行，中生及其他负责同志多在新集。十二号到新集，始知到长江下游蕲水一带的理由是：1.援助中央苏区；2.恢复黄梅、广济赤区；3.截断长江，威吓武汉；4.解决四军物资缺乏问题。我当即根据中央决定，指出单独军事行动，使红军脱离这一赤区，在严重“包剿”期内，放弃了巩固这一赤区的任务而空谈截断长江。并提议目前四军任务应迅速清商城之亲区民团，打通商、光路线，将黄、麻、光山与皖西形成一片，来巩固和扩大这一赤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央苏区。这一提议得到

^①这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张国焘关于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及其它情况，给党中央写的书面报告。

当地同志同意。那时我没有时间来详问同志们当地情形，也没时间来做一个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和鄂豫皖苏区的任务的详细报告，我只以最简单的形式说明了一些中心，指出敌人“包剿”的严重，批评他们举行很冗长的会议，没有得到具体任务的答复之错误，指示目前是反“包剿”的国内战争紧迫时期，须立即执行几个具体任务。（1）经过宣传鼓动工作，发动工农群众加入红军。“五一”以前要号召三千人武装群众，党员、团员军事化等；（2）立即设法集中十天粮食在苏维埃手里为红军之用；（3）白军、民团中的兵士工作；（4）非苏区的群众工作等等。红4军军事行动的计划在新集的同志虽然同意了，但红4军那时已到达商城之亲区，正在准备经由皖西到长江下游去。因此我于次晨又赶到亲区去转变这一军事行动计划。十五号到亲区。邝继勋同志却已由皖西金家寨会合十二师预备下长江。四军负责同志对于军事行动计划的改变，都表示赞成，可是这时敌人已不让我们去从容肃清亲区了。那时四军与黄、麻联系已断绝，同时陈调元部已占据了皖西麻埠，向金家寨进攻。我和泽民同志就于四月十七日晚在亲区会面了，当即决定红四军首先去解决麻埠、独山之敌，因交通关系，我随同四军一同行进。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消灭了独山陈部两千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把麻埠敌人也吓跑了。把麻埠工作布置一番后，即兼程转回黄、麻。黄麻赤区中心七里坪、新集一带却在五月一号前后被吉鸿昌骚扰了一次（虽然损失并不大）。四军于五月九号到达光山之后，曾击退了由浍皮河去进攻新集之李国永师。泽民、传贤同志近来到黄麻，中央分局于十二号在新集正式成立起来，工作才数天。

二、鄂豫皖的中心赤区，包括黄安北部、麻城西北部，光山、罗山南部，东西约二百里，南北约一百里的区域，人口约一百四十万人，黄安南部、黄冈北部、黄陂南的一部，还有一些赤区和游击战争环绕着。在我们周围的敌人，你们是知道的，不用多说。我们接好几次消息，都说蒋张战争已在剑拔弩张之形势中。今天又接到消息，说蒋系军七师以上向潼关开。就是从赤区四周敌人看来，光山浆皮河敌人原系五团，说只有二团，京汉路赵观涛部向北移。这些都证明上项消息有几分可靠，即使敌人因军阀混战，××××……断绝他的粮草；敌人近来动员地主豪绅反动势力组织，加强和恢复民团清乡，并配合民团与白军一致行动，由地主豪绅强迫农民入联庄会，大刀会等；经常由白军配合着民团骚扰赤区，割赤区农民的麦子，牵农民的牛，烧农民的房子，砍农民的头，强迫农民投降他们的联庄会、大刀会等，送些米草料给敌军。派大批侦探反动分子到赤区内部来从内部破坏。这些阴谋，敌人是在有计划的进行。最近敌人并且得到相当的成功。在黄安仙居区之一部、高桥之一部、二程区之大部、麻城赤白交界一带，均曾引起了群众的相当动摇。这里有许多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不正确的错误，是被敌人利用之一因。

敌人的阴谋，虽然造成了赤区边界相当危机，毕竟我们在第二次“包围会剿”第一个浪头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得到了相当的胜利。这些胜利是由红军、苏维埃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并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红四军现在共十三团，每团有机枪四挺，内十二师共四团在皖西。一共有一万二千支枪，子弹平均每支枪有四十

颢。士兵成分百分之八十五是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贫农、雇农，中农也占一个相当数量，富农有些单个分子。百分之十到十五是俘虏兵和哗变过来的兵士。五月上半月，黄麻曾动员了二千以上的农民参加了红军，现在红军中枪还多过于人，四军现在起码还要二千人补充。除红军外，黄麻、皖西两赤区约有四千支的群众武装，组织在警备营、游击队、袭击队、特务队等各词之下，可惜这种士兵家庭分得土地的状况没有详细调查。我亲自问过二三十个士兵在分土地中所得到的利益如何，有一个雇农和他的家属得到了十七斗田，一斗田有一担至二担谷，他非常之高兴的来参加红军，另有一个青年十七岁也分得了五斗地，他母亲非常之高兴的送他的儿子去当红军。但是以后随着我一块儿走的一个兵士，他家有十斗田，三口人的家庭，但分出去四斗田，现在只剩六斗。以前笃三同志的传令兵，家中七口人，有田八斗，也分出去一斗。虽然有许多严重的错误，可是红军士兵的发展是由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特别是由地方武装生长出来的红军士兵成分还要好些。因此，我们的红军虽然在技术缺乏生活恶劣的条件下（有时甚至终日饿饭），每次战争都是非常勇敢，形成愿死不愿伤之心理。独山之战，十一师独攻敌人而得胜，十二师在麻埠之高山，终日不退而胜，使敌人终不能在赤区停留。而且在游击战争和4军历次作战中，的确造成了不少的干部，但每次作战伤亡特别多，因此干部始终非常缺乏。当然我们的红军还有很多弱点，还有许多国民党式军队的残余，政治工作特别的差，政治工作人员干部的缺乏，俘虏兵变成军事干部者相当多，组织的混乱，纪律的不严格，极端民主和平等观念的倾向，□□□□□□□□□□

□敌人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红军，有些富农混进我们军队里来，改组派企图有组织的来破坏，□□□□□□□□□□，企图经过兵士的家属来破坏红军等等。夏斗寅、岳维峻（他还被关在这里）都企图经过由白军哗变过来的分子或派人假装哗变来破坏红军等等。红军现在不但能冲锋陷阵，且能时时作战，可是作战不技术，特别是射击不好，不能攻坚，能攻不能守。红军有了这样的基础，有些弱点是容易克服的。

在黄麻这一苏区，土地又重新分配一次。这次分配大体说来还算正确，改正了过去许多错误，贫苦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土地。现在仍然有错误，就是他们常有“集中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口号，因此，贫农和中农会想到他们的土地也在集中和没有之列了。分配土地时，组织一个很小的土地委员会（多半党创办的）来调查统计分配，不是广大的发动群众的分配，分配土地时有些苏维埃执委有对自己亲戚朋友营点私利的勾当，机械式的平均，有时侵犯少数中农，有时连红军士兵家属（贫农或中农地位的）的土地都平均分了一些出去。皖西土地分配得一塌糊涂，最坏的是商城，商城的土地没收了来，每人分一斗田，剩下的让他荒废下去或归苏维埃，山地更是不分。这不但侵犯了中农，还侵犯到贫农，简直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最好办法。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商城分土地如此错误，农民还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而且在皖西区数第一。这是因为党和苏维埃组织游击队、群众武装，去领导群众打民团首领，商城农民受亲区民团首领顾敬芝等蹂躏太甚了。我经过商城看见最大多数的房子都被顾敬芝烧了，男人以及小孩就拿去砍头，女人拿去卖，每个女人换一到两支枪，抢掠更不要说了。同志们，假

使我们有正确的土地政策，当要得到农民何等热烈的拥护！

苏维埃改造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绩。现在各乡、区苏维埃的成份大体不错，贫农、雇农占大多数，许多苏维埃机关中的富农和腐化分子被改选掉了。但是最大的毛病是：这一改选运动只是技术的，没有从政治上去改造，没有指出苏维埃过去成员政治上的错误及今后苏维埃应有的转变和任务，因此一般人都说现在苏维埃换了一班老实无用的人。苏维埃虽然设立起来了，每天不知要办多少事，但是有点象地保或兵差代办处，不大象群众革命政权机关。这些群众在我们党在苏维埃内工作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不知道政权是什么，只知学国民党政权的样式，衙门化。分明是一个贫农，一旦被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学着办公事，接应国差。虽然有这些怪状，终于贫农、雇农不会是国民党的官僚、有些下级苏维埃，的确有他的群众。我曾在高桥区第一乡苏维埃坐着，围着许多的男女在那里，我问他说：你们如何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他们一致回答说：男子去当红军，女子参加生产，童子站岗放哨。我问他们苏维埃是什么？他们说：苏维埃是我们穷人自己说话的机关。一切气象都证明乡苏维埃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苏维埃的错误是误认苏维埃是单用命令统治农民的。有些地方，证明农民群众的了解政权，是我们重要的武器。一切地方党部不知发动农民自觉的建立苏维埃。

红军和苏维埃之间存在着不正确的关系，现举两个例子：一个红军军官向苏维埃要一双鞋，苏维埃的执委说没有，他回说：“你们生存是驼皮鞭子的”。商城区乡苏维埃写信给4军军长称。“哀求军长大人”，同区某乡苏带领一

些女子到红军许师长马前，跪求红军代他们打寨子。这些都证明苏维埃与红军是怎样受着国民党军队的流毒的影响，同时并证明我们的党还要做许多的教育工作。

群众对于红军都是非常拥护的，到处都有农妇替红军缝衣洗衣做鞋等，昨天军委还接到七里区送来的一百双鞋子，乡间的老太婆甚至将好吃的小菜留起来，说等红军来送给他们吃。征募红军新战士时，有数百小足女子和小孩要求参加红军，经苏维埃劝阻不听，一定要走六七十里路，问军委是否可以要他们到红军中去。现在红军中已有少数小足女子和小孩做宣传工作。

赤色区群众对红军如此拥护，可是白色区群众是在反动势力影响之下，他们不知听了多少关于红军的谣言。从前有一时期，有些地方捉了白色区的人，不管是农民是地主，胡乱杀起来。红军到了白色区，赤区农民就去运输粮食，有些运输队甚至红军到了那里，他不管是农民的是地主的，什么东西拿了就走，形成了赤白对立的现象。红军打下了光山十几个寨子，运输队乱拿当地农民的东西，虽然督促很紧，立即进行解释工作和检查监督的工作，但这种现象还是有的。这一苏区最感困难的就是粮食问题，皖西粮食情况更坏，商城要欠三个月的粮食，黄、麻、光、罗去岁也要缺少一个月。现在农民已经没有饭吃了，苏维埃机关还是乱费粮食。最近我们对粮食想了许多办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整理好。特区成立一个粮食委员会一面设法没收白区地主粮食，一面囤管粮食，新集附近虽然打了寨子，挑了四千石以上的粮食，但光山县苏只集中了八十石粮食，弄得伤兵医院都没有粮食吃。即是在这件事情上便充分证明有些知识分子在苏维

埃机关中简直没有革命气味，更谈不上做共产党员，因为他们自己吃饱了，并不十分注意伤兵和农民是否有饭吃的粮食问题。经济更是无策，特苏政府、军委、军队和党部穷的要命。因此在财政经济特别是粮食这条战线上还要有极大努力。我想这并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没有想办法，也还没有得到相当干部去执行这一政策。特苏银行已于本月十五号开幕，信用非常之好，农民都是用这银行纸币，不要非苏区的票子，只七里坪一处几天功夫已用二十千元，现在还来不及印刷大批纸票来供给市面。

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从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等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活动分子。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的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麻城改组派竟然影响了一部分贫农，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

中央分局成立时，我们曾指出当地同志和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由奋斗已获得了伟大成绩，但是并不能证明特区党内的路线就已经是正确的了。的确自中生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我们当时指出三点：第一、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时，曾申明“关于红军曾受到失败一点不同意，实际有走到取消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倾向。第二，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充分发展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与当地具体工作联系起来的自我批评。第三，往长江下游去的军事计划的不正确。当时得到了中生同志的承认错误的表示，我们认为是满意的。笃三同志的确在工作中对于他自己过去的错误没有再重复，而且有申

明书到中央分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工作中表现很好。舒传贤同志却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问题，原因是皖西同志说他曾对改组派妥协，因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鄂豫皖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又批准皖西这一开除党籍决定。传贤同志到皖西后，皖西扩大会又取消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不过同时批评他对改组派曾有不坚定不敏捷的政治错误。这些事件，当中央决定传贤同志任组织部长时，中央是完全不知道的。因此中央分局决定暂时不分配传贤同志工作，改由郭述申同志任组织部长。对于传贤同志，组织一审查委员会来审查传贤同志的错误，现在审查委员会尚未结束。中央分局除中央最初指定的六个委员加上我和昌浩同志共八人外，再补充了郭述申、周纯全（工人）、高敬亭（农人）三同志，候补拟定十五人，还未正式通过。军委决定国焘、中生、继勋、徐象谦（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七个同志。徐朋人同志违抗中央命令，到这里后，曾有反对四中全会的发言，现在中央分局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他承认他曾奉右派的使命来这一苏区，他承认他的错误，但是他还没有公开他到这里后的活动和指出他自己错误的性质，因此我们正在调查他与右派组织上活动的证据，来进行给他一个思想斗争，并给他组织上的严重制裁。

我想上面这些叙述，已经指示给我们：一、在反对立三主义的错误路线之下，这些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二、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转变来实现冲破敌人的“包围会剿”。这一苏区是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基础上已产生了强有力的红军，他的发展前途是未可限量的，只要能够不动摇的执行正确策略。我们的干部

是很缺乏的，党、苏维埃和红军主要力量都用在战争的任务上，五月一号前后，又被吉鸿昌部在赤区骚扰了一次，自然很难得建立经常工作。我们现在准备积极提拔工农干部。苏维埃代表大会已延期在七月一号举行。现在要准备在这会议以前的党和团的扩大会和苏维埃大会。

我们要求中央的事件是很多的，指示、干部与材料：

（1）刘伯承、李特二同志和其他的军事人材、骑兵、炮手（尤其是迫击炮手）都要；（2）诊伤的医生和诊梅毒疥疮的医生；（3）大批工人干部；（4）做党的工作、团的工作以及文化工作人员；（5）无线电与无线电生；（6）我们四周围的非苏区工作的加强，中央须多派人到信阳、广水、黄、麻、皖北一带工作；（7）鄂北、豫西工作特别重要，请中央派人去，此间找不出适当的人。中央能多给我们一分人才，我们这一苏区就要多巩固一分，无论如何，多派和快派人来，多多益善。材料也请多多给我们。

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和堡垒的形势：一是商城区的顾敬芝民团，善于游击战争和侦探工作，压迫当地农民服从他，四军每次到那里，农民都被他们压迫跑反走了。二是新集西北至东北一带有百多山寨（我们已打了十几寨），都是地主同民团的武装。三是水圩子。要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和扩大赤区，非打破这些堡垒不可。

我们已决定于二三日内由新集将4军主力调到黄安附近，来消灭黄安附近之敌，来巩固这一苏区，保护农民的麦子。等这一任务实现后，四军主力还是要去执行肃清亲区的任务。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 联席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各位同志：这次会正是在红四军南下的时候开的。开这次会主要的是要配合红军南下的工作。关于红四军这次肃反的胜利，红四军政委陈昌浩同志已报告过了。中央苏区的红军也获得伟大的胜利，在反三次“包剿”中，击溃敌人十一师之众，缴得敌人枪支二万余支。我们这个苏区亦得到很大的发展。红军经这次教训，得到了改造和坚强，给国民党以致命的打击。现在正是国民党一天一天的崩溃，苏维埃运动一天一天的开展的时候，我们更应用很大的力量争取一省数省以及全国的胜利。

目前一面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向工农群众进攻，一面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群众起来反抗这一反革命的进攻的革命战争，这就叫做阶级斗争。共产党做什么？是领导广大群众实行阶级斗争。青年团做什么？是领导青年群众实行阶级斗争。苏维埃做什么？是领导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

现在红四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就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及至改组派首领被我们逮捕起来后，大家才害怕，在未发现以前是不注意的。现在改组派肃清没有？大部是被破获了，但没有肃清。陈昌浩同志说黄安的改组派不多，这话不见得，说比

较少点可以。陈定候、陈翰香、江子英，不都是改组派吗？不都是黄安人吗？

改组派的活动不是偶然的，是有它活动的客观原因：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绝对不注意成分，把地主、富农也拉进党内来了，只要是我们的兄弟、朋友、老婆、亲戚都介绍到党内来。富农路线说革命的地方地主、富农也是革命的，说不革命的地方连贫农、雇农也就是不革命的，加之地方过去送了不少坏分子到红军中去了，苏维埃秘书长专政，其次的是司务长专政，开除的共产党员专政，反革命的地主、富农坏的分子专政，命令群众，扳蛮要群众抬台子，又不向群众解释，并说你不抬台子就是不革命的话。又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怎样不发现改组派！？怎样不发现第三党、AB团？就是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直到中央分局来后，坚决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才把党从立三路线的泥坑里纠正到正确路线上面来。建立了保卫局，加紧了肃反工作。

黄安改组派、第三党、AB团活动有不有？有的。如改组派扯标语、贴标语、打石头，我们的同志只有惊吓而不设法去考查。以为肃反是保卫局的工作，是不对的。肃反是要大家注意大家负责。应分两方面：一面是拿着刀子杀改组派的首领及其活动分子，一面是要用宣传教育工作，从政治上去夺取这些被欺骗的群众。过去改组派造谣，我们的同志也不设法去揭破。改组派说我们反了富农要反中农，我们的同志也不耐心的向群众解释。

改造党的组织。为什么要改造党的组织？怎样来改造党的组织？严重不严重？严重。黄安党是执行中央分局的决议，分局发来的文件总在遵照去做。为什么做得不好？在分

配土地中，是地主成分的党员，他自己说是富农，是富农成分说是中农，企图窃取土地利益。还有一部分党员留一部分好土地。扩大红军大家同意不？同意。你到红军中去，我不去，你不去，我也不去；你要到游击队中去，我也要到游击队中去。共产党是什么人的？是不是中央分局的？不是，是不是那个党员的？不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是要领导群众，工人、农民都得有分的，不是那个私人的。我是个党员，我是苏维埃的委员，我要分好土地，要穿皮袍，要享受特殊的利益，是不对的，是非常不对的。象这样的共产党的党员，去做肃反工作，是不是能肃清呢？不能的。革命是不是能成功的？不能的。苏联的革命成功，因为每个党员都能站在群众前面，每个党员负有当红军的责任。我们的党没有做到这样，所以要改造，要洗刷坏的分子，要吸收新的工农积极分子入党。入党的条件起码要是工人、贫民，最可靠的中农，起码对革命要有点认识。

改造党首先要从支部、小组去着手。支部、小组是一乡一村的领导，应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扩大红军，支部、小组同志要起领导作用，要领导群众去参加红军。改造党要组织代表团，首先要考查代表团里的成分，从支部、小组中改造起，由下而上的改造，要洗刷党内反革命分子——异己分子，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倾，反对立三路线、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巩固国际四中全会的路线。

什么叫做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两方面的斗争，是要教育全党同志，是保障党内正确路线的执行，是不能离开党的正确路线，所以要改造党，要联系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同时要改造青年团，发动团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要改造苏维埃，要改造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党内还有许多坏的分子。不要说群众靠不住，群众是革命的。

配合红军南下，我们应该起领导作用，使红军配合我们的行动，这是斗争问题。同时要注意赤卫军的整顿与红军行动的配合，怎样的配合，当然要在会议讨论。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要努力补充红军的新兵问题，也是党的最严重问题。

1931年11月

（原件存红安纪念馆）

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的原因^①

——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中央政治局：

在鄂豫皖苏区破获了一极大反革命组织，事实部分已详昌浩同志的报告中，我仅补充一些昌浩报告中所未提到的问题。其所以形成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之原因以及我们为什么在斗争中能获得伟大的胜利。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为要说明这一现状，必须略知这一苏区发展经过。

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这一苏区第一个发源地是黄、麻。由于1925—1927年，这些共产党员（多半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员长期混合，共产党之无独立政纲，一九二七年后，经过许多变节、失望、消极与国民党左派去分化，其中一部分党员最具有革命热情，根据他们办农民协会时所获得之农民群众信仰，成立农民政府，组织游击队，最初是采取了土匪行为的政策，经过了烧杀、苦战、立三路

^①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国焘就鄂豫皖苏区白雀园“肃反”问题给中央的书面报告。

线，以至与真正土匪之分化，终于把赶走了和杀死了的地主土地分给了一部分农民。可是立三路线之军事冒险竟能客观上纠正了一些军事上的畏缩、右倾机会主义，利用时机还缴得敌人一些枪支，虽然右倾的实质依然是发展着，因此形成了一部分斗争坚决的干部，并有一部分贫农、雇农和中农（由于农民所受的痛苦太深）当然也与富农混杂着拥护这些干部，这样就形成了最有根基的黄、麻赤区，一部分最精干的红军和党的基础。这苏区第二个发源地是商城。1927年国民党叛变后，大部分商城共产党员实是国民党左派，就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实际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或明或暗的反对共产党，将农民的武装缴交民团，为地主豪绅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农民，所谓共产党就大部分加入民团，其中有一部分所谓党员虽然做着反革命行为，心中仍不愿意完全叛党，因此乘着机会与民团分离，挂起红旗，后又经过杀党代表、党的巡视员，阴谋捕杀郭述申、刘英不遂等事变。这些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改组派失势的时候，就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政策，明为共产党员，暗中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成则为工农革命之英雄，败则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无所谓土地革命，不过与农民最痛恨之部分的地主豪绅斗争，土匪流氓都被拿入党、苏维埃与红军中，也因为农民受痛苦之深，得着一部分农民拥护，形成商城之赤区与红军。实质商城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领导人物，如周维炯、陈慕（党的负责者）等始终与改组派联系着。至于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的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

在这三四年中混进这赤区和红军中来的有不少的自首告密变节为国民党捕杀共产党员的所谓共产党员（奸细），有的

是自己混进来的，有的是从信阳等处党的组织介绍来的，其中一小部分并是中央及长江局介绍来的，许继慎、熊受暄即为其首领，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改组派、各国民党军队、当地地主民团派选进来的侦探也不少。

在这种复杂情形之下，最能影响此地一般政治方向者有以下的例子：

一、曹大骏来，在烧杀政策未尽转变时，主张联合富农、保护中小商人、大赦三大政策。

二、立三路线时代，由参加去年五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回来之当地代表，主张杀尽富农，实际没杀着富农，反而与中农破裂了。

三、三中全会后，曾中生同志等来这赤区，其积极作用就是努力对付敌人之“包围会剿”获得一些成绩，未经斗争的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对当时党及红军中没有政治斗争，却盛行了一些无原则的私人意气斗争，采取了一种家长制度下的调和手段，由立三路线的实质所形成之政策依旧继续着，对红军干部并未与其错误行为斗争，对内实行向群众借粮借钱，实际上是欺骗热心革命的劳苦工农，不没收地主家财及征发富农，因此放松了阶级敌人，对外即优容对白区群众的掳劫行为。表面上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同志一些信用，实质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反革命的大活动。

国焘、昌浩四月十一号到达黄、麻赤区中心，泽民、维宁（他是改组派元老）亦于此时到达金家寨，因敌人包围紧急，四军又有南下截断长江之错误政策已开始执行，因驰往军中纠正。麻埠独山一战，许继慎抗不遵命，让十二师（只四

营兵力)及三十团与敌五团之众苦战,他带三团兵力应于上午十一时前接应上去,事实上亦绝对能办到,但他到下午五时才到达,还不是军部所指定的地点,并用小团体的派别斗争反对卞继勋同志,因在麻埠四军会议上予以严厉批评,指出他是国民党军阀的行为,并提出在军四中反对国民党军阀式的残余,建立真正红军的基础。红军中如乱拿农民的东西等事件更数不胜数。曹大骏、熊受暄等并反对将麻埠反动派的财产分给当地贫苦工农。麻埠、独山之敌既退,皖西赤区稍得巩固,对皖西全盘工作匆忙布置一番。因为回师黄、麻,正是吉鸿昌部扰我赤区之后,敌军正企图进攻我新集,二次包围正在紧张,中央分局即于五月十一日之军事紧急中急速于新集成立。

在泽民同志等到达皖西后,中央分局成立之前,此间同志都奔走相告:谓泽民来将使此苏区塌台。因泽民曾指出中生之立三路线,笃三在苏所犯错误,并批评其他同志之错误,他们认为这是引起党内纠纷之行为,泽民关于巩固苏区之提议亦被认为是保守观点。这些同志由于对立三路线之不了解,甚至认为反立三路线之斗争亦是意气争执,是党中不好现象,根本不了解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及至我同昌浩同志到达时,许多同志向我说:“你来的甚好,我们拥护你所领导的中央分局”。其意是国焘究系老干部,决不致如泽民之荒唐。但是这些同志那时对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及中央分局执行这正确路线之设施,却了解得很少,甚至反对。彼时大多数好的干部,甚至最好之干部,后来成为拥护中央分局所执行之中央路线的坚决分子,亦对中央分局及其路线或中央分局之某同志有些怀疑。因此,中央分局在其初成立

时，就是始终站在原则的立场上，企图将好的干部团结在自己路线的周围，力求一彻底转变。改造了黄、麻赤区一些党的县委会，过去这些县委会中常委有不少地主、富农分子，因此撤换了他们而代以工人及贫农出身的积极干部，这样就造成了后来各县委书记八个之中工农占了七个，和各县委会常委工农积极干部占大多数之局面。在重分土地及此次肃反之中表现都还坚决，彼时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仍是宣传，至多才实行到县委。红军中之公开反对中央分局路线的分子曹大骏等即被撤职而代之以最好干部如甘继时（黄安县委）、官叔衣（少共负责者）等。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实际在中央分局成立后才建立起来，由一当地的最好工人干部周纯全同志负责，慎重选择五个以至十个斗争积极的工农分子组织起来。到现在不但保卫总局有了三百个以上的工作人员，就是各县分局也成立起来了，而能起相当作用；百数十人工作，后来在肃反中就起了他的极大作用。但是那时不仅是天天要对付敌人的“包剿”，而且粮食极困难，一方面要解决粮食，同时农民对生产兴趣极低，当然是过去错误政策所造成，因设种种方法提高农民生产，如提倡赤区内无论男女老少种南瓜五棵，节省粮食，不使赤区有一寸荒土等政策，据计算黄、麻赤区那时至少有四万人绝对无粮食，皖西无统计，因红军家属无粮食几乎动摇了红军，但结果粮食危险安然渡过。

经过准备之后，于六月二十八日举行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在正式会议中，一般同志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线及决议全文，至多在会场上对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评而已。但在会场上就有许许多多同志中之议论，表示其对中央分局之不满，不

是说中央分局督促批评太严，就是说中央分局使党员恐慌离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因中央分局公开批评了陈定侯（当地同志，后来发现他是改组首领）极端右倾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他就到处宣传其他同志不敢做文章了，因做文章受打击，此种言论并未遇党员群众的反抗。就是中生同志也经过了中央分局与他的两天会，批评说服他对中央分局之不满是不正确的，在他完全承认错误与允许将中局路线传达到四军中去后，中央分局才赞成他继续四军政治委员之工作；但他始终不服昌浩同志之批评，对中局采取了外交手段，他到四军后，不但没有传达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改造红军之任务，反进行反中局之斗争。他如在这次扩大会中之好干部就更团结中局周围，对路线有更正确的了解，形成了一个有大多数当地工农干部参加的中央分局委员会，其常委会除泽民、国焘、昌浩外，有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同志参加，的确组织一个最适当的中局，并且因此就立下了苏代大会成功的基础。

接着就于七月一日开全苏区代表大会。事先中局就改正了过去所规定的国会选举式的选举代表办法，因其结果将会阻碍工人及贫农当选代表，反给富农及知识分子当选的许多便利。并规定富农无公民权利，各乡每二千贫农、中农中，红军一千人中，工人五百人中，直接选举一代表的办法，并在选举运动中改组苏维埃及宣传大会大纲。结果苏代会到四百代表，工人约五十，贫农二百八十，中农也有五十，红军约二十人，开会八天，讨论了土地、劳动、经济、肃反、武装等政策及苏维埃建设；但是代表们最注意的是土地问题。大会结果极佳，大会后就发动一个重新分配土地，反富农的

斗争，虽然在分土地中仍有不少错误，如共产党员及苏维埃负责人窃取土地革命利益及仍有地主、富农获得土地等，但大体来说，的确是在向正确路线转变，尤其是黄安重分土地进行得热烈而较好。

苏代会后，接着就是西余集之军事会议。其时援助中央苏区之任务正紧迫，赤区周围又无粮食，敌人“包剿”那时亦不甚紧张，并为反对4军干部出武穴之观点，因有出潜、太回师取六、霍县城以巩固皖西赤区之决定。这一决定实是战略上的错误，而红军之改造虽然都严重提出，但没有执行，仍然是一种空文。

此时秋收斗争正紧张，我们在秋收斗争中获得了胜利，重分土地，经济政策的实行等，同时赤区内开始一个大的时疫，群众病者三分之二，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完全病了，死者黄安一县就有一万人，至今有许多病人尚未好，而肃反的大斗争就在此时开始了。

最初政治保卫局虽然捉到一些反革命重要分子，但没有审问出全盘线索，只杀掉一些反革命的个别分子。但是许多同志已经感觉到红军和赤区有不少反革命组织。八月初就破坏了一个岳维峻所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名AB团，自成一系统，约一百二十之谱，最大多数是岳的旧部。由于过去对岳的机会主义，甚至幻想他，过分准其自由，直至中央分局成立后，组织保卫局，始将其禁闭起来。岳经常供给这一反革命团体之计划和经济，建立赤区内外之交通网及侦探网，联络赤区一切反革命分子及组织，计划于九月十五日暴动，毁医院药房，抢岳维峻出去。岳之参谋孟守先亦为其组织者，已枪毙。其宣传要点就是红军生活不好，白军生活好、势力大

等。因为岳之反革命组织之破坏，就部分的破获了黄麻赤区AB团的组织。它们团结了富农、地主残余流氓首领等，也有九月十五日暴动的阴谋。并在他们的供词中，说明过去AB团、改组派、第三党各种侦探是从各方面来的，于今年春间即企图统一，而且成了功。民团侦探，蒋介石及赤区周围各军队派来之侦探、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许多实际行动中已充分证明联成一气。这时我们就知道反革命必然有一中心组织。接着又由政治保卫局破获了一些改组派的县委、区委组织，红军中的破获，皖西反革命重要组织的发现。皖西肃反工作几乎没有，保卫局也混进了不少的反革命。方英同志的错误就是由于没有团结一些真正好的干部在特委的周围。由于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没有能及时改造路线，完成肃反，幸政治保卫局以其所发觉的反革命组织（内中有做过多年商城县委负责人、固始书记、赤卫军组织者陈梦尧），立即通知皖西，才开始了皖西的肃反。

这些破获，并证明必然有一反革命的极大组织。因将已发现的红军中反革命重要分子如丁超、陈兴×密函连夜通知中生，嘱其坚决肃反（但后来才知道他将此要函搁置箱里忘记看了），同时因四军干部在中生领导之下反抗中局的路线及肃反严重，因撤中生之职，派昌浩同志两次坐飞机去皖西，因飞机场不好，不能到达，因又折回启程去四军，九月十三日才赶到。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在迅速进行肃反，打破了九月十五日许继慎、周维炯之暴动计划。

在肃反紧张中，军事委员会之参谋主任李荣桂（他曾在

4 军中长期工作，做过师政治委员及全军党委书记等要职），日益表现动摇恐惧，企图洗刷自己。其时并有反革命首领潘皈佛之妻确实供出他来，因逮捕李荣桂，没有费半点力气，他就供出许继慎、熊受暄及他自己之全盘反革命计划，这样就逮捕了许、熊及周维炯等。而反革命之全盘组织就均陆续破获，计从九月十三日至现在七十天内，我们用了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理四军（详情已详昌浩报告中，兹不赘）。

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的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胜利。以前路线转变不能深入，就是有这些反革命的暗中破坏，曾中生就尽了如李尽如、余笃三联合托派之同样作用，甚至在英山同意放走蒋介石派来勾结许继慎之代表钟梅桥，将另一代表钟俊交许枪毙，后来为许暗中送走。好在中生现在皖西肃反还坚决，这是分局给他一最后机会去改正错误，但是他的错误必须公开批评来教育全党，同时他现在也不能担负重要工作。

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着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我们利用了富田事变的经验，将肃反与政治宣传联系起来。党内两条战线斗争正在开展，淘汰异己分子，即黄安一县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已经开除二百多异己分子，受批评者不下数百人，但还不深入。红军中的战斗情绪提高，大批工农干部加入红军，他们说，现在的红军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了。

1931年11月25日于七里坪军中

（选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选编》）

共产党·苏维埃·红军

国 煮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领导广大工农兵士群众起来斗争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也就是工农兵士群众斗争的领导中间，整个阶级斗争的总指挥部。

苏维埃就是工农兵士的代表会议，也就是工农兵士的政权机关。这一政权由工农兵士群众组织而成，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之下，拥护整个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压迫压迫阶级。

红军是工农群众的武装队伍，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维护苏维埃政权，消灭压迫阶级的武装和政权而斗争。

因此不是苏维埃领导共产党，也不是红军领导共产党，而是共产党领导苏维埃和红军以及整个阶级斗争。

共产党领导广大青年群众斗争，目的就是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建立起来了，就是广大工农群众手里的有力武器。

整个被压迫阶级只有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才能夺取政权，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和红军。共产党就是整个阶级斗争的发动机和船上的舵一样，在未夺取政权前，他领导群众有组织、有计划的去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中间，共产党就是英勇的用武力去摧毁旧的政权，组织

新的政权；在夺取政权胜利以后，就巩固这一政权，领导工农群众学习使用政权，维护工农群众利益，镇压压迫阶级的反革命。共产党并领导这一工农兵政权，将整个革命推上前去。

因此整个工农群众不仅需要苏维埃和红军，而且需要自己的共产党，就是自己的阶级中最先进分子的组织，共产党不是加入了共产党的党员才有份的，乃是整个阶级的领导武器。

（中共川陕省委机关报《川北穷人》第9期，红江县苏维埃出版，

1933年2月16日）

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

国 煮

川陕赤区还有许多地方土地没有分好，各级苏维埃内面混进了许多地主富农和发财人走狗等分子。因此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是最重要的任务。

发财人反对苏维埃革命的一种办法，就是混进到苏维埃内面来把持苏维埃，他们把持苏维埃就阻碍平分土地。

地主富农混进苏维埃内面来有几种办法：第一、就是隐瞒成份，冒充穷人来混进当苏维埃主席或委员。第二、如果不好冒充，就由发财人找几个能干的熟人做事的穷人来混入苏维埃。第三、混到苏维埃内面来当文化委员或秘书，利用他们职权的便利来把持苏维埃，形成秘书专政。

地主富农混进了苏维埃，他们阻碍土地革命的办法很多：

第一、威吓群众造谣说发财人还要回来，回来了不得了，使群众不敢分发财人的田地房屋等。

第二、利用家族和地方观念，阻碍分粮食，不准别乡别村的人来分这一乡这一村的粮食。他们却替地主富农将仓封起来替发财人保存粮食。

第三、混记成份的划分，将地主划成富农，富农划成中农，暗中将好土地都归地主富农，穷人要好土地就说穷人不

安分。

第四、暗中包庇地主富农，威吓穷人暗中替发财人缴租谷。

第五、不执行分土地中红军战士的优先权和代耕的制度，来阻止群众参加红军。

第六、将发财人的田地划为红军公田，不将红军公田粮食缴交苏维埃，暗中缴给发财人。

第七、农具没有分给雇工贫农。

第八、故意将苏维埃土地政纲不向群众宣传。

上面所说，不过是几点主要的，发财人阻碍土地革命的办法还要多些，因此必须大大进行改造苏维埃和平分土地，检查土地是否分好，来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只能抓紧改造苏维埃和平分土地，才能动员大批群众来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大批群众来参加苏维埃，并加入共产党和共产青年团，并镇压反革命。

必须抓紧组织雇工会和贫农团，贫农团不准混入富农，中农也不让加入。如果没有雇工工会和贫农团，查田工作也成形式的了，因此最近组织的查田队，不是苏维埃主席委派的就混进了地主富农。

同志们！消灭刘湘的战争必须紧密的与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联系着……完。

（川陕省苏机关报《苏维埃》第11期，1933年10月20日）

贫农团的重要

国 煮

贫农团是乡村中雇工和贫农的结合，联合着中农与富农作坚决的斗争，彻底消灭地主势力，因此，这个组织是苏维埃政权在乡村中的支柱。

红军的胜利，苏维埃的成立和加紧的平分土地，已将地主富农的公开势力摧毁，但是还没有彻底铲除地主富农在乡村中的潜伏势力。因为富农地主潜伏在乡村中的势力即没有铲除，他们就在乡村中阻碍土地革命。

豪绅地主统治乡村有很长久的历史，但富农附和他们，而且他们还有一些爪牙，不但有他的统治经验，而且他们有依据宗族乡土观念和迷信观念的小组织，甚至有武装组织。如果穷人起来平分土地，他们就威吓穷人，使穷人不敢去分他们的土地；如果穷人起来组织苏维埃，地主富农就混进苏维埃内面来把持；他们又捏造谣言，来动摇中农，买通爪牙，压迫雇工贫农的抬头。雇工贫农如果没有贫农团的组织，只是单个的和傲慢的雇工贫农分子，就没法去反对地主富农。

乡村中贫农占最大多数，如果只有雇工会的组织，没有贫农团的组织，不但不能把广大贫农结合在一条战线上，无产阶级领导也无法实现，贫农团的组织就是乡村无产阶级领

导贫农的具体表现。因为贫农团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能执行最清楚的政策，联合中农，反对富农，消灭封建残余的政策，贫农团不是反对中农的，乃是反对地主富农的。

贫农团怎样组织呢？

一、贫农团不应当由苏维埃来组织，更不应当由苏维埃主席指派，应当由乡村中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部起领导作用，雇工分会或其会员们发起成立起来。

二、首先由共产党支部、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雇工分会，找到乡村中积极的贫农分子，（如果象积极去捉拿区正团总甲长国民党员等，积极参加分粮分田参加红军和游击队、运输队等，积极做革命工作，送信、做侦探，报告反动派消息等等贫农分子，就是贫农中的积极分子），举行一次会议讨论，该乡该村几家是地主富农，几家是滚刀皮，这几家是发财人的走狗，不能加入贫农团，哪几个家是中农，是贫农团的联盟者，也不加入贫农团。那些家是雇工、手工业者，贫农男女老少，都可以加入贫农团。决定日期举行贫农团大会成立贫农团，选举五个至十一个积极的雇工贫农做委员会。

三、贫雇工分会或村雇工小组整个加入贫农团，在贫农团中雇工小组仍然存在，不要将雇工小组无形混合在贫农团内，因为雇工小组是属于工会系统的。

四、党和团的支部在贫农团中起领导作用，不是包办，也不是做尾巴，每次支部会议都要讨论如何领导贫农团工作，在贫农团中吸收积极分子做党团员。

五、地主富农因平分土地的结果，现在变成穷人了，也不得加入贫农团。过去是雇工贫农，平分土地的结果，现在

变成中农了，也还是在贫农团内。

六、贫农团成立了，彻底平分土地、查田，坚决肃清反革命，监视地主富农的行动，扩大红军游击队，替红军家属代耕，监督地主富农做工，改造苏维埃，经常领导苏维埃工作，不侵犯中农利益，经常领导和扶助个别雇工贫农与地主富农斗争，没收地主富农武装。

从贫农团的作用和组织看来是重要极了，因此，党和团的组织，雇工分会要快快起来，发动贫农团的组织。

（川陕省苏机关报《苏维埃》第14期，苏维埃共和国

3年11月7日）

毋忘广州暴动

国 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暴动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光荣的战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远东的中国苏维埃的旗帜以数万工人的武装暴动高高的举起来了。压不住中国的工农群众，而且是全世界的工农群众都将跟在广州暴动中学得丰富经验，踏着广州暴动中烈士们的血迹向前奋斗。川陕赤区的工农群众们和红四方面军的全体战士们就是起着广州暴动的英勇战争。

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那一天，广州市数万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来武装暴动，将广州的国民党军队全部缴械，占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各种机关，红旗在广州市飘扬起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府。这苏维埃政府立即颁布了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粮食归穷人，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打倒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等政纲。数万工人就拿着武器与广州市四周的敌人激战了三天，表现了非常大的英勇。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屠杀了广州市上万个工人，因此他们是全国工农的仇敌。

因为广东领导者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的工作做得不够，没有一起始就去集中兵力进攻敌人的要害处，与农民暴动的联系没取好，和军事上的缺点等，暴动的队伍就被迫离开广州

了。

可是中国工农从广州暴动中学习了许多经验，知道广州暴动所树立的政权旗帜和政纲，必须由全国工农的流血的斗争来继承。这样广州暴动成为中国工农夺取政权的一次大预演，现在中国的苏维埃和红军就正在艰苦战斗中来完成苏维埃中国。

同志们！今年广州纪念日，正是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也是我们消灭刘湘战争的紧急关头。

同志们起来更加百倍努力，大大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健强党的组织，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加紧白色士兵工作和白区工农群众的工作，大大学习军事和群众军事化。

我们要继承广州暴动的英勇斗争，完成苏维埃中国。我们要为广暴死难烈士复仇。我们庆祝全国苏维埃大会和川陕省党的大会，只有坚决的战争才能消灭当前敌人刘湘，迅速完成苏维埃的四川和苏维埃中国。

（川陕省委机关报《苏维埃》第20期第1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3 年12月11日）

战胜杨森的意义

——消灭杨森即是对刘湘进攻的回答

国 焘

同志们！我英勇善战的红军，于九月二十三日开始向杨森进攻，第一战即将杨森的第二旅全部击溃，占领昆山、玉山□□□带阵地。二十九日第二战□佛楼寺一带，杨森第一旅一、三团全部击溃。本月三日□决战，□将大庙场一带杨森主力击溃，前后缴获枪支在二千支以上。正当刘湘高唱进攻赤区，我红军要首先将杨森部队击溃，这正是红军和赤区群众对刘湘的最好回答。

战胜杨森的结果，使工农群众手里增加了二千支枪，扩大了巴州南边、仪陇、营山、渠县一大片赤区，发动了数百万群众起来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一胜利的影响，将震动全四川的群众起来，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

在这次战争中，许多新成立的独立团和独立营的战士们，拿着刀矛，勇敢向前冲锋，缴获敌人许多枪支，这就证明由川北土地革命产生的新红军，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刘湘进攻的一路军队，已经摧毁了，消灭刘湘就更有把握了。

同志们！应当将这一胜利，大大解释给群众知道，发动

群众，消灭刘湘，更高的热情动员群众起来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拿着钢枪刀矛土炮去战胜敌人。

我们得着了初步的胜利，这正是获得战胜刘湘的前提。我们应当加倍努力，更加坚定我们消灭敌人的决心，加紧我们消灭敌人的紧急动员，必须将刘湘、田颂尧、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等完全消灭，四川穷人才能得到解放，不要骄矜，不要□□，要勇敢坚决的去与敌人作战，来彻底消灭敌人。

（川陕省苏机关报《苏维埃》第九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3年10月11日）

还要百倍努力才能彻底消灭刘湘

国 焘

连日我军与王芳舟、范绍增两部激战，给敌人以严重打击，敌伤亡二千余人；但是要彻底消灭敌人，还要各方面加紧努力。

- 一、必须继续大大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 二、必须加紧对新兵及整个部队的军事发展，最近战争中，表现对新兵训练不够，如对飞机和迫击炮的知识等。
- 三、必须大大进行白色士兵工作。
- 四、必须大大在部队中进行政治动员。
- 五、各级干部特别要讲究历次作战的经验。
- 六、严格清洗红军中和地方武装中坏的成份。

（川陕省苏机关报《苏维埃》第10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3年12月11日）

坚决肃清反革命

国 焘

最近长胜县发生反动事件，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因为阶级斗争的不深入，到处充满了对地主富农调和包庇的态度，过去没有大大发动群众来与反革命坚决斗争，反对包庇反革命，只是号召反革命自首，没有解释号召反革命自首，仅是一种策略，似乎已引起一种对反革命的幻想，这是非常大的错误。这是长胜县的反动形成的原因如下：当初我军将杨森军打垮时，杨森部队下跑（溃）散的官长等约二三十人暗藏在观音阁一带；长胜县肃反最不坚决，只要区政团总到几个寨子叫穷人送一口猪来，就算完成了；地主富农组织起来的，苏维埃也不去改造。反动武装没有根本肃清，这样，反革命就大大行动起来了。因为赤区边境上警戒的松懈，敌人侦探自由出入，这样杨森就派了大批军官和侦探分布在长胜、仪陇一带，反革命建立着交通网，形成了内应外合之势。

同志们！反革命还没有镇压下去，必须同志们大大努力，坚决镇压反革命。

第一，必须在红军中继续清查成份，接连经常注意考查，要考查得周到、迅速，特别是新兵的考查，地主富农和一切坏分子，要坚决淘汰出来。

第二，反革命老早就有这个计划，混进到地方武装中来，各级政治部及军事指挥部必须大大清洗地方武装的内部，地方武装中的领导应当记着教训，长胜县的反动主要是混进地方武装中来了。

第三，加紧戒严。必须有计划的捉拿混进到赤区内的敌人，必须加紧站岗放哨，特别是边境上的戒严最为重要。以后无论何人出境，必须持有保卫总局或军区机关的介绍信，就是持有各级苏维埃路票也一律不准出境。凡进境的都必须严密监视，讯问和取保。过去三十军和九军边境上的警戒都特别松懈。

第四，必须加紧改造苏维埃，将暗藏在苏维埃内的坏分子一律肃清出去。

第五，必须加紧侦查，有计划的逮捕反革命。因为赤区的扩大，许多地主豪绅区正团总都暗中跑回家来了，这个赤区内，如通南巴，绥定宣汉一带，过去有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各县都有国民党的组织，田颂尧有剿赤青年团，刘湘有清共委员会，胡宗南在汉中有CC团，以及各种各色的侦探，不要容留一个反革命在赤区活动。

同志们！应当立即讨论具体办法，迅速肃清一切反革命，大大动员群众起来，坚决反对一切反革命。

（中共川陕省委会机关报《共产党》第22期，

1933年12月1日）

张国焘在赤江、巴中活动分子 大会上的演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四年五月十五日）

我们的要紧任务是消灭当前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谁呢？当前的敌人就是刘湘！

为什么要消灭刘湘呢？消灭刘湘才能过日子，才能保护自己的田地，保护自己的父母和娃儿！大家才晓得有万源这个地方吧，这个地方的工作做得很坏，工会非常坏，党里非常糟，苏维埃里一塌糊涂！工作做得都不够，肃反肃得乱七八糟，穷人他把他肃了，地主、富农、反革命还有很多留在那个地方，甚至包庇起来。田地没有分，穷人得不到利益，苏维埃工作人员到处欺压穷人。结果红灯教起来，把穷人整得很厉害，大家都晓得这个事情。后来刘湘来了，拉老百姓当夫子，厉害得很，他拉的夫子，背完东西便拿去当兵，年纪老的便累死了。如果是为红军当运输队，那是为自己做的，有饭吃，也不受人家打，而且当运输队还有优待。在刘湘这个地方拉去当夫子，连吃的东西都没有，有得吃就都很不好吃，睡瞌睡连谷草都没有，挨到边边上也要把你撵开，结果在他们里面死的不知多少。他们不光拉男人，还要拉女人，他们拉来的女人关在屋子里边，白天当夫子，晚上侮辱妇女，

啥子事情都做出来了，这样又不知道死了多少穷人。刘湘把老百姓一升半碗的粮食都倒了，连种子都没有了，牛也吃光了，小的牛也杀了，到处都这样闹。还要做工事，老百姓的犁耙、锄头、家具把连拿去了，什么东西都打破了。他骗这一般老百姓说他来了有盐吃，绥、宣老百姓一样没有盐吃，盐贩子的盐把连被他倒了，人拉去当了夫子。他为什么要这样整呢？因为他们的粮食要到后方去弄，他经常要四万个夫子，天天拉夫。当夫子的病的病，死的死，这样拉夫子的结果，把老百姓都赶到老林里去了。

老百姓受过这一次痛苦，现在才明白了。这次红军打到万源，一个跑反的都没有，红军一到，老百姓都围了我们哭，告诉我们：刘湘把他们整狠了！

为什么刘湘这样整穷人呢？他是否报仇呢？他是否第一次？是否在别处好一点？不是的。他在什么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他在成都拉夫一样地凶，整穷人一样地凶。大家还记得田頌尧怎样地整我们的款子，刘湘也和他一样，只有比他还要凶一些。只有把这些敌人消灭干净，穷人才有出头的日子，这是一定的道理。因为从刘湘起直到他放出来的县大老爷，直到团正、甲长都是这样。他们就靠穷人吃饭，如果不这样就没有鸦片抽，小老婆要，没有那样安逸了，这是一定的道理，不是偶然的。如果穷人有一点反抗，轻的便捉去坐牢，重的便拉去砍头。有人说刘湘来了不杀你，假的！不砍头，假的！不要款子，假的！有盐吃，假的！没有老虎不吃人，没有猫子不吃耗子！万源的事没有奇怪，他强奸拉夫，砍穷人，活埋，抢粮食，把锅子打破，这没有奇怪的。如果老百姓和有些同志相信刘湘、田頌尧来了或者可以讨点

便宜，或者可以吃点相因盐，那就错了。同志们，往年田颂尧在这里，一般穷人几曾吃过盐？卖了粮食得了钱，还是完了款子。只有红军在这里，穷人才有盐吃。猫子不会替耗子掉眼泪。正因为通南巴产生了穷人的队伍——红军，保护穷人的利益，穷人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分了发财人的田地，所以刘湘才来进攻，就是为的整穷人。穷人必须明白现在只有一条路，不要风吹一根草，可以两岸倒。不打刘湘，只有受到整，睡岩洞，吃观音土。只有坚决消灭刘湘，才是出路。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打火线，是什么人同什么人打？是不是红军同川军打，这是不对的。红军同刘湘打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就是发财人，豪绅地主、国民党蒋介石、刘湘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和全国工人阶级的战争，是整个穷人反对刘湘的战争，是全国穷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争，全中国穷人打地主资产阶级、打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整个的阶级战争。红军是由苏区工农组织起来的，这个战争是和吃人魔王的战争，现在打得很激烈，现在正是这一战争的决战关头。

刚才我们讲了，蒋介石、刘湘要整穷人，现在正是穷人的政府和军队与他打得很凶，这是第一。

第二，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各帝国主义要想把中国吃下去，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他为什么要瓜分中国？就是为的要整中国的穷人啊！田地种出来才有用，矿挖出来才有用，一块荒地没有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就是为的要整穷人。日本帝国主义整高丽人，五家人共一把菜刀，别的不说了。在东三省穷人的小刀子都被日本帝国主义收去了，怕穷人造反。帝国主义到中国来要整穷人整到怎样呢？就是把穷

人做活路做出来的东西把连归他，逼穷人饭吃不成，吃胡豆叶子，把穷人整得要死不活，子子孙孙做奴隶牛马，把庄稼做出来，把矿开出来把连给他。我们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为这事特别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便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通江县有个大老爷是外边来的，底下有团正、甲长都是帮说话整穷人；国民党也就象这些团正、甲长帮助县大老爷一样帮帝国主义整中国穷人。

现在帝国主义都在争中国，他们自己就要争了，要打了，要打了这是一件事。顶要紧的是世界穷人要抬头了，苏联穷人已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要推翻全世界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顶重要的一部分，就象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一样。所以帝国主义天天想把苏联整下去，想把中国苏维埃整下去，他才好到中国来整穷人。为什么刘湘整穷人整得这样凶？就是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要整穷人替帝国主义做走狗来瓜分中国。正因为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所以拼命来进攻苏联、进攻中国苏维埃红军。现在顶重要的就是全世界的穷人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帝国主义拼命要把苏联和中国苏维埃整下去，我们穷人也要把帝国主义整下去。另一方面，中国被瓜分的民族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就要首先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啥子是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呢？就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这一个大的斗争，这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现在的战争有两个意义，第一，是代表穷人反对款子、反对拉夫、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刘湘、县大老爷、团正、甲长等，平均分配土地；第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如

果不打，我们便要被打死。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国民党刘湘打下去，我们便可以得到土地，中国就可以独立自由，中国穷人就可以永远得到解放，永远不完租，不完款，分得土地。这是我们很要紧的战争啊！

现在大家问了，不错，刘湘把我们整苦了。田颂尧这一般在苦草坝一带，穷人冷天都打个精巴子，没有衣服穿。问他为啥子，他说田颂尧整苦了！刘湘、田颂尧这些东西都是帮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整穷人的。

共产党来了，成立了苏维埃，穷人得了好处，没有得的好处很少。因为我们共产党还没有把工作弄好，没有把田分好，红军家属没有代耕，苏维埃内混进了许多坏蛋，强迫穷人当运输队……。

可是还是好了一点，大家都有白米饭吃了，有一百万人以上有新衣服穿了。但苏维埃还没有办好，我们要好好领导苏维埃，不要整穷人，把苏维埃工作改造好。同时要告诉穷人，随便啥子事情总要有代价。苏维埃是穷人自己的，是一把刀子，刀子用不好可以砍掉自己的指头，要好好学习使用这把刀子。工农群众掌握政权不经难产，错误是不会有的，不要奇怪，不要惊惶，好象女人生娃儿一样，总要痛一下，这是免不了的。群众有种心理，就是只想好处不想出力气，说起整田颂尧、刘湘非常好啊，说起用力气就没得话了。问他不收款子好不好？他说好。问他不完租、不完粮好不好？他说好。问他田地分了好不好？他说好。问他怎么办？他们总不大想出力气，这是非常错误的。列宁同志说：

“只有战争才能消灭战争”。就是说穷人要用力气才能消灭发财人，只有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消灭反动统治。要田地，

要猪，要牛，如果不用力气便要不到手。现在只有穷人自己拿起武器参加红军，大家卖一口力气参加运输队，许多弟兄在火线打伤了好好抬回来，运粮食给他们吃，才能永远不受刘湘等压迫。如果要子子孙孙的粮食不被刘湘倒去，就要花点本钱，能做啥子的做啥子，能拿枪作战就拿枪作战，不能作战的加紧生产，忍点饿吃点苦，节省为革命战争。这样才能永远土地归农民，八小时的工作才能得到，苏维埃政权才能建立起来，帝国主义国民党才能打倒下去！

在这紧急斗争关头，要去告诉群众不要动摇，不要害怕，要坚决斗争，苏维埃不好，是穷人自己还没有学好掌握政权，共产党员没有学会领导，因此苏维埃混进了地主、富农捣乱，要穷人自己起来负责。苏维埃旗子虽然扯起不久，但已经指示一条道路，只有苏维埃之下才能有饭吃，要得解放，就要大家卖点力气花点本钱！

共产党对群众的领导是什么呢？就是要领导群众不出款子，得土地，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压迫，要得到这些解放，就要领导群众起来干，首先要党员以身作则。有许多同志入党象是来作官一样，做个团员只是打跳，当个共产党员不是做官不是整穷人，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为了打刘湘，为了工农得到解放愿意牺牲一切。要特别吃苦英勇，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有些打土豪我来一个，吃苦的工作便没有人了，得好处有人，一收紧阵地缩起头来了象一个乌龟，这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是牺牲一切为革命奋斗，特别是在艰难困苦时候更要牺牲一切，做群众的模范，坚决领导革命的战争。

第三个问题要把斗争认为是自己的斗争，是我们广大劳

苦群众的斗争，是整个阶级的斗争。有的问群众，问他干啥子去当红军，好象是替红军打的一样。要向广大群众宣传，一切拥护红军的行动就是拥护自己；一切帮助红军的家属的行动就是帮助自己，一切吃苦就是为了自己的子子孙孙解放吃苦；一切共产党员的斗争，都是为了自己的，为了自己阶级的解放。要领导整个阶级来斗争，完全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区委工作，不是为省委工作；一切牺牲，一切吃苦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阶级。

群众还有（的）这样了解：“不错啊！革命成功要花力气啊，一切都是为自己干的啊，不过有一个问题，革命能不能成功啊？”他怀疑到革命能不能成功时，他就说四川有五个军长，我们打不赢。同志们！必须了解穷人起初抓起来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编队伍，怎么使用武装都不知道，怎样组织苏维埃，怎样组织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都不知道，事情不能一下子做得完完全全，这是不会有的。社会民主党说：“我们革命首先要无产阶级啥子事件都要比资产阶级懂得多些，个个都要念过书，认得字，还会带兵。”这个事情不会有的。因为穷人在没有夺到政权前，发财人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啥子事情不让穷人知道，穷人越蠢，发财人越好剥削穷人。

马克思、列宁说，要革命成功，就要有少数的先锋队领导大多数群众起来坚决斗争，就一定能使革命成功。这便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不同的地方。

我们现在只有领导群众坚决斗争，就一定能消灭刘湘。要告诉群众，不要两边倒，不要吃现成饭。码头是打出来

的，成功不成功全靠自己干，死干就干得出来，缩头就只有被刘湘发财人整死。

大家知道革命要卖力气，卖力气还是替自己卖的。如何卖力气法子呢？我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里面发生了许多毛病，发生了右倾——不领导群众斗争，他缩头逃跑开小差，不够一个党员的资格。要怎样才能尽自己的责任呢？我们的同志大家都是宣传家，可是组织的力量还少得很，宣传工作也还是没有做好。我们同志说的非常凶，可是办法非常少，说了又打跳去了。打跳加上说漂亮话，革命那得成功？要说到做到才是共产党员。有些同志便是瞎干，命令群众，我们个个同志，个个共产党员不光口里说革命的话，妇女部的也会说得很，可是啥子工作没有做，这样革命不能成功啊！每个同志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要打跳，要真正做点工作，自己要想一想不光自己做，还要领导群众做。怎样做法呢？许多同志在开会时说（的）非常响，扩大红军。扩大红军多少个，那几个领导，多少群众去呢？没有了，越说越空。革命不能变成空谈，空谈不能使革命成功。革命要做实际工作，口说不能打倒敌人，要有实际的行动。每个同志不仅要做一个宣传家，同时要做一个组织家，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特别宣传的一点。党员不是做官，怎样做实际工作，支部要做些啥子，怎样才不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有这些，我们的同志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到底能不能战胜敌人呢？你们打过架没有？如果你打架你想到你打不赢，你一定输；如果你想不要紧，死都要打，你一定要打赢，就是被人按倒了，你爬起来还舍命的打，你一定胜利，你想你一定胜利你便是胜利。战争和打架一样。

我们看看这个刘湘他的力量空得很，好象一个人块头长得大的很，又长杨梅症，又烧鸦片。他有几个兵？范绍增的兵从前来时，一连百把人，现在只五、六十人，只有班长排长是老的，其他都是拉来的新兵。王芳舟早先一连百把人，现在只有四、五十人，生病的非常多，兵多是拉来的，他死了三万多，每师有七千人以上的伤亡，只要我们好好宣传就行了。现在田颂尧和罗泽州又开起来了，说敌人有多大力量简直是笑话。在刘湘的后方有许多逃兵破坏交通，共产党领导许多游击战争起来了。各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穷人都反对刘湘、田颂尧，这样刘湘还算个什么力量呢？

在我们的力量呢？我们锻炼出来了，我们的力量有很大的增加。但是，为什么收紧阵地呢？

这很容易答复。战争不是很简单的事，总免不了困难，就是敌人兵力比我们多，消灭敌人要用些方法，同志们还记得去年消灭田颂尧的方法吧！王芳舟来把他打垮了，范绍增、郝耀庭、陈兰廷……都把他打下去了，每个部队都不敢动了。再把我们的力量养足些，一下子把他打垮下去，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一个地方要让给敌人就收紧一点，可是队伍没有乱过一次，都是有计划的。打仗时，地方有时大一点，有时小一点，这是常事。在屋里打架，前进后退不能决定胜负，如果一下子把他头打破了这才是胜利。我们又没有被敌人打垮，有许多同志便动摇起来了，这完全是右倾。要把敌人队伍打垮了才能算胜利，这次打倒刘湘，一下子可以撵到成都、重庆去。同志们永远记住要战胜敌人，只有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坚决领导群众拼命斗争得来。不是说空话能够得来，不是打跳，不是动摇，不是逃跑，也不是害怕

敌人所能得来的。

刚才说了，坐了不能消灭敌人，打跳不能消灭敌人。紧急时期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是要不管时势如何紧张，百倍努力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去消灭敌人。我们共产党是领导群众斗争的党，不能这样，开小差滚开去，动摇的和他斗争。我们是有政权的党，要每个同志能挺身去作战。动员群众起来参加红军，参加游击战争，解决经济物资各项问题；动员群众拥护票子，加紧春耕，加紧节省……。

巴中赤江的党员、团员的任务，就是这样动员群众起来作战，做白色士兵工作瓦解敌人。每个党员要有这样决心，不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来执行，而是领导群众来执行。只要我们能坚决领导群众斗，我们就一定能消灭刘湘，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刘湘没有什么狠处。

中共川陕省委会

五月十六日 印

(政一六八七号)

(选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 党政工作大会上的政治报告^①

一 我们伟大胜利的意义

我们这次大会有什么意义？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首先要明白的。

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增加、发展红军的战斗力。

因此，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和党的工作的大会，目的就是要在政治方面来准备自己去战胜敌人。这对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红四方面军的胜利，是可以使全四川、西北的一省数省的革命首先胜利实现起来。实现这一胜利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因素和条件，不仅在整个革命中是一个配合，而且要由这地方推广到全中国去，这关系于整个革命的前途，因此，大家要把责任担负起来。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得到很大胜利。在一年的持久战，

^① 红四方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在通江毛浴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连以上的政治工作干部八百余人。会议讨论了六路围攻以来的政治工作，并根据长期积累的政治工作经验制定了《全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等，张国焘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

这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是头一次打这样一个持久战。这表现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和坚定，不战胜敌人誓不甘休的精神。这表现在：一年来的战争中间无论在东林河、火烽山之战，给进攻敌人以非常大的打击。九军、三十军、七十三团、七十五团、二六三团、二六八团、二六四团，在这战争中表示了非常大的英勇。在大口寨的战争，表示了二六九团的战功；在铜华山的战争，二六八团、二六五团表示极大的英勇；马鞍山之战，二六五团把郝司令完全消灭。二六五团、二六八团、九军、三十军都有自己的伟大成绩。镇龙关、高碑寨以至万源，并至反攻中，几次的伟大功战，都在这战斗中锻炼了自己，显示了自己是坚定的精神。在一年来的战争中，打垮了敌人，这毫无疑问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的坚定，政治的正确，战士的英勇所得来的。我们这战功曾得了中央的奖励。“……”中央对这伟大胜利表示称赞，表示欣慰。这应公布给全体战斗员指挥员知道的。

我们的胜利，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就是给了四川的整个反动统治极大打击，给了整个赤区的群众以信心，红四方面军是有把握的，群众的依赖，并给了所有同志们证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不但对赤区，就是对白区的群众也给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知道苏维埃和红军胜利了，救星胜利了，这一事实是给了全四川的反动势力以根本的动摇。

同样的理由，这使全国的国民党统治更加动摇。

我们不仅是得了政治上的影响，而且在革命方面增加了很大的力量，上万的枪支到工人农民这方面来了，这增加革命方面的比重。这是给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以很大打击。给了整个革命以一个很大的配合和推动。这是彻底消灭反革命

“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的步骤，是可以完全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五次围剿”的。

但是这胜利没有结束这战争，要结束这战争，就除非我们完全消灭了敌人的时候。没有把全四川的反革命国民党统治，全中国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消灭，这战争不会告一段落，不会是最后的结束。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还要继续战争，战争还在肩膀上，我们必须争得更大胜利，直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应如何估计我们的胜利呢？是给了敌人很大打击，使敌人暂时不能进攻我们，使敌人原有计划归于失败，不增加新的力量就不能再继续进攻。但是我们的胜利还未充实，我们还只是获得了更大胜利的可能性。去完全消灭敌人，如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打垮蒋介石主力，甘鄂陕的一切敌人等等，我们得到了可能性和条件来赤化四川和西北。这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在将来的战争中实现这一可能。

这就是要经过百折不回的斗争，坚固我们的队伍，坚定我们的决心，使这可能成为事实。这是这次大会的任务。

如在二七一团昨天战士所说的，我们有条件可以打到成都去，我们一定实现这一口号。因此要估计：我们绝不能自满的估计，我们只是大大打击了敌人，但是还未消灭敌人；我们是得了伟大胜利，但这胜利还未巩固，发展与巩固是不能分离的。所以我们就必须用进攻的路线去开展更大胜利，这就是大会的责任。

在了解这问题当中，每一战争中胜利，一定要有基本的条件，就是坚决的斗争，一个战争由于坚决的斗争，努力工作，可以改变力量的关系，可以使自己力量增加，而削弱敌

人的力量。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可以增加得最快。这是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

我这政治报告，可以分做几点：

第一，世界上的阶级斗争

第二，中国的阶级战争的情况

第三，环绕川陕赤区及红四方面军周围的情况

第四，以后的任务

二 世界上的阶级斗争

(一) 革命者必须是国际主义者

为什么我们川陕苏区的同志要来研究国际的情况？因为每一个战士都要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共产党员，革命战士，都要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整个世界的政治情况，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发财人一边，另一方面，苏联和各国无产阶级、农民，殖民地工人农民——弱小民族和被压迫的劳动民众等在一边。这样形成两种力量。在伟大的阶级斗争中间，整个世界上被压迫阶级，是互相不能分离的，不能说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的，可以大家不管。全世界上统治阶级包括少数，被压迫阶级包括大多数，这两种阶级战争是整个世界的状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头一句就说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什么估计世界情况？好象我们要在打仗中估计敌情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红军中因为反帝的工作做得非常少，所以就不了解帝国主义的“世界”，知道世界的情形非常少，不会估计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如在火线上，反动派宣传“我们是苏联的

走狗”，很多同志就不能答复和揭穿其反宣传了，我们同志简直做了非常愚蠢的事情。好象我们不把小偷的真脸孔指出来，结果，反而给小偷指自己是贼，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资产阶级的世界是帝国主义。苏联是没有帝国主义的。发财人最怕人家指出其帝国主义走狗的事实。而且最怕我们揭发这事情。但是我们不会揭发这事情，你不把握这武器去进攻敌人，没有好好去宣传，那我们只有处于被动的地位，让敌人去说这句话，这就是由于我们不懂得使用最好的武器，等于游击队不会用机关枪一样。这是政治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敌人诬蔑我们，说我们是苏联的走狗。这是非常好答复的一个问题。因为资产阶级最怕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不仅怕我们工人、农民和苏联联合，而且也怕我们在中国里面的联合，发财人最怕穷人团结在一起，因此破坏，这是他们的阴谋。假若我们摆事实，那就好办了。若果我们好好去学习国际的状况，如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一样，我们基本任务是反帝国主义的土改革命。现在我们把一个重要的任务放松了。轻视反帝工作，象打仗一样，只把步枪打，不会指挥机关枪连，是一个道理。

因此在这会议中要有基本的转变：要懂得如何去反对帝国主义，来争取广大的群众。

刚才我们说过整个的革命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分为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地主、资本家、高利贷、军阀、官僚等挑拨鼓动战争，他们在一路压迫穷苦的人，这一种压迫阶级发展到最高度，就是帝国主义。就是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的阶段，好象一个人，从小长到大，已经经过了壮年，到老了，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整个资产阶级的

压迫制度快要死亡的时候了。帝国主义这现象是压迫到最广，他压迫资本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压迫殖民地的工人和农民，帝国主义是世界内把连反动势力的首领。因此，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工人农民的总的仇人。

所以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都要反对帝国主义，起来革命。我们知道，刘湘的那些破烂飞机，鲁易士机关枪，捷克式轻机关枪，以至他的子弹、炮弹，都是由帝国主义得来的。发财人有全世界帝国主义做头子，来进行反全世界穷人的战争，所以中国革命是不能单独的。穷人一定要联合起来才能根本打倒全世界的发财人。为什么原因一个红色战士要是国际主义者呢？要懂得和全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帝国主义。这个是说明世界上两个世界的对立和阶级的斗争。

若果红色战士不了解这一点，那敌人拿些政治武器来打我们，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必须要注意的。

（二）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这里挂着一个世界地图，我们首先看看无产阶级祖国的力量，这是苏联，包括了六分之一的全世界的土地。人口有一万万七千万，占全世界人口中九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光景。那里没有发财人，也没有刘湘、蒋介石了，只有苏维埃、红军和工农穷人。同志们知道，在那里的第一次五年计划已经成功了。说起成功，当然非常之多，在苏联里面，一切进步非常之快，机器，工业方面，有许多部门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国家，有许多部门马上就要赶上。那里工人、农民创造出来的东西，归工人农民享受，社会主义的过程，是消灭阶级，消灭压迫的过程。我们只说苏联有几千个飞机，究竟有多少？普通用的有一万架以上，战斗机有五千上下。他的飞机

不象刘湘那些孬的，苏联顶大的可坐一百四十八人，炸弹可以带一万四千斤的炸弹，刘湘的顶多带六十至八十斤就足了。这样可带一万四千斤炸弹的飞机有二千多，象刘湘的那些飞机好象这里童子团玩的木枪，在苏联是拿来给娃儿耍的。苏联经过了这几年，空军在世界上已占第二位了。这不是容易的事，在苏联不仅啥子都用电气、机器，大家都识字读报，苏联的战斗力的增强，不仅陆军、海军、飞机方面，都有强大力量，把帝国主义吓死了。这形势在苏联中还继续往上涨。

帝国主义里，又长杨梅，又打摆子，又拉痢，又是长狗皮癩，病重得很。苏联好象十八九岁的红色战士一样，发展非常之快，帝国主义最怕苏联的进步，苏联和帝国主义是不能两立的。一边是工人农民，一边是资产阶级地主。苏联不但自己得了解放，而且影响全世界工人农民非常之大。因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成功，领导了很大的斗争，推翻了沙皇，资产阶级地主，把土地分了，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国家为穷人所有。全世界穷人都拥护他，好象甘肃的武都的穷人起来革命，也打起红旗子来了，正如全四川的穷人也说红四方面军到我们这里来就好了。苏联对全世界也是一样，对世界革命有非常大的影响。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是全世界工人农民的榜样和标准。

（三）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德国，地方虽然小，但有好几千万的人，那里也有个蒋介石，专门整穷人。叫做希特勒，是个顶坏的家伙，那里有七百万人起来反对棒老二的统治，外国话叫这些棒老二强盗、狗头叫做法西斯蒂。那里不管有多凶的狗头，但是有这

么多人起来反对。在奥国，工人起来暴动，美国矿工起来罢工，西班牙的革命也很凶，在日本的海员起来罢工，台湾也起来反抗，不愿给日本帝国主义者整。差不多全世界的穷人都起来革命。在中国苏维埃有广大的区域，有百万的红军，十大苏区，正在粉碎“五次围剿”的过程中。中国的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中国革命成功，将要包括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这就是简单的说来全世界都在革命。革命采取了各种的形式，如中国有广大包括一百多县份的苏区。如西班牙及旁的地点，都在起来暴动。德国工人起来给法西斯蒂打。有些殖民地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些斗争的发展，是向着一个目标：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这是革命一方面的情形。

（四）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危险

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方面。

帝国主义在做啥子呢？他发生一种根本的矛盾，生了病，日子过不下去了。第一，穷人没得饭吃，为啥子没得饭吃呢？工矿关闭了很多，广大工人失业，三千四百万人没有工作，加上他们的家庭，当有一万万人以上。好象通南巴地方，从前田颂尧、刘湘在的时候，穷人没有布，没有盐。帝国主义里面，穷人没有钱买不起，形成广大的失业，没法解决。第二，帝国主义正在自己中间斗争，好象四川军阀正在拼命争防区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也分了防区制度的：英国争了非洲一大块，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又拿了非洲一大块，安南。美国在菲律宾。日本又拿了我们的东三省，还不够，又想别国的防区。好象四川的田颂尧、刘湘等，为争防区，过去打过几百次仗，现在还在左冲右突一样。

这样，世界上瓜分了，世界的防区没有了便来争地盘，大家都在竞争造军械，美国用了许多的钱来造枪造炮，钱都花去，害得大家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帝国主义为做帝国主义大战的准备，便搜罗各种流氓痞子、政客无赖，组织个团体叫做法西斯蒂，在横行霸道，乱七八糟的整穷人。为啥子要用法西斯蒂，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无法过日子了，而且穷人又起来革命，要打仗就要整穷人，一方面可以压迫穷人不反对战争，另一方面又催款迫捐来筹备打仗。帝国主义好象吃了很大的东西，肚皮吃大吃饱了，拉不出屎，眼看要胀死了，这就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已经吃了这许多东西，没有办法，便大家争起来，为的要将不要的东西有一个地点销卖出去，争夺殖民地、争夺市场、准备战争、造军舰、造大炮，形成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日本和美国，英国和日、美等争市场，就引起世界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德国也要拼，也要和法国拼。英国和美国也在争霸王（好象刘湘与刘文辉互相争打一样），都在准备。帝国主义的统治，必然要发生战争，上次世界大战打得很凶，将来的战争一定要比上次的还凶些。

所以帝国主义的统治：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战争是跟着帝国主义的制度来的，不把帝国主义打垮，战争是一日不会消灭的”。这种战争之下，一定拉夫抽丁，不知道要死多少千万人，这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形。

（五）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进攻苏联

现在最中心的问题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战争。苏联与帝

国主义的战争，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争。这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一边是苏联和全世界工人农民，一边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为保持自己，一定要进攻苏联，这是一定的道理。

帝国主义在想各种方法去进攻苏联，特别表现在满洲方面。整个进攻苏联中，现在英国在做头目。

帝国主义要进攻苏联，好象六个军阀进攻川陕苏区一样，所以苏联的工人农民正在积极准备，要来打垮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在拥护苏联，为的要拥护自己，这是一定的道理。假使川陕苏区受到打击，就是四川工人农民受到打击。假若这地方得了解放，那全四川穷人都得到解放了。所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看清楚了，拥护苏联就是拥护自己。全世界最主要的阶级战争，就是帝国主义企图进攻苏联。因此全世界的工人农民的最大任务，就是拥护苏联，因为武装拥护苏联的结果，可以使帝国主义驱逐出去，可以增加工资，可以得到八小时工作，这在火线上宣传也是一样，要对白兵指出：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你自己。

（六）法西斯蒂的猖獗和目前是革命和战争的新周期

法西斯蒂闹得顶利害是德国，顶久是意大利。什么是法西斯蒂呢？法西斯蒂是公开的强盗，公开的棒老二。蒋介石也在学法西斯蒂，他的法西斯蒂就是卖国，公开的屠杀，内容就是这样。第二，就是世界上无产阶级起来反对法西斯蒂的战争。

第三，就是进攻中国革命，瓜分中国。国民党把中国出卖了四省（东北），把要紧的场子都卖了。这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就帮助他们的瓜分。在中国最伟大的是发生

极大的苏维埃和红军，这使了多数殖民地革命运动受到极大的推动，就更使帝国主义向中国革命进攻。现在，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是我们最大的危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为的是要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

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中国革命的战争和我们反“五次围剿”的战争，在国际上就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这是根本的问题。另一方面，世界帝国主义都在准备自己中间的战争。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解放自己，正在拼命进行驱逐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就是民族革命战争。

因此，现在的世界是“革命与战争的时期”，这是说工人农民起来和帝国主义拼命的时期，这是共产国际告诉全世界的工人农民，警告全世界的工人农民的一点。共产国际的警告就是：现在非常迫切了，世界革命和强盗战争都要掀动起来，大家要准备好了。

在这样的战争中间，我们的战争不是单独的，我们在革命，世界上工农也在反对其政府，英国、法国、美国工人都在起来拥护中国革命。蒋介石在杭州有七十架飞机，一下给我们烧了，哪个干的？共产党领导来干的。在中央苏区蒋介石的飞机的炸弹，打起来不响，这是各国工人为拥护中国革命，有组织的破坏他们进攻中国革命的表现。

所以在这样斗争中间，被压迫的阵线中间，各国的被压迫阶级都在互相帮助，若果我们把拉夫抽丁打了，他们也有好处了。所以，为的分土地，这不是给任何人做走狗，是为自己。国民党为的要镇压革命，出卖中国，到的地方马上出告示保护洋鬼子，所以我们为的不愿做亡国奴，才去打国民党。这就是我们的主张。正因为世界革命中的互相支持援

助，因此，中国革命在世界上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的战争，是解放全世界工人穷人的战争中的一部分——最主要的一部分。苏联比我们的努力更大。中国的苏区在世界革命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所有上面所说的一些，是说明在革命中，苏联有非常兴盛的一面，各国的革命也发展得非常之快。另一方面，各国里面同时有经济的危机和革命的危机不能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时期，这中间，中国革命起了极重大的意义。我们正处在历史的时期，是天翻地覆的时期：我们正向这时期斗争，这一形势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的。

就在这样的革命发展时期下，我们要在有利于我们的国际形势下，加紧我们的努力和责任，经过艰苦斗争中获得更大胜利，为获得最后胜利而奋斗。红四方面军和党的任务，就是要准备自己和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在一起，去战胜帝国主义。要在反“五次围剿”中，反帝国主义战争中，民族革命战争中，共产党要能够领导广大工人农民去推翻帝国主义，获得苏维埃的胜利，只有这样，世界革命才能走上实现的道路。

三 中国革命的形势

（一）全国苏区的形势

说到中国的情形：中央苏区是第一方面军，下有一、三、五、七、九集团军（主力是一、三、五、七、九）、一个集团军管三军，还有独立师，一军九团，加一个特务团，还有炮兵团，骑兵团，还有其他单独行动的军，好几个独立师（共产国际师等等）。赣东北是十军，湘鄂赣是十六军，鄂

豫皖是二十五军、二十八军，陕甘边是二十六、二十九军。我们的编制是集团军之上，为方面军，比如中央苏区，一个地方有五个集团军，有我们五倍的大。

全国苏区和红军，顶主要的是反“五次围剿”的战争，已有一年多了。在这战争中，获得许多胜利，光是中央苏区计算，打垮了敌人一百几十团，消灭了五十余团，就在鄂豫皖，湘鄂西，已有极大胜利。我们川陕苏区，打垮了敌人二百团兵力，消灭了五十团以上，我们在这赤区中，获得了很多枪，打垮了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这班军阀，不算兵工厂，光是缴的枪，前后已有四万上下。在中央苏区，比较我们打得更好点，由于他们有广大游击战争，他们组织有许多特务队，专门弄到敌人后面去，在敌人后面一二百里打。在赤区内大多数的壮年通通参加赤卫军，有五十万，经常行动有二十万，少先队十几万，他们在作战中，布置好几万的赤卫军，又会做工事，施设假阵地，施设疑兵，能单独担任任务。所以能将主力集中在一个地方打。赤卫军能做竹儿城，满山遍野都是，在一切进赤区的路口，都设置有这样竹儿城，敌人进攻就不容易找路了。晚上没法来，白日来只能慢慢打，若果土匪进来，我们集中一点力量一个出击，就赶到竹城阵地，把连缴械。要紧就一下收上去了，敌人根本没法找。他们又做得许多老虎箭，把它放在要路上，使土匪难于进攻，他们又会做地雷。他们用了许许多多的打法，利用各种土枪土炮。可惜我们知道太少了，不能一一说出来，他们能够用各种的方法打，他们的游击又打得好，打一仗能够俘虏几万白兵，看守白兵的都是赤卫军、少先队，赤卫军又担负搜山的任务。所以白色

士兵说：“和中央苏区的赤卫军，少先队打，没有办法。”因为和红军打还有规矩，但是赤卫军却给你没头没脑的乱打一顿。他们又会造各种炮台，不仅这些，赤卫军还帮忙招呼伤病号，所以他们地方武装非常发展。他们在赤卫军、少先队中有专门的政治工作，党的工作。这一点，我们还未学到，还差得远。

他们的红军打起来，比我们炮多，有很多大钢炮，有好几百门，机关枪、迫击炮都比我们多，每师人都有无线电，所以他们作战起来，有时候集中几百门炮打国民党一个炮垒，攻击起来火力凶家伙。他们的主力一、三、五总在一起，团团总在我们75、268之上。这三个军团总集中在一起，打起来敌人就头痛，他们最会夜间移动，运动部队，夜间运动部队时，又有地方武装掩护，使敌人根本没法知道我们的主力在哪里。

他们经常有个红军大学，有一万多学生，出来可以当营长以上的干部，比我们彭杨学校大得多了。他们不仅会做工事，会射击、抛手榴弹，还有许多人会打炮，会架飞机，他们学的比我们多，他们有红军操典，详细政治条例，经常教练。就是赤卫军、少先队也一样的教练新式军事训练，在瞄准，指挥队伍。他们赤卫军的一个团长恐怕比我们的一个团长还懂得多些。他们也当然有困难，因为敌人在封锁，但是粮食不成问题，妇女去做生产，盐呢？他们自己也会造，这些问题解决了。药材，他们也发明了，若果获得敌人的不够，就广大的组织草药先生，跌打先生，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发明的东西多得很，那个发明的大加奖励，他们发票子，发公债，老百姓、红色战士都大家用。不管在游击战争

还是指挥队伍作战方面。他们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做得好得多。他们在不久以前，蒋介石的六师人去攻击一个地方，一下把他推垮了。后来蒋介石又组织其军官团，但是也给我们通通打死了。他们做到这样，就是群众工作比我们做得更好，田分得好，苏维埃做得好，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也做得好，那里的群众非常之热烈，参加作战非常踊跃。在不久以前，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红军家属大会，到了一万多红军家属代表，写了几万封信给前线，派了代表团，叫红色战士坚决去打。他们还给了红四方面军一个电报，叫我们也坚决打。

他们的工作比我们的做得好得多了。他们坚决为革命拼命，现在中央苏区正在为革命坚决拼命的时候，要把敌人打垮下去，就可以把蒋介石赶到海里面去，他们把蒋介石的飞机厂也弄垮了。

再说肖克，他是红六军团，把队伍由湖南东边拼到西边，他的队伍凶得很，他比我们打得还要凶，敌人正在忙着调动队伍打，贺龙是打游击的大家，打到那里分谷子，分衣服，这些比我们红四方面军有些同志到处不准群众割谷子好得多了。

鄂豫皖也打得很凶，把张学良占去的金家寨也打过来了。在几个月以前，吴焕先同志打到信阳州车站去了，把国民党吓得要命。

这样，全国的赤区和红军都在给敌人激烈作战中，他们在各方面给我们都有非常大的效法的地方，应该学的地方。总之，现在不管那方面，都在与敌人热烈的战争中。川陕方面，我们首先打破了“五次围剿”，但是这“五次围剿”还

未消灭，只要我们再努力下去，就能彻底粉碎这“五次围剿”。因此，我们和全国的苏区的配合，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在现在，我们也要拿出在万源吃洋芋包谷的精神出来，把“五次围剿”彻底打垮下去。

全中国的共产党员有多少？有三十八万，领导了全国的苏维埃的党和白区的斗争，我们应把这斗争看做是全国苏区的斗争的一部份。我们的责任实在是非常重大，我们应一刻不停留去彻底粉碎“五次围剿”。

（二）白区的斗争形势和工人运动的猛烈发展

第一，除了苏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以外，我们再看看中国大城市中的工人运动的状况。大城市是帝国主义的势力把持着，最近共产党领导了五万唐山工人的大罢工，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上海的丝厂绸厂英美烟等工厂都在大罢工。这些罢工，动不动就给国民党的军警巷战，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

在河北，我们在非常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个工会有六千多会员。不管白色恐怖多厉害，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起来斗争，共产党的力量是猛烈开展了。

第二，在这些斗争中，看见非常激烈的性质，在北方在工人中建立了许多基础，在白区工作，是秘密的活动，但是党的努力的结果，在主要的工厂都有我们的人，在失业工人中我们也有非常大的斗争。

因此，中央说：“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在猛烈的发展活泼有生气。”这与我们的斗争是有很大大关系的。

此外，共产党在“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占夺了我们的东三省，给他叫“满洲国”）组织有许多人民义勇军，在

给日本帝国主义打。打得很凶，又是说缴了好多枪，今天杀了日本人，明天又杀了日本军官，他们成立了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义勇军，又有游击队。

第四，农民游击战争也非常厉害。就说我们四川周围：在川南，古宋、马边一带，和印来等十六县，有好几支抗捐军，渠山、武都到处发展有农民的游击战争。那么多，各省各县不知多少。在甘肃武都，农民暴动起来之后，打起“红四方面军别动队”的旗帜。

兵士方面，哗变到红军来的天天增加。哗变到中央苏区的孙连仲，有四师人，二万六千多枪，改编成第五军团，现在国民党士兵哗变发展得很厉害，兵士把连长的头砍了，拖枪往这里跑。

所以同志们看，全国革命方面有这些苏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游击，兵士兵变等许许多多，这就是大概全国方面革命的情形。

四 国民党统治的实质

（一）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必然性

大家看看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在中国做了什么事呢？从前中国的工人农民，把武汉的租界夺回来，国民党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又把武汉租界送给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农民。这是一定的道理，一个出卖民族卖国的政府，是不得不屠杀工人农民的。这是不能分开的。列宁对这个问题说得清楚：殖民地资产阶级在工人农民土地革命还未起来的时候，是表示似乎可以代表民族利益，好象是民族代表这样。在工人农民为

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表示好象赞成的样子，但是当工人农民真正起来反对的时候，他就马上叛变革命，跑到帝国主义怀抱中去。中国资产阶级也是一样，民国十六年的时候，广东、湖南、湖北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完全叛变，投降到帝国主义怀抱中去。这于是形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革命。

国民党从那时起就投降帝国主义，如是一直发展，到东北四省的出卖，便是最可耻的一个例。东三省军阀国民党张学良有上百架的飞机，有兵工厂，上二十万的军队，但完全不抵抗，甘自给日本帝国主义缴械，把一切送给帝国主义去了。这以济南事件一个例子，如蒋介石下命令，假如日本要缴械的时候，给他跪着让他缴枪，绝对不抵抗。这样，国民党把东三省热河，完全出卖给帝国主义。国民党不敢抵抗，如此，当然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把东三省完全夺去了。

一·二八上海的战争，上海驻扎的士兵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义勇军出来打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得一塌糊涂，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十九路军长官都是国民党，便立马投降帝国主义，想把帝国主义缴械去，但是十九路军士兵还是一样打。蒋介石后来又开了第五路军来，想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夹击十九路军的革命士兵和工人义勇军。这就是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最具体表现，不但投降帝国主义，而且和帝国主义共同打反帝国主义的工人、农民、兵士群众。

这就是国民党所做的事情，国民党投降出卖民族利益的事情，是数不清的，国民党就是不愿意中国工人农民抬头，那是发财人、亡国奴、卖国汉奸的大集团。

假如工人农民起来，他们就根本没有饭吃了，同时帝国主义也要利用中国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为爪牙，来剥削压迫工人农民。象通江一样，县老爷要整穷人就利用本地的人做团正、甲长，在中国也是一个道理。国民党的统治——血腥的统治，强盗的统治，一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现在国民党的统治是变成法西斯蒂公开的不要面孔，从前还说些漂亮话，现在连这个也不说了。他说：“你们若来反对日本就必定不注意“剿赤”了。”所以说：“那个反对日本，就砍他的头。”蒋介石公开的说：“中国不能反对日本。”那就只好投降日本，做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国民党更无耻更公开的投降帝国主义，把民族改良的假面具都抛弃了，这样来公开的镇压革命。国民党这样的统治结果，引起了群众非常大的痛苦加重群众的压迫。再加上了连年的军阀的战争，弄得民穷财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连年灾荒，弄得中国的经济状况完全崩溃，特别是农村的破产，群众饥饿。

许多地方发展分土地、游击，广大的土地革命就是由于这些根本原因，同时由于国民党的卖国，发展了很广大的反帝运动。全国范围之内每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也齐恨帝国主义，大家知道国民党是投降，群众不满意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国民党的统治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国民党所绝不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显著：没有法解决土地农民问题；国民党统治，就必然要拉夫抽丁，使上百万的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连续不断的拉夫抽丁、战争，这是反动派所根本不能解决。第二，根本不能实行欺骗的“民族改良”，只有使工农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获得的结果，反转还给帝国主义

(九江、汉口租界)，因为国民党统治的结果，只有将中国完全卖给帝国主义——给帝国主义做清道夫。国民党这样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瓜分中国，不能有丝毫减轻，民族工业就无法改善，这是反动统治的根本矛盾。也就是国民党给帝国主义做走狗的根本情形。

(二) 三民主义是杀民主义！国民党是刮民党！

所以他们所谓三民主义，广州暴动时工人已给他取一个名字，国民党是刮民党，三民主义是杀民主义。

列宁说得非常清楚：共产党的民族问题的定义，民族自决，反对压迫弱小民族。什么是民族问题呢？世界上有好几种人，有白的，有黄的，有黑种，有一种是红的，有一种是棕色的，——就在中国，也有西藏，蒙古、满洲等特别区，中国的就是黄种，民族中有强的，有弱的。帝国主义就利用优越的势力，来压迫弱小民族，帝国主义把中国人不当人看，上海的公园门口挂着一牌“中国人与狗不准入内”。他们简直不把中国人当做一个入。

香港来的同志，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故事。我们对民族主义的观点就是：在自由的原则下，通通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把各种民族普遍解放。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第一就是出卖中国。第二，压迫回回、苗子、番人、蒙古人。只有共产党，列宁的观点才是唯一的正确的观点。孙中山是中国的卖国贩子、头目与教师，他著的建国方略，就是出卖中国财富的一个计划，就是把中国的一切东西卖给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拿钱，另一方面，就压迫中国国内的弱小民族。

什么是民权主义？民权主义就是到处打穷人，屠杀工人农民，有什么民权？

权也没有，只有到处拉夫。刘湘有权，老百姓一点权没有。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就是杀人放火主义。只有共产主义的观点，苏维埃的政纲才有民权，苏维埃没有拉夫抽丁，都有选举被选举权。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中国百分之九十的穷人来参加政权。

民生主义是民死主义。这几年来不知道打死好多人，整死好多人。卖鸦片、贩吗啡，什么压迫屠杀穷人的事，都做得出来了。只有共产党才给群众真正生活、分土地和找工作。所以三民主义是杀人放火的主义。国民党丝毫不能解决中国群众问题，群众只有起来打倒国民党，夺取其政权。

这些反动派又说：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实行。大家知道共产党的十大政纲，哪一条不能实现？第一，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第二，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企业银行。第三，关于中国民族的自决。第四，推翻国民党统治。第五，建立苏维埃政权。第六，八小时工作，工人实行失业劳动社会保险。第七，没收一切发财人土地，分土地给工人、农民、士兵。第八，给士兵以生活和土地。第九，打倒款子，建立统一累进税则。第十，联合世界上无产阶级，弱小民族和苏联。

这十条哪一条不能实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改善士兵生活，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中国得到独立自由，这种主义是唯一的在中国能实行的主义。共产党的政纲是唯一的中国工人农民要求的政纲，已经动员了几千万的群众为这政纲而战争。共产主义是唯一能代表群众利益的，我们奋斗的同志，就为的共产党政纲的实现。国民党是使中国做亡国奴，使工人农民死亡饥饿，这种主义只有灭亡，只有给我们打倒的。

反动派又说，中国只有实行德国主义，就是法西斯蒂——在中国的只有两种力量在斗争，一种是三民主义法西斯蒂，一种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不仅为理想于这政纲的实现，而且千百万人为实现这政纲而斗争。你们可以答复：“三民主义是一定要打倒的，只有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穷人，只有共产主义才适合于中国大众的要求。”

（三）中国只有走上苏维埃的道路。

现在中国的情形简单的说来：国民党卖国，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因此，使各帝国主义都起来争这中国，这就更引起各帝国主义来瓜分中国，英国走康藏，法国走云南，美国入长江，国际联盟利用其技术委员会。中国是一块肥肉，帝国主义就乌七八糟在抢，国民党做清道夫，就替帝国主义扫开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叫做殖民地化的道路。另一条路，就是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这就是苏维埃的道路。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正在争这一条路究竟往哪里去。中国的工人农民只有坚决往前打，来获得苏维埃的胜利。

同志们哪一个看过反帝抗日五大纲领的？这反帝抗日五大纲领就是我们为争取独立自由新中国的动员令。

现在中国最紧要的反“五次围剿”的战争，正在拼命的斗争过程中间，全国的工人农民群众都必须以此为自己的任务，彻底把“五次围剿”冲破粉碎，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由各个方面去动员自己的力量，用全身的气力去斗争，来获得胜利。

五 中国革命的一般形势

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我们当中的应有决心。

因为中国的革命发展是不平衡，在中心城市还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白色恐怖的势力还占住了很广大的区域，在这区域中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因为革命的发展不平衡，而很多产业中心还在反动统治下，工人虽起来斗争，但还没有能够起来形成苏维埃和红军，这困难就在这里。

反动势力靠什么来镇压革命呢？靠军队，当官是发财人，当兵是工人农民，国民党压迫了工人农民出身的士兵，为他们阶级利润去当炮灰，这在国民党是非常大的矛盾。第二，国民党卖国之下，群众反对他们卖国，农民破产，工人受压迫失业，国民党的基本矛盾，就是使他们的军队不稳固。国民党为挽救其统治，不得不采取很多改良的欺骗，例如邓锡侯的啥子三年不完粮，不杀苏维埃职员等假的口号，为的要把革命势力镇压下去，再好杀人收款，不要以为国民党法西斯化了，就不会用这些欺骗口号。这些欺骗口号，是最危险的。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揭破其假面具，把他们的群众争取过来，如国民党目前在提倡些工农兵商学大联盟等，他们都是阻碍革命往前发展的力量，我们必须看清楚。

国民党里面不可解决的第三点矛盾，就是各个军阀的防区制度，南京与广东闹意见，五中全会又闹意见，这无非是大家在力争做出卖中国的大走狗，整个中国就好象这样子。因此，大家要有坚决的决心给敌人拼命，需要在广大群众中努力，白色士兵中努力，为巩固自己队伍而努力，这使我们

革命的成功更快到来，可以使不平衡的革命发展平衡起来，使革命更快胜利。

所以，共产党的领导斗争，就要各方面去争取这胜利，胜利的条件摆得非常明显，敌人的矛盾不可解决的冲突等。这就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根本条件。

这样以广大苏区为基础就在一天天扩大出去，使广大受了影响的群众起来为共同目的而斗争，现在群众已根本不愿意在这样环境下生活下去。第二，敌人的统治已无法统治下去，只有我们百倍努力，我们就可以把“五次围剿”更迅速的打垮下去。我们现在有完全战胜敌人的条件，必须要在反“五次围剿”中战胜敌人，要使这胜利更快到来，就要全党的党员，各苏区更增加白色士兵的工作，群众中的工作，来把目前的形势转变为胜利的迅速到来。这是中国革命必然要走的道路，在一次胜利的基础上再争取第二次更大的胜利。这样，由坚决的扩大我们的力量 and 影响中，由这一区扩大到整个西北。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不仅是配合的作用，而且一天天占着决定胜负的地位。革命的胜利是由于自己坚决斗争的结果。反“五次围剿”中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胜利的条件，加上我们的努力，就有胜利的把握。现在的中国，就是殖民地和苏维埃的斗争，中国往哪一条道路发展，就全看我们今后的英勇奋斗！

六 川陕苏区的斗争前途

(一) 川陕苏区周围的群众斗争

川陕苏区的情况：刘湘有个刘神仙，垮了，刘湘没有法

子做下去了。他自己辞职了，他自己说：“官损五千，兵亡八万，二十年来练兵精华，尽丧一旦”了。他的一、二、三、四师都在绥定、宣汉的前线统统给我们打垮了。他的地方银行的票子不用了，把他打垮的结果，成都发生了非常大的风潮。发财人天天跑反，因为刘湘所有力量，破铜烂铁一百几十团的兵力，开到前线来都打垮下去了。邓锡侯只有三十团兵力，已打垮了十八团。田颂尧二三十团，十团比较好的给我们整整消灭六团。李、罗、杨也只有几团，统统给我们打垮下去了。这样，全四川反动统治发生很大恐慌，敌人虽然在收集其破铜烂铁的队伍，塞口子，在弄许多民团来补充其队伍。但是里面有许多开小差的，长官不得不把士兵关在屋子里。不但这样，士兵中又有许多死亡，没有哪团人不损失一大半，死的开小差的不知道多少。在绥定、宣汉不知道有多少夫子，夫子拉得光光的，一个人影没有，梁山没有人赶场，老百姓简直不用他的票子。在这样敌人的惨败下，敌人发现最大的动摇，于是收集民团，收集所有的破铜烂铁，所以大家看见火线上许多新兵在下操就是这样来的。梁山的造纸工人暴动起来，扯起红旗子来了。

两开有很大的游击队的活动。在马边一带群众的活动都是很重要的。象去年间南部、宣汉一带地方一样，是不是那里的群众不赞成我们？不是的。因为我们的共产党力量薄弱，机会主义，有些白区的组织没有领导四川群众的斗争，四川军阀大惨败之后，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共产党太右倾机会主义，不积极带头。这就是使我们要加紧白区工作。深入白区中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陕西也同样，前几天的反动报纸载：红二十六军把国民党

的县知事捉了，缴了很多枪。陇西成百骑兵哗变，汉中也有共产党的游击队，甘肃也有回人的暴动，闹得很厉害。

前几天十二师前面有四个白色兵士哗变过来，有两个在火线上就积极宣传。他们向刘湘的士兵们叫他们到我们这边来，这表现了反动四川军队的日益革命化。于我们更造成有利的形势。

(二) 冲破“川陕会剿”是我们工作的中心。

第一，现在四川的军阀正在企图补充其破铜烂铁的队伍，招致胡宗南、孙蔚如他们来参加作战，形成一个“川陕会剿”。敌人准备得很快，想进攻我们，我们就要准备好，来冲破这“川陕会剿”，来准备进攻敌人，先发制人，给他各个击破。这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第二，现在我们来估计川陕赤区的情况。我们工作上的困难在哪里？因为我们发展的迟一点的关系，就是因为地方工作还没有基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省委和党的组织，和最大限度的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在鄂豫皖，从来不曾把我们的兵力四面分散过，总是主力集中在一路打，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游击队。那里拥护红军非常热烈，那里的群众的积极性，是有组织的。去年收紧阵地以前，苍溪、阆南一带有几千人参加红军，这种革命的热情，从前很少见，鄂豫皖也不曾看见过，群众托起枪往前冲锋。新兵一上火线就坚决的冲，这种精神是非常好的。

若果去年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那我们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到现在我们对扩大红军数目还不很大，地方党还是薄弱。

四川的状态就是群众再过不去，反动统治里面矛盾也最

多，如刘神仙、刘湘等就更多，简直是狗子。他们什么也做得出来。这地方封建的色彩就更重，群众没有广大发动起来，这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以致形成这样的结果。

所以有些群众问我们：我不是不想来参加红军，但是要你们打过嘉陵江之后，我们再来。固然一方面是反革命在捣乱，阻碍群众参加红军，但是另一方面群众的确有这样一个心理。这就要全靠我们的政治部和党的工作了。

四川的情势，就是在群众的革命还未广泛爆发出来以前，就来了红四方面军，所以从前在这里的地方工作就带上浓厚的政治部色彩。因此，以后政治部在地方工作中也还要起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就尤其要巩固我们的布尔塞维克的力量，吸收广大群众积极的参加党，形成一个群众的，领导战斗的党。

第三，就是积极做白色士兵中的工作。

第四，就是反帝工作的问题，要我们成为广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使广大的群众与我们共同冲破“川陕会剿”。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这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就是首先获得西北的首先胜利！

(三) 迫切任务

我们所以能够消灭敌人，要几个条件：一、要人，要群众。二、要武器，要枪、机关枪、迫击炮，各种条件。三、要有这些东西，就要共产党的英勇领导，在进攻路线上去战胜敌人。

我们是不是没有枪？还有很多空枪在这里。机会主义者说，刘湘有啥子啥子，但是这里我们的破坏弹是刘湘一箱箱送来，运输大队多家伙。现在31军是想给胡宗南打，为的想

他的自动步枪。若果哪个说敌人的武器好，因而觉得恐怕打不过敌人，那我们就说他是机会主义，向他斗争。哪个敌人有好武器，我们就坚决把他的武器缴过来。

人的问题，摆在我们大会面前，第一，就是如何加紧红军里面的工作，提高队伍中的阶级自觉，使他知道战争是为解放整个阶级的斗争。提高我们部队中的阶级自觉，使他们更有坚决斗争的决心。那我们在自己部队中的工作，就使树立起队伍的威信，使每个战士都了解，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下红军中建立严肃的军纪，来保证队伍的战斗力，用这些方法去加强我们党的组织和领导，特别在战斗当中，共产党的领导，增加我们的领导，不然敌人出一个题目，我们就答复不到。要政治上团结得非常紧，这是第一。第二，因为红军有历史的关系，有多几年的斗争经验，有经验的共产党的组织，在这赤区中成了主要的领导力量，因为川陕党是后起的。第三，就是怎样经过政治部的动员，去动员广大的新兵参加红军，不仅在苏区内，还要在白区中做群众工作。第四，白兵中工作，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五，就是领导广大反帝运动（包括少数民族问题）。这就是红军中基本的问题。

（四）转变今后工作，使工作有组织有系统，是实现任务的先决条件

假使把自己内部的力量更能充实巩固，就是过去有绝微的开小差也可以消灭。不管新编队伍，一不做二不休的觉悟和决心，再加上军事上的学习，那内部的力量还可以大大发展，那一团人就可以增加一倍的力量。

动员大批群众参加红军，群众的工作，就是更广大的范

围了。反帝工作简直是一片荒土。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我们忽视了反帝工作。中央的指示中批评赤区内有**种机会主义**，就是认为赤区内根本不能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倾向当然是非常错误的。

白兵工作才在开始，还没有广大的开展起来。部队内工作还是不够，就是政治部本身领导不健全，政委还不曾把本身的任务担负起来。各团、各营的政委在战争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党的工作看轻了，甚至有轻视党政工作的倾向。

再则，是政治部没有经常的计划，没有经常的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宣传和组织部完全去干地方工作，党委会只会干队伍工作，而且地方工作也并不好。

战前、战时、战后的保障计划，是没有做到的。直属部队和杂务、经理、医务的工作人员在外面破坏政治影响的特别多，在采买、马夫、杂务人员中没有经常工作，这种例子特别多。

是不是过去没有成绩？不是，而且有很大的成绩。经过这几年来来的战斗中，我们把我们的基础确定了，脱离了游击主义，成为钢铁的红军，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打下了最坚强的基础，这是我们可以引为夸耀的。

但是这里面的缺点也就特别多。

固然在收紧阵地中，我们表示了极大的活跃，但是工作上还不够得很。

对于地方工作，我们政治部和党的组织不是不了解党的路线，已经有了这基本的观点。但是最大的毛病就是不会面向群众，不会发动群众的斗争。以致工作上只变了科长主任

的分土地。特别表现在不会组织工会、贫农团，发动群众的斗争。不是说我们要减轻我们的领导，而是要恰恰相反的百倍加强我们的领导。在党政工作中要反对几点倾向：一、取消观点，以为有军事工作就够了，不了解政治工作的伟大力量，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基本手段。二、就是在一般政治工作人员中间，把政治工作只认做地方工作，放弃或轻视了队伍中的工作，不懂得政治工作的范围。不会把军事和政治工作联系起来，好象学习射击瞄准时，用党的力量去格外提倡他们的军事学习。这倾向是不懂得联系军事和政治方面，以为只要有主义和好的认识，就可以战胜敌人。我们必须了解，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近代的军事知识结合起来，才可以战胜敌人。这种不懂得联系军事和政治工作，这倾向最易发展于政治工作人员方面。虽然支部在战争中表示了大的活跃，但是这还非常不够，还要加紧。我们不能轻视军事和政治工作的结合，就是要我们的党的领导，不管在政治或军事方面，都要做群众的模范。三、反对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许多连中不会在每次作战中，吸收最英勇最积极的战士入党，不会好好发展党的组织。现在的工作是或者机械式的工作，不会把工作深入下去，不会把工作通俗化，不会活泼的领导，只知道一个文件到下面去念念，不懂得如何去发展战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就是只讲实际工作，忽视学习等等。

在收紧阵地中有两种倾向：（一）以为收紧阵地中，不能巩固阵地了，于是在政治工作中也发生了些右倾机会主义。（二）就是以为敌人会自然打垮下去，不知道在这期间更应百倍的工作。大部分的政治工作在这期间没有起到应有

的作用。

还有红军中的纪律问题，不是放松，就是执行的机械。纪律与教育的关系，执行清洗与肃反方面还未弄清楚。这也是在这大会中要解决的。我们大会要解决这些任务就首先要把自己的路线看清楚。

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把自己的队伍更巩固、更增强，来更加动员更多群众参加这战争。集中力量，打敌人的一面，再来击破其他方面，就是要广大动员各方面，以坚强领导去战胜当前敌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路线，也就是中央给予我们的反“五次围剿”的路线。

在执行路线的时候，就要打击一切右倾机会主义，打击一切不坚决进行进攻路线的分子。要保证进攻路线的执行，就必须反对一切失掉与敌人斗争的自信，这发展于夸大敌人的力量，畏惧阶级斗争，怕激烈反对富农，在队伍中怕清洗地主暗探出去等。再者，则是夸大我们现在存在的困难，又说这里怎样，那里怎样，没有坚决克服困难的精神。当然，忽视党政工作等，也会发生一样的结果。

另一方面，就要反对一种宿命论，以为敌人已经打垮下去，你们算什么东西？以为胜利自然是归于我们，现在可以睡觉，等上级下命令再打，这是放弃了目前艰苦的准备工作。这是“左”倾空谈。

在消灭敌人来执行基本路线中，我们必须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和空谈自满的“左”倾机会主义。必须准备增加自己的力量，在政治方面更有准备，人员方面更有补充，一刻不迟缓来进行进攻的路线。

我们有把握战胜敌人，有把握把敌人完全打垮下去，我

们这样，可以把胜利走上更迅速的道路。战争是千变万化的，军事上原则告诉我们，战争到最后一秒钟，还不能保证战争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我们要一方面把战胜敌人的保障巩固起来，这是我们整个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唯一道路。

这一次大会，所有解答的问题，就是澄清了不但是中国国际间的革命任务，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这是使掀动世界革命，特别是东方殖民地革命起来的任务。这是我们冲破国民党“五次围剿”，也就是我们赤化全中国有决定胜负的关系。在川陕赤区已把敌人打垮下去，我们担负了这任务，来彻底粉碎全国“五次围剿”，不仅是配合的地位，而且是爆发西北整个地方的革命根据地。

我们工作做得好，革命就更有条件，现在我们有肖克同志会合了贺龙同志夹击刘湘，我们更有了无上顺利的形势。因此在全国的工农红军任务之下，红四方面军的大会的任务，就是采取进攻路线进攻敌人。这会议就要解答以下几个：

1. 红军中工作。
2. 地方工作。
3. 白兵工作。
4. 反帝工作。

这大会要在连中广泛执行起来，在这次大会特别着重，所以这次大会能解答这些任务。有经常的战斗间的领导，发展党的组织，发展阶级的自觉，严肃军纪等等。

这些任务的执行，就是保障我们的胜利。党的正确领导，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近代新式军事知识结合起来，

以坚韧不拔的决心，克服一切的决心，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冲破“川陕会剿”，不但可以把胡宗南这些走狗的自动步枪缴来，就是把“五次围剿”彻底击破，来为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大鼓掌，全场起立，高唱国际歌）

1934年11月2日

（选自《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

长征路上和叛逃以后

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

给各军的指示

我军已胜利的占领了道、泸、甘等地县广大地区，为要继续这一胜利来完成消灭蒋介石卖国军李抱冰的战斗任务，须以突击精神于四、五两个月内来进行下述的各项工作，兹决定四、五两月，为战斗准备时期。

第一、准备战斗

一、为要坚决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各级干部必须细心的耐烦的有系统的研究西康以及整个西北的地形道路、社会情况、并将所得的材料报告我们。

二、研究西北地区的敌情——回兵、藏兵、骑兵、番兵情形及其战术。

三、审计自己力量，对人员的切实考察，不适于现在工作的、应审慎调动，检查武器、弹药及设计补充的方法，对一切军用品的补充、修理、节省与分配。

四、各兵团以上的首长及其指挥机关，对当前敌人，根据任务和自己力量，定出局部的以及整个的战斗计划。

第二，训练计划

一、过去管理教育的主要缺点：

1. 干部不深切了解和考察连队状况，干部与群众关系

不密切，很多部分连长指导员不知道排长班长的姓名，个别干部不知道本部人员、武器、弹药的数目。

2. 组织观念薄弱，不按组织系统，不按编制。

3. 干部个人观念还很浓厚，自私自利，缺乏无产阶级的观念。

4. 执行命令过于呆板，缺乏机动性。当然这种机动并不是违背上级意图，而是为了正确执行上级的命令。

5. 军事教育虽然进行了，但还是表面的浮浅的，各种教育有些还停止在干部中，没有传达深入到每个战斗员特别是事务人员中间去。战士的基本动作还不熟练，基本常识还不了解，如卫兵发现敌人不知报告，一年多的战士还不认识表尺缺口。

二、为要纠正上述缺点，在准备战斗期中必须：

1. 切实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中每一问题甚至很小的问题，本部队人员，武器、弹药增减数目必须时刻记着，不得丝毫疏忽或隐瞒不报。

2. 凡来往人员必须有正式机关部队的介绍信，否则绝对不应收留。

3. 严格按照编制执行，各级参谋处经常到部队检查，各首长必须以身作则。

4. 建立日常报告及汇报制度。

三、准备战斗时期部队训练的中心：

1. 消灭蒋贼主力战术的研究与训练，应着重打堡垒与夜间动作，训练材料可参看南下时半个月整理计划中所示。连以上干部可讨论过去发的战术讨论提纲，再次的责成四军三十军司令部应将过去打薛岳的经验悉心研究，并将结果报

告本部，以使用之教育全军。

2. 演习打番反和游击战术，根据当地番反情形、战术上的特点、与过去打反动派的经验和“游击队怎样动作”配合起来。总部拟有打番反应注意之点，正在印刷中，随后发给。

3. 每天辅助教育，应抓紧瞄准、射击、投手榴弹，练习七式瞄准和急射击动作，要求每个战士能于瞬间完成火力准备，且能命中精确。参看过去射击周工作计划，此后早操禁止打子。

4. 侦察部哨卫兵动作都要个个学会，并能确实达到受领的任务，材料即参看野勤及卫兵勤务（正在印刷中）。

5. 依照对骑兵战斗的指示和教育计划表，继续练习打骑兵。

6. 工兵训练须依照工兵训练计划执行之（材料随后即发），步兵部队也须学习士工作业与筑城训练，此后爱惜工作器具要和爱惜自己的武器同样重要。

7. 事务人员教育：

（1）进行本身工作的教育。如饲养员如何养马（参看“养马须知”），炊事员如何煮饭，怎样吃面饭肉食及粮食的节省等。

（2）训练基本的军事常识，如瞄准射击，武器的保管与使用，判定方位、夜间动作、打骑兵等。

（3）加紧事务人员的政治教育，每个政治文件必须传达到事务人员中去，尤其着重在对番民政策和政治纪律方面。

（4）每隔三天或五天负责干部应召集事务人员训话一次。

8. 干部教育，在不妨碍战斗的条件下，军、师团部均可成立轮流训练班。

第三、组织创造红色骑兵

一、为着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迎接新的民族高潮，在极有利于骑兵发展的条件底下，这个新的武装力量——红色骑兵必须迅速的组织起来，各军须努力征集乘马，兹决定数目如下表。

部 队	4 军	5 军	9 军	30军	31军	32军	总直 属队	大金 县委	合 计
应征马匹数目	四百	二百	二百	六百	二百	一百	一百	增助 二百	二千

这一数目须于两个月以内完成，各部队须在指战员和党政工作中广大动员，加紧突击，定出计划，为编短期限与超过定额而斗争，除每军各需留一百匹成立骑兵连外，统应分批交总部。

二、骑兵训练计划：第一个月着重养马、乘马的基本训练，第二个月进行马上劈刺、跳障碍及骑兵战术的训练（参看“养马须知”与骑兵训练计划）。

上述各项教育以比赛方式来完成之。成绩如何，望给我们作有系统的报告和响亮的回答。

第四、巩固自己的有生力量与扩大红军工作

一、从政治上提高战斗情绪，并实际改善部队生活，设法解决物质的困难，避免一切的减员现象。

二、尽量争取非战斗部队中事务人员体强力壮的充任战斗员，加强部队战斗力。凡老弱残疾的和妇女同志，可尽量

使之充任事务员，炊事员和公务人员中提出“到前方参战去”的口号来号召他们。

三、某些部队认为这些地区人少或认为番民不能当红军而放弃取消扩红工作，这是极端错误的。最近三十军已经在道、泸、甘一带扩大了二百名以上的红军，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了。

目前扩大红军工作仍是政治工作中的第一位，兹决定各军于两个月内应扩大数目如下表：

部 队	4 军	5 军	9 军	30 军	31 军	32 军	总直	合 计
应 扩 大 红 军 的 数 目	五 百 名	三 百 名	三 百 名	五 百 名 (已 扩 大 者 除 外)	三 百 名	二 百 五 十 名	二 百 五 十 名	二 千 四 百 名

第五、供给计划

一、准备战斗时期物质补充应完成：

1. 每人要有一顶皮帽、一件毛衣或皮衣、一件裤子、一双手套，两双袜子、两双皮鞋或布草鞋、一双裹腿。

2. 每五个人补充毛毯一床（即补充全数百分之二十），每三人补充雨具一个（即全数百分之三十），每三十人补充帐篷一个（因为在此地作战，山上无房子又无树木搭棚子，所以必须带帐篷——在部队中应解释），干粮袋每人一个，子弹带每两个战斗员要补充一条。

3. 补充办法，首先完成衣裤、袜子和手套。

二、责成总供给部制造、收集骑兵用具一千套（乘马全套用具：鞍子、蹬子、缰绳、笼头、嚼口、皮条等件），责

成各军每军准备骑兵用具二百套。

三、筹集资材。除上述一、二项自行解决外，并应更多的征集制造衣帽、袜子、手套、雨具、干粮袋、子弹带、帐篷等军用品。筹缴总部数目如下：

三十军征集制造一万个人用的东西；

四军征集制造五千个人用的东西；

五军、三十二军各征集制造一千个人用的东西；

九军征集制造二千个人用的东西；

总直属队征集制造五千个人用的东西；

上述物品分四月底与五月底两期缴完。

四、被服制造：

1. 各军可成立短期训练班，由公务员、饲养员、运输员中抽调伶俐的青年，轮流训练织毛衣，要求每个人都学会。

2. 用皮子做帽子、鞋子、裹腿等物，用羊毛织毯子。

3. 这些方法总直属队已在进行，而且得到很好的成绩，而且还正在研究改善。这一成绩的获得，主要是高级首长注意并督促指导进行，各军应学习这一经验。

现在地区羊毛堆积如山，可以收集十万斤以上，只要会织，则被服问题即可解决。

五、给养问题：

1. 成立牵牛队（每团组织一个班，十个人），各军、师供给部均各组织一个排（三十个人），抽调青年小同志（不能托枪的）任牵牛队员。各直属机关保证每一百人有五条现成的牛（行军驮东西，粮食十分缺乏时才可以宰杀）。

2. 丹、崇、绥方面，粮食应尽量节省，统一筹划与分

配。无论如何要保证后方医院的粮食，一般的要能保障到七月底新粮食收获时为止。道孚、泸霍、甘孜方面，除保障此方部队有四个月的外，还应供应给一批牛、羊给丹、崇、绥。

六、武器制造：

1. 总供给部应制造：

工作器具（铁锹、洋镐）	一千件
矛子	一千支
刮刀	二百把
弯刀（砍柴的刀）	三百把
斧头	一百把
锯子	一百条

2. 各军应制造：

工作器具	二百至三百件
矛子	二百支（骑兵及带短枪的人每人给一支）
刮刀、弯刀、斧头、锯子	尽量制造。

3. 收集土枪、土药、检查火链石有无。

七、资材节省：

1. 节省通信器材，集中电油给无线电台；

2. 节省纸张、铅笔给电台使用，部队办公可用破书本子和自配墨水写字；

3. 节省经济，与贪污浪费者作无情斗争；

4. 节省灯油。

第六、卫生计划

一、这一时期卫生工作的中心，应普遍进行卫生教育。

各团卫生队派医务人员到连队上卫生课，每月至少六次。防止四种疾病（肿腿、肠胃病、流行性感冒和眼疾）来保障部队的健康。

二、节省卫生材料，利用现地中药（虫草、贝母之类）泡制西药。

三、两个月内最小限度减少疾病数目应该：

1. 现在的重病员两个月后要有百分之五十（一半）变成轻的；

2. 现在轻病员两个月后全部出院；

3. 死亡率应减到百分之四（两个月入院的总数计算）。

四、立即建立卫生员，并检查各连队卫生员的工作；

五、加强连队特别是事务人员的卫生教育（卫生常识，疾病预防法等）。

第七、政治保证计划

战斗准备时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1）深入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宣传；（2）保证各项战斗准备计划的全部实现；（3）普遍对少数民族政策的教育。为此必须：

1. 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立刻分别召集下列会议：（1）团级以上军政干部会；（2）连、营军政干部会；（3）支部大会；（4）战士大会，青年晚会；

（5）供给、卫生的专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级军政首长要根据党中央及总政最近文件，说明目前有利的政治形势及我主力红军以消灭李抱冰，配合二、六军团开展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战斗任务，要把计划中的每一具体要求和数目字严重地提到每个党团员及指战员的面前，发动他

们的竞赛热情，为先期完成和超过预订计划而斗争。同时要在各种会议中详细讨论实际的办法（如供给，卫生会议要特别讨论搜集资材、制造方法及研究以中药代西药与预防疾病等）。

2. 有计划的进行学习与培养干部：

（1）各级政治部（处）应即按照总政指示，组织各级的军政学习小组。目前研究材料以少数民族工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骑兵战术、南下战役的经验，以及西北和西康政治经济情况等问题为主。

（2）目前可抽出学习的干部应即送红大学习。

（3）军师政治部接到重要文件时，如“干部必读”重要论文、总政已印发的“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中的原理”及尚待印发的“战时政治工作基本原则”、“红军中党的工作”、“共产国际纲领”等等小册子，得按情况召集干部流动训练班，专门讨论一个或两个重要问题。

（4）在战士中则应用本部所编的“战士读本”进行经常的政治课。

3. 有计划地进行工作：

军政治部应根据上级指示及自己部队所处情况，订出每半月或一个月的计划，提出工作中心及实施与检查方法。师、团政治部、处应根据这一计划，订实施日程及按期检查报告。单独行动的师、团政治机关，应另有计划。以后师、团政治机关的书面报告应写两份，一份送其直属军、师政治部，一份则直送总政治部以便存查。

4. 提高党团员、干部及战士的阶级警惕性，与一切太平观念、过路观念、疲劳松懈与疏忽的现象作斗争。加紧对

警卫员和警戒部队的教育，严防番民的袭击，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捣乱。各级政治首长应经常注意在各种会议中说明保卫局的任务和意义，动员支部介绍连队中最忠实最积极的党团员为保卫局工作网网员，加紧在部队及地方上的肃反工作。

5. 在进占泸霍、甘孜及前线各部队，应加紧对少数民族的宣传，注意对番民武装及一般社会情况的调查，派遣代表向外活动，多印藏语宣传品；对番民在其交械投降后，一律予以优待；总政对少数民族工作的各种指示及西北联邦政府关于地方政权的组织与工作决定，均应保证完全执行。先头部队得有各种教材及良好食品，应注意转送后方医院。

6. 各军特别在行军应注意部队分散时的政治工作，克服在粮食困难中违反纪律的行为，及可能发生的失望情绪。在五军应根据总政训令大大进行艰苦奋斗的政治动员与教育工作，如曾提出：打到甘孜去吃“大米”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在进迫康定及雅江的部队，应特别注意对瓦解李抱冰部队的政治工作，尽量输送对敌军的各种宣传品。

附动员口号：

1. 加紧准备，准备愈充分，胜利愈有把握。
2. 努力学习，多学习一分，就多一分战斗力。
3. 组织红色骑兵消灭白色骑兵。
4. 保持有生力量，没有一个掉队落伍的，没有一个生病开小差的。
5. 争取番民当红军，成立番人革命军。
6. 加强供给、卫生的领导，完成供给计划，实行卫生突击。

以上各项，务于准备战斗期间四、五月分别两个月内全

部完成。各部接此指示后，立即召集干部会逐次传达讨论执行的具体方案，并将执行情形限四月底到五月底各作一次总结报告本部。

同志们，一切胜利的条件具备了，需要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来争取，希望我们的同志要克服一切困难，集中一切力量，为完成和超过这一指示而斗争，胜利终于是我们的。

主席 张国焘

1936年4月1日

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 策略路线的报告^①

我们正处在民族革命的新高潮中间，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中央政治局已有一个决议。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关于目前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好比在某一个时期打仗的时候，为要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必须要采取某种战略先打敌人的主要方面，使其一部中立，使另一部分消极，甚至利用其中一部分和我们暂时联合。军事上是这样，政治上也是如此——当然政治上是要复杂得多。

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底下，党要根据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客观的条件，阶级力量的对比情况等来定出适合于目前革命形势的新的策略路线。我们这一策略路线的改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深刻的讨论。我今天的报告就是要向大家解释这一新策略路线的内容。

^①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张国焘在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

一、目前政治形势

(甲) 中国方面

目前中国的情况，最主要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东北四省，现在正在吞并华北，首先就组织殷汝耕的所谓“自治政府”，不管他们的名称如何，但实际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第二个“满洲国”。现在所谓“满洲国”的李守信部队拼命向绥东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动作，不仅是占领华北五省还要吞并中国全部。

因为南京卖国政府蒋介石拼命出卖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许多秘密条约，第一步成立“冀察委员会”在“防共自治”的名义下包括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有它自己的保安队、保安师，著名汉奸石友三当北平保安司令，殷汝耕当天津保安司令，并且以日本关东军特务部部长土肥原为“冀察委员会”的高等顾问，这证明冀察委员会的实际政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土肥原手中。

蒋介石实际上是要完全将全中国卖尽，现在李守信正由绥东方面勾结内蒙王公德王向山西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是否只建立了冀察委员会就满足了呢？刚刚相反，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台湾建立飞机场，准备由福建进攻，在山东方面，青岛也要实行所谓“自治”，日兵正向济南移动，最明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海军会议的行动，海军会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退出已经破裂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退出海军会议呢？这是日本要单独进行他的远东政策侵略中国，另一方面

他为了要缓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反对，还表示相当不侵犯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日本的外交部长广田当退出海军会议之后，发表其对华外交方针，在于使满洲国强化，使中日关系成为日满关系一样，广田并且发表了实现这一政策的三大原则。

（一）要以全中国民众为对象，排除一切对日不友好的态度及行为，这就是说不准中国群众反日排日，要与日本亲善，要一切都服从日本的主张，要中国完全亡给日本，如果不卖尽中国那就不是友好。

（二）要将中国变成满洲国第三，首先要中国承认满洲国，和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

（三）广田说：中国共产主义是最大的威胁，要中日提携共同“剿赤”，这不仅是要进攻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而且连义勇军抵制日货及一切抗日运动都视为共产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内容，就是进攻苏联，进攻外蒙人民共和国，并首先将中国完全拿在手里。

这样摆在中国当前的极大威胁，就是完全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引起全国民族革命的新高潮，到处的群众都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北平、上海、武汉、天津、广州、汕头的学生，连续不断的举行抗日示威，并且冲破了国民党的禁令，发展到与卖国贼军警的武装冲突，广州、北平的学生甚至到农民中去了，上海工队英勇的进行了流血的战斗。

这样一种情况，把落伍的群众都卷入了革命漩涡，造成了一种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划分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的侵略中国，正是蒋介石与日本里应外合相勾结的结果。广田之三大原则南京政府已经完全同意，当着南京政府为要掩盖其卖国面具在报纸上发表说广田的三大原则尚未正式承认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即刻就来了一个声明：指出日本代表与南京外交部部长面谈时，蒋介石的代表完全默认，并且蒋介石亲自答复同意。显然的，南京政府正在完全的出卖全中国，而蒋介石已亲自出马，来直接担任卖国的责任。

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临到了全中国民众的头上，群众的抗议、罢工、罢课、示威，正在风起云涌的发展，甚至于反动国民党军队新编第一军的参谋长，在孙中山坟前自杀，并且留下一封信说“中国只有抗日之学生工人，无抗日之将军，可耻孰甚。”

这证明民族革命的高涨，工人农民甚至自大革命后比较消沉之一部也勇敢的起来了。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也卷入这一高潮中来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富农和小地主，一部分的军阀，也在动摇起来。

在这新的革命高潮中，使这一部分动摇的中间势力中立起来是对于革命有利的。过去蒋介石在“抗日必先剿赤”“攘外必先安内”的欺骗口号下，组织一个“反赤的联合战线”拼命进行所谓“五次围剿”。过去在蒋介石出卖“一·二八”及长城各口的抗日战争的时候，说是共产党捣乱后方，并发出“盲抗日者新”的命令，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需要的。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到中国的腹地来了。而蒋介石还用“剿赤”名义拼命进攻中国革命，但是蒋介石这一欺骗作用已经非常困难，连小资产阶级学生也自动提出组织抗

日救国政府，证明蒋介石的欺骗是缩小了。

在这样情况中，苏维埃的运动不仅没有低落，而且苏维埃运动在许多地区得到了新的开展，我们南下之后的伟大胜利：一三军与廿五、廿六、廿七军会合后在陕北原来的游击区也成为苏区了，二六军也在广大的运动战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采取了新的活动办法，在过去当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一方面军离开中央区之后都是一直向西打，但二六军却在原有赤区附近开展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打垮了敌人好几个师，并且他们两个多月的运动战里面，不仅没有如一方面军的减员，而且扩大了几千人，在各个原有赤区中小的游击战争到处发展着，这证明苏维埃运动并未低落，而且有新的发展。

我们应该如何来估计这一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形势呢？当然不能如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认为是低落的；但是我们是否一下子就可以打到成都去，立即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我们必须首先认定，这还是要经过相当时期的艰苦战争去实现的。

中国民族革命是正在新的巨潮中，中国苏维埃运动是向前发展着。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结合这两个高潮，即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更好的结合起来，使国内的阶级战争与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

(乙) 国际方面

中国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拼命侵略中国，蒋介石拼命出卖中国。国际方面主要的是各帝国主义拼命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各帝国主义间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殖民地反对帝国

主义侵略的战争同时紧张起来。

法西斯蒂拼命活动，德国法西斯蒂首领希特勒想由巴尔干方面进攻南俄，希特勒公开的说：他的任务是在于消灭第三国际。

日本帝国主义从东方向苏联尽其一切挑衅的能事，从东西两方向苏联进攻的危险不是空话，日德反苏联的军事协定，说明进攻苏联的布置更具体化了。特别在东方日本进攻苏联的战争随时可以爆发。

意亚战争是更打得激烈了。意大利用了最大的力量进攻亚比西尼亚，意大利宣称在十八个月之内可以完全征服亚比西尼亚，但是已经打了四个月了，意大利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亚国境内就要到雨季时候了，意大利的进攻将更加困难；亚比西尼亚是一个较小的国家，用了一切力量同意军打，亚国采用伪装、奇袭、埋伏等战术，而且应用大规模的夜战，这些战术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应用的，在最近一次剧战，虽然还没有详确的消息，但是西欧各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宣布意军又失败了。

现在英国大批运送军队赴埃及，英法公开的妥协来对付意大利，这样更说明意亚的战争，随时有转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这些一切证明世界帝国主义的冲突，已经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帝国主义大战的前哨战已经开始了，很快就会大厮杀起来。

另一方面为什么帝国主义要拼命进攻苏联？这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功，很多苏联的工业部门已经赶上帝国主义，有些部门已占世界第一位。苏联的国防力量大大加

强，和平政策也得到了很大的胜利，英国和法国从前是反苏联的大本营，现在不得不向苏联讲和，苏联的地位是大大加强了。

苏联的势力增加，对全世界工人农民有极大的影响。现在共产国际在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蒂，反帝国主义大战中得到了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的拥护，社会民主党一天天削弱下去，因为他们是战争危险的拥护者，是资本主义的仆人，法西斯蒂的帮凶，已经半文不值。

各国共产党力量一天天增加，英法共产党威信的提高，德国共产党的坚强，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些一切，说明全世界正处在战争与革命新时期的前夜。

这样的国际形势当然对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苏联地位的增强，各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将会帮助中国革命来瓦解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压力。

日本的侵略华北，苏维埃运动的继续发展，民族革命的高潮，有利的国际形势，这些就是我们顺利的运用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

二、目前党的策略路线

现在要说的是关于目前的策略路线。

“在这种形势之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团结和组织全国民众，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

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

目前中国革命和反革命最主要的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蒋介石的统治在一边，中国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们在另一边。但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必然会表现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党应领导着群众，坚决的同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即是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同时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才可以因此树立加强和巩固起来。

党更应以坚决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卖国贼的策略路线，和实际行动，来争取共产党在抗日反蒋运动中的领导权。在反日战线中广大群众的基本利益的要求应当得到满足的解答，牺牲群众利益的倾向，不但不能加强反日战线的势力，反会使之削弱下去。

这个策略比之于过去的策略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可以看见，在过去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起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区命。苏维埃政权是广大雇工贫农和中农的结合，在乡村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地主，同时在乡村中提出反对富农。

在城市中间，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联合贫民。

现在有什么改变呢？

现在我们说：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我们应当联合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不管那一阶级，那一派别，那一武装队伍，都联合起来，结成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的统

一战线。

分别在那里？

第一、我们应当按照目前具体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策略，因此我们就必须把敌人阵营中的分野清楚的划分出来：那些是主要的，那些是目前次要的，那些是可以中立的等等，如果我们不懂得分别当前的敌人来运用策略，就是对革命一窍不通。列宁曾经教训我们：在左派幼稚病这书中指出，绝对不妥协是不对的。并且告诉我们，如果策略是有利于阶级利益的话，妥协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要正确的运用策略路线，我们就要首先了解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

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大任务就是扫清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目前完成了没有？当然是没有。所以革命的内容当然是不会变更。

中国现在的民权革命与俄国沙皇时代的革命是不同的。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我们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现在革命的动力变更不会？这是不会变更的，革命的动力仍是工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了解目前中国的阶级分野。

中国有那些阶级？

第一、是地主。地主是土地革命的主要敌人，也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反动统治在农村中的主要基础。

第二、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城市中大商店和大部分银行，帝国主义企业中的买办，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二把手，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根本上是反革命的。另一个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中国轻工业（纱厂丝厂烟草工业等等）的资本家老板，这一集团是和帝

国主义有矛盾的。因为他们受到帝国主义的收买原料，推销商品，各方面的排挤与压迫，特别是大部分轻工业，在最近几年来的倒坍，最少也在倒坍过程的情况下，使得他们和帝国主义冲突。他们是不是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呢？他们是在相当限度以内可以来一下反帝国主义，但是结果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低工作时间，改良待遇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军警来镇压工人，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与乡村封建剥削和高利贷资本有关系，所以反对土地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虽与帝国主义有矛盾，但和无产阶级和农民处在根本对立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中他们是动摇的、畏缩的，妥协的，在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就随时准备投降。

当然，亡国是要反对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喊一些反对亡国的高调，来欺骗群众，为的是利用群众的压力来争取帝国主义的某些让步。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种倾向，我们名之曰民族改良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在不受到阶级的威胁的时候，甚至可以利用全民的口号来参加民族革命，甚至可以影响到小资产阶级农民并且连一部分工人也可以影响到。他们有可能参加初期的民族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发展，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必然向动摇而妥协，而最后的叛变革命。

第三、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分成几个阶层，在城市里面的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包含有手工业的老板，小商业（除掉一部分日货代售人）和小工厂的老板，他们是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而破产没落，帝国主义的商品压塌他们的小的经营，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切身的与中国的封建关系有密切的联系，特

别和高利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仇视工人斗争，因此，他们也可以在民族革命初期中，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土地革命的发展就动摇他们，由安阳□□□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跑，他们是反对土地革命和工人斗争的。

另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阶层——学生和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专门家，小学教员等），他们的特性是在民族革命中表现非常积极，甚至于当工农还未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振臂呐喊，痛哭流涕的奔走呼号。可是这一阶层的家庭背景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和小资产阶级，一当土地革命发展深入，他们就会说“工农扰乱他的后方”，因此而动摇幻灭，给工农的铁拳吓坏，最后至于垂头丧气的离开革命。

第三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中的下层分子，城市贫民。包含：小贩做小生意的，失业手工业者与给帝国主义压坍了的小老板，他们和无产阶级是最接近的，城市中这一阶层是我们争取的主要群众。

第四、就是农民。农民整个的不是一个阶级。其中的雇工是乡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乡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中农——乡村中小资产阶级。以至于富农——是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者。雇工贫农是土地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农在土地革命中得到取消苛捐杂税以及推翻封建残余的实际利益。富农在土地革命中得不到利益，而只有部分的对反捐税感觉兴趣，一部分富农与小地主，可以来参加一下反捐税反军阀的斗争，在民族革命中甚且可以表现守中立并部分的来干一下子。但是土地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会立刻动摇起来反对土地革命。由此他们也不会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

第五、无产阶级。如大家所知是在民族革命中最坚决的

最彻底的反帝领导力量，他们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

根据上面中国阶级的分析，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雇工、贫农和中农以及城市贫民。

反革命的阶级是地主，最大部分资产阶级。蒋介石的基础，也就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联盟上。

除了革命与反革命以外，还有所谓中间势力，这包含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等等。

最近资产阶级对民族革命的态度怎样呢？上海的资产阶级最近开了一个会议，他们讨论应如何去保护自己在帝国主义租界内的财产，他们觉得财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但又不敢分散他到各地，因此只有准备随时投降帝国主义企图由帝国主义手中分得一些剥削中国工农的残余，就心满意足了。这充分表示民族资产阶级在目前民族革命高潮中的动摇犹豫。

我们必须看清楚以上中国阶级的分野及表现。我们应该采取各种策略，但是否可能与民族革命中的中间势力采取统一战线？是可以的。为的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如果把目前的中间派当做反革命看待那是不聪明的，不妥当的。

具体的应用统一战线应如何？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对各个阶级，应采取什么策略呢？这就是现在应谈到的问题。

共产国际在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上指出两种错误的可能。

“第一就是不了解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与民族革命的倾向，这两者的分别，于是发生对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的政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与组织上的分别，十

分的不正确，不明了主要的革命口号（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口号）等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所犯的根本上错误的”。

“第二过低的估计这一倾向的特殊意义。要晓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因为它在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一部分劳工阶级的队伍中有群众势力，是与封建帝国主义的营垒不同的。这一过低估量能引起，至少在革命运动的初期，一种宗派政策以及使共产党脱离劳苦群众”。

这就是说，若果不了解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反蒋当中的很不坚决的、动摇的暂实的实质和在革命中随时随地准备叛变的特点，我们就会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若果不懂得运用中间派的势力去抗日反蒋，结果就会脱离群众，被蒋介石利用这中间派的势力去形成反赤的统一战线。

为什么我们党在白区中的组织力量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薄弱？这就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估计不足，没有在白区中间积极的组织与大胆的发展民族革命的群众的统一战线。

我们运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在于争取下层广大群众。我们可以不可以有这种观点认为民族统一战线是不需要的，只要我们工人农民就够了，还要发财人和小资产阶级作什么？我们应当明白，我们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们为要打倒这个力量，斗争是艰苦的，必须采用各种纵横捭阖的办法，利用帝国主义中的每一个矛盾，反动统治中的每一矛盾。不管这是如何暂时的，如何动摇妥协的，只要在某一个时候，能起相当的作用，就要毫不放松的利用他，这是有利于革命的。

在另一方面，能否以为和敌人玩把戏，恐怕上当，就不

敢大胆的干，不应当这样，只要我们自己有力量，我们就可以放胆做去。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论绝不妥协一段是怎样说呢？

列宁首先引用恩格斯指斥勃兰基主义者的绝不妥协论所说的话：“这是何等幼稚的孩气，把自己的暴躁，当成理论的论据”。

列宁在严格指斥叛贼式的妥协和机会主义的妥协复接着说：

“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之斗争，比较各国间最剧烈的普通的斗争，还要繁杂、延长、复杂到百倍，要进行这种政策，而事先拒绝纵横捭阖的手腕，拒绝敌人间利害冲突之利用（即令是一时的拒绝）与可能的（即令是一时的，不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联盟者之妥协这岂不可笑到了极点吗？”

列宁又说：“要想战胜更有力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并且必须最谨慎周到，细心敏捷的，一面利用敌人间每个（即令是最小的）间隙，利用各国资产阶级间各国内部各种资产阶级间的每个利益的冲突，他方面利用每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机会，以获得群众的联盟者，尽管这个联盟者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都不要紧”。

“在比较长久的时期中，在比较复杂的政情中，谁要是不曾在实际上证明他会应用这个真理，那么，他就可以说还未学会怎样在斗争中帮助革命阶级，以求把全体劳动人民从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

“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在能利用这种动摇而绝不当加以忽略，既欲利用，便当对于那些在倾向于无产阶级的一部

分人表示让步，同时却要与那些倾向于资产阶级一部分人斗争”。

列宁的指示，证明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需要的。

我们现在对于富农的策略，是中立富农，不没收他自己耕种的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也不征发富农，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若果我们同志反对这一点，我们就应当想想：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土地又何在？我们为要推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起见，就需要采取对富农的这样策略，这是为的争取民族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保证我们的土地。这一让步是对于我们夺取中间势力有更大的意义的。如果我们不会运用这一策略，我们就不能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并且我们还应当知道，我们倘若不会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各个击破敌人，使用各种的武器来打击敌人，我们就只会是不出门的闺女，见了生客就娇红满面，羞人答答，就不足与谈无产阶级的领导策略。共产党也不是讲清高的，我们要用一切的手段来战胜敌人，这样才能够巩固领导权，争取民族革命的胜利。中国现在的革命动力是没有改变的，革命的性质当然是不会改变的。为要坚决的战胜敌人，我们就必须改变策略，第一策略的改变是万分需要的。在目前的阶段上，是完全正确的。呆板，孤立，清高，绝不妥协，绝不让步，都是不对！

我们现在提出民族革命高潮中策略的改变，是否能误会成为放弃阶级斗争的武器，放弃阶级斗争的发动？绝不是的。

根据我们几年来阶级斗争的经验，事实上证明中国民族革命与阶级斗争没有冲突，民族革命与阶级战争并不是

对立的。现在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结合民族革命和阶级战争。要达到这一点，才必须采用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统一战线中间，是不是有内部的矛盾？当然是存在的。我们党就应该坚决的领导基本的工农群众，为他们基本要求斗争，坚决的反对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动摇，妥协，投降叛变的倾向，必须随时随地提防自己的“友军”，好好组织我们力量，教育自己的阶级，准备我们的队伍，大胆的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略，这样我们的胜利是有保障的。

三、如何具体运用策略

为什么我们过去不采取这策略，而现在才采取这策略？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形势变动。

过去中国党在大革命中间，是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当时正是要团结我们的力量，进行土地革命，这时候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残酷的阶级战争中教育工农群众来自己掌握政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领导广大的群众起来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这个时候，民族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积极的向工农革命进攻，那时候的小资产阶级是被大革命的风暴所吓软惊坏的。当时的党坚决的领导土地革命，在这残酷的斗争中使自己走上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同时又在这时候，在红军中和党中发现某些分子对国民党改组派和富农发生幻想，党就必须集中火力来反对这些倾向。

中国党自□次大会以后，发现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使党脱离了群众。在日本占领了东北四省以及一二八，长城各口的

战争中，这时候民族革命高潮已经看见了，但是党正当这时期，城市中的组织力量非常薄弱，只在广大的农村区域中，苏维埃运动是蓬蓬勃勃的发展。这时期，党却在策略路线上发现了如下的错误。

例如在五次围剿中，福建事变发生了。领导福建事变的领袖自己来找我们，但是我们在事前没有好好的准备，没有好好的组织他们，没有立即抓着这些抗日反蒋的力量，甚至只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福建事变的当时，是否有造成广大统一战线的可能呢？如果我们在当时活泼的，主动的运用了国际的指示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那革命的情形将会是另外的样子，在北方方吉事变中，当时也是一样的。当着广大小资产阶级起来抗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

当时白区中和苏区中的政策也有这些错误。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教训。这一教训是我们纠正了大革命当时的右倾，并且又若干次的发现了另一形式的机会主义左倾。五次围剿的教训应该我们好好去想想。五次反围剿在客观上是否有胜利的可能？若果我们由各方面去运用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什么福建事变十九路军失败了以后，不敢向苏区方面靠近一些，反而向漳州方向退却，以致被蒋介石所解决？在当时我们可以动员十几万的红军，我们有没有机会使反帝的土地革命与当时的反日战争联合起来？为什么蒋介石能封锁得我们紧紧的，感觉物质的缺乏？为什么反动营垒中间，不会再发生一部分来和我们结合暂时的统一战线？为什么“宁都暴动”没有再出现第二个？为什么白兵的投降哗变的分子减少下去？如果我们广泛的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革命再不会像

那样的情况。

当然党内某一种倾向，必然会影响我们的战争，现在历史证实了这一点。而事实上告诉我们，目前必须要转变策略。

我们可以不可以在小的区域中进行拚消耗的战争？不可以的。可以不可以采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办法，这是可以的。因此我们也需要策略的转变。

为适应民族革命新的高潮，我们需要改变策略，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我们了解这一问题，也就可以了解过去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在那里。不会运用统一战线的这一事实，不但表现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也曾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吉鸿昌在失败了的时候，甚且公开的说：“最后无出路的时候，我只好找共产党联合”。但是我们也没有利用敌人里面的消极情绪，而我们提出的，正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如果我们当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我们当时的情况也不会那样。

在对富农问题上，我们提出反对富农是错误的。当然联合富农也是不对的。列宁的意见：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间，我们的策略是联合中农，中立富农。反对富农的结果将会使中农动摇。

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中，什么是最具体的组织形式呢？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最广大的具体的形式，应当是抗日救国政府和抗日联军。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摧毁卖国贼蒋介石的统治，只要他是抗日反蒋的不管什么阶级派别和军队，都可以加入抗日联军和抗日救国政府。抗日救国政府和抗日联军是什么呢？是领导对日作战，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战斗领导机关。

同志们会这样问，我们已经有一个苏维埃政府，还要一个抗日救国政府做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要敌人是日本，是蒋

介石，打日本帝国主义不是随便的事情，所以我们必定要将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联合起来，在统一战线领导机关之下共同奋斗。

如果我们不形成一个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日本就会继续利用其反赤的反动统一战线来对付我们，我们为要联合的对付他们就必须组织抗日救国政府对付他。

抗日救国政府的政纲应当如何？如果完全和苏维埃的政纲一模一样，那就不是抗日救国政府了，是苏维埃就是了，何必多此一举呢？抗日救国政府的政纲和苏维埃的政纲是不相同的。不同到如何限度？如果这一政纲不降低到适合于抗日反蒋的话，那抗日救国政府也就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我们若果不提出最低限度的目前满足群众要求的纲领，抗日政府也就组织不起来的。因此这一政纲的内容，应当是：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的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和汉奸的一切土地财产，发给工农兵士，贫民和难民；

三、给予民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

四、组织民众的抗日救国军和义勇军；

五、救灾治水，救济被灾民众；

六、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七、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和教育界的生活，发展教育和生产技能，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学生和专家门；

八、实行民族自决，联合本国内各少数民族一致抗日，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

九、联合朝鲜台湾人民，赞助他们的独立解放运动，并

联合日本国内工农及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使他们与中国的反日战争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与一切表示同情，和赞助中国伟大民族运动和守善意中立之民族和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根据这一政纲，或是用群众的革命手段，经过群众的暴动，或是由苏维埃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或是经过人民抗日救国大会来建立起这一抗日救国政府，用一定的联合形式，将红军苏维埃与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联合起来，这是实现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方式问题。

四、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和苏维埃红军

目前的民族革命高潮同第一次大革命时不同之点就是苏维埃已经在中国许多地方胜利了。苏维埃与红军是反日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中坚支柱，为使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得到更加扩大和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兵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

1. 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种改变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

2. 给一切革命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凡愿反日反卖国贼的白军官长士兵一律优待；

4. 改变对富农策略，在苏区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的一部分外，不论自耕或雇人耕种的均不

没收，以中立富农；

5. 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来对待民族工商业和资本家，欢迎海外华侨投资并保护他们。

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办法？

为的是更便利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在努力执行这个策略底下，更高涨的民族革命高潮是必定要到来的。

我们和第一次大革命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革命经验，我们必须提出抗日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苏维埃的许多政策，来适应目前的战斗需要。

倘若我们仍将原有的政策坚持不变，富农仍是要反对，不给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以选举权，拒绝动摇的中间阶层于门外，那么统一战线就不能实行，苏维埃红军也就不能够成为抗日反蒋的中坚支柱的作用，这样抗日救国政府只是一个宣传号召的口号而已，这是非常清楚的。

同志们于此就会发生问题，现在连苏维埃名字也改了，政策也改了，还要优待抗日反蒋士兵和军官，小资产阶级而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还要来中立富农，甚至于欢迎华侨来投资，这样一来，那我们工农分子还有什么地位呢？这问题是不能如此误会的。这样就等于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胆子小，不懂得列宁的教训，不会运用无产阶级的策略。倘若我们的党已有相当的基础，在斗争中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的党，红军已有巩固的基础，并且苏维埃又有相当的经验，那我们还怕什么呢？只要有这个本钱，我们就要大胆作这个生意，何况一定是赚钱的生意。为的要打倒我们主要的敌人，这个策略是必要的，唯一正确的。我们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中间势力的动摇，我们应用这政策是为的联合

目前的友军，一块去抗日反蒋，不是欢迎他们，不是欢迎他们来坐在苏维埃内烧大烟，也不是让他们来整工农的。以这样的观点来了解改变策略路线，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无产阶级为要争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们就必须百倍努力的扩大红军，同时要大大的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因为红军是抗日的红军，苏区是抗日根据地。现在我们进攻敌人，因为军阀的军队是卖国贼的军队，我们扩大赤区是巩固抗日后方，同时必须要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实现群众的利益，争取工农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士兵和少数民族，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与灵活的外交政策来建立共同的反帝统一战线。

同志们会问，为什么苏维埃政府改成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个根据是在共产国际政纲的一条上，“在先进的殖民地国家，可以建立苏维埃工农兵共和国，在比较落后的地方，可以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也就是比较落后的地方，我们的任务就是首先使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

为什么要有两个政府？抗日救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在民族革命高潮与统一战线中，这两个政府的具体关系如何呢？那个大一些呢？发生了彼此间冲突怎么办呢？我们要了解两个政府的存在不过是过渡形式，一个是事实上正在发展的政府，另一个是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领导机关，是发动与领导群众对日作战的政府。因此问题的解决是依据将来的情况与政治上组织上的战斗力量来解决的。我们的力量大，抗日救国政府可转变为苏维埃，如果我们的力量比较小，那还是靠我们力量的准备与继续扩大中去求解决。

至于在苏区内，只有苏维埃政府，不要用抗日救国政府的形式，在新赤区中也是如此。

为什么要给小资产阶级以选举权？为什么要优待知识分子？这是不是妥协呢？当然是妥协，当然是让步，我们已经指出绝不让步绝不妥协是不对的，我们运用策略正是为革命的胜利和为的便利争取工农民主专政的胜利，便于争取最后胜利的。

这样一来，影响到什么实际政策呢？

这影响到各个部门都要来改正。

第一、在苏维埃的土地问题中

我们过去对土地问题是按照人口和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是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的土地，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现在的主要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现在对富农方面要改变的是我们现在不没收富农的财产房屋，富农土地自耕的与雇人耕种的不没收，只没收其封建剥削的部分（即出租的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土地当然要分给穷苦工农群众（雇工贫农），中农的利益不要侵犯。

过去地主没收后不留生活，现在要留给一点生活（锅头、碗盏、一小部分粮食）这是为的不要动摇了中农（？）。

其次我们明白的说：自己家里有少数田地佃给别人而自己出去作工的或是因为没有劳动力出租小块土地的，不算地主。土地可以出租，而且可以买卖。

这样雇工贫农是不是会分少了田地呢？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革命胜利与否是中心问题，只有革命胜利，土地利益才有保障。

对祠堂庙宇的土地照旧办法由同族人或群众自己解决。

对教书的，医生，以及其他农村中的专门家，端公道士，只要是贫苦的和自己耕种的，可以分给一部分田地，富农的女子嫁给穷人同样可以分田。

第二、关于劳动政策方面

增加工人工资，工资应有最低限度的决定，减少工作时间，一般的实行八小时工作的办法，但应采用工人代表与老板交涉的方法，不能使用过去由工会单方面决定的强迫办法。一定要建立与提高劳动纪律，真正的实行八小时工作，不能随便缩减工作时间，否则雇主可以向苏维埃法庭控诉和工人打官司。

劳动纪律在苏联和过去武汉政府都提出过。但武汉政府是用劳动纪律来压迫工人。现在苏维埃是把劳动纪律建立在保护工人利益上。

第三、经济政策问题

根据过去的原则，铲除封建残余，满足群众的需要和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对于税收的问题应该加在资本家和剥削阶级身上，在没收方面现在只没收商人带封建剥削的部分。没收反革命及与反动统治有密切关系的财产，与群众所痛恨的高利贷。

不仅一般的保护中小商人，对遵守苏维埃法令的大商人也不没收。

中小商人的房子不没收。住房子要给租金，住大商人的房子也要给租，当然苏维埃政府是拥护减租的。

奖励工厂开工，政府不能办的企业可出租给私人经营，实行劳动法令。农村中借水磨子也要给代价和粮食，不能随便占用不给租。

富农可以加入合作社，并可以组织自己的合作社，苏维埃政府要领导工农组织工农合作社来和富农的合作社的操纵与高抬物价作斗争。

为要发展和奖励商业，苏维埃必须规定保护商人到各地贩货的办法，不能象过去一样不发路票不给予保护。

苏维埃政府反对高抬市价和破坏市场的投机行为，必要时可采取强迫收买的办法，但不能普遍的限制物价。

为了发展商业，必须奖励信用借贷，规定最高利率，借债（高利贷要禁止）不仅要还本而且要付利，要规定借债诉讼打官司的办法。

第四、关于苏维埃的选举方面

地主没有公民权，富农一般的也没有公民权。反对苏维埃及积极参加反动的富农没有公民权。倘若同情于苏维埃的，可以在苏维埃的选举大会上给予发言权，但无选举被选举权，对积极参加抗日反蒋并执行苏维埃各决定的富农中的个别分子，还可以给予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富农分子发表拥护富农利益的意见时，不能用简单的驱逐方法，要由群众中发动斗争，来反对他们不正确的言论，对富农斗争的方法，不是一般的用保卫局的手段。

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给予选举与被选举权。

在过去反动统治机关的下层人员，以至团保甲，这些人若果积极的反对苏维埃并反对抗日反蒋，就必须用专政的办法对付他们，要是他对于我们中立或取消极的态度，表示不再侵犯穷人的利益，不能简单的逮捕他们，应该在苏维埃革命法庭上控告他们过去损害穷人的罪恶，由法庭判决他们赔偿过去对穷人的损害。

富农以上的分子参加过反动的，可以要他们 取保投诚——（穷人的担保条件），在反动统治下做过事的，只要有穷人担保不反对苏维埃时，不能够简单因为他们是甲长就逮捕起来。杀尽地主富农团保甲的话，再不好说了。我们主要的镇压他们的反动头子，中立他们的一部分。

对乡村中的教书先生，医生阉猪阉牛的老手等分子，苏维埃一般的优待他们，按照其本人之阶级成分来规定是否分田与给予公民权。

对和尚端公道士，再不能随便驱逐他们，并应按照其阶级成分来决定是否分田。

乡村中嫁娶时，还依旧可以坐花轿，请酒，看病的先生还一样可以坐滑杆。

当然苏维埃政府是反对奴隶主的，解放一切不给与工资的劳役与等级。

苏维埃主张信教自由，不捣毁祠堂庙宇，对天主教基督教应当没收教会的房屋土地及财产。对信教的教民应用宣传教育的方式。

团丁和白色士兵及参加抗日反蒋的下级军官等可以分配田地，并采取优待他们的办法，对白军军官在苏区中的家属，如是地主当没收其田地，但是应该向他们的家属说：如果他们的男子能够抗日反蒋，还是可以回家。

以后再不能到群众家里乱翻乱抄了。请老百姓背东西，要付工资。

以上是一般的运用策略的办法，一部分是纠正过去的错误，另一部分是策略的改变。当然在目前苏区中粮食的缺少应采用：（一）捐助募捐的办法；（二）强迫收买的办法

（但必须付与代价），（三）用借贷及给把凭的办法。用这些手段的活泼应用来解决当前的困难。

第五、对红军中的办法

红军自然是工人雇工贫农中农才可加入。过去因为成分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总闹不清楚，今后应当如此：红军中个别的富农分子，倘若是经过相当时期工作表现好的可以不生研究，社会关系也是同样，要依据工作来决定，工作不好才生研究。

过去来参加红军的富农分子，我们简单的拒绝他们，并不好好的安置他们的另外相当的工作，今后应该纠正这一点。若果他有特长，可以介绍他到其他机关工作。

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来参加红军，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拒绝他们，必须用些办法介绍他们以其他工作。

这才是保证无产阶级对中间阶层的正确态度。过去对于白兵官兵有些成分不好的，我们总是当面生研究，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宣传他们抗日反蒋对其成分不好这点只须在脑筋中记忆着就是了，用不着当面生研究。在前线上应该大大宣传抗日反蒋，宣传抗日联军，这是非常重要的。

五、群众团体的问题

在苏维埃政权下，当然有各种的群众团体。这问题只要明白对富农的策略的意义，那就好了解了。我们是中立富农，不是联合富农。我们是联合中农，若果我们说联合富农，那就必然是中立地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富农当做是革命的基本群众，若如此就根本说不上土地革命，但是反对

富农也是不对的，我们中立富农，这即是说，当雇工和富农斗争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无条件的站在雇工方面，而且我们要发动和组织雇工向富农作无情的斗争，但是这不是说用保卫局的路线而必须用群众的路线。

若果富农积极参加反革命的活动，那当然是要用保卫局对付他。现在是民族革命中间，一部分的富农还可以来参加，如果革命发展到更高阶段，那富农必然要起来反对革命的。现在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中，我们还不能提出反对富农的口号。当然，我们革命过程的发展，是必然要走上反对富农的阶段上来，但是这不是目前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好好的分清什么是联合，什么是中立，什么是反对，这问题的了解对明白每个群众团体的基本路线时是必须的。

一、关于工会

今后雇工会不应讨论什么家庭成分，但凡雇工都可以加入（出身富农的雇工同样，当然这样的例是很少的），只要他们赞成工会章程，经常到会，服从决议，缴纳会费就行了。对手工业的工人，不管什么职业，都可以加入工会，并且可以组织自己的职业工会，老师不论曾带徒弟多少都可以加入。季候工人也可以加入职业工会。小学教员店员等也可以组织工会。当然，当掌柜的，直接代表雇主利益的分子是不能加入工会的，因为他们是资本的附庸。

苏维埃的一般工作人员，要采用工资制度。

我们要大胆地把工会的门，广大开放起来，但同时要保障主要的产业工会成为工会运动的中坚。保证党的领导，在苏维埃中，不仅劳动委员会，一切部门都应有工会的代表参

加在内，如此来确保苏维埃内无产阶级的领导实际。但是工会没有代表政权的权限。在工会中应该大大吸收非党工人来参加工作，参加领导机关，由工作中培养他们。

工会问题在目前执行党的新路线中，是有决定意义的。

第二、贫农团

贫农团在土地革命中是非常重要的。若果在新的策略方针中，不能团结和具体发动贫农的斗争，富农就能够利用一切机会来把持并窃取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若果没有党的领导，那么，一切富农的知识分子是可以操纵一切的。

雇工会和贫农团是共产党在乡村中的主要柱石。贫农团应该与乡村中的苏维埃取最密切的联系，贫农团的主席应该是苏维埃委员之一。

贫农团的工作的确立，是保证苏维埃政权不落在富农手里的主要保障。

联合对象看待，不晓得随时提防他们，而把他们当着基本力量之一，这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倾向，只知让步，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等等，这必须要给予坚决的打击，加强火力与之斗争。

所以我们为要执行新的策略路线，党就必须反对有害的右倾，才能顺利的反反对主要的左倾。

现在党在组织上，需要大批的吸收党员，必须大大的扩大党，发展几十万至几百万的新党员。更多的吸收工人雇工入党，使成为党的骨干，加紧培养工农干部，特别重要的是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成分。

过去在赤区雇工贫农入党比较容易，对于知识分子的入党非常困难，现在应当注意成分，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党

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必须要吸收民族革命中和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以其赞成党纲党章和党的主张，工作的积极作为入党的标准，革命的分子，接受党的党章党纲积极工作，是可以加入党，因此我提议，应当缩短党员的候补期。

在运用新的策略当中，党要注意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大大的教育党员，养成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动性，应当发展党内的民主，多发展讨论，不要怕犯错误，要多采用教育说服的精神，必须着重思想上的斗争。党内斗争中不能简单采用一切简单化的办法，当然不好的现象是要斗争反对的，每一个党员必须明了共产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提高党员的自动工作，使他们好好的运用新的策略路线，这样才能把土地革命与反帝民族革命具体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党员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现在党内可能发生的倾向是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不相信民族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另外一种，就是以为现在执行新的统一战线中，就没有艰苦的战争了，什么都好了，这两种倾向同样是要反对的。

我们必须注意到白区党组织的薄弱，以及新的高潮中革命不平衡发展的依然存在。要战胜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统治，还是需要艰苦的较长期的斗争，我们要看清楚，现在时期的不同，我们经过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经过了悠久的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若果我们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努力，扩大我们的宣传煽动，加强我们的组织力量，那么我们一定能胜利的执行新的策略路线。

对于统一战线的策略，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斗争力量去决

定一切，不应当对统一战线发生任何的幻想，一切只靠我们的力量才能决定。

最后还要说的话，就是这一决议，还只是原则上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必须了解共产国际是如何能精确的根据中国情况的转移来给予我们适切的指示。原则上是毫无疑义的完全正确的。

至于更完满的解释与更充实化，就全赖我们今后实际工作。每个同志不能以为这既是国际的指示就无需讨论。在讨论当中大家可以尽量发表意见。

国际指示的这一策略路线，现在二六军团和陕北的同志大家都是同意的。

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第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如陕北的同志们采取各干各的，互不相管的态度，现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过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会上来解决，是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组织上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正在具体提议，解决办法目前应在适当地区内建立中央，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们成立西南局。这并不是对反倾向斗争的让步，而是目前执行党的历史伟大任务中所必需的。

全党必须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党的新策略路线而战斗，才能争取抗日反蒋的胜利与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热烈的大鼓掌）

（原载《干部必读》第16期1936年2月10日出版）

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 发展前途的报告^①

同志们！我们今晚要来讨论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的任务。现在我首先提出几个简单的问题来说：

第一、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情形究竟怎么样呢？

上次党的策略路线的决议上已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国内阶级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结合，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苏维埃实际政策许多部分的改变等等，但是对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没有一个肯定的断然的估计。现在我们就来解答这一问题。中国苏维埃运动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的联系究竟是怎样呢？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有什么影响呢？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五次战役是敌人的主力与我们的主力红军残酷决战的一幕。结果主力红军退出了中央苏区。当时左翼的红四方面军，右翼的二、六军虽然不断的取得了胜利，但不能决定一切，不能补偿于主力红军的损失，结果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了中央苏区。这是划时期的一个关键，我们没有粉碎五次“围剿”，

① 这是张国焘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攻击中央，吹嘘南下“正确”。进行分裂活动的欺骗和宣传。

在相当意义上说苏维埃运动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苏维埃运动从胜利的向上发展而转为相当的停滞与降低。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结合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有这种过分的估计。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得到了一些发展，然而还不是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我们取得的一些发展，还不能使我们有能力去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二、六军方面来说，他们还没有确定的根据地，还要进行运动战，在运动战中人数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发展，可是发展的数量并不大。陕北红军经过相当时期的休息和整理，现在也有相当的发展，最近在山西行动，虽然没有得到他们的报告，但一般的估计，他们或者还要回到陕北行动。这些我们在各方面得到的发展，显然还不是有决定意义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能否说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是继续低落下去，没有前途呢？不！绝不能如此说。事实上也不是如此，相反的，是要得到了一些发展，而且苏维埃运动是在与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结合的过程中。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到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因为日本要完全殖民地化中国，蒋介石要完全拍卖中国的现在，掀起了广大群众的斗争。现在的问题是在要求我们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奋斗。二、六军大概要经过运动战来同我们会合，共同创造西北根据地。我们也要克服当前的困难来创造西北广大的

抗日根据地。陕北红军同样要艰苦奋斗来确立脚跟。五次战役的不能取得胜利，给予我们现在许多新的困难，但丝毫也不能引起我们的悲观失望。当然，对于我们现在获得的一些发展也不能作过分的估计。

其次、我们说到苏维埃运动发展过程的三个时期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游击战争发展到攻下长沙。这一时期是从零星的游击战争进到大规模国内战争的开始与根据地的创立。当时敌人内部的争斗，军阀混战的爆发，群众斗争的兴起，党的领导的正确，与党一贯的艰苦奋斗，是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源泉。可是当时的立三路线却阻碍了这一时期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时期是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中间，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长城各口反日战争，以及胜利的摧毁了敌人对苏区红军一、二、三、四次的“围剿”。当时在红军建设、党的建设等等问题上是获得了不少的成绩，这里四中全会是起了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可是在这时期中没有使反日战争与苏维埃运动取得具体的结合，没有实地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孤立蒋介石，反而使敌人能够在“抗日必先剿赤”的口号下形成“剿赤”的联合战线来包围我们，这是这一时期中战略上的极大错误。当时爆发的“一二八”与长城各口反日战争一直到北方事变与福建事变都有极大的可能与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然而，当时我们党的领导却坠入深深的关门主义泥坑中去了。不会去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来进攻敌人，不会设法去把苏维埃运动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结果敌人还可以去进攻鄂豫皖与湘

鄂西苏区，而且压迫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离开了原有的根据地。

第三时期是五次“围剿”后经过长期行军到一、四方面军的会合，进到了目前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时期。中间一方面军的退出中央苏区，在相当的意义上说不能不说是退却，一直到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才终止了这一退却。

因此在今天我们必须进行布尔什维克顽强的艰苦奋斗，共产国际曾经这样的告诉我们：在有革命形势的时候，共产党要组织群众的暴动去争取政权；可是在革命形势低落的时候，却要耐心的领导群众的部分斗争，联系到为政权而斗争。在中国革命形势在广大区域存在时，形成了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但后来受到了相当打击。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斗争。我们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巩固与扩大我们的力量，去开展新的更大胜利的局面。

第三、我们来说中国民族革命高潮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我们也不能过分估计。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蒋介石无耻的投降卖国，已经掀起了中国民族革命新的高潮。西南派与胡汉民等反蒋派已经积极的活动，公开摆出反蒋派的面孔；中国的广大群众与小资产阶级反日运动的发展，说明中国民族革命新高潮正在此伏彼起的发展着。可是我们党还异常缺乏有组织的领导，党在白区中的领导力量还很薄弱，因此民族革命的运动带着更多自发的性质。这同样也要求我们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有些同志在民族革命高潮的面前发生过分的幻想，以为现在著名的军阀也可以来抗日了，这是小资产阶级有害的幻想。要晓得蒋介石“剿赤”的欺骗口号还有一部分的欺骗作用，他还能用许多新的办法来

进攻我们，我们绝不要作过分的估计，主要的是要我们积极去发动群众的斗争，经过艰苦的组织工作去团聚群众在党的口号下行动。

当然，如果把现在的民族革命新高潮不当什么一回事，或者说苏维埃动动就包括了民族革命，现在没有什么单独的民族革命运动好说，都是错误的，这就根本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国际六次大会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带有伟大民族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性质。譬如在武汉的城市工人中，不仅要以八小时工作的口号去动员工人，而且要以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去动员他们。否则民族改良主义便可以在工人中起欺骗的作用，同样民族改良主义也可以影响到乡村的农民，特别是一般小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国际告诉我们不要小视了民族改良主义的作用。当民族革命新高潮的前面，不仅小资产阶级重新卷入了革命，就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地主与军阀也有动摇中立以至参加反日运动的可能，因此我们才着重提出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去孤立敌人、包围敌人。过去我们那种呆板的观点，以为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没有所谓中间势力的争取那是不适用了。中国大革命到广州暴动时期，小资产阶级被吓退了，富农走进反革命营垒中去了，在民族革命高潮的今天，他们又摇摆起来，以至参加反日运动，这正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性。总之，我们指出民族革命新高潮的发展，但共产党领导的力量还薄弱，正需要我们从艰苦斗争中去把苏维埃动动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这里来说我们南下的意义吧

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该指出当前我们都是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及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便取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使自己站稳脚跟，整理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根本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到不顾一切的分裂红军与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这一罪恶行为便减弱了当时的有利条件。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在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相当挫折，企图用反攻敌人保持原有胜利的基础上，而发动全党热烈的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当然是胡说瞎道。南下的事实同样也证明了他们“预言”的绝对破产。南下打坍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一个团以上，主力红军不仅取得了休息和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开始在川西一带创造苏维埃区域，掀起了当地群众的斗争，

整个部队在物资上得到了很大的补充，这也都是从我们坚决反攻敌人中所获得的成绩，这样，怎么能说南下是退却呢？！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这样的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至于南下胜利后转移地区，也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情。不过在当时各方面红军是否可能不离开苏区，我想在客观上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丧失了这种可能的机会，就在于当时我们没有采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孤立敌人，反使敌人来包围我们。现在不仅我们转移了地区，陕北红军也同样转移到晋西去了。当敌人有相当优势兵力，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尚未具体形成的今天，转移地区可以说是平常的一回事。

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团军能够顺利的达到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能顺利的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我们这次离开天、芦、雅，主要的原因是敌人有着比较优势的兵力，我们不愿意去和敌人拼消耗，而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求新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退却的行动，可是这一退却是有秩序的出于我们自己的主动。

同志们！我们还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

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这里我们还必须说到当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时我们有组织有目的的提出到西北去，创造革命根据地，一直到川北来成立了川陕政府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扩大了数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当时我们与中央曾发生过一个时期的隔阂，为的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离开鄂豫皖呢？事实是这样：当时敌人的兵力大于我们几倍，我们形成孤军独战，虽然和敌人进行了不断的剧烈的战斗，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可是仍然不能最后解决胜负的问题。如果继续维持下去，那么，将要形成与敌人拼消耗而损失我们的有生力量。结果为着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为着寻找在有利的地区上新的的发展，所以离开了苏区。当时中央同志反而批评我们说，如果以为离开苏区有客观的原因那是右倾。又说四方面军到西北去是离开了全国的苏维埃运动，这不是胡说是什么呢？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去顾到客观的事实，而将一切的问题都归咎于主观的错误（当然，当时我们在主观上也有很大的弱点）。遵义会议的重大的缺点就是不承认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除主观的错误外，还有客观的原因，对于划时期的关键不加丝毫考虑，把革命当作儿戏。对于红四方面军退出苏区的经验不加研究，因此使五次“围剿”时又重复一次教训。这些空谈家、唯心论者先生们简直是闭了眼睛来说话哟！

我们与陕北同志基本分歧就在于对五次“围剿”的估计，五次“围剿”后的整个形势与当时的战略方针。这些空

口说白话的书生们，当我们退却时还说我们胜利了！这是多么小孩子气与信口开河啊！因此，就使当时的北进成为无组织无准备的瞎闹。虽然想了许多补救的办法，可是噶曲河终是没有办法渡过的。这样，只有要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南下是对退却逃跑主义的坚决反抗。在今天来说，纵使南下得到更伟大的胜利，始终也还要向西北伸张我们势力的，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力量还没有能够和敌人拼消耗。毛、周、张、博的重大错误的继续，就在于没有揭发过去的错误，而继续其退却路线，一直发展到罪大恶极的分裂红军。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的。

最后，说到我们现在的行动方针

我们现在还是要相机消灭李抱冰，会合二、六团军来顺利的遂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西北是一个机动的极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地区。西北离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使敌人更困难来向我们进攻；西北是敌人统治势力最弱的一环，群众最痛苦；西北有广大的少数民族为我们的助力；西北毗连外蒙与苏联，使我们能够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主要依靠我们自己，而与机会主义者之专门依靠苏联之飞机大炮完全不同。列宁说：各国的革命不要等外力的帮助，否则便不是国际主义者，这是完全正确的。其次，我们夺取西北，主要的还是创造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来战胜日本强盗与卖国贼蒋介石。

现在有些同志在猜疑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走那一条路呢？天天在估计草地有多长；另外却有一部分同志把革命势

力过分的极端夸大，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大炮客如果一受打击，便要堕入消沉的深渊。毛、周、张、博就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者，当四次“围剿”时，消灭了两师敌人，便大声疾呼四次“围剿”彻底而完全粉碎了。五中全会甚至还说五次“围剿”我们胜利了，结果呢？一受挫折便跌落悲观失望的泥潭中去了。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一带的地区来呢？难道是我们自己挑选中意的么？难道不是在客观上需要如此么？关于这，有许多同志天天在猜想，非常不安心，到处去打听，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同志们！有意见尽可提出来论论，为什么要到处去乱说而引起风声鹤唳满城风雨的空气呢？这难道对革命有利益的么？

我们现在要在这里停留一个时期，要去打康定的敌人。二、六军团在康定附近与我们会合有极大可能。所以我们的战役计划还未终结，完成这一战役计划与将来胜利的行动是密切联系着的。现在我们要进行许多准备工作。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夺取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争取相机消灭李抱冰，拿下康定的战役胜利。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顽强的艰苦奋斗来完成这些任务呵！

末了，还要指出已经发生的错误倾向

现在有些同志只是准备在革命高潮时工作，在现在艰苦奋斗的环境下便发生许多错误的偏向，有的在清谈起来，在议论南下对不对，北上是否向毛、周、张、博投降等等，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军队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为自由批评只有涣散我

们自己，这种现象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现在又有些人在造谣，说什么要走三个月的草地，这一谣言影响到我们通讯连发生个别开小差的企图，这种谣言必须坚决扫清才行。

还有表现不遵守政治纪律，断送群众，将群众赶向敌人那方面去。更发生泄漏军事秘密，不要组织路线，以及生活上行动上的许多不是艰苦奋斗所能容许的现象。这难道不是在客观上帮助敌人么？

这些同志对于苏维埃运动前途失掉了信心，表现着一种醉生梦死的行为，这需要我们开展无情的斗争。

在艰苦奋斗的今天，干部以身作则的领导作用，是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在我们干部中发生一切可以起破坏作用与瓦解作用的现象，都要给以布尔什维克的猛击。

现在每个党员都要为革命牺牲一切，要准备在革命不甚顺利发展的时期依然铁一般的坚决奋斗。

我们是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每个同志现在要好好的约束自己，不要信口开河随便乱谈。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服从党的决议，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每个党员有意见可事先向领导机关提出，但决定后便要一致执行。故意引起猜疑，类似小组织的活动等等，只是一种帮助敌人损害自己的行为。每个同志应该慎重的来约束自己。

同志们！党要求每个干部在今天的条件下，要以卓绝的艰苦奋斗来领导全党一致为党的路线而奋斗！

1936年3月15日晚于道孚

（原载《干部必读》第18期，1936年3月18日）

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 我们当前的任务^①

(一)

同志们！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这与中国革命是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

当然，这一地区比之于湖北、江西较为落后，可是我们有着伟大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有如下发展的可能：可以在比较落后的区域，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而其冲突与矛盾特别厉害的地方首先得到胜利，使整个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与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使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这样去取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

这一伟大的前途，鲜明的摆在我们面前，因此每一个党员必须相信，在落后的地区中建立政权来配合全国民族革命新高潮，可以使革命得到最后的胜利。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相信这一点，坚决为实现当前的战略方针而斗争。

① 这是张国焘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在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攻击中央，散布其企图偏安西北边陲的谬论。

任何落后地区中不能建立苏维埃的倾向，任何落后地区不能战胜进步地区的见解，都是取消革命的观点，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不能赞同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同志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当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要落后，当时考茨基预言说十月革命最多只能维持三天或一月，后来又说一年，然而这些机会主义的“预言”都破产了。现在苏联已经得到最伟大的胜利，这证明列宁观点的正确——即在敌人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首先暴发革命和革命胜利的可能。外蒙的例子也是同样的——那里的革命政权巩固了，进行了许多建设的工作，而自己获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这是非常明显的历史先例。当我们从嘉陵江过到平武以后，我们中间有一个知识分子写了一篇文章，说革命不能在落后区域发展，当时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观念。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我说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胜利的可能，然而博古出来反对，他说“马克思主义承认革命可以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区域发展起来，但不能首先在最落后的区域发展起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当前我们所处的区域比之于英美德法当然是最落后，但比之于半殖民地中国的其他地区，就是比较落后。西北一带的地区当然是比中国内地差一些，但与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相比说来，那就不能说他是最落后的区域了，只能说较落后的地区。外蒙已经可以得到胜利，我们就没有理由可以怀疑这地区能否建立革命政权了。再拿这地方的民族做例来说吧！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建筑、经书、军队、骑兵等，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他是最落后的地区？如果最落后的话，为什么西藏能建立二十四个营的新

式军队？我想只有充满大汉族主义观点的人们，才会说这是“最落后地区”，这是“革命的障碍”。列宁说过，苏维埃政权可以便利一切穷苦人民的应用，落后民族的应用，甚至非洲刚果的人民也可应用这一政权。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落后地区中就没有丝毫困难，困难是有的，但是这正需要我们去战胜困难，从艰苦的斗争中去克服一切困难。譬如拿苏联来说吧！他们的革命还不是经过艰苦的奋斗么？他们中间不管什么人不是都努力从各方面学习，以惊人的努力去克服一切困难么？苏联革命的成功、巩固以至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原因也就在此。

我们在这一区域中，虽然是比较落后的，可是已经具备有这种条件：可以形成政权和军队去战胜敌人，当然，这里需要我们有充分的组织工作，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任何懈怠都可以使革命中途断送。在少数民族区域中工作，倘若不经过艰苦的斗争，那么，革命胜利的获得，简直是梦想。如果认为这里是最落后地区的话，那么这是取消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悲观的哀号，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者，那些牛皮大家，看见一些小的胜利便头昏了，便大声疾呼“五次‘围剿’粉碎了”。后来事实上没有粉碎五次“围剿”，以至离开中央苏区，便堕落到赤裸裸的悲观主义的泥坑中去了，以为中国革命前途已经惨淡无光了，这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者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有获得胜利的可能，对中国革命有决定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一伟大的前途。那么，我们的前途是失望，我们的行动是无意义的了。

事实上也说明这里的工作不仅可以做，而且可以发展起

来。丹巴的例子还不明显么？在丹巴建立了政权，组织了格勒得沙革命军，而且组织了骑兵呢！当然现在的工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开展，这只是我们的工作还差，我们的工作还不善于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罢了。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中国革命与苏联的革命以及土耳其革命对于西北群众的影响是很大的。譬如回民都知道“天方国”（土耳其），而且说“天方国”革命以后快乐得很，大概他们现在也想学“天方国”哩！

当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挫折以后，把苏维埃运动转移到比较落后的地区，这是必然的趋势，毫不足怪的。当我们离开鄂豫皖后，我们的退却方向是向着西北，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也是向西前进，二、六军团同样是在同一的方向前进。

现在可以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在落后的地区中我们可以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艰苦斗争中去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另外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西北不能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在梦中留恋着瑞金、黄、麻的大米，对于革命的前途表现悲苦的失望。

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来，我们是遭受了相当的挫折。但是卖国贼蒋介石能否在这基础上稳定他的统治，改善群众的生活，取得帝国主义的让步，以实施其民族改良的欺骗呢？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清楚蒋介石的进一步的卖国以后，掀起了广大群众的斗争，中国民族革命新高潮到来了，因此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基础是削弱了。当然我们不否认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是得到了一部分的胜利，我们受到一些损失，可是蒋介石并没有把我们镇压下去。明显的，二、六军团军克服

了一切困难，取得了胜利的前进，虽然在数量上还没有显著的发展，但在质量上已有极大的进步了。又如陕北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五军，最初离开鄂豫皖时不过一千多人，到现在已有极大的发展。二十六军也有相当的扩大。一、三军团在长期行军之后，能在陕北会合后取得相当时期的休息和整理。红四方面军在渡过嘉陵江后，力量不仅没有受到摧残，并且有发展。这些说明红军并没有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使基本力量受到损失。反之，蒋介石不但不能把苏维埃革命镇压下去，同样也不能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消灭下去。现在反蒋派也正在抬头了，而使蒋介石的统治基础更加削弱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革命方面，不但没有被蒋介石打坍下去，而且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这一发展还没有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然而，这一前途已在前面。

因此，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我们必须要以艰苦的斗争来保证这一胜利，象那些只能在太平时候工作的牛皮家，我们是不需要的。当革命发展的时候，有篮球足球打，有菜馆子进，有捷报看，便兴高彩烈，可是当革命走弯曲路时，便悲观失望，随时带几个金戒指在身边准备逃跑，这不是一个有准备能艰苦奋斗的革命家，而是太平时候的装饰者。同志们！党现在所要求于我们的是：艰苦卓绝的为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二)

其次说到我们的南下，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达到了我

们预定的目的。我们击溃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缴枪达一万三千支。主力红军不仅得到休息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发动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红大、党校也办起来了。南下的行动，同时给二、六军团的行动以有力的配合，吸引敌人到主力红军这一方面，而使二、六军团胜利的西进。对陕北红军也给了极大的配合，南下的行动牵制了敌人，使陕北红军能顺利的到陕北去。如果主力红军不南下，全部用到陕北去，将遭受更大的困难，敌人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至于各方面红军都转移了地区，这并不奇怪的。当我们苏维埃运动极发展的时期，没有能够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来进攻敌人，反而使敌人利用机会结合成“剿赤”的联合战线来对付我们，这一基本的原因就影响到苏维埃根据地的转移。

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八个月长期行军后，需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两个主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们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开始时的关门主义——不去利用敌人的弱点，反而被敌人包围。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说“如果革命阶级底政治家不懂得‘使用手腕，周旋妥协’以避免必然败北的战争，那么，这种政治家是丝毫无用的”。他们的基本弱点也就在此。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用

的，当他们应该利用时机休息整理的时候，反失却战胜敌人的信心，而继续逃跑。

四次战争中，虽然消灭了敌人两个师，但敌人还有相当力量，还占领许多城市，可是牛皮大家却说“四次围剿”完全与彻底粉碎了！这是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丝毫也不懂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一受到挫折时，也就当然只有堕入悲观主义而不能自拔。

我们和机会主义者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准备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不仅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的时候才来革命。

因此，我们向西北行动是绕到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为的是避免和敌人拼消耗，避免“决战防御”，为的是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

有些人以单纯的军事眼光来估计中国革命，以为中国国内的阶级战争只能是防御的，这是“食古不化”，是替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偷运私货。

在国内战争中，敌人的兵力当然占些优势，我们的力量比较的薄弱，这时候以少胜多——是可以有这样的形势的，这就是采取运动战，用各个击破敌人的办法来战胜敌人。这就是进攻路线的特点。

无政府主义者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为了大多数人而干的，那我们是反对的。社会民主党以为只有获得了大多数人才能革命，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因为在统治阶级把持一切的时候，革命最初是不可能占多数的。只有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可以在少数人的发动下领导大多数人斗争而取得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估计中国革命是防御战正是不

了解列宁主义原则，也唯有列宁主义才能了解中国革命，才是正确的进攻路线。

所以我们夺取西北为的是进攻敌人，与毛、周、张、博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三)

因为有的同志对西北革命前途没有估计清楚，与对落后区域的估计不足，没有对这一落后地区的特点了解清楚，以及对少数民族的估计不足等，于是便发生了许多错误的见解。

现在我们要用主力红军来准备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少数民族，争取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胜利，争取相机消灭李抱冰，拿下康定任务的完成，与二、六军团的行动互相策应。我们不能以为在此是借路经过，因此乱搅一顿，乱拉牛羊，以为西北群众争取与否可以不管了，这是极其错误的。必须了解，我们要把这一地区创造成为巩固的地区，要去夺取少数民族，以取得向西北行动的顺利条件。

这里我们首先来说说西康的大概情形吧！

西康的地区，从一般原有的材料上可以找到一些参考，可是这些材料还是不精确的，这些材料需要我们加以一番整理，譬如有些人估计西康有三百万人口，有些人却以为只有一百多万，甚至有些人只估计为六十万。拿炉霍一县为例来说吧！他们只估计有四、五千人口，可是总政治部先遣工作团的报告却说这县实有二万二千多人。因为过去只估计到差民的数量，其余喇嘛、牧民就不计算在内，这当然得不到一

个精确的结论。又如由此地至炉霍必经之将军梁子，有人说比党岭山还高，可是据先头部队说上下只有三里路。再如，甘孜有三、四万人口，有很大的坝子，青稞、麦子、豌豆、胡豆、酥油、奶渣等出产极其丰富。在瞻化县也有二万多人口。这样算起来单就甘孜、瞻化、炉霍、道孚四县就已有十万多人口了。

这一带地区是农业与畜牧的社会，而畜牧地区也比较固定，在粮食的给养上是无问题的。光就我们已到道孚的队伍来算，每日有八万斤粮食就够了。单拿炉霍每年出产二十五万石粮食来推算，那么，我们整个部队在那里住三个月才吃去五万石粮食，再加上牛羊的出产，那么，粮食是极其充足的了。当然，如果说我们有吃，百姓没有吃，或者百姓有吃，我们便无吃，那当然是不行的。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此地粮食的充足也决不会发生如此这般的事实。

拿番民的情形来说，当然与我们是有许多不同。首先语言是不通的，因此常常发生许多误会，番民群众还认我们是“平番军”呢！在我们中间也有些人误会，认为“番人是蛮子和牲畜样的东西”，因此就乱搅一顿，乱打菩萨。大家想想，这样怎么能够去争取番民呢？！

有的同志说番民很落后，其实并不尽然，譬如拿番人的武装来说吧！西藏有藏人（就是番人）军队二十四个代本（每代本等于一营），他们有英国造的枪支，有机关枪和钢炮，他们在军事上也并不落后。现在藏兵驻昌都的有七个代本，驻巴安有两个代本。我们如果要打藏兵，那还需要我们自己好好学习呢！

我们要夺取西北，首先在此地需要准备的时期，但必须

准备得很快，这里我们要完成相机夺取康定，消灭李抱冰的任务。另外我们每一个同志在此地必须下极大的努力来学习，学习番话，打番骑番反，研究此地的政治、经济、历史等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知识，那么，我们就不能在此立足。现在的确要从党校、红大各机关起以至每一个同志都从事于这方面的努力学习才行。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老大”的现象，以为这些落后的区域要来干什么呢？同志们想想吧！法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在此地建筑教堂，为什么要来此地传教，而且一住几十年，他们拼命学习藏文，著有法藏字典，他们为的什么？难道法国资本主义的国家还不好么？又如蒋介石还不是不断派人到西康来么？诺那呼图克图就是蒋介石派来的。蒋介石为什么要西康？难道南京、江浙还不好么？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眼光狭隘到不得了，连学习番语、番文，了解当地情形的决心也没有，这怎么行呵？！在苏联有二百种以上的民族，苏联党的负责同志拼命学习各民族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却如此“老大”？纵使中国革命成功了来说，也还要派人到这些区域来工作的，可是，身处此地的我们的同志却没有决心来学习，这又怎么行呵？！

总括说来，就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过路，而是要巩固这一地区，作为我们根据地的一部分。我们要努力去夺取群众，坚决反对轻视少数民族，抛弃粮食，破坏政治影响等等不能容忍的行为。

现在来说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形成政权与革命军队？第二是我们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

我们要夺取西北少数民族，当然是包括回民、番人、蒙

古人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与不同的风俗习惯等等，现在只说此地的番人吧！

番人与汉人的关系是非常恶劣的，而且经过长时期的恶劣关系。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主要是中国历朝的西征平番一直到赵尔丰的统治，刘文辉的入康，一贯来大汉族主义对于番人的压迫，汉官、军阀对于番人的无限制的残酷剥削，就当然造成了番人仇汉的心理。番人一般的可称为土伯特族，藏人叫藏巴，康人称康巴，丹巴一带叫雍巴，道、炉一带称博巴。番人还是处于残存着的部落社会上面，牧畜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农业还不发达。以前汉人统治阶级对番人的政策，就是拼命压迫他们，赶他们往雪山上跑，或则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来压迫他们。因此，番人的主要要求当然是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直至与汉族完全分离。

番民极迷信宗教，他们信奉释迦牟尼的喇嘛教。每家番人只留一个男子在家，其余男子都要出家当喇嘛，甚至一个男子也不留，只留一个女子去找“上门汉”来主持家务。喇嘛有自己的日历，还懂得一些天文、地理、医药之类，完全垄断文字事业，并操有极大的财富与高利放债，大喇嘛寺且保持有枪枝。结果，番人不管什么事，不管是下种、牧畜、疾病、婚丧、生儿育女都要去找喇嘛。于是喇嘛的无上权威便在番人群众中建立起来了。无怪乎每家番人都有精致的经堂、经书，无怪乎捣毁了他的经堂比挖他的祖坟还要厉害，要和你拼个死活。

当我们打下道孚时，灵雀寺的喇嘛都跑光了。及后喇嘛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要求不要把他们的经堂、经书、菩萨毁坏了，他答应送我们的马，一个人送一匹。可是当喇嘛的代

表进了灵雀寺，看见我们已经捣坏了他们的经书、菩萨时，他便溜之大吉了！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笨事呢？一定要去捣毁经书菩萨？为什么我们有马不晓得要？偏偏要去断送群众？这真是糊涂极了。同志们！到了此地，马是很宝贵的东西了！你有一匹马，好象是讨了一个老婆一样！（笑）为什么你们有老婆不晓得要（大笑）？！

这里我们说到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关系吧！

第一、要了解整个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吞并的对象。帝国主义为着要吞并西北起见，同时就用一切办法来束缚少数民族。因此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必然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我们说少数民族的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革命的助力。同时也必须指出少数民族如果不和汉族工农联合，他们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少数民族和中国革命联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取得解放，就是说中国革命附带的解决少数民族问题。

第二、少数民族是在蒋介石汉官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因此，中国工农所要打倒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也正是少数民族的共同敌人。

第三、少数民族所要反对的土司、大喇嘛的统治，是和汉官统治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他们要求农奴、牧奴的解放，取消等级制和差役制，取得自由民的地位。所以我们说少数民族的问题就是民族独立运动，解放农奴、牧奴，反对帝国主义汉官、军阀和他们内部勾结帝国主义汉官的内奸。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疑的少数民族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现在的状况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其次说到形成少数民族的政权问题。这需要我们加以好好的研究。首先要估计到现在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已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如果少数民族单是建立土伯特的人民革命政府那就不够了。少数民族的政权与汉人与红军必须在自愿的原则下联合起来，西北联邦政府建立的原因也就在此。因为必须提高西北联邦政府的威信，其名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有些同志反对这一政府的形式，我起来声明说：这一政府的性质，一如当初苏联的远东共和国一样，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可是有一些同志却偏偏想法来修改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当时王稼祥同志说：“要苏维埃运动在西北一带发展，那么，中国革命的旗帜就要变色”。这是不把少数民族当做中国革命一部分的错误说法，这实际上是没有看清现实的革命，是把革命的理论当作教条的书呆子，企图把自己脑筋中的公式套上革命，真是愚笨至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是要把少数民族当做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也就绝不能解释成中国苏维埃运动之下一切政权的形式都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忘记了劳动苏维埃的形式。

曾经有人瞎说，列宁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原则是先分裂而后联合，这种机械式的了解是不对的。先进的无产阶级必须帮助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党必须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全部利益为前提，去帮助少数民族的运动。正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样，一面坚决拥护番人完全独立，同时号召各民族在自愿原则下的联合。因此，分离和联合的原则是没有矛盾的，绝不如书呆子所理解，以为少数民族应该先行分离，然后联合，因此，必须先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至于说西北

联邦政府的组织是大汉族主义，那更是胡说，是不足与辩的。

最后，他们又来作最后的挣扎，说“没有邦，怎么联”。联邦政府各民族已有自己的军队、政府，群众为什么不可以用“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要应当在获得更广大和巩固的根据地上，重新正式行使职权较为慎重。因此，在目前最恰切的名称当然是西北联邦政府了。他们反对这政权名称的原因，实质上是对西北的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争取西北失掉信心，用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掩饰他们放弃西北忽视少数民族的实质吧了。

在提起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想到过去对这些问题是发生了多少幼稚的行为呵！然而这是用不着任何感慨的。

我们要了解西北联邦政府的正确性，了解他的前途，它的历史的需要，绝不能有丝毫的儿戏，而是要立即开始与加强西北联邦政府的工作，并要强固的树立其威信。一切与群众间的各种问题，都要经过西北联邦政府来实现。西北联邦政府正是坚决拥护民族自决直至完全分离。

在道孚、炉霍、甘孜一带，我们要建立波巴日德瓦革命政府，这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

现在要说的是大喇嘛、大头人的一群。这些人在反帝、反汉官中有的动摇，有的局部中立，甚至有参加的可能，他们对取消农奴制度自然是反对的，因此我们可以中立他们。我们要反对他们中的一部，孤立其中另一部，再利用他们中间的一部。

对于土司，他们中间的一部还是有可能参加反帝、反汉官的斗争，同时在事实上他们曾经有过土司反汉官的事件发

生，因此我们不能提出杀尽土司的口号，如果他们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汉官，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采取外交手段来对付他们呢？

可是，我们的同志现在非常怕犯右倾，以为“左”倾总比右倾好，拼命的往“左”倾路上跑，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好好纠正过来，依照党的正确路线来争取少数民族。

这里，我们说到番人革命党与青年革命党的问题。

在内蒙古革命时，有过这样的事实：王公大喇嘛虽然是反动的，可是在另一面，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汉官时他们是革命的，因此蒙古的革命党中还包括着王公大喇嘛。而另外则以青年革命党来吸收更年轻的分子参加。所以，在番民党中可以包括大喇嘛、大头人进去，同时也可以同样的必需来组织番民青年革命党，一般说来，在比较落后的区域中，青年革命党党员的年龄要大些，将来青年革命党在军队中有极大的作用，同时在番民的领导干部也将大部出现于青年革命党。番民区域中青年工作的重要再明显也没有了，可惜我们的金川省委都不了解这点，以至一直到现在关于这些问题都没有好好解决。

再则，还要补充说到的，在部落社会中，部落中间有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之，政府的组织想将他统一起来，实行中央集权与千篇一律的形式是比较困难与不可能的。就是说，在组织上应该是灵活的，是要注意到各地方的特点的，要有地方分权，组织上不完全相同，不过在原则上，要使这一政府成为群众强有力的政权机关，至于呆板的去讲究名词的统一那是用不着了。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克服工作中大汉族主义的表现，要克服番人对我们的误解与猜疑。

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主要的是满足穷苦番人的要求。当然，此地无所谓富农、中农、贫农的分别，土地问题在原则上是土地归耕种者所有，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此其一。将教堂、土司一部分反动头子的土地没收，分给地少与无地的穷人，此其二。第三，废除等级制度、差役制度、解放农奴、牧奴。第四，允许土地买卖和出租自由。第五，庙宇土地依当地群众意见来决定，实行减租。

对宗教问题是：政教分离，信教自由。我们还应提出保护喇嘛，反对天主教的口号，一般的不没收喇嘛庙土地。甚至我们还可派一些人打进喇嘛庙中去，夺取喇嘛，革新喇嘛教，使之有助于革命。我想，为了争取群众，为了革命胜利，这种工作方法是可以采用的。

就粮食政策来说吧！现在就需要我们赶紧号召春耕，同时我们要坚决反对践踏田地，在这方面要来一个动员，要坚决的转变，我们下操的操场，不应该设在耕种的土地上面。其次，我们要设法开荒，奖励耕种。我们可以号召缴纳土地税，并灵活运用购买、乐捐、借贷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给养问题。至于搜山必须严格禁止，粮食政策上的目的在于一面满足队伍的给养，同时又要使群众在我们领导下面斗争，就是说，不应该因粮食问题而断送群众。

所有这些当然还是从原则上提出的问题，现在需要我们的同志依据实际情况灵活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党在少数民族区域中如何进行工作呢？第一、番人自决、完全独立，与旧有汉族统治完全分离。在自愿的原则下加入联邦政府；第二、要使番人了解清楚我们与过去的汉官是完全不同的；第三、要使群众消除对我们的猜疑，抛弃我

们曾给予不好的影响。这样才能去争取少数民族，而使党的策略在少数民族中实现出来。

其次，要说到红军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大数量的红军，直接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党经过军委领导这一军队。红军与西北联邦政府的关系怎样呢？当然，整个红军是以中国革命为前提，而联邦政府也是党经过党团而领导的政权机关，这一政府也包括红军的代表。西北联邦政府包括着西北各民族穷苦人民联合的性质，如果说我们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形式是以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兵士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基础，那么，西北联邦政府则包括全西北与各民族人民的联合的形式，红军是以全国的革命为方针领导的基础，在西北问题上的方针则共同结合在联邦政府之下。

(四)

为着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在此必须坚决反对那些不可容忍的错误观点。这表现在：以为我们到此地是借路经过，侵犯番人利益好象是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主力红军为着战胜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不仅以夺取西北为对象，而且以全中国革命胜利为对象，因此我们要用最大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队伍，加强我们队伍的质量。另外，我们要虚心的细心的学习，去了解此地番人的特点，学习领导与争取少数民族，学习如何去领导波巴日得瓦革命军，学习战胜骑兵打番反，学习战胜自然，我们这方面的学习正与学习战胜蒋介石卖国军联系着不能分离的。可惜，有的同志在

这方面还缺少学习的勇气和决心，学习的积极性还没有提高，甚至有一小部分的同志表现怕雪山、怕草地悲观失望的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开展斗争去克服。

拿事实来说吧！草地雪山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去年我们过草地所以遭受一些损失，原因是在于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如果我们有准备的过雪山，损失就微乎其微了。据调查，我们这次主力红军全部翻过夹金山，只牺牲四十七人，其中二十五师便占了二十四人，因为二十五师事前准备较差；反之，在红大，因为准备工作充分，一个人也没有牺牲。翻党岭山牺牲更少，总数才不过二十人左右。实在来说，如果进一步的准备，牺牲的数目更可减少以至于没有。事实也是如此，有的师、团准备好些，整师整团队伍翻两个雪山，一个人也没有损失。至于过草地呢，那更好走了！过草地如果能够：设法用牲口、毛牛多驮些粮，减少人员带干粮的重量；每天缩短行军的路线，找有树林的地方宿营；加强收容队的工作；预先准备帐棚等物质，再加上今后天气渐渐暖和了，通过草地至多不过十天八天，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如果好好准备，一定能更其胜利的战胜草地。

还不止此！还发生许多错误的见解和行为：第一、不顾一切的乱搅，有一部分竟发展到类似土匪的行为；第二，轻视地方机关，以“老革命”自居；第三、没有阶级友爱的精神，争水磨子，吃不完的粮食随便抛弃；第四、认为要筹粮便只有胡乱搅一顿；第五、自私自利，只顾满足小部分的要求，自暴自弃，醉生梦死，对工作消极。这一切的错误倾向，一刻也不能容忍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他将怎成一种极大的罪恶，丧失党、政府、红军的威信，削弱我们自己的团

结，断送群众。当然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于革命前途失了信心，小资产阶级的哀号悲啼。我们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我们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与这种错误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

更有一种罪恶的行为：我们的通信连，又没有发现反动，便随便打了八十颗子弹。九军卫生部为了捉一条猪打了许多子弹。同志们想想，我们的子弹并不充足，我们的子弹是要去打敌人的，为什么要浪费子弹？难道准备打完了子弹去当土匪，去做老百姓么？真是糊涂至极！

再其次，在我们部队中，要加紧反对打骂现象，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这表现在执行命令的精神很差，这可以使使我们自觉的铁的纪律松懈与堕落下去。还有一小部分人说我学习不来，我不能艰苦奋斗，晓得那天打死了，“革命”便成功了呵！同志！这是什么话，这简直是醉生梦死的大傻瓜，绝望哀号的可怜虫。

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个别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懈怠，不遵守军事秘密，把我们在军事上的秘密到处乱说乱谈，表现小团体的观念。一切一切的怪现象，都在这需要艰苦奋斗的时期中暴露出来了。这是小部分同志不相信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不刻苦耐劳，向困难投降，悲观失望的一种露骨表现，重复的再说一次：我们必须与之坚决斗争，才能使党的策略路线顺利的执行。

同志们！努力去争取少数民族，夺取西北，准备战胜蒋贼卖国军，准备战胜自然，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去奋斗。只有如此，才能顺利的遂行当前的战略方针，夺取西北，创造广大抗日根据地，争取民族革命与土地

革命的结合，去完成中国革命所给予我们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1936年4月1日

（原载《干部必读》第10期，1936年4月1日）

怎样去正确运用

党对少数民族的策略路线^①

(一)

我们要领导番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五一”节波巴依得瓦全国代表大会，究竟采取什么政策？这一政策又怎样去运用呢？这里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赵尔丰、陈遐龄、刘文辉、诺那、达赖的“筹边”、“西康建省”、“改土归流”、“康人治康”、“建立大西藏国”的政策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过去汉官、军阀、诺那的政策都是建筑在维持与加重番族的封建剥削，建筑在无止境的掠夺番人的基础上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当那些中国的军阀们侵入西康后，他是采取这些办法的：

(一) 取消土司制度（当然还有许多土司尚维持着其过去的势力），设县府，放汉官，建衙门，以汉官的反动统治代替土司制度，以汉官衙门代替土司衙门；

(二) 强占番人的土地为汉官所有，并没收一部分喇嘛寺的土地；

^①此文是张国焘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伪中央局会议上所作的报

(三) 实行横征暴敛。在道孚耕种一斗种的土地要纳粮六升，在甘孜则收获四担要纳粮一担，宰牛、猪一只征收屠宰捐两元，牛场也要征收牲税，平均每十条牛征收藏洋一元。此外则借名修桥等等来剥削番民，更有各种非“正”粮“正”税之抽剥；

(四) 普遍的不断的派乌拉、派汤役、打役，有的地方更加上土司喇嘛庙的差役，使番族人民陷入极悲惨的苦痛中；

(五) 强占番人的药山、土地、矿山，开采金矿；

(六) 在商业上则采取操纵垄断的办法，以遂行其重利盘剥；

(七) 在文化上则强迫番人派“学差”，强迫读汉文，讲汉话；

(八) 以贱视的态度去对待番人，并以不平等的待遇去分划汉、番人民的界限；

(九) 最后是以残酷的惨杀去镇压番人。在巴安，赵尔丰曾经将一个村的群众三百余户全部杀光，只剩下一个未杀死而残废了的番人。刘文辉在炉霍和其他各地也在继承赵尔丰的屠杀政策，虐杀番人。汉官、军阀的这些政策，一面极度的加重番人的苦痛，使番人永远在人间地狱过活，另外却激起了番人对汉族的极大仇恨，番民所以不断爆发“洗汉”运动的根源就在于此。

诺那的政策又是怎样呢？诺那在番人中基本的欺骗口号是“康人治康”、“复土洗汉”。显然的，诺那这一政策是与刘文辉的统治互相对峙着，与刘文辉到处冲突。诺那进入西康后，将刘文辉派来的八个县长完全杀戮逮捕或驱逐出境，而以诺那遣来的“部下”代任。在道孚，将汉官拘捕解送

至康定。在甘孜，则借追缴修桥款子为名逮捕县长，没收张行和与刘文辉有关的人员的财产。在道孚，更把刘文辉的部队缴械，并发还过去被汉官没收了的喇嘛寺的土地。诺那到地便召集土司、头人、大喇嘛的会议，以图恢复旧有的土司统治。这样就到处把刘文辉的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蒋介石之所以利用诺那，一面为的是削弱刘文辉的势力，另外便采取比较“聪明”的办法来奴役西康番人。诺那也就在蒋介石的驱使下，李抱冰的依靠下，以过去的土司为基础，以喇嘛寺为根据，到处派重粮，派乌拉，对波巴群众的剥削比刘文辉还要厉害。明显的，诺那的政策是代表着番人中上层分子的“康人治康”。因此，诺那的政策无疑的只有加重对番人的压榨，与番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而且是番人独立解放的障碍。

至于西藏的达赖政府，他的基本口号是建立大西藏国，理想中的大西藏国国界包括康、藏和川、青、甘的一部，当然，西藏之所谓民族运动，是在英帝国主义卵冀下的反动民族运动，可是必须认识，在英帝国主义的经营下，达赖政府比刘文辉的黑暗统治是较为进步些，比如建立了一些新式军队和较为进步的政府组织，可是达赖政府始终不能取得番人的信服，而且酝酿着番人的反抗，基本的原因是在于西藏地脊民穷，与达赖政府之无止境的抽剥榨取和外货的剥削，因为西藏约有七十余万的人口，其中不事生产的喇嘛便占了五分之一，政府庞大的组织，新式军队的豢养，以及极大数量的喇嘛的给养与挥霍，就只有依靠在仅有的番人与对番人惨酷的榨取上面。西藏税收空前未有的繁重以及人口的不断减少与逃跑的基本原因也就在此。这样达赖政府便无法实现其

大西藏国的口号，甘孜、德格等地的番人反对达赖政府，就是惧怕达赖政府税收的枷锁。

我们领导番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对于赵尔丰、刘文辉、诺那、达赖的政策，无疑的是不能效法的。可是只有一点可取的东西，那就是建立大西藏国。当然达赖的建立大西藏国口号的目的是在于使康、藏成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我们所以采用这一口号的目的却在于番人之真正独立与解放，是在于动员群众为着打到康定去，消灭李抱冰的任务而战，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二)

党的策略是领导广大番人下层群众的独立解放运动，直至成立完全独立的波巴依得瓦共和国，可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是否完全执行了这一策略呢？根据今天各方面的报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没有完全依照党的策略路线去执行，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工作的同志都在为党的策略而斗争，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事实是很明显的。

一、首先，拿政权问题来说吧！党决定番人组织波巴独立政府，在某些地区汉人密集的所在，汉人则组织自治委员会（隶属在波巴独立政府之下）。汉人不多的地方，汉人只选派代表参加波巴政府。关于这，我们同志运用的结果是走到了一个极端，在炉霍，在甘孜，凡有汉人的地方普遍的建立了汉人自治委员会，在炉霍，自治委员会更设在衙门里头（与波巴政府一块）结果无形中就形成：第一、除了波巴政

府外，又形成了一个汉人的政府，两个政权同时出现了；第二、有可能使波巴政府成为“汉人政府”的附属品；第三、番人开始感觉到大概第二个汉官又将逐渐形成了吧！（炉霍自治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过去与汉官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番人这种感觉是有可能的。）这是不对的，而且需要立即纠正。在炉霍，要大大提高波巴独立政府的权威，自治委员会不应该设在衙门里头，各乡不需要设自治委员会，只选汉人的代表参加就够了。已成立的汉人自治委员会最好先迁出衙门来，这就可以去掉他的包办。

其次，说到利用旧的人物问题。在甘孜，现在是大批旧人物办事，孔撒女土司任为波巴全国大会筹备会的委员长，日利土司副之，督巴香根为秘书长，这种办法，如果不积极树立政权的下层基础，那么，就有一种危险；使我们的政策流向诺那的政策了。在炉霍，所有各乡的政权都掌握在过去的保正、头人手中，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将发生不好的结果了。当然在民族解放统一战线运用的原则上，革命开始时期，利用一部分旧的人物，利用一部分有名望有号召能力的土司，作为争取群众暂时的桥梁是可以的。可是也要有这样的条件，那就是要他能忠实于波巴独立解放运动，同时不至因利用旧人物而妨碍群众斗争的发展；更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迅速的巩固和树立下层群众的基础。如果偏重于上层的勾结，外交的玩弄（当然这还是需要的）而放松了下层基础的建立，那将使这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前途遭受危险。当然，以为如果不要利用这些旧人物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在今天我们还不能如此办。

正确的办法是一面利用这些旧人物，同时不使其掌握政

府的实权，提拔大批可靠的基本群众的代表去实地掌握政权。

关于土司，我们的策略是中立其中的一部分，利用其中的另一部分，反对其中的反动土司。现在有些同志一般的提出发动群众反对土司，废除土司制度，另外又有同志提出不要反对土司，我想这些观点都是太呆板太机械了。反动土司我们要坚决的反对，那是毫无问题的。可是有的土司愿意参加反对汉官、军阀的斗争，甚至赞助波巴的独立，并不反抗我们，并且有号召能力，当我们运用民族统一战线时，当革命还是在开始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利用他呢？个别例外的分子还可以吸收到政权中来给他一个虚名。同时我们也不一定要去机械的废除土司名义。但一定要把他的实权夺取到新的政权的手中来，对于土司本身可采取发优待费的办法去优待他。根据群众阶级斗争的深入程度，根据群众的组织力量的如何才能逐渐改变我们对待土司的办法。

二、关于喇嘛教的问题。党的策略是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信教自由，还俗自由，政教分离。可是我们同志在运用这一策略时，却有时走到了在群众中抬高喇嘛政治地位的倾向。选举个别喇嘛参加政权是容许的，但最好不让大喇嘛进来，因为大喇嘛坐在机关里，群众的代表便会俯首贴耳了。番人保正当然也可以吸收一部分参加政权，但不能象炉霍之走到一个极端。这里要注意，当我们吸收了一部分旧人物参加政权时，政权的运用中，一切问题的决定必须采取较民主的办法。这样才能逐渐涌现新的可靠的干部，并掌握实权。这样才不至走上旧人物包办政权的倾向。在我们波巴青年中，要开始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工作，这一宣传要从群众切实问题

上说起（如为什么缺少劳动力等），最初要以不伤害群众的宗教感情为原则。金川省委提出组织喇嘛教改进会，革新喇嘛教，使之有助于革命，我想这是适用的。

三、土地政策。党的决定是正确的，道孚波巴依得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暂行条例是依据党的策略正确决定的，这里无容赘述了。甘孜工作的同志提出不没收土司的土地，是不对的。因为如果这样办，那么解放农奴便无从说起了。当然运用土地政策时还需要灵活点。有的同志提出可以实行平分土地，我想这是过早的办法。因为第一、在这一带不是缺少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的问题；第二、群众的阶级觉悟与斗争还没有深入。在生产事业上，现在却要以最大的努力进行春耕，所有部队机关驻地附近的土地一定要最迅速的春耕完毕，我们要为着实现“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的口号而斗争。有的同志中间存在着一种观点：“恐怕春耕的收获我们吃不到吧”，于是便放松春耕，这是必需纠正的错误观点。

四、道孚波巴依得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喇嘛与喇嘛寺、独立军的组织、粮食、发展农业、商业、保护工人娃子、借贷投资、交通、税收、牛场等等条例，我想都可作为全国代表大会的讨论基础。不过在波巴全国大会中问题的讨论需要更其切实具体而明了。譬如粮食问题来说吧，我们可以要督巴香根和我们包买粮食（一切运输均由他包办），在商业问题上我们可以提出怎样到青海去买盐。这些问题，大概比我们的条例要实际而有效力得多吧！又如关于政府问题，必须宣布一种规矩，政府要做那些事，那些事不应该做，政府人员要遵守什么规矩，这样的宣布，才能清楚认识新的政权与旧的政府之分别所在。我们提出要组织“波马沙

松巴”（番人自卫军之意），那么，必须与群众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与番人的独立联系起来，必须高高的提出“组织波马沙松巴，打到康定去”的口号。在税收问题上，我们只收正税，免除一切苛捐杂税，如果我们今天提出免除一切粮税、乌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需要给养，需要乌拉，不过我们所需要的粮税、乌拉是与汉官、军阀不同吧了！因为第一、我们只收正税；第二、为的是波巴独立解放事业的胜利。最后在全国大会中必须进行活泼的外交活动。我们可以写信与派人到德格土司那里去，同样也可以写信到西藏、到玉树去。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波巴独立运动的影响，而且在某种限度内可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某种目的。

在全国大会中最中心的一个任务便是最广泛最深入的宣传波巴的独立与我们的政策。因为在今天波巴依得瓦还存在着对我们的疑惧与不信任。其次，必须发布一个最有力的宣言，他要能沉痛的诉出番人的苦痛及来源，因为最初发出的一个宣言，如果最能诉出番人的苦处，那就是最好的宣言了。在宣言中要痛骂赵尔丰、刘文辉的残酷统治，要驳斥西藏达赖政府之政策，并指出其被英帝国主义所驾驶，要揭穿诺那的反动欺骗。

五、波巴革命党与波巴青年团的组织必须迅速建立起来。首先需要我们广泛的宣传波巴革命党的党纲，尽量的吸收较进步些的番人到革命党与青年团内来。因为在番人中一般的组织共产党的组织是不适合的（吸收个别最进步的分子进党当然是需要的）。我们正需要组织革命党并使之在党的影响与帮助下成为番人独立解放运动的骨干。同时我们极端需要训练大批的当地干部来领导番人的革命斗争。革命党与

青年团正是训练当地干部最适当最良好的学校。

其次，我们要立即开始去建立番人的群众组织了。我想□□□□□□群众组织便是百姓联合会，□□□□□□称百姓，土司、大喇嘛、大头人等是不包括在内的。那么这一百姓联合会正是番人基本群众最广泛的组织，也就是群众组织最重要的形式。要发动群众斗争，要树立群众的基础，百姓联合会的组织是不能再延迟的了。番人青年的主要组织可以采用道孚的形式——青年队，至于妇女则可组织姊妹团，因为姊妹团正是番人过去曾有过的娱乐组织。最后，各区须尽可能建立俱乐部（名称可自定，以适应番人之习俗为原则），要把对番人的教育工作最大部分在俱乐部中建立起来。至于办学校的方法那是不适用的了！因为番人过去最怕汉官的强迫读书，一直到今天，番人一听到读书都要头痛呢！

六、最后，在我们同志中间要克服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将阻碍番人独立运动的开展。其次，在汉人中更深深的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这同样需要给予教育。在番人中存在着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谓“洗汉”；其次便是一种不自信的心理，以为番人不懂事，不能办事，要汉人或土司来做官才行。还有一种极端保守的观念，以为旧的制度、旧的一切规矩都是对的，这些观点我们都要去进行艰苦深入的宣传说服工作，不过要注意防止过早的行为，以免使番人发生反感，这与尊重番人的风俗习惯是全无矛盾的。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方式是在于宣传解释，首先在革命党与青年团中须立即开始进行。

同志们！波巴依得瓦全国代表大会是有极伟大的意义的，它不仅是波巴独立解放的重要关键，而且是全西北少数

民族解放的号炮！他将燃烧起全西北少数民族解放的烽火，去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汉官、军阀的统治。我要求派到甘孜领导大会工作的同志，依据今天的讨论，正确去领导这次大会，使大会得到圆满的成功。

1936年4月29日

（选自《干部必读》第13期，1936年4月29日出版）

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①

同志们：首先让我们来说两件消息。第一、大概同志们都已知道，前天在甲洼地方，我三十二军罗炳辉同志率领的部队，已经和肖克、王震同志率领下的第六军团的先头部队会合了。（热烈的鼓掌）伟大的会合已成为事实，我们的二军团现在已经到达巴安，二、六军团的全部大队伍大概最多两星期以内便可到达瞻化、甘孜一带了。这是苏维埃运动中很大的胜利，这将开展我们更大的胜利局面，全军指战员在伟大会合的捷报之下，莫不欣慰万状，这是值得我们大大庆祝的。

必须要了解会合已成为事实了，这会合之后还有更严重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立即动员起来着实的从事于实现西北抗日根据地。这意义上来说，会合的成为事实，证明我们是胜利了的。为实现当前的战斗任务，我们要继续用争取会合实现的艰苦奋斗精神，更大的发扬阶级友爱，无尚的巩固为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斗争到底的决心。给二、六军团的兄弟们以最大的政治上鼓动，使我们能和二、六军团的弟兄团结得好象一个巨人一样，因此就必须互相学习所得的斗争经验来增加我们的战斗力量。我们还需要大批的物质上

^①这是张国焘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被迫宣布取消伪中央。这是报告内容的一部分。

的动员，去拥护二、六军团，使二、六军团的弟兄们得到莫大的精神上的愉快。这就要动员所有指战员及事务人员扯毛线、打衣服、造鞋袜，来发动更热烈的拥护二、六军团的热潮，大家切不要轻视这工作的伟大意义，这工作的重要性是和火线上打冲锋相等的！

……第二个可庆贺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地归于统一了。去年十二月时候，我们根据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目前民族革命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决议，同时不论那一方面——陕北或二、六军团也好，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在这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管那方面的党，是艰苦的为实现这一决议的精神而斗争，并且已收获了显著的成绩。最近我们和陕北方面的关系也改善了。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我们已得到了一致，并且在实际行动和军事战略方针上，都能够一致地行动了——这决不止于表现在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实现，并且陕北方面的行动也和我们在一致的战略方针下行动，这是非常可以庆贺的事，这对苏维埃运动是有莫大的意义的。

曾记得去年一、四方面军分手的时候，敌人非常高兴，甚至瞎说是共产党的“日暮穷途”了。自然，这类的谣言，现在是丝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曾经犯过相当的错误，但是党在斗争中一天天的纠正了过去的缺点，使自己学好，使自己健全化，并且懂得如何战胜过去的缺点。中国的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斗争环境的复杂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比较少，所以党内引起争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一件事。共产党的党内争论与国民党的完全不同，国民党可以暗杀自己的人，可以用到最卑鄙无耻阴谋的手段，但

是我们决不会如此。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的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大鼓掌）

关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大概大多数同志们已经看过了，这决议大家要好好的去看，不要当做一个简单的通知。在决议中，我们指出了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即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的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中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在这样的决定之下，我们同时要反对一切企图曲解这决定的分子。我们这决定为的是团结党，使党能一致的为新策略路线而斗争，这是党在原则上组织上的大团结，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共产党的行动是站在原则上的，我们斗争的是错误的路线，倘这错误路线不存在时，我们就可以归于一致了，这是共产党员的原则上的态度。

当五次战争之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是应当取得休息整理的机会，并且当时我们必须用大的力量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可是当时就发生了不顾一切的逃跑的倾向，不要少数民族工作的观念，以及向敌人的堡垒投降，认为无法创造根据地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动摇。这

时候，那些悲观失望的同志，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便是带着一部分队伍跑。在当时那样的严重的情况底下，我们是否能慢慢的等待国际或七次大会来解决呢？那时候，实在难容许我们的犹豫，我们只能自己去解决问题了。当时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战略上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争论。当然到现在新的策略路线底下，这争论是成为过去了。以后这争论可以用党七次大会或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形式去解决，我们原则上是反对不正确路线，这是必须坚持的。

自从沙窝子会议时，我们便公开出来说话，指出当时中央部分同志可以有好的志愿，但是发现了严重的错误，这是由于军事上错误，路线上、政治上的错误，这结果使五次战争受到很大的挫折。当然由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单纯的问题，而是关门主义的错误了。直到去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来以后，陕北同志们便同意了这一决定，在得到了国际的指示以后，方才表现了陕北的同志们在行动中有整个的计划。同时一般指战员艰苦卓绝的斗争决心，使陕北方面得到了新的发展和胜利。当然我们也未能过分估计这些发展和胜利。但这是证明着陕北同志们已坚决为执行国际指示而斗争。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们已回归到国际路线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向敌人奋斗。过去我们的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相当的让步，这也是为着原则上的。我们的思想斗争是为着求得党的一致，因此党在思想斗争中有他的两方面：一是向错误的路线斗争，另一方面则尽量求得党的一致。往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机械式的了解，就是犯过错误的同志已经有了转变，还是一成不变的斗争下去，这是不对的。现

在陕北同志们已经表示了转变，并忠实执行国际的指示，这样我们就应该一致起来，过去的争论留待将来解决。我们现在不但与二、六军团完全一致，并且和陕北的同志们也取得一致了。这个伟大意义必须使每个同志们深刻了解。

现在在取得一致之后，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其次，组织三个方面军，陕北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四、五、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军仍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四方面军总政委仍由昌浩同志兼。一方面军方面，是林彪同志的一军，徐海东同志的十五军。至于陕北方面，他们北上时候用的旗帜是抗日先遣军的名义，也看不出当时他们有成立军委或总政治部的模样，现在，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们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在这样的编制中也许会有些人生出些疑问，即是一方面军旧的编制中一、三军到陕北去了，只留下五军，三十二军在这方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对此我们应该如此了解。即是红军原是一体的，原本就没有什么人造的界限。比方说，陕北方面，原也有不少四方面军的编制的部队，如徐海东同志部十五军也就是由鄂豫皖出来的，曾记得往年我们到达汉中附近时，叫他们带队伍来会合，可是他们到达陕西时，我们西征了，于是徐海东同志就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会合，就成为一方面军中建制下的队伍了。现在一方面军彭德怀同志率领有四师，徐海东同志有三师，另外的游击队很多，并且也打得非常好，我们对此，就应有布尔什维

克的观点去了解问题，不应有着旧日方面军的界限主义。过去的旧毛病应一律除掉，必须发扬互相帮助，求进步、团结一致的精神，这是非常必要的。

这是关于成立方面军的意义，倘若宣布之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那么我们就按照新的办法施行，这是为的党的统一，军事上一致去求取胜利，以保证将来会合时不致发生其他意见，这是要大家注意的。

组织上既然一致，那么摆在面前的任务就是为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上面我们已经说了关于二、六军团的会合，党、苏维埃、军事上的统一，与我们必须一致去打当前的敌人，一致为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奋斗。现在我要说的是首先由一般政治的形势说起——可是这问题卓然同志已报告过了，我只想附加几点：

太平洋上的矛盾一天天加紧地尖锐起来，在帝国主义——首先是日、英、美、法——的积极准备强盗太平洋大战。

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地由远东进行冒险进攻苏联。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独吞中国而引起帝国主义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更尖锐化——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革命一天天的增长的高涨。

中国革命的日渐高涨的因素，让我先举一个例来说吧。现在泛滥全中国特别是华北的所谓走私问题，即是日本货在华北不用任何关税地流进中国，使华北的中国工商业加速度的破产，不特中国的土货并且连洋货——英国货品都打坍下去了。这样一来，不特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兴起，并且也就引起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拼死反对。美国政府首先提出九国公约，主张中国“门户开放”。英国则保持中

国的关税制度以对抗日本货的无孔不入。日本如何呢？日本说这是“正当防卫手段”，非如此不足以“抵抗中国的进口关税税则”，即是主张泼皮强赖的走私正当论。目前这走私运动日益发展，而且远至西安、成都、平凉、武都都发现大批日货，使这些地方的市场发生根本上的动摇。固然日本的目的是非将中国的市场整个独揽过来，和非将中国工商业整个打坍下去不可的。如是日本的这一步骤越来的利害，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将开展到更大范围，而英、美和日本的冲突矛盾就必然加紧尖锐化起来。当然，解决这问题，唯有直接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蒋介石的卖国外交偷偷摸摸的通过些惩办漏税条例，都不外是掩耳盗铃，掩盖他的卖国丑态吧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独吞中国，如最近的通过了二十三万万日元的大预算，其目的同时是为着进攻苏联的。现在的苏联是怎样呢？我们知道苏联现在是国际地位百倍增强，这一具体表现就是苏联的和平政策转向了更积极的活动。苏联当出卖中东路的时候，苏联的和平政策还是防御的性质，现在我们看见的是另一样子了，法国与苏联订立了互助公约，与蒙古订立了互助公约，与捷克等国也订立了互助公约。斯大林同志宣布，假使哪一个敢于公然侵略蒙古，则必定采取更积极的办法。在远东方面，表现着他的和平的领导因素。我们看得清楚，苏联过去曾采取反国际联盟的政策，这时英、法正是——反苏联的先锋，而当时战败国正是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所以其时苏联的政策是与战败国的关系，如德国保持得相当好，以反对英、法，后来德国成为法西斯蒂的国家了，天天想进攻乌克兰。假使这时苏联还采取从前一样政策，结果苏联必成孤立，但苏联为取得巩固的世界革命地

位，那继续以前的政策是不聪明的。后来德国即成为进攻苏联的急先锋，而法、英反成为亟需和平维持现状的国家了。是以苏联就加入了国联，其意义是拆散帝国主义的一致战线，使帝国主义的营垒中分成了两部，一即是少数的亟须发动战争的如意、德、日；其他即使愿意维持和平的如英、法。拆散这些国家一致的联合战线，苏联则联合英、法等国暂时不愿战争的国家一致去反对目前积极侵略的国家。如是苏联由防御的和平政策转向积极和平政策。库伦公约表示苏联在远东更加转向强硬，表示他是准备联合中国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了。

南京政府怎样？他们仍在遵守日本的广田三大原则。而日本目前的走私问题，也恰恰表示了南京卖国罪恶，这些罪恶更进一步暴露，中国抗日反蒋斗争也进一步发展。

昨日，日本人发的新闻中表示出，两广的军队已开到湖南附近来了。也许是造谣吧，但是事出有因，当然两广军阀在英国的势力下，进行一种民族反日的改良主义的运动是可能的。

目前在上海宋庆龄、何香凝这些人物中，联络了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主张“联共反日”，主张进行抗日救国运动以反对日本。他们并办有报纸，每日销流二十万份以上，如是蒋介石内部已起了极大的纷争，全国反日货的问题也起来，一般的联共反日的运动日起，而蒋介石的势力更加削弱，民族革命的势力日益增长了。

目前与二、六军团的会合，我们战斗的质量已大有进步，革命是伟大的胜利。陕北的伟大胜利，党内的一致，这一切证明苏维埃运动是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现在是证明我们已成

功于打破反共的统一战线，而结合成为联共的反日统一战线了，这是非常之对的。苏联之如何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而中国也恰恰是拆散了反动阶级内反共联日的战线，而形成反日反蒋的联合战线。

如何使这抗日反蒋的战线一天天成熟起来，这是如何使抗日救国战线成为反对南京卖国战线，而苏维埃红军之作用一天天占着决定的因素。

伟大的事变正在目前，在目前巨大十倍的革命高潮是可能最近迅速到来的。因此同志们要把这问题抓紧，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是和抗日反蒋的运动紧密联系的。这中间包括新策略路线的内容。是以上次同志们在讲演竞赛中最大缺点便是不知道如何联系抗日反蒋运动与创造西北根据地中的任务。

这一了解与过去有何不同？当我们行动中，同志们有这观点：以为打就是了，没有打红旗子即是反动，这是第一；其次，对一般群众的了解，以为真正的雇工、贫农、中农才是革命的，因此遇见大围子便以为是富农，所以只在没收征发中维持纪律便够了；日兵中以为营长以上都是反动，当兵的还要分分当好久；扩大红军也一样，首先一句话问做啥子的？雇工、贫农没有事，至于小商人便要写信问问总政治部，否则弄个右倾，便以为不得了。这些观点完全没有了么？在战士和事务人员中还是有的。现在在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中，我们到西北去活动时，就必须转换这样的观念与政策，我们不是碰见谁就打谁，而是联合所有抗日反蒋分子，一致去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即使是坚决与我们作战的部队，我们也只打他们卖国的头子，而号召联合其抗日的部队。因此必须联合所有反蒋的队伍，去提议停止内战，提议

集结所有抗日力量去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当前一般的要紧口号，就是“同一切抗日力量共开抗日救国大会”，“停止内战，一致去反对卖国贼头子”。不仅如是，还要与反日力量成立抗日联军，与各种抗日社会团体、个人成立抗日救国的大同盟或联盟。对外则联合外蒙与苏联，对内则提出十大纲领。这目的是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由此，我们就看见了这一行动方针和过去有很大分别。过去只是单纯的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打敌人，现在更要添上我们的抗日政纲、传单、标语，外交上的活动，利用敌人中各种弱点，纵横捭阖手段去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去打敌人，这一力量是要比飞机、大炮还重要的。当然学会这些策略还是要相当时间，但我们必须立即准备好。

抗日的十大纲领，我们必须牢记，好来随时运用，这纲领即是（参看前一期干部必读）。

重新研究党的策略路线，研究如何运用这纲领，这是当前的紧急任务。在这运用中也许陕北和2、6军和我们有些出入，但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以后当要搜集材料，补充起来。其中第二条即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分给群众中，有些同志中也以为连土地也不必提了，当然这需要我们根据西北情况来决定，自然，这还不是原则上争论就是了。

我们采取这策略，有没有可能性呢？有的。只要我们和张学良的部队好好的说，“为什么你们不去打日本，不夺回东北？……”假定经过我们有系统有力量的宣传，那任何人都不能说，这是没有半点希望的。如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和五马说明：不要以为在西北角上日本就没有可能来，我们还是联合起来一致去打日本。我们要好好去运用这武器，这里

必须反对关门主义，任何关门主义是不对的。我们须要走些弯路，采取些联合战线的办法，这是必要的。

这里会发生一个问题，可能在将来发展中，一面自己组成革委会和苏维埃，联合其他抗日力量成立抗日联盟；另一种则是因时间上关系，需要一下自己搞起来，给所有抗日人等以抗日名义，这也是一种发展的形式。我们已经有过这种经验。但不管那一形式也好，苏维埃的政策还是一种新的策略下的政策，我们吸收小资产阶级和白兵来参加，中立富农，没收政策不能及于愿意抗日反蒋的分子。是以我们即使创立新的苏区，我们提出的还是新的政纲，我们要采取更宽大的政策。

大家去学习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限于原则上，而要推广到各方面的运用，如政权中各种政策以至各方面。这是第一。

1936年6月6日（未完）

（原载《干部必读》第21期，1936年6月6日）

从 现 在 来 看 过 去^①

张 国 焘

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和党的路线的一个坚决的执行者，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和整个红军中一个战士，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以后，我执行着十二月决议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红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因为这是我坚决不愿意做的，没有什么理由使我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而且认为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都不应当这样做，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容许的。

我说上面这段话，我觉得是有充分理由，没有丝毫虚伪。不错，在五次“围剿”后，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会合时，我与当时的党中央有过分歧；但在十二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在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在这政治上一致的基础上，又在西康地区自动的取消自称中央的错误行

^①这是张国焘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在延安时向党中央所作的检讨。

为，成立西南局，从政治上的一致走到军事策略的一致，组织对立的撤销，一直到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的统一，和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现在我与党中央之间，没有任何的原则上的分歧了。

但是，过去有过分歧，不能不留下一些余波和痕迹，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来在主要问题上加以说明。一则我自己应当开展自我批评，检查我自己过去的错误；二则为了纠正同志中过去分歧可能发生的错误观点。因为党中央的路线是依据着世界革命的理论 and 经验，特别是联共的经验教训和中共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来决定的，是唯一的领导中国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路线；党中央是中国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所组成的，每一个党员都应当了解党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党中央是一个领导的整体，全国红军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整体，应当坚决在党中央领导下奋斗到底。

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的估计了这一现状，从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现在想来，这正是我的错误观点得着发展的开始发动，错误观点在那里呢？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五次“围剿”中客观情况，五次“围剿”中敌人采用战略战术的特点，和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这样就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

第二、在中央红军突围成为必要后，敌人追击的严重性，远过于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敌人所给予的压迫，对于这点，估计也是不足的；这就抹煞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

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一个数量很大的红军的万里长征，减员是不可避免的情况，终于达到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和大批干部的保存，正是表现着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在这一点上不应当超出党中央决议上的批评。

第三、因为有了上述两个观点，同时对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也估计过分，就发生当时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之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的意见。

第四、同样对于中央苏区对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建设工作所获得的成績估计不够，并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现在看来，上述五点为主要错误所在。

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五次“围剿”以前，五次“围剿”中和突围以后，都是执行着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一贯的正确路线，坚决领导着苏维埃和红军进行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为苏维埃中国奋斗。虽然有着关于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错误（如对十九路军）和军事策略上的错误（如党中央决议历次批评的那样），但是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基本路线是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根据当时的一般条件，所应当采取的路线。这次不能拿策略上的部分错误曲解成为路线上

的错误。

五次“围剿”中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应当永为中共的光荣。中央苏区里的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工作，发扬了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足为全国的苏维埃和红军的模范，万里长征中英勇坚决的抗战，是中共布尔什维克最堪夸耀的一页，虽然红军受着一部分损失，但万里长征中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坚强和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这是胜利的。

南下虽然是发扬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获得了创造川西赤区、红军扩大和迎接二方面军北上的胜利，但在与北上对立和形成党和红军不经常的关系上说来，是错误的，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南下在战略上虽然有他的不利之点和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执行的，可是在党员群众英勇奋斗的基础上获得了相当胜利。

那时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当由南下主持者负责。

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当有的。

就是领导四方面军的党的组织在十二月决议后，对党中央过去关门主义性质的错误的认识也是不对的。应当了解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作战协定三条件的提出，是统一战线策略运用的开始，在当时情况下，在统一战线策略运用上虽然

有着关门主义的错误，但不能解释成为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上述的错误，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起到12月决议时止，在这一段时间中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虽然12月决议开始了转变，没有再继续这一错误，向着和党一致的路上转变，但这一过去有过的错误，是应当严重指出的。

这一错误的根源在那里？

我认为领导四方面军的党的组织和自己，在基本上是执行着一贯的为苏维埃中国奋斗的基本路线，一贯的忠实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这也是后来转变到党中央领导下来的基础，对于五次“围剿”中，和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中所受损失的过右估计，和夸大领导的错误，对于五次“围剿”后，正是民族危机严重关头，应当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来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不了解，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去估计当时的军事方针，发生了军事策略上的彷徨。对于四方面军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估计不够。对组织原则不够布尔什维克的了解，军阀主义倾向得着发展，这些就是错误的根源。因此在过去一个时间中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和组织上的对立，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虽然我现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与中央一致，我应该申明坚决脱离过去有过的错误，而且反对过去的错误，并且劝告过去与我有过同样观点的同志们，应当坚决反对和脱离过去的错误。

应当认识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的，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和党中央。应当认识党和红军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反对一切派别观点，小团体观点，门户之见，地方观点，部落观点等等，这些是有苏维埃红军从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农民意识的客观原因做我的基础。应当扫清一切不正确的观点的残余，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为党当前的历史伟大任务而勇往直前的奋斗。因为党的毫无缺陷的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和一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保障。

1937年2月6日

（选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文献》第8集）

关于我的错误

张国焘

我上次那篇“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虽然揭发了一些错误，但是非常不够，甚至对自己错误没有从基本上去了解。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的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我应当申明，我已经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并坚决拥护党中央现在的路线，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路线，就不会深刻了解党目前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路线，因此，对于我自己过去错误更彻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对党的路线，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坚决的拥护。

我而且应当说到，在我与中央会合以后，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错误的过程，没有继续和加深自己的错误。但是在过

去一时期中，没有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就没有能够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对于那些对我的错误缺乏了解的同志，没有能够起积极的帮助作用。

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与那些背叛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的基本不同之点，就是我一直拥护共产国际。虽然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路线是不相容的，可是因为我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坚强信心，因此，我自信这是我能够改正错误最重要的保证。

由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恶习，堕入了狭隘经验论和机械论的泥坑，做了落后意识的尾巴，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和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发展过程中，对于时局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的估计。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估计不够，反而做了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和军阀意识形态的俘虏，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重新表现出来。因此，要彻底克服错误，我自己必须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我并且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在党中央路线领导之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1937年4月6日

（选自《党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企求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澜言（如加本人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 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以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 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均有放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般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

偶然，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到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高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

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民主义的本质而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有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为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

战是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以农民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变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

近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力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相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谓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谬误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界封锁尤严。如斯作法，岂以为人尽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基本观点上，愿作下列提议，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虑：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家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第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如此一面可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顾虑，一面于彼此融化之过程中，互相交换经验，则今后裨益抗战实力，当非浅鲜。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

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点，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谓“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的具体内容。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二十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忆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昭然，当可复按。嗣后决定采取和平方针，本人与

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之危亡，因而认为中共彼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分子。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势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亲护中共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亦亦披沥所抱之见解，深

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亦全体民族之福也。

1938年5月6日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附：张国焘部分文章、 译文、谈话、声明资料目录索引 (按发表年月顺序排列)

文 章 名 称	署 名	资 料 来 源
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 补习学校	张国焘	《劳动界》第15期(1920 年11月21日)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 报告	张国焘	《党史研究资料》(1981 年6、7期合刊)
国庆日裁兵运动	国焘	《向导》第1卷5期(1922 年10月11日)
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 略的危险么？	国焘	
——驳胡适的“国际 的中国”		《向导》第1卷6期(1922 年10月18日)
中国人民是驯服了的 奴隶吗？	国焘	《同上》8期(1922年11 月2日)
还是赞助新蒙古罢	国焘	《同上》8期(1922年11 月4日)
庆祝海参崴工人	国焘	《同上》9期(1922年11 月8日)

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	国焘	《同上》10期(1922年11月15日)
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	国焘	《同上》10期(1922年11月16日)
不要忘记了山东问题	国焘	《同上》12期(1922年12月6日)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	国焘	《同上》12期(1922年12月6日)
劳工司与劳工局	特立	《同上》13期(1922年12月)
我们对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	国焘	《同上》13期(1922年12月23日)
革命党的“否认”病	国焘	《同上》15期(1922年12月27日)
学生运动的我见	国焘	《同上》17期(1923年1月24日)
如何反对铁路共管	国焘	《向导》1卷37期(1923年8月22日)
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	张国焘译	《新青年》季刊2期(1923年12月20日)
海员的新争斗	特立	《向导》3卷108期(1925年3月28日)
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采取之方针	张特立	《中国工人》4期(1925年4月)
海员的新争斗(报告)	张特立	《同上》(1925年4月)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	张特立	

次代表大会之始末 (报告)		《同上》(1925年4月)
敬祝第二次全国劳动 大会	张特立	《中国工人》5期(1925 年5月)
“五一”运动与中国 工人	张特立	《同上》(1925年5月)
“二七”前后工会运 动史略	张特立	《新青年》2号(1925年 6月1日)
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	国焘	《向导》3卷136期(1925 年11月21日)
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 党全体党员	国焘	《同上》139期(1925年 12月20日)
国民党新右倾之反动 倾向	国焘	《同上》139期(1925年 12月)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 会的教训	国焘	《同上》145期(1926年 2月10日)
民众心目中的广东	国焘	《同上》4卷160期(1926 年6月30日)
革命势力联合与时局	国焘	《同上》5卷200期(1927 年7月8日)
中国革命能够胜利 吗?	特立	《实话》4期(1930年12 月21日)
党内必须有一个彻底 的认识	特立	《同上》
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 路线上的斗争	张国焘	《实话》9期(1931年2 月7日)

- | | | |
|---|-----|----------------------------|
| 二月二十五日一国庆
失业 | 特立 | 《同上》10期(1931年2月22日) |
| 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
两条路线上的斗争 | 特立 | 《同上》13期(1931年3月5日) |
| 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
团对于立三路线的
讨论会上的发言 | 特立 | 《布尔塞维克》4卷3期
(1931年5月9日) |
| 关于我的错误 | 张国焘 | 《党的工作》第31期
(1937年4月12日) |
| 张国焘的声明(1938
年4月22日) | 张国焘 |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 |
|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一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
抗战建国诸问题
(1938年5月6日) | 张国焘 | 《同上》 |
| 论中华民国的宪法 | 张国焘 | 《解放》第1卷6期 |
| 我的回忆 | 张国焘 | 香港《明报》(月刊)
1卷6期(1966年) |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